

主 编 李树喜

副主编 陈娇娇

编 委 张 程 陈娇娇 王 琦 夏 炎

杨 亮 李晓塘 刘 晖 衣 远

陈丹正 周 丹 李 瑛 岳泽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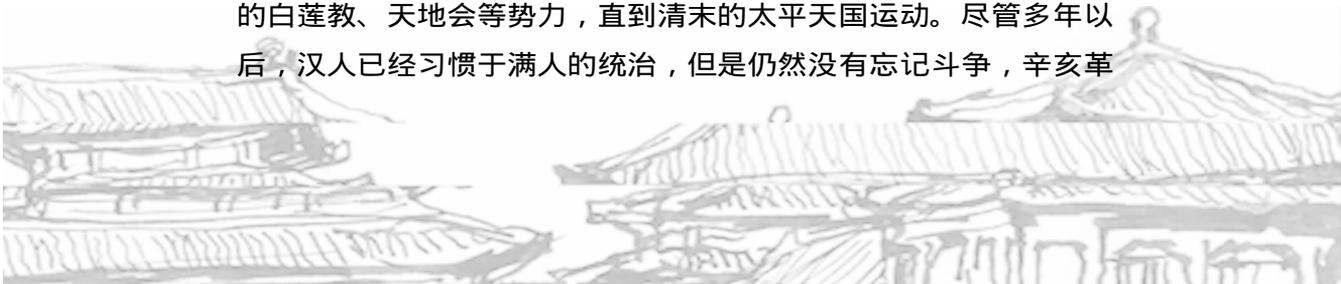
李 峻 蔡文俊 张 琴 蒋俊超

Preface

与传统的改朝换代不同，清朝灭亡是以一种缓慢而剧烈的特殊形式完成的。稳固、保守、僵化的中国传统社会逐渐瓦解。传统体制压制的各种力量、掩盖的各种矛盾纷纷登台。同时近代思想和体制持续冲击着国门已开的中国。诚如李鸿章所言，晚清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敌。

本书的主角清王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第二个统一王朝，自顺治帝山海入关到宣统退位，统治中国近300年。中国在此期间，历经了辉煌，同时也遭受了磨难，但比起昙花一现的元王朝来确实很值得称赞。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难免于被社会所淘汰。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根深叶茂”。清王朝自立国之初就没有建立起深厚的统治基础，它入关之后，采取了敌对汉民族的政策。清王朝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深深地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使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在清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对满族产生了敌对的情绪。所以清王朝自建立之初就没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以至于汉人的反抗斗争从它建立时就开始了，像早期的“反清复明”的白莲教、天地会等势力，直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多年以后，汉人已经习惯于满人的统治，但是仍然没有忘记斗争，辛亥革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命中孙中山先生不也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斗争的口号吗？满人始终看不起汉人，即使汉人在清廷中为高官，也很难消除满人对汉人的歧视。虽然满人对汉人的政策比起蒙古人来进步了不少，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和汉人融为一体。清末的民族融合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历史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这种民族悲剧在传统社会的瓦解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王朝历经了“康乾盛世”，但是以后却一路走下坡，直至最后的灭亡。虽然说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抵挡的，但是，外国列强的入侵，统治者的顽固不化，加上国内新兴阶层力量的不断斗争，确实是加速它灭亡的催化剂。清王朝自道光之后，与外国列强的战争始终不断。战争使国家实力大减，连年的战争赔款使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清廷内部的腐败势力也在趁机搜刮民脂民膏，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不断高涨，使清朝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乾隆朝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科班毕业，在国家研究院任过职，主编过四库全书，当过高官，可谓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他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透露出他的思想、见识来看，真是满纸荒唐言，全书充满神狐鬼怪之说，愚昧迷信之极。而当时西方列国科学民主正如火如荼，两者相较，从中可窥清朝灭亡的必然性，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从纪晓岚身上可看到当时的知识阶层还爬在故纸堆里，还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意识，思想上固步自封，行为上唱着老调，无视时代的发展，无视形势的变化，而此时西方科学发展正兴，中国落后挨打不免矣。

知识精英们尚且如此，那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又该如何呢？尽管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统治者仍然闭关锁国，不肯接受外国的先进制度，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正是清王朝拒绝进行制度学习的表现。虽然后来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那也只是学习



外国的表面形式而已，根本无法改变清廷的现实状况。洋务派和保守派各持自己的偏见，争执得很激烈却不曾想把西方的社会体制和夷技结合起来，当然这是不能被统治者所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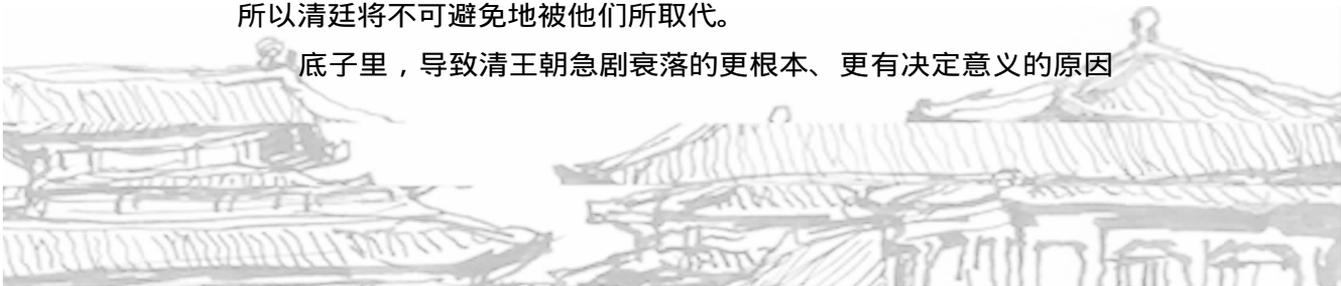
晚清中国曾经有过一次改革的契机。光绪帝（载湉）登基时只有19岁，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明君”身上。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始终未脱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现在假设，倘若没有慈禧等保守势力的阻挠，倘若光绪帝能够大权独揽，那么他的变法维新是否就能成功，是否就能挽救中国岌岌可危的命运呢？未必。因为当时的环境下，光绪的任何变法、任何维新，仍然是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皇权为出发点。戊戌变法中，维新派鼓吹的“开国会”、“立宪法”等都没有涉及。光绪再改革也不会把自己皇帝的位子改没了，最多只能是在现有制度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已，隔靴搔痒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到最后免不了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光绪帝是位希望有所作为的末代帝王，但是既得利益者总是希望把自己的利益能够“持续、稳定”地保持下去，任何的改革改良，只要不涉及到最关键的问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光绪帝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总代表，他有这个勇气和魄力迈出那一步吗？也未必。这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当时的中国宿命的悲哀。

除此之外，反对清廷的还有一股很强的势力，那就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潮流的代表，是社会的先进力量。他们掌握着引导历史前进的旗帜，所以清廷将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所取代。

底子里，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根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骄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单纯的修补已经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大清朝了。

灭亡的原因，首先源自体制的败坏。

清朝末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西方列强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民主政治制度已见雏形，而中国却仍是在皇权专制统治之下，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官员腐败，民不聊生，和整个世界潮流格格不入。

阎崇年先生解释司马迁那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说：天，天时也；人，人意也；古，借鉴也；今，通变也。的确，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民主制、工业化之时，清末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慈禧太后还通过“听政、训政、亲政”的方式实行专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真可谓逆天时，拂民意，不鉴古，拒变通。因此，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兴起，既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民意的自然选择。

这个时刻，每个人都在做着的选择。一些人决意拼命维护这座将倾大厦，另有一些人却决定推翻旧制，打造出一番新天地。戊戌六君子首先站了出来。

戊戌志士的鲜血异常刺眼，更重要的是在于戊戌喋血的意义。也许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十几年里没人看出戊戌血腥对清朝命运的最终影响。但现在的史学论述已看到这个清晰的意义：“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后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进’的手段对付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菜市口的斩杀是个信号，如果谭嗣同们的血白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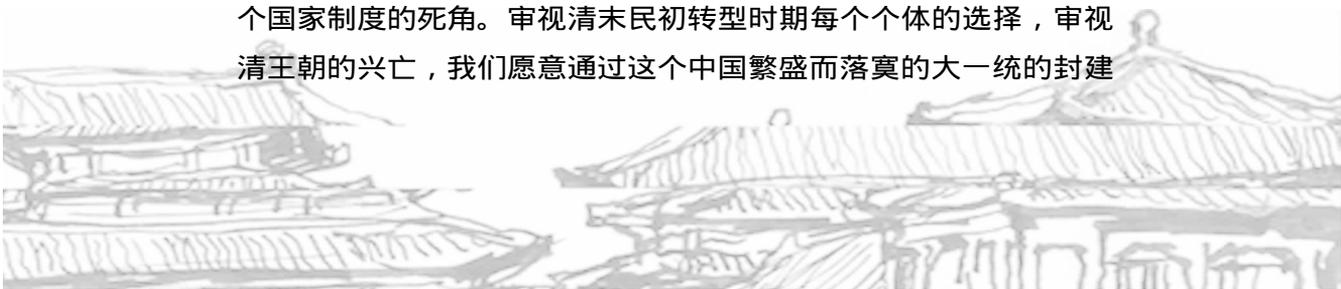
如果能真正忘却这个事件倒是中国的大幸。可惜他们的血没白流。也许没人会刻意铭记这个事件，但它的象征意义却会被每个人都记住，从此不再会有公车上书。当下一次危机出现时，一切都晚了。如果说戊戌喋血前人们还有希望，戊戌喋血之后就只剩下失望了。当 1898 年之时，清政府还有消化的能力，引导的能力，控制的能力。到武昌起义之时，它连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有了。

1900 年列强铁骑踏入紫禁城是偶然还是必然？群众爱国主义被借来作为慈禧抵抗列强要求变法压力的工具。义和团兴起 10 年之后的 1911 年，该来的日子终于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政府与民间一场经济纠纷，一场铁路权益的争执。清朝终于灭亡了。

清朝的灭亡还在很大程度上是灭在了自己的手上，灭在了清王朝统治者那种天生的夜郎自大的态度上。满族是在马背上得到的天下，所以他们尚武好兵，清初对国人采取了过激的措施，所以得天下不能得民心。清朝同时又处于一个纷繁复杂的年代：西方大国的崛起，朝廷内部的腐败堕落，还有农民以及新兴阶层力量的不断运动，这些外在的因素更使其灭亡的速度加快。

清朝撑得很累，也许灭亡是它最好的解脱。

本书第一、三章由张程完成，第二、四、五章由陈娇娇完成。我们在写作过程中真是感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作为后来者，我们能够从这些被大浪淘尽的“英雄”身上探究足堪我们今天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我们在 21 世纪的今天回首清王朝灭亡与民国兴起这段历史的缘故。中国，中央伟大之国，不偏不倚。清朝有几代皇帝亦是勤勉有嘉，前几朝人才济济，大清朝亦是繁盛的很，后百年受尽侮辱，究其原因，不在于外面敌人的强大，而是腐烂从里面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官场文化，虽然博大精深，远非蛮夷之邦可比。但勾心斗角，恃势弄权，是这个国家制度的死角。审视清末民初转型时期每个个体的选择，审视清王朝的兴亡，我们愿意通过这个中国繁盛而落寞的大一统的封建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国家的最集中的历史，愿意通过几个权力人物的兴亡，带给读者一个相对感性的历史图卷！文字有时冰冷得可怕，有时又激情似火，在这火与冰的感受中，能否带给读者一个深刻的印象，能否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深层次的权力考量上来，全看读者阅读这系列文章时能否与作者发出共鸣了。共鸣是艰难的，特别是我们驾驭文字的功力尚不到火候，如果读者认为还有可取的地方，那将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与支持。

谢谢大家。



第一章 | 天朝的危机

咸丰之死
庙堂危机
这个女人不简单
圆明园的哭泣
“长毛”也占半边天
刺马案与湘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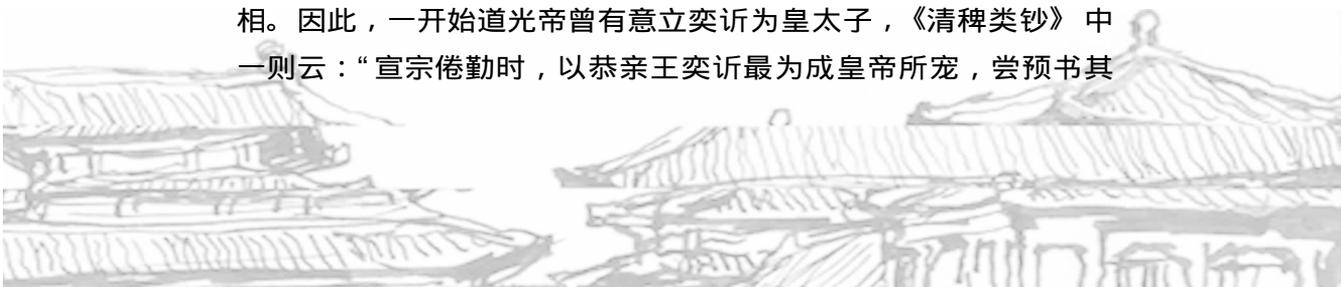
第一节 咸丰之死

在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以吝啬出名的道光皇帝正处于风烛残年。道光皇帝除了吝啬、迂腐、平庸，总体上还算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他一辈子都在思考着怎么把祖宗的基业维持住，怎么让国库的银子不少下去。为了因鸦片走私产生的越来越大的银子缺口，道光皇帝不惜与英国人打了一仗。谁知道，平庸的道光皇帝战和不定，最后竟然输给了蛮夷之邦。国库的银子反而是越来越少，连祖宗传下的香港岛也给割了。道光帝实在是愧于列祖列宗。

但是让他最头疼的问题是给大清王朝挑选关后的第七位皇帝，一位合格的太子。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已经是 65 岁的老人了，挑选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道光皇帝一共有 9 个儿子。其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已先他去世。五阿哥被过继给了醇亲王绵恺，失去了继承资格。七阿哥（奕，日后光绪皇帝生父）、八阿哥、九阿哥都还年幼。真正参加继承者竞争的只有 16 岁的四阿哥奕和 15 岁的六阿哥奕訢。

奕与奕訢相比，除了年长一岁，不论是论文才，还是论武功，都远不及后者。从面相看，奕小时候骑马摔断过腿，还得过天花，所以脚稍微有点瘸，并且脸上有麻子。而奕訢帅气威严，有帝王之相。因此，一开始道光帝曾有意立奕訢为皇太子，《清稗类钞》中一则云：“宣宗倦勤时，以恭亲王奕訢最为成皇帝所宠，尝预书其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名，置殿额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末笔甚长，疑所书者奕，故其事稍闻于外。宣示知而恶之，乃百守立宗。”

道光皇帝为什么之后选择了奕，自然没有野史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道光对两个儿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在这些考察中，奕的平庸反而取得了父亲的欢心，战胜了奕訢。

清朝尚武，皇室每年有围猎的传统。通常这也是检验皇子骑射才干的考试。因此每一年的围猎都被天下看作是各位皇子表演的舞台，被看作是刺探皇位更替的指向针。这一年的围猎，人们都将目光对准了奕与奕訢。

奕訢正常发挥了他的武功，骑射功夫出众。他率领部众打到了许多猎物。奕则力弱多病，干脆呆呆地站在一旁，一箭不发。围猎结束后，奕訢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去见父皇。道光看后非常高兴。道光见奕及其部众毫无所获，大惑不解。奕平静地说：“父皇曾经多次教导孩儿，要有仁爱之心。春天正是万物孕育的时候。现在正是春天，如果我把它射死了，那么就连它腹中尚未出生的幼兽也射死了。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所以一箭未发。”道光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也有欣慰，当中称赞奕心胸开阔，有仁慈之心。

奕此举并非他的实情。在围猎之前，奕认为毫无超越奕訢的可能，非常焦急，就去请教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杜受田告诉他要以“愚示仁”，不以武功取胜。结果虽然他两手空空，却和六弟打了个平手。

道光皇帝还是难以在两个儿子中取舍，于是以国家大事相置询。道光先传旨召六阿哥奕訢问策，询问他对当前国事政务的看法。道光先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可能不久于人世了。现在我想听一听，你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看法。”奕訢便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道光听着也频频点头。奕訢对时弊看得很深，对各领域政务都有比较明确的设想。做父亲的道光自然很高兴。

道光又召见了奕，把刚才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再向奕询问治国良策。奕却一言不发，长跪在地，痛哭不已。道光很奇怪，一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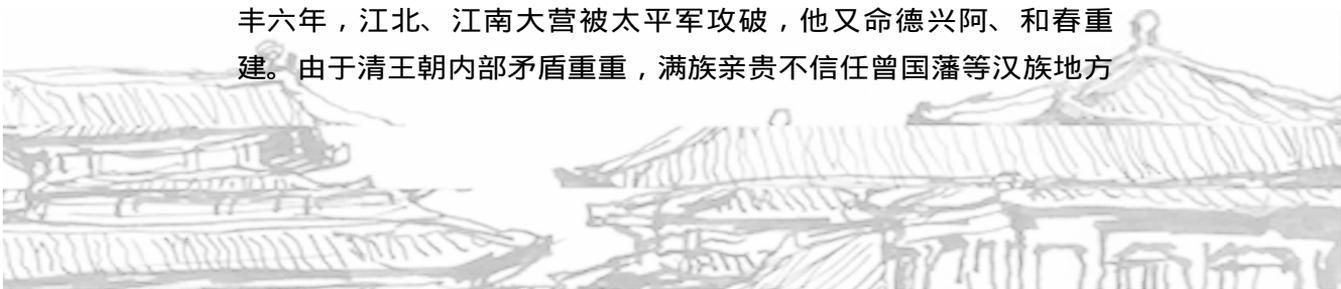
催促他快点回答。于是，奕流着眼泪回答：“儿臣希望父皇健康长寿，永远也不要离开我们。我要永远留在父皇身边，好好侍奉父皇。”道光闻言，长叹不语。之后转问了几个琐碎问题。这回，奕答了，并无大的方略，只是延续了父亲道光的既定策略而已。据说，这又是奕的老师杜受田教导的，以愚示情。

最终，道光在奕与奕訢之间选择了四阿哥奕。奕与奕訢两人的表现，将各自的能力、眼光表现得一览无余。道光为什么选择前者，而不选择能力出众的奕訢呢？因为道光从奕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奕虽然长相丑点，学识和武功差，但仁爱孝顺。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老实，守规矩，恶变革。这既符合倡导儒家的仁爱和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又让同样墨守成规的道光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决定弃奕訢，而立奕。如果道光是一位锐意改革，奋发图强的帝王，他就会选择奕訢。

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奕正式登基，改年号为“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就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

咸丰登基之初，与许多年轻帝王一样，也有过锐意图强的创举。但是一来国家积弊日深，二来咸丰能力有限，依然是新瓶装旧酒。结果是朝政毫无改善，反而是打击了咸丰自己的积极性。咸丰也真是苦命，刚即位，太平天国运动就爆发了。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完善的农民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几乎断送了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开始以传统镇压农民起义的方式一再围剿的同时，又要防止汉族官僚掌握实权。结果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弊政的总体现，成为封建社会保守僵化、积贫积弱局面的总爆发。太平天国越剿越多，直至建立了与清朝相抗争的政权。

咸丰先是派赛尚阿前往湖南防堵，无效。咸丰三年，向荣、琦善分别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再命曾国藩等人广办团练武装抵抗太平军，派僧格林沁阻击太平军北伐。咸丰六年，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他又命德兴阿、和春重建。由于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面——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武装，不肯委以重任。而八旗子弟又腐化堕落。因此，咸丰日夜操劳，左右支招，清军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却屡遭失败。

茅海建老师的《苦命天子》一书是研究咸丰的通俗而深刻的专著。他认为咸丰年代“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腐败已经使得“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官场腐败，行政敷衍塞责。咸丰勤政指挥，甚至倾尽家底，但屡战屡败，局势每况愈下，最后不可收拾。咸丰困惑不解，他以传统的方法来惩罚自己，两次下《罪己诏》也丝毫不起作用。慢慢地，“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又于咸丰六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先帝一样，咸丰在外国武装的威吓下，愚昧无知、战和不定。结果一次次错失良机，方寸大乱。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后，咸丰赔款、修改税则、开放通商口岸都可答应，就是死扛“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一条，拒不见外国公使，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气象。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咸丰帝匆忙逃往热河，命令受封恭亲王的奕訢留驻北京，以清政府全权代表身份与英法议和。这一去，咸丰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平心论咸丰一朝，咸丰并非昏君，也想奋发图强；清朝也拥有曾李胡左等干臣。如果在和平时期，咸丰也算是个成功的守成之君。遗憾的是，咸丰及其大臣身处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强敌”。输就输在观念，输在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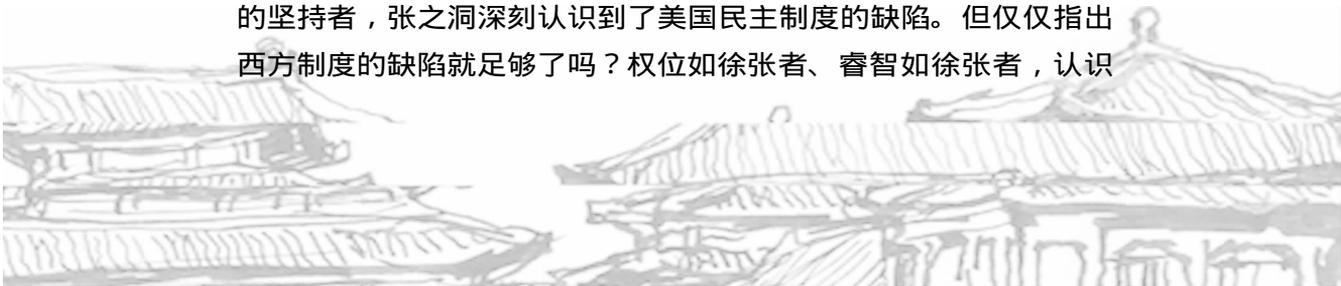
在18世纪的时候，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潮”。当时的欧洲对中国认识不多。中国俨然是繁荣、祥和、发达的国度。中国的制度是完美的，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看来足以成为欧洲改革发展的方向。中国的一切，都散发了耀眼的光芒。但是经过鸦片战争，到了咸丰朝的时候，当时的欧洲和美国又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热潮。西方知识界和舆论总体的态度可以用8个字概括：善意还在，尊敬不再。

西方人眼中的中华帝国开始变得愚昧落后。因为中国专制保



守，缺乏社会保障、没有近代医疗、交通设施贫乏，甚至千百年来固执地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力，但就像一位穿着破旧丝绸衣服的老太太，守着宝藏向西方国家要饭吃。虽然不能说这是全部西方人的观点，但它确实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趋向性的。110年前的美国人把中国人看作“不受欢迎的移民”，审视者既往的敬羨和热情没有了，代之以诧异不解、冷淡蔑视、讥讽贬抑，至好也不过是冷酷的漠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忽视。近代西方不乏清醒、全面、深入观察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家和思想家。这是在对中国认识增加、思考加深的基础上，西方得出的结果。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的思考是超前的、正确的。

中国人在政治认识领域缺乏这样的心态和人物。英文“president”一词进入中国后，晚清国人将其意译为“总统”，取总统职权“总而统之”的特点而定。从总统一词的译法，对比清朝存在的“都统”、“统领”、“总管”等官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人试图将这一现代政治名词划入中国政治习惯的努力。曾任福建巡抚的晚清思想家徐继畲惊讶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徐继畲，《瀛环志略》）徐继畲的认识一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思想，二来并不深入。他看到了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首创共和的功绩，但缺乏深入比较认识的能力。稍晚的思想家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针对清末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他认为：“其国（指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恶。华人之称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张之洞，《劝学·正权考证》）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持者，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但仅仅指出西方制度的缺陷就足够了吗？权位如徐张者、睿智如徐张者，认识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尚如此，更何况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衣衫褴褛又目不识丁的百姓们。

鸦片战争时，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

咸丰朝，中西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中西互识的天平也在向西方倾斜。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缺乏不是途径问题，而是心态问题。咸丰和几乎所有的晚清国人沉浸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不愿意转换心态，客观地认识世界。承认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这才是天平倾斜的根本原因。

茅海建老师在《苦命天子》一书中这么评价咸丰：“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第342 - 343页）咸丰在位11年，“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内忧外患，遍地硝烟，使得咸丰如坐针毡，忙得不可开交。当李开芳的北伐军逼近北京的时候，京津一带的官僚富豪几乎逃避一空。不知道在紫禁城一日数惊的咸丰帝作何感想？当强大得多的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已经完全缺乏胆量和气度坚守北京了。中外军队略一接触，咸丰帝即以“狩猎”为名，狼狈逃奔热河，至死也未敢再回京城。

相反，当时只是贵妃的慈禧太后倒坚持咸丰留守京城。遗憾的是，慈禧太后的话被肃顺等人“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给顶了回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三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口授遗诏，立惟一的儿子、年方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要求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在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为关键人物，而载垣、端华两位王爷庸馈无能，毫无主见，为肃顺所驱使，形成了以肃顺为主的政治集团。肃顺集团的权势，此时达到鼎盛。第二天，咸丰帝死在了承德，年仅31岁。



咸丰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让天下平和，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留给天下的是一个纷纷扰扰的危局。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10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咸丰憧憬过，也努力过，可惜他用过的千方百计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内容，换来的只能是失败。作为百姓或者普通官吏，咸丰不失为一位可交往的朋友，但作为国家领袖、全民的“天子”，咸丰的缺陷就是国家的缺陷，在东西较量的关键时刻使国家堕入了悲剧的深渊。

阎崇年先生评价咸丰皇帝的一生有三错：错登皇位，错失京城，错立后事。皇位是他千辛万苦算计来的，遗憾的是并没有成为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京城是他主动放弃的，从此一去不复回，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临终时设立了顾命大臣，本想辅佐年幼的独子，却加剧了身后的党争。

自咸丰死的那一刻起，政治阴谋就开始在庙堂之上酝酿、生成。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二节 庙堂危机

咸丰帝死后，朝廷立刻陷入了党争。党争在历朝历代都是为君者力行禁止的。咸丰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正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之后的庙堂危机。

咸丰帝刚即位时，即按先父道光皇帝的遗诏，封19岁的奕訢为恭亲王，恩遇超过其他诸王。这可能是道光皇帝对奕訢这个皇位竞争失败者的补偿，也可能是希望弟弟的才能能够辅助忠厚守旧的哥哥，匡扶大业。1852年，奕訢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入安徽，杀入河南，直逼直隶。在危机时刻，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奕訢成为了掌握实权的亲王，威信日隆，在镇压太平军北伐期间“参赞军务，夙夜勤劳”，布防及时，为守卫京畿消灭北伐太平军立了大功。但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帝妒嫉奕訢的才干，又担心弟弟势力过大，就借口奕訢在其母丧期间为母争封，礼仪失当，于1855年罢免了奕訢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统等要职，仍命在内廷行走。^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于1860年8月逼近天津。9月18日，怡亲王载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等人拘留了英国使团巴夏礼等26名英国人和13名法国人。侵略联军决定向北京进攻。9月21

^①徐海娜：《恭亲王奕訢》，载于《文史天地》2005年第10期。



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咸丰帝逃往热河命奕訢留京议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奕訢，在大兵压境之下，代表清朝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当时的北京依然保留着政府框架，大批官员留守，京畿军事力量仍在，都受奕訢节制。咸丰皇帝西逃承德，却使自己防范的弟弟成拥兵在外、自成气候的亲王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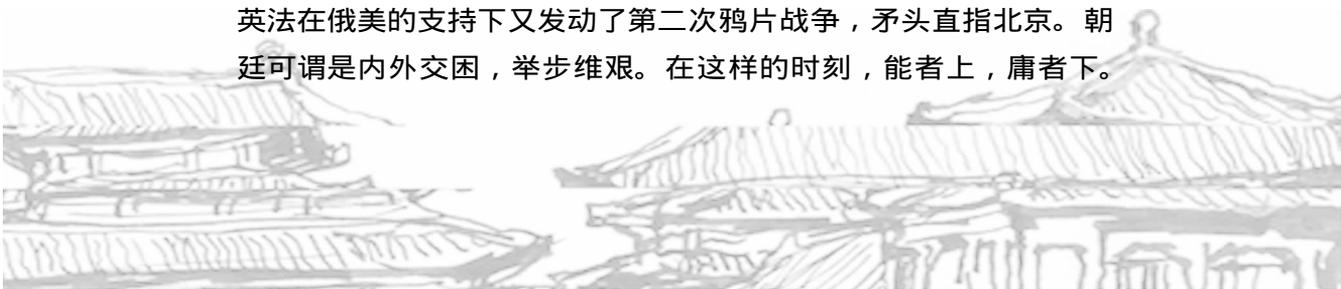
主持与西方交涉的奕訢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在西方近代物质成果面前大受刺激，立志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的道路。这期间奕訢逐渐思想开明，转化为鼓吹洋务改革的首领。于是，奕訢集团拥有了独立的、相对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政策武器，足以在思想上与热河的宫廷相抗衡了。咸丰十年（1861年），奕訢建议并创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通商和外交事务。奕訢和桂良、汶详任总理事务大臣，势力更加强大。

这样清廷无形中产生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以奕訢为首，由在京的王公大臣组成。他们凭借总理衙门这一机构，掌握清朝外交大权，又逐渐经管通商、关税等事务，把握了清廷的财税大权。西方列强支持相对开明的奕訢集团。另一个是围绕咸丰帝，以肃顺为首的在热河行宫随驾的一班近臣组成，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双方在咸丰帝生前就在议和、回京、借师助剿等问题上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如果说亲王势力集团的形成有他的先天优势，那么权臣势力集团的形成背后，往往充满政治斗争故事。肃顺集团就是如此。

肃顺，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一字豫庭。郑亲王端华异母弟，由宗室入仕。咸丰初以敢于任事渐受重用，地位不断升迁。历任正红旗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工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御前大臣，一时握有国相实权。宗室和外官多人前来依附，形成肃顺集团。

肃顺的兴起不是靠阿谀奉承，而是凭借干练刚毅而得来的。他的上升期正是清王朝在太平天国打击下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同时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矛头直指北京。朝廷可谓是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时刻，能者上，庸者下。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当时的军机大臣诸人都是无能之辈，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如老中堂彭蕴章被外界戏称为“彭葫芦”。这样的大臣在国家危局，财政捉襟见肘之时自然难以胜任。年轻的咸丰帝就深感“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因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将军机大臣弃置一旁，起用勇于任事的肃顺。肃顺等人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改革财政、重用汉臣、训练乡勇等政策。

同时，肃顺的个人表现可圈可点。首先他为政务实，雷厉风行。为镇压太平天国，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胡林翼、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其次在对外方面，肃顺坚持国家主权利益，维持天朝尊严。他不畏强敌，奋起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肃顺在御前坚决主战。1859年，肃顺负责与俄使伊格纳季耶夫谈判。他严词拒绝沙俄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璦琿条约》文本，掷在谈判桌上，严厉斥责道：“一纸空文，毫无意义。”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肃顺随驾咸丰逃往热河，次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主管行政事务。

肃顺的上台与咸丰八年这一年关系密切。在这一年，肃顺趁“议约违旨案”和“戊午科场案”在派系林立、强手遍布的政坛里异军突起。

先说“议约违旨案”。在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命令桂良、华沙纳前往议和。耆英也自告奋勇前往。咸丰帝出于对耆英的器重，想让他扮演“如桂良、华沙纳所许，该夷尤未满意，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弥进京之请，则更妥”的角色。但被寄予厚望的耆英却擅自离开差次，“不俟旨回京”，也就是没等咸丰同意就回北京了。载垣、端华等抓住耆英违旨的把柄，奏请将擅自回京的耆英“讯明正法”。奕訢等复议，为其开脱，理由是“遍查律例，并无大员奉使擅自回京，作何治罪专条”，认为“量予未减，定为绞监候”。按惯例，绞监候是死缓，大员绞监候往往一段时间后释放。当时肃顺“独具疏请”，认为耆英原本为“弃暇录用，委任办理夷务”，却“不顾大局，避而奔



回”，假如以后“皆相效尤，畏蕙潜奔，成何事体”。肃顺等人坚持要求将耆英“立予正法”。最后咸丰帝朱谕耆英“自尽”。^①这一事件是咸丰生前两派政治力量斗争的反映，也显示了肃顺一派的政治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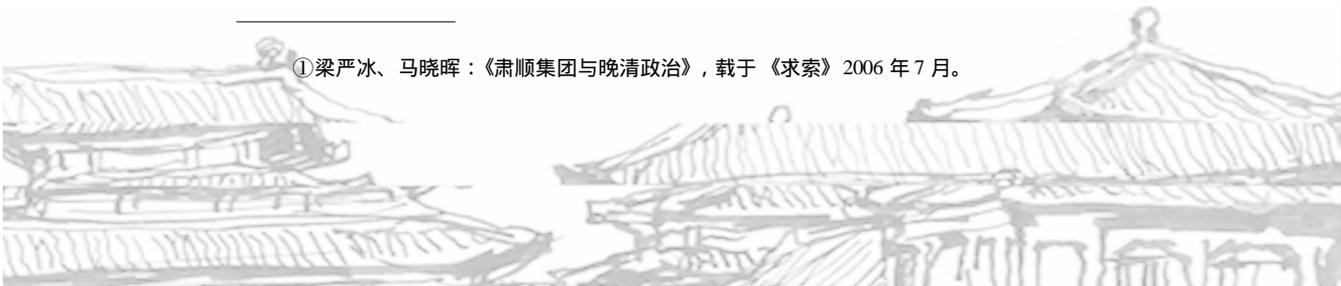
咸丰八年，顺天府乡试科场考官舞弊，发生“戊午科场案”。这是清朝多次科举舞弊案中的一件。戊午年九月十六日顺天乡试揭榜。当时舆论哗然，因为不学无术的著名“票友”平龄榜上有名。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帝，揭露此次乡试有诸多舞弊行径，奏请立案审查。孟传金指出了此次科举主考和同考官相互推荐人选，各自录取，其中考取的平龄的考卷朱墨不符。咸丰帝当时正想严查官场腐败，下令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组成专案组。

平龄是旗人，在考试的时候还在外面登台演出，竟高中乡试第七名。载垣、端华等提审平龄。他支吾不清，不久猝死在狱中。复查平龄试卷的时候发现其墨卷内草稿不全，朱卷诗内有7个错别字曾被改过。之后专案组在圆明园的九卿朝房复勘全部试卷，发现有问题的试卷50本之多，甚至有的试卷错别字有300多个，这种人竟然也高中进士。咸丰闻讯大怒，著令将主考官柏葭革职，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听候查办。

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非常关心此事，暗地访踪查迹，查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进士、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载垣、端华等马上传讯罗鸿绎，罗供认他为了考中，贿托兵部侍郎李鹤龄，乡试同考官浦安等。浦安还告诉他“柏中堂门丁靳祥”参与科场舞弊，牵出主考柏葭。靳祥已随同柏葭之侄、分发甘肃知府的钟英离开京城，最后在陕西潼关截获归案，押回不久病死狱中。浦安、李鹤龄在审讯中将柏葭接受嘱托情节合盘托出。

咸丰九年二月，专案组上奏结案。其中力请将柏葭“拟斩立决”。柏葭，蒙古正蓝旗人，历任刑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

^①梁严冰、马晓晖：《肃顺集团与晚清政治》，载于《求索》2006年7月。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协办大学士等职，典试戊午乡试不及一月就位迁大学士，旋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于柏葭为当朝大学士，两朝重臣，对他的处置成为科场案中最大的政治问题。

四大臣联衔上奏的当日，咸丰帝便在勤政殿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商议处置。各大臣鸦雀无声。咸丰帝本想对柏葭从轻发落。这时肃顺出来力争，认为科举关系朝廷信义，士人典范，对柏葭“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咸丰帝最后以柏葭触犯科条，判斩立决。午后3时，肃顺与刑部尚书赵光奉旨赴市曹监刑将大学士柏葭斩首。柏葭成为有清一代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惟一大学士，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也被同时斩决。

浦安之前还供出自己在科场中曾闻及副考官程庭桂烧毁条子的情节。副考官程庭桂因此也受到专案审讯。程庭桂供出专案组成员、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潘敦俨等都向场内递过条子，请托。兵部尚书陈孚恩因此自请开缺，为咸丰挽留。程庭桂也是道咸两朝重臣，对其如何论罪朝内也颇存争议。载垣等拟请将程庭桂父子斩首。最后咸丰帝将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7人分别革职，发配新疆。同时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因失察科场革职，陈孚恩、潘曾莹、潘铎等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级调用，李清凤病死免罪，同考官邹石麟、徐桐以更改朱卷被革职。

戊午科场案至此审结。

其间还有一个插曲。清代凡是一品大员临决之日，多加赦免，改斩为戍，这也是清朝自立国之初就沿袭下来的惯例。柏葭被绑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前也以为到时候咸丰一定会刀下留人，赦免其死罪。于是他叫家人打点行装，准备圣旨一到，就起解登程。没想到，咸丰拿他做了整顿吏治的榜样。

在整个事件的处理上，肃顺利用了年轻的咸丰皇帝立志整顿吏治的决心，处死了柏葭。嘉道以来，吏治败坏，正如曾国藩所言：“京官办事通病大要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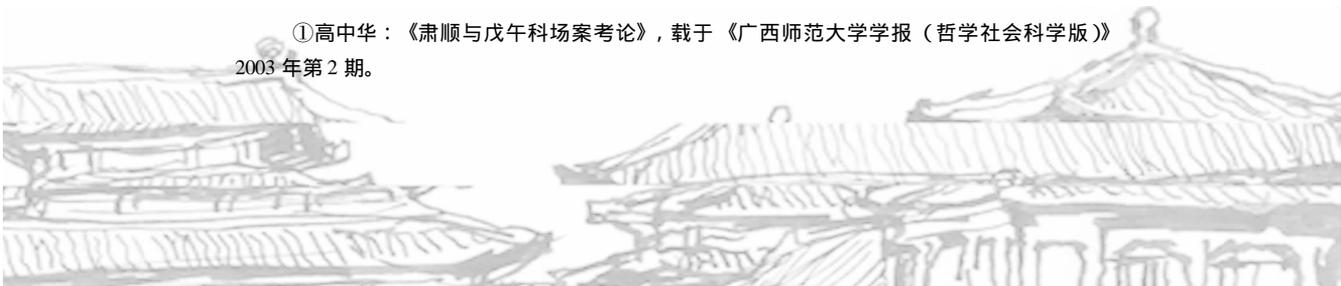


曰敷衍，曰颛顼。……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咸丰帝对此深恶痛绝，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出发，为了一件科举舞弊案郑重其事地召开御前会议。戊午科场一案对整治科场积弊和肃清吏治确实收一时之效。《春明梦录》一书评论道：“京师场弊，自大学士柏葭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之后朝廷会试，纪律严格。士子入场时官员搜检片纸之字都不许带入。可惜肃顺辛酉断命后，科场旧习又沉渣泛起。

“议约违旨案”和“戊午科场案”的处理，肃顺自然有肃清吏治的考虑，但是更多的是借机排斥异己，打击顽固守旧派。两案发生时，太平天国运动摧枯拉朽的打击正令朝廷疲于应付，实力丧失殆尽。汉族官僚利用募勇办练，势力发展迅速。曾国藩及其湘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湘军的发展受到顽固派支持的政府的处处限制，处于既无军饷又无地方支持的地步。但严峻的形势又使得朝廷必须借助汉族实力派，放权地方，维护统治。当时以祁寯藻为首的旧贵族官僚集团对军人抱有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处处限制地方武装。彭蕴章、柏葭等都是严肃谨慎的顽固守旧派。而肃顺集团一开始就意见相反。他主张以汉制汉，务实执政。肃顺对曾国藩、胡林翼等多有支持。但是肃顺缺乏资历名望，其政策主张受到顽固守旧派的反对阻碍。而两案刚好为肃顺集团打击反对势力提供了最佳武器。之后，肃顺又通过咸丰九年户部宝钞案和十年何桂清脱逃案，先后打击了协办大学士周祖培、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和首席大学士彭蕴章。这些大案极大打击了当时的内阁和军机处的势力，进而削弱两大机构的实权。最高权力逐步由军机处转移到御前大臣肃顺、载垣和端华手中。咸丰九年十月，肃顺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年正月，被授为御前大臣。^①

经历这一系列政治斗争，肃顺借助权位和咸丰帝的器重，力主

^①高中华：《肃顺与戊午科场案考论》，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重用湘军，大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平定太平军。曾国藩不久以兵部尚书衔任两江总督，并为剿匪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各省军务。虽然肃顺集团最终失败了，但政治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已经完成，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壮大，慈禧太后依然重用汉人，借助地方实力派执政。肃顺集团务实的政策主张并没有改变。

但是肃顺之人律己不严，而律人过严，结果在贪污成风的官场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反对暗潮汹涌。在肃顺集团失败后，马上有人为戊午科场案翻案，要求重新评价该案，起用科场案中被革职的官员，并明确请求为柏葭昭雪。同治元年正月，朝廷发布上谕，指出肃顺等人因与柏葭有私仇，借科场案擅作威福，致柏葭身罹重辟；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办案不力，降级调用；弹劾科场舞弊的孟传金被视为多事，发回原衙门。但慈禧太后也认为柏葭罪行确凿，不过行刑太重罢了。之后同治帝召见柏葭之子候选员外郎钟濂，加以抚慰。

这里的慈禧太后也是在同一时期崛起的第三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但真正让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由选秀女入选咸丰后宫，在残酷的后宫争斗中脱颖而出，并生下了咸丰帝惟一的儿子——载淳。

慈禧太后不是个简单的女人，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第三节 这个女人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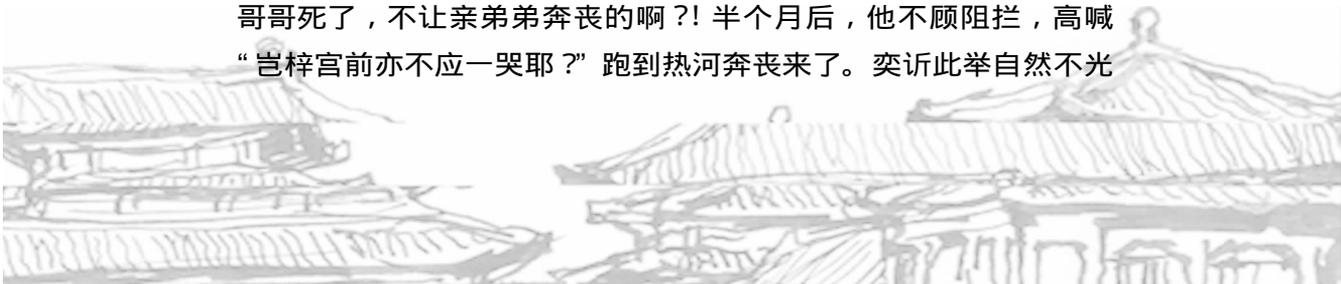
1861年咸丰帝病危时，将身后的大政托付给了肃顺集团。8月22日咸丰帝病逝，遗命载垣、端华、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执政，总摄朝政。

肃顺不用说是谁了。端华是他大哥，是世袭郑亲王；载垣爵位是怡亲王，也是皇族；御前大臣景寿是咸丰的妹夫。

但咸丰在临死时，人为制造了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他将自己的两枚印章（“御赏”和“同道堂”）的作用提升。“御赏”章让皇后慈安掌握；“同道堂”章由同治掌握，同治年幼归慈禧掌握。咸丰规定皇帝发布诏谕时，除了玉玺必须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这就使肃顺集团的大权受到了极大限制。

咸丰帝死后，肃顺8人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第二天，群臣为太后上尊号，尊咸丰皇后慈安为“皇母皇太后”，新皇生母慈禧为“圣母皇太后”。载淳登基，定第二年改元祺祥。这一切都是程序。热河朝廷仅命奕訢继续留京办理一切事宜，意在防范政敌前来热河干预新政。

奕訢自然不会在北京等着被肃顺集团收拾。肃顺集团强留奕訢在京，不让奕訢集团的人员参与新朝。但是奕訢搬出孝道来：哪有哥哥死了，不让亲弟弟奔丧的啊？！半个月后，他不顾阻拦，高喊“岂梓宫前亦不应一哭耶？”跑到热河奔丧来了。奕訢此举自然不光



是哭哥哥，也是哭自己，是哭给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看的。他希望形成后宫与北京留守力量暗中联络，共同对付肃顺集团。

现在的问题是，奕訢怎么和后宫“接上头”？

肃顺集团对其他两大势力都有所警惕，对后宫防范严格。奕訢只能要求与太后直接会面，“叙亲情”。当奕訢在咸丰灵前哭得昏天黑地再提出这个要求后，肃顺擦干泪水说，不行。在场的八人集团之一的杜翰也说：“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可是庸碌的端华却认为：“阻乖于礼。”奕訢抓住把柄，更加坚持。这时后宫也传出话来，说既然众大臣不让单独见面，那就让众大臣陪着王爷一起来后宫见面吧。叔嫂见面，哪有奴才们监视的啊？这更不成礼法了。八大臣忙说，“不了，不了，我们就不进去了，还是请亲王进去吧。”奕訢“乃得一人独进见，两宫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双方“奏对良久”。叔嫂3人在后宫密商，确定了回京（咸丰必须回北京下葬，朝臣要护送）发动政变。

奕訢出宫后，北京、承德两头就开始了政变筹备。

奕訢在承德度过了悲痛欲绝的6天，回京了。3天后，道光第七子、日后成为光绪生父的醇郡王奕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北京周边军队的实权。（奕终生都在扮演这样的政治助手角色。）

任命发布的第二天，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上了奏折，发动了前哨战。

董元醇的奏折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立论，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他大赞两宫，“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肝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外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但是清朝向来没有垂帘听政的制度，因此董御史说“我国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第二，要求遣派一到两个亲王辅政，董元醇称：“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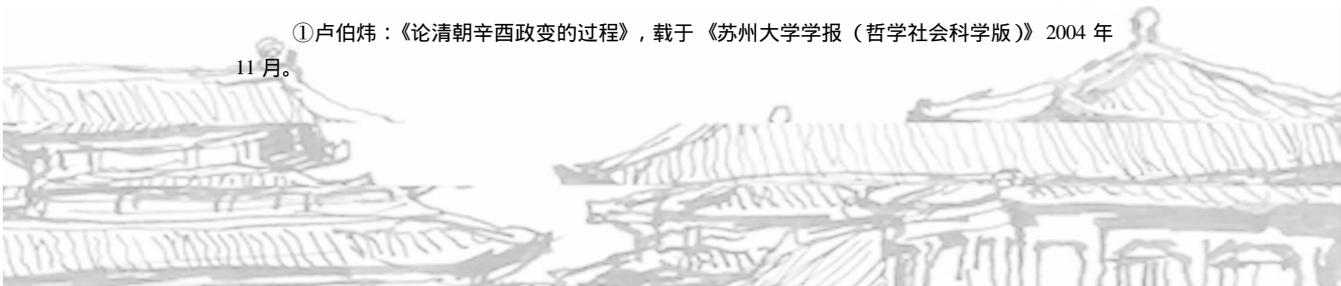
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律各尽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第三，董元醇要求给幼皇加派师傅一两人，意在建立宫内外稳定的联络渠道。“董三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咸丰帝的临终安排。^①

这份言辞激烈的奏折引起了9月16日的激烈廷争。参加董元醇奏折讨论的一共有11个人：两宫太后、小皇帝、辅政八大臣。慈禧和慈安坚持要批准董元醇的奏折，肃顺8人坚决不同意。双方都不肯让步，发生争吵。肃顺勃然抗论，极言不可，声震殿堂；载垣也当面咆哮，认为他们“赞襄皇上，不能听从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就是说本来让太后看奏折就是多余的事；杜翰声称“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也就是说如果太后同意了，我们也不奉命执行。慈禧太后气得双手发抖，双方激烈争论达两个小时之久。史载：“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就是说小皇帝吓得直哭，尿了裤子。廷议不欢而散。

肃顺坚决反对清朝太后垂帘听政，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则串通慈安拒绝盖印，将奏折留着不发。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则声称不理朝政，罢工示威。最后两宫太后不得不让步，下旨严厉斥责董元醇。

董元醇本来就是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上奏折的，现在慈禧等于是自己下诏书打自己的嘴巴。16日的廷争坚定了慈禧除掉肃顺集团的决心，并加紧部署政变，尽管表面上依然对八大臣优待有加。10月7日，慈禧谕令端华改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载垣、端华、肃顺等3人以事务繁忙管不过来为由，恳请改派。步军统领掌管整个北京城的卫戍部队。肃顺集团让出这个职位可能觉得北京的军权实际意义不在。端华坚持担任行在（皇帝暂住地）的统领。慈禧马上免去端华步军统领职务，将他管辖的健锐营调走，削去了肃顺集团的兵权。

^①卢伯炜：《论清朝辛酉政变的过程》，载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当时驻防热河的主力军团还有钦差大臣胜保部和宫内侍卫大臣荣禄部。在宫外的奕訢积极争取和荣禄两支武装力量的支持。胜保当即表示愿为两宫太后所用，并公开声称将“清君侧”。慈禧闻言大喜，赐了“精忠报国”的锦囊给他。10月17日，胜保率领卫队前往热河拜见太后。（慈禧掌权后，胜保居功自傲，成为被慈禧惩治的第一位功臣。）荣禄的城府要深得多，他不露声色，但主动承担了慈禧太后的警卫工作。阴云密集。

当时就有人断言：“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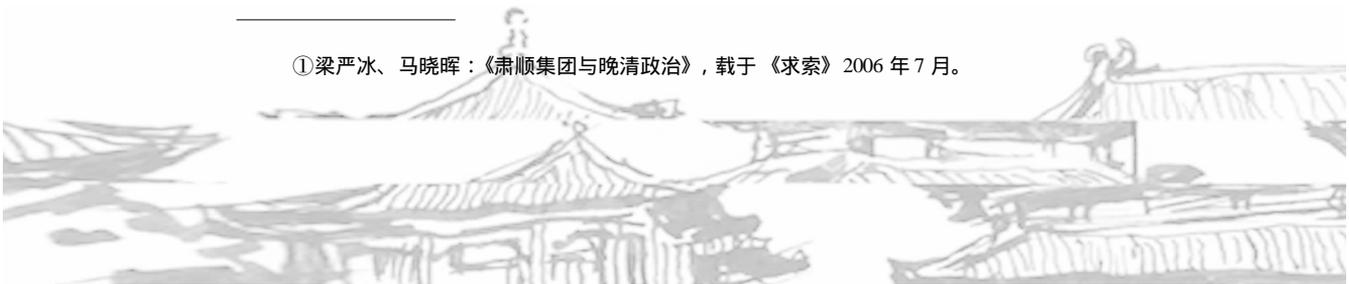
紧接着，两宫太后对付肃顺集团的主要措施是催促咸丰灵驾尽快返京。在北京，奕訢已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祜、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肃顺集团则计划着回到北京，光明正大地掌握实权，再慢慢对付两大反对势力，也同意回銮北京。10月26日，朝廷宣布咸丰灵驾九月二十三起驾，二十九到北京。

按清代丧仪规制，在皇帝梓宫抵京前，皇帝的妃嫔均需跪迎。因此热河的两位太后必须先行到京。所以26日当天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启程回京，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在这里，慈禧又耍了个花招，故意让除肃顺以外的七大臣陪同幼帝先行回京，将肃顺与团伙分开。原本新即位皇帝是要护送先帝灵驾的。太后说新帝太小，离不开母亲，建议只象征性地陪护灵驾一天，之后赶上前队回北京，在京恭迎灵驾。肃顺听着有理，同意了这样的安排。

皇帝灵柩既大且重，要用120人肩抬，肃顺一个人护送着灵驾慢慢而行。谁知当时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后发的咸丰帝灵柩比幼帝和慈禧太后晚到京4天。

当时先行到京的慈禧等人已经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查办肃顺的圣旨了。现在，皇帝、玉玺、“御赏”和“同道堂”两章都掌握在北京。北京又在奕訢集团的重重保护下，胜负立出。11月2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并令载垣、端华、

^①梁严冰、马晓晖：《肃顺集团与晚清政治》，载于《求索》2006年7月。



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处。载垣、端华等7人大呼这是伪诏，但是一切手续齐全，慈禧和奕訢集团硬是把八大臣给废了。不到24小时，宫中又下诏将肃顺等3人革职拿问。第二天，朝廷任命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鋆入军机处。新的领导层转换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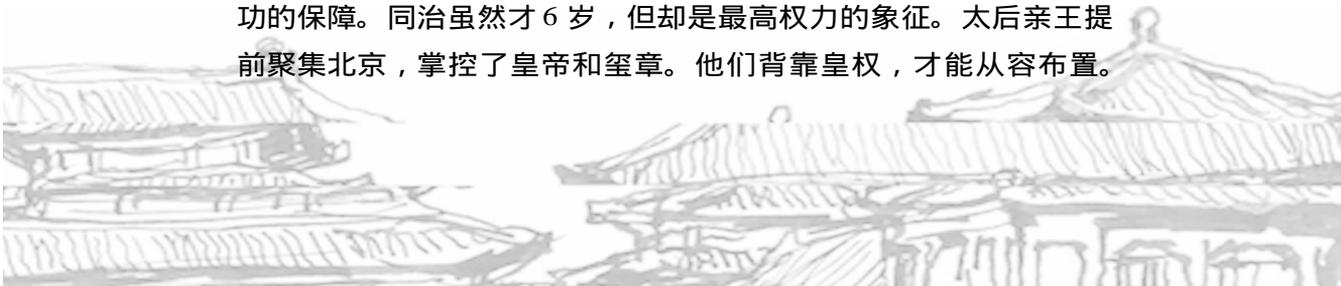
当时肃顺还在密云途中。奕兼管善捕营，连夜前去捉拿。史载“逮者至，门已闭，乃毁外户而入……又毁其寝门……遂械至京，亦系宗人府”。肃顺在睡梦中被抓，押往天牢。

11月7日，朝廷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8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传说肃顺临刑时破口大骂，称那拉氏“废弃遗命，紊乱家法，妄干政事”。肃顺集团的党羽，像之前出现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侍郎刘焜、黄宗汉、成琦、德克津泰、富绩等也即行革职或遣戍。

这场称为“辛酉政变”的政变从策划到成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8位顾命赞襄政务王大臣3死5废，陈孚恩等6员官和5名太监被查办。

慈禧等人成功发动政变的原因很多。肃顺等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正是他们的愚昧无知、举止失措造成了中国的惨败和圆明园之毁。在咸丰死后，肃顺集团试图大权独揽，这更加加重了人们对他们的不满。两宫太后虽然也是为权力而争，但他们是皇室成员，占据着舆论优势。相当一部分人将肃顺集团视为弄权祸国的奸臣，支持了慈禧集团的政变。帝师贾桢就是个明证。贾桢是山东人，进士出身，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的时候他拒绝随朝廷逃往承德。史载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说贾桢每日在天安门正襟危坐，阻拦侵略军进入皇宫，一时被传为文人骨气典范。像他这样的社会名流站在了反对八大臣的一方，无疑助长了其他两个集团的力量。

在技术层面上，慈禧和奕訢集团牢固掌握皇权，是政变迅速成功的保障。同治虽然才6岁，但却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太后亲王提前聚集北京，掌控了皇帝和玺章。他们背靠皇权，才能从容布置。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军队支持（胜保等人）和外国列强的配合是政变成功的另两大原因。列强在国内各政治势力中认定奕訢是思想开放、可以合作的政治伙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说：“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列强在政变中采取了支持奕訢的态度。

宫廷斗争是破釜沉舟的流血。如果肃顺集团把丧事安稳处理了，必然要反过来对付慈禧和奕訢集团。懦弱的慈安太后在政变中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其实也是自保的表现。

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两百多年的体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太后开始垂帘听政。这一体制后来演变成慈禧专权。慈禧这个女人实际掌握朝政长达47年，影响清朝的历史，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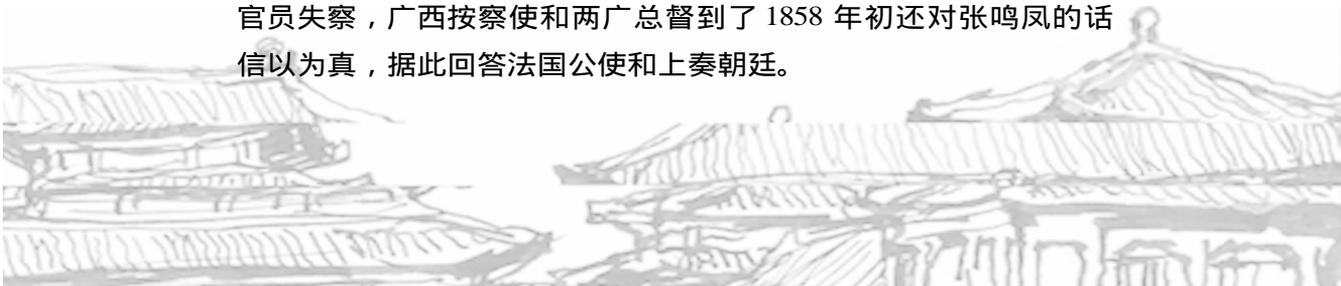


第四节 圆明园的哭泣

圆明园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圆明园的伤口是因广西的一个小县城西林开始掀开的。

西林县是广西西部的小县，现属百色。清朝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后，1842年，一名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深入这一地区传教。马赖此来，是为天主而来，而当地投靠天主的却是地痞流氓和作奸犯科之人。他们希望天主能保佑他们免除中国政府的惩罚。而马赖不知中国国情，在西林广收信徒、包庇教众，极大破坏了当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不满。必须承认，马赖未经清朝政府同意私自传教，是违法的。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馆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赖不仅私自传教，而且在《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

1856年2月29日，西林县代理知县张鸣凤因县府缉拿犯法徒众与马赖发生冲突，重刑将马赖杀死。这一行为得到了西林上下的支持。但当法国公使查问马赖下落时，张鸣凤却矢口否认，极力隐瞒马赖传教和被杀一事！不知是因为西林过于偏僻，还是广西省府官员失察，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对张鸣凤的话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作为后来人，我们在指出马赖违法的同时，必须承认西林地方官员行为过激。马赖罪不该死，拘捕后解送法国领事馆即可。这样犯法徒众不难缉拿。在马赖事件上，中国白白送给了列强侵略的借口。

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该船虽然在英国香港注册，但是被检查时注册有效期已过）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英国就借这件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于当月炮轰广州，挑起战争。法国即借口马赖被杀事件，与英国组成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这两个事件都只是幌子。英、法两国真实的侵华原因是它们不满足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博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博取更大经济利益。在形式上，他们希望中国严格按照外交规则、外交条约来行事。特别是希望与清朝政府建立稳定、常驻的外交关系。对于咸丰为首的清政府来说，依然盲目自大，坚持传统的朝贡外交制度，只愿意做小修小补。《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规定，中外条约满12年之数后，西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但清政府一再拖延，拒绝重开谈判。这自然与列强产生了冲突。

当时中国保守僵化的社会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西交往已开。但是广州官民坚持反对外国人入城。入城斗争在全国各地都有。但广州人开了先河，历时10多年都未解决。英国政府强烈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南京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在当时的官民看来，让洋人进城可是夷夏大防的大事。思维相对开放的薛福成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



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小嫌终酿大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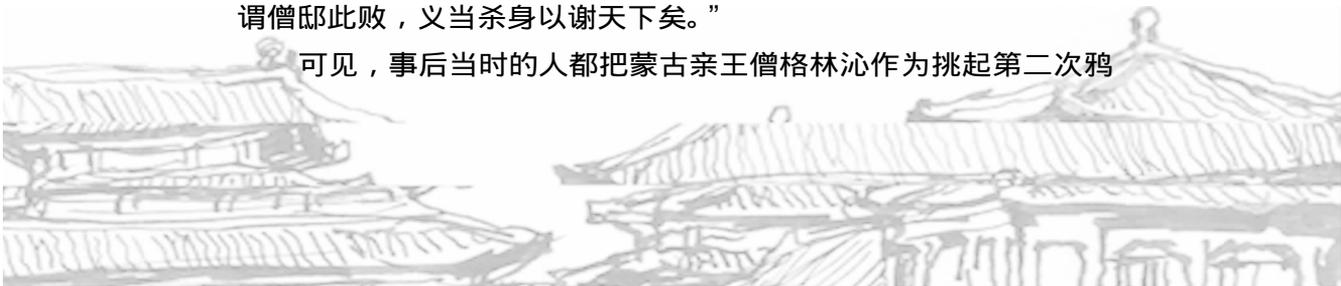
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法国政府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组成英法联军负责对华战争。美、俄两国也表示支持英、法。1857年12月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成立傀儡政权。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抵抗、不交涉、不投降，被俘虏到加尔各答，只吃从广州带走的米粮，最后粮尽而死。1858年5月，英、法军舰炮轰并攻陷了大沽炮台。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议和，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南下。咸丰事后对条约内容后悔了，尤其是不愿意接见外国公使。他下令交涉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但英、法方面不容变易既定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英、法公使按照条约规定，在军舰的护送来前来天津外海要求进京换约。

1859年4月10日，当时在僧王幕下、后来成为首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对于之后爆发的更严重的战争，郭嵩焘是这么记载的：“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

可见，事后当时的人都把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作为挑起第二次鸦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皇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片战争更大规模战争的罪魁祸首。事情概括是：小心眼的咸丰“密旨”僧格林沁，对英法一行进行袭击，而且要求官兵冒充乡勇，以各被发现后可以逃避责任。而仇外的僧格林沁拿到尚方宝剑后，主动出击。这场大沽战斗中，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不知外交为何物，举止失措的清朝政府又主动授人口实。战斗结束后，英、法两国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联军2万2千人，扩大了侵华战争。

本已弱势的清王朝，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结果酿成了大祸。

咸丰十年七月下旬，英法联军屡败清军，兵临通州。咸丰皇帝急了，再次与英法联军展开外交交涉。英法联军同意交涉。根据朱维铮先生《火烧圆明园之前的事》（《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记载，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清朝政府又与英法联军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纠纷（对于通商、税则等西方关心的实质内容，清政府兴趣不大）。钦差大臣、全权代表载恒要英方代表巴夏礼面见皇帝时下跪礼拜，遭到巴夏礼反对。咸丰皇帝觉得自己愿意谈判，接见英国使节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坚持要外国人“跪拜如仪，方可许可”，谈判遂告破裂。僧格林沁的军队遂将巴夏礼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记者等一行39人缉拿扣押送往京师刑部，关进“天牢”，以作为人质。（这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有生动的体现。）

英法联军要求释放使团，未果。谁知第三天，3名人质死于天牢的消息传到军中。清朝天牢的黑暗就无须多说了。使团的人不明实情，自然没好果子吃了。于是英法联军做出了攻占北京的决定。咸丰慌忙以“狩猎”为名，北奔承德。当时禁在天牢里的人质每日没少挨打，饮食无着，在短短25天里，就有21人在天牢中被折磨至死。交还的尸体有的还被中国人分尸数块。

英国在华全权公使额尔金得知人质死去大半的消息后，对外交官和新闻界记者的死极为惊恐。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不顾法国公使葛罗的建议（拆毁北京城内部分宫殿而保存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圆明园），命令英军进攻、摧毁京外皇家园林——圆明



园，以作为对咸丰皇帝的惩罚。在西方人眼中，皇家园林是皇家的私产。对圆明园的焚毁，就是对皇帝的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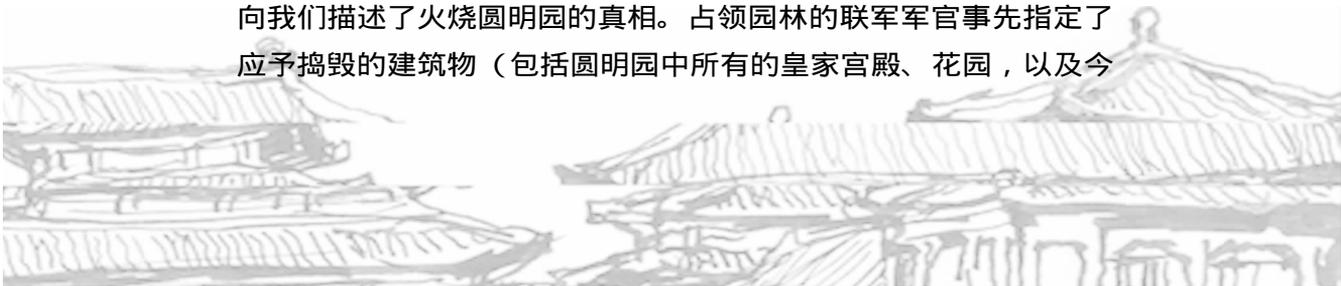
巴夏礼在10月2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10月13日，北京城的一座城门落入英军之手，因此，整座城市已在英国军人的控制之下。按他的说法，这一态势本来可以结束双方的对峙局面，但问题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俘虏事件，而这一事件必须受到惩罚。

火烧圆明园就这样开始了。

圆明园是海淀区东部的一座大型皇家园林，与附园长春园、万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乾隆九年竣工。附园长春和万春两园分别建成于乾隆十六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之后几代清朝皇帝多有修缮，不仅将圆明园作为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作为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圆明园占地347万平方米，凿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树，建有中外名胜40景，有建筑150余处，长春园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是一座艺术价值极高的人工山水园，又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被誉为“万园之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圆明园。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两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圆明园的火眼进一步延伸到京西皇家三山五园。这三山五园是：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

法国作家伯纳·布立塞根据当年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暴行的英法外交官、军官和士兵的回忆录写就《1860：圆明园大劫难》，向我们描述了火烧圆明园的真相。占领园林的联军军官事先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包括圆明园中所有的皇家宫殿、花园，以及今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宫殿和花园，甚至更远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指挥士兵进行有计划的焚烧、抢劫。

英国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参加了对圆明园的纵火与洗劫，“在进行了洗劫之后，我们又回去，将那个地方全部烧毁，像汪达尔人那样，将这无价之宝付之一炬。尽管我不如别人捞到那么多，但我也毫无怨言”。即使是强盗也对圆明园之美深表赞赏，也略有遗憾：“很难想像被我们烧毁的地方有多么雄伟壮观。把它们付之一炬，会让你的心里流血。实际上，宫殿面积之广大，行动时间之紧迫，使我们无法从容地抢劫。无数的金器，都被当成黄铜烧毁了。对一支军队来说，这真是道德败坏之举。所有人都抢疯了。”

领事兼翻译郇和大篇幅描写圆明园大火：“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当我们接近圆明园时，大火发出骇人的劈啪和呼啸声……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他们活像一群魔鬼，正在为举世无双的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夜色温柔，而圆明园里，屋顶接二连三地坍塌下来，压倒了燃烧中仍然挺立的墙壁，吐出大团大团的浓烟……大批无所事事的士兵把抢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每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第15旁遮普团就这样得到了一大笔金子，一个军官据为己有的金子竟然相当于九千磅之巨。”

许多法国官员和士兵拒绝参与烧毁圆明园。葛罗是反对烧毁圆明园的。但是他的建议是捣毁紫禁城。法国海军上尉巴吕直言不讳：“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径。”历史学家高第也不甚赞成烧毁圆明园：“我并不认为这在当时是个好办法。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此外，对同胞无辜的血，我们也不应该向石头寻仇。法国人与其英国盟军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抢劫，可以；放火，不行！”

英法联军到处烧杀抢掠、野蛮洗劫、焚烧圆明园的结果是园内寺庙建筑大多数被毁于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本意是将其夷为平地，但是由于圆明园的面积太大，景点分散，而且水域辽阔，一些



偏僻之处和水中景点幸免于难。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查勘，园内尚存有建筑13处，如圆明园的蓬岛瑶台、藏舟坞，绮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

1860年10月24、25日，奕訢终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新的《北京条约》。俄国以“调停”有功为号，逼迫奕訢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了巴尔喀什池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北京条约》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并将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400万两和200万两一律增至各800万两；中国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圆明园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再次被列强放火焚烧和抢劫。圆明园再遭洗劫后就呈现出现在世人所见的、仅存长春园西洋楼的部分石雕残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圆明园残垣断壁。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五节 “长毛”也占半边天

一个末路王朝总是内忧外患不断。强敌环绕的清朝在腹地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从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开始到1869年5月太平军残部在陕西被歼灭，太平天国运动在清朝核心地区纵横近20年。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是贫苦民众在各种压力下，奋起反抗的结果。历史并没有给起义者留下多少选择余地。先是鸦片战争后是清政府为支付战争的赔款，向民众转嫁负担。官府在旧税之外，巧立名目，增加捐税，加上地方官乘机敲诈勒索，广大民众濒于绝境。这是历代“官逼民反”现象的重演。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气、工业和政治结构。”

起义首发的两广地区是西方列强首先入侵的地区。由于鸦片走私和对外通商，当地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老百姓完粮纳税都要用银两，使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列强经济势力的入侵加剧了当地的矛盾。偏偏在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自然灾害不断，不满情绪和反抗意向如越积越高的干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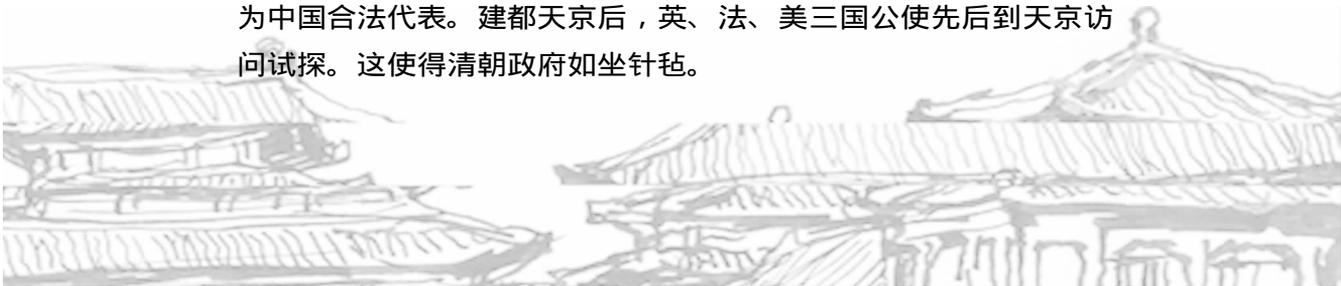


广东花县落第秀才洪秀全科场失意，萌发造反思想。他结合内传的天主教创建了拜上帝会。1844年初夏，他和冯云山等前往广西活动，以传教为掩护，向农民宣传反清思想，吸收农民参加拜上帝会。洪秀全不擅实际工作，不久返回广东从事著作。冯云山坚持在紫荆山区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凝聚力量。至1850年紫荆山区的汉、壮、瑶等族农民有超过万人加入，并形成了杨秀清、石达开等领导核心。

于是拜上帝会于1850年夏通知各地会众到紫荆山下的金田村团营，建立起武装。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称天王，设百官，蓄发易服。太平天国起义正式开始。咸丰初年，太平军一直在广西各地转战，克永安，围桂林；二年北出湖南，攻全州，克道州，沿途吸收了大量青壮年，九月攻长沙，全国震动。咸丰二年末，太平军绕开长沙，出洞庭，进入长江，第二年初占武昌。之后数十万太平军沿江东下，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与清朝对峙的全国政权。

立都后，太平军分兵北伐、西征。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的北伐军自扬州穿越安徽、河南，突破黄河天险，迂回到山西境内，东向折回河南，再进入直隶省，前锋迫近保定。清廷惊恐，咸丰帝准备逃往热河，官僚豪富纷纷逃走。太平军绕开保定，从深州向东攻打北京。朝廷集结大军在天津杨村与北伐军决战。北伐军粮尽，坚守待援，后兵败被歼。2万北伐军孤军远征几乎震动了朝廷的200多年的统治。南方的太平军则扫荡了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各省。在湖北宜昌、湖南长沙附近，太平军遭到了曾国藩统率的湘军的堵击。其时，长江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于太平天国版图之中。太平军四出，刺激了各地的起义浪潮兴起。在清朝腹地，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反清起义高潮。

太平天国对朝廷统治的最大瓦解作用是它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存在。它的存在，使得西方一度犹豫承认哪个政权为中国合法代表。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试探。这使得清朝政府如坐针毡。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就在清朝绞尽脑汁的时候，太平天国发生了内讧，由盛转衰。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的矛盾日益尖锐。天王等人的缺陷被逐步放大为整个运动的缺陷。洪秀全着意加强王权，集大权于一身；东王杨秀清总理全国政务，却利用天父降托特权挟制洪秀全，争夺最高权力。洪秀全下诏诛杨秀清。北王韦昌辉乘机扩大事变，将天京变成大屠杀场。石达开起兵平定韦昌辉之乱，却被洪秀全逼走。从杨秀清被杀到石达开出走，前后半年多，太平天国大批将士被杀和脱离天京，元气大伤。

湘军和正规军的江北、江南大营却乘机崛起。事变后，太平军因弹尽粮绝从武昌、汉阳撤退，湘军东犯九江城下。清军在东线重建江北、江南大营攻陷句容、镇江，进犯天京。太平军不得不采取攻势防御，在后期统帅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通过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又挥师西上，在庐州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从而稳定了战局。之后太平军在苏北、浙江克复部分州县，进入短暂的鼎盛时期。湘军和清军休整后，大举反攻。安庆之役太平军失败后，陈玉成部孤军被围，在寿州失败，太平天国在长江北岸主力全失。1863年后，浙江汤溪、金华、绍兴等地失守，太平军在苏州、无锡、常州相继失败。1864年春，天堡城要塞失守，天京对外交通断绝，陷落军败。5年后陕西残留的太平西路军在保安县老岩窑全部牺牲。太平天国告终。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领导层素质低下、品德低劣造成制度败坏、所用非人、政策失当是主要原因。洪秀全屡试不中，受刺激后读了基督教布道书就自信为上帝使者，并自行施洗。洪是为个人名利而起兵的，缺乏成熟的思想体系，自以为能拯救乱世。但是他并不擅长实际政治。冯云山在早期的传教中起了核心作用，聚拢了起义的最初力量。起义刚开始，洪秀全就自封天王；不久分封诸王。形成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五王。洪秀全自称天父次子、天兄耶稣胞弟，其余五首领并为天父之子，并设立官制。在长期斗争中，洪秀全一直以上帝之子的身份起偶像的作用，大权操于杨秀清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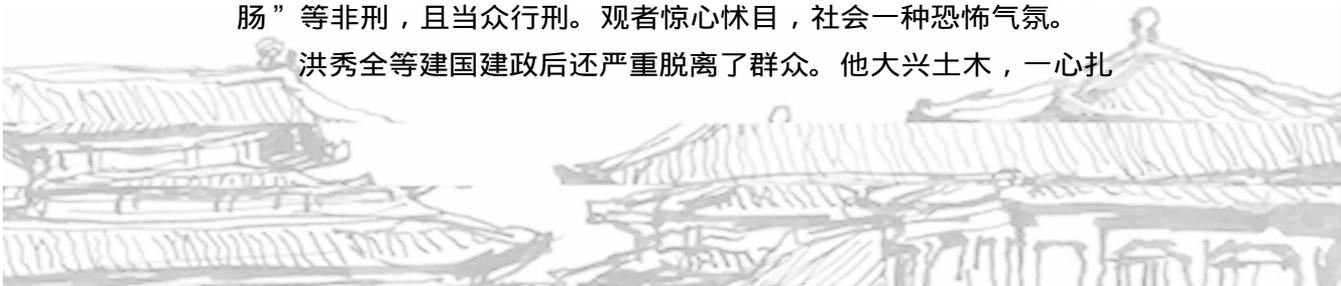
太平军攻破南京后，洪秀全颁登极诏书，大封将士，建立了极其复杂的官制。其中王分4等，侯为5等；设天、地、春、夏、秋、冬6官丞相为6等；以下7至16等依次为36殿前检点、72殿前指挥、100正副将军、95总制、100正副监军、95军帅、445师帅、2375旅帅、11875卒长、47500两司马；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自6丞相至47500两司马总计62699人，占当时太平军总数60余万人的十分之一；如再加上各级“职同……”官，太平军官员在13万人左右。从总制到两司马还仅是军队编制，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京官、多如牛毛的地方官、诸女官6584人，总计男女官30余万。洪秀全等王还兴起临时增设及恩赏各级各类官职。尤其是洪秀全后来滥封乱赏，封王数以千计，“几至无人不王，而丞相、天将之职多摄行”。

太平天国官僚群体庞大，等级森严，教义宣传的平等原则受到严重侵害。天王轿子规定为64人抬，东王轿子为48人抬，依次递减，但就连第16等的小官两司马的轿子也是4人抬。（读者可以计算一下太平军官轿轿夫的人数。）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起义者贪求荣华富贵，大过官瘾王瘾，只知享受，丧失了斗志。天国后期冗官冗员满布朝野，指挥调动不灵，各部分官员相持不下。

作为天王的洪秀全本人带头腐化堕落。他的妻妾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有15人，一年后在永安洪秀全耽于女色，妻妾36人。天京沦陷后幼天王洪福瑱被俘供认：“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给我4个妻子。”洪秀全的《天父诗》透露了他对妻妾规定的、应严格遵行的规定，如“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洪秀全最常说的命令是：“云中雪（刀的隐语）飞。”（刀要飞，即指要杀人。）他统治的天国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且当众行刑。观者惊心怵目，社会一种恐怖气氛。

洪秀全等建国建政后还严重脱离了群众。他大兴土木，一心扎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进自己精心营造的小安乐窝。太平军拆毁了南京大片民房，建造起方圆十余、高数丈、豪华堂皇的天王府。役夫万余，穷极奢丽。洪秀全戴着8斤黄金做的王冠，派人搜罗民间美女填充后宫，在莺歌燕舞中昼夜不息。他放弃了国家领导人应有的职责，深居简出，沉湎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太平天国官场贪赃枉法成为惯例。安王洪仁发招权纳贿，肆行无忌；福王洪仁达贪污蠹法，暴虐恣横。南京被围，形势危急，洪仁发、洪仁达依然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发国难财。太平天国冲破清军重围送入天京的粮食都被两人上下其手，大半皆入私囊，天京不仅没多一粒粮食，反而粮食断绝。天京城内饿殍遍野。

到后期，洪秀全主要通过普遍加官晋爵，以团结人心，维持权威。清军将天京围得水泄不通，李秀成苦劝洪秀全“让城别走”，撤出南京保存实力。但是洪秀全舍不得离开安乐窝，大发脾气，说“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他将百草称为“甜露”，号召军民吃草坚守。围城的曾国藩听说洪秀全率领天国官衙死守孤城后，交额庆幸。

终洪秀全一生，他的主要政治活动集中在宗教领域。他的宗教宣传和政策在起义初期的确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后期他加强权威，贪图享受。他对专制政制的吸收和推演，缺乏新意，没有把握住动荡时代的历史机遇；他个人能力偏低，在南京等同于一个平庸的专制帝王。1864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太平天国早已成为了过眼烟云，但后世对它的评价却大起波澜。先是自辛亥革命起，太平天国成为反清斗争的榜样事件，再是现代革命时期太平天国被作为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一再宣扬。太平天国运输的历史评价越来越高，一度成为了光辉的定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场横亘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运动的真相逐渐被还原。

纵向比较，太平天国规模之宏伟、影响之深远，是之前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在横向上，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从内部崩溃的。宗教作为发动组织的工具，在起义中后期却开始脱离群众和起义现实。心中的思想支柱倒塌后，后期的太平军组织涣散，斗



志低落，甚至与清军拉锯祸害地方。宗教也将洪秀全等领导人越缚越紧，成了个人享受的工具。

最先高扬太平天国运动旗帜的辛亥革命群体孙中山等人在称赞太平天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不是近代中国前进的方向。

钱穆先生在名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简要客观地评价了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 10 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从清亡民兴 40 年间的政治变迁来说，太平天国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了以曾国藩和湘军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势力的兴起。清政府调动八旗、绿营军队围剿太平军，但都不堪使用，对太平军望风披靡。咸丰朝开始大规模命令地方官绅督办团练，协助官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和湘军由此产生。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崇尚程朱理学。1853 年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团练。他以封建宗族、乡土、师生关系为纽带，联结了一批封建士人（包括李鸿章、左宗棠等），组成湘军。湘军从将领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全军各级层层相依。湘军用封建宗法关系联结，又采用近代火器，战斗力强。湘军组织开创了中国近代军阀制度的先例。^① 作为本书之后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概念，在这里不得不多做解释。

^①主要参考文献：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田久川的《太平天国政权崩溃的历史教训》、史式的《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为金田起义 150 周年而作》，载于《开放时代》2001 年 1 月。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六节 刺马案与湘军

1870年（同治九年），太平天国的前都城南京“光复”不久，百业未定。这年8月底，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决定举行“秋操”。秋操顾名思义就是在战马肥粮草足的秋天进行军队操演。马新贻总督此举在乱后江宁另有深意，朝廷欣然同意。

谁知，该月23日，江宁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在天光化日之下，在军队环绕之中为歹徒刺杀，一时间朝野震惊，举国倾注。同治帝喻之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慈禧太后惊问大臣：“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李鸿章若有所思地说：“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①

这件被称为“刺马案”的大事件的版本很多。江宁官方向朝廷奏报的版本是这样的：

总督阅视操演原定是8月21日。但是这天突降大雨，总督只好推迟操演。第二天，也就是22日，天气转晴，两江总督马新贻于早晨徒步来到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亲自阅射。依惯例，总督阅射允许百姓参观。这是江宁的一大盛典。因此马新贻阅毕回署的

^①国内“刺马案”的响亮研究者是高尚举。他的《刺马案探秘》，载于2000年8月3日《光明日报》，是关于此案的佳文。这里的主要事例以该文为主，用的是高先生考证的“张汶详”之名。



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貽一行来到总督署后院门外时，马新貽的同乡，山东郓城武生王咸镇跪道求助。巡捕将其推走查问。马新貽继续前行，不几步，有人拦道喊冤。正当旁人想依例推开，谁知那人在队伍停后亮出一把明亮的匕首，直扑马新貽刺去。马新貽右肋中刀，跌下马呻吟。事后查明匕首刺进右肋，深至数寸。

跟随差弁一拥而上。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从容就缚。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清军将领是中军副将喻吉三。他喝令将凶犯捆缚到督署候讯，连忙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遇刺后，马新貽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在地上萎缩着身子。差弁、家人忙取下门板，将其抬进督署上房。等魁玉等人闻讯赶到总督府探望时，马新貽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马新貽自知命将亡，挣扎着口授遗疏，令嗣子毓楨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貽失去语言能力，拖到第二天下午2时许死亡。

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江宁知府冯柏年、江宁知县莫祥芝、署理上元县知县胡裕燕、候补知府孙云锦、候补知府钱海永、候补知县沈启鹏、陈云选等先后轮流审讯刺客。刺客坦然供认名张汶详，河南人，只求速死，即使严刑也不吐露行刺缘由。

坊间的传闻叙述线索大致与之相同，但增加了一些细节。有人听到刺客在刺杀成功后高喊：“刺客是我张汶详！”又有人说张汶详当时口中不停地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有仰天狂笑等豪壮之举。更有消息灵通者说马新貽临死前曾对身前最宠爱的某妾说：“我误卿先，卿今误我也。”

《清史稿·马新貽传》因为篇幅限制，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只有一句话：“九年七月，新貽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貽，伤肋，次日卒。”可能朝廷觉得，与马新貽一生言行相比，遇刺一事大可淡化处理了事。



马新贻的一生的确很辉煌，少年科第、坎坷仕途，但终成官场正果。《清史稿》的官方简历是这么写的：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先后担任安徽建平知县，代理合肥知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马新贻先后参加了庐州巢湖战役、舒城战役，先后升任庐州知府（赐花翎），代理安徽按察使。在庐州战役中，马新贻因所部溃败印信丢失，被朝廷革职留任。咸丰九年、十年，马新贻母亲、父亲先后逝世，马按律应丁忧，为挽留。咸丰十一年，马新贻任候补道员，东山再起。因庐州战役、蒙城防卫战的功劳，先后出任按察使、代布政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七年，马新贻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勤政爱民，在任上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减浮酒，除陋习；奖廉能，惩贪墨；体恤寒儒，兴办实学，刊刻书籍等等。

同治帝接到江宁的600里加急后，实深骇异。马新贻是第一位在任上被刺杀的两江总督。朝廷对地方大员的保护，不遗余力。但是如果真的出了事情，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每一位官场中人都是官场的一枚棋子。在官场圈子里地位越高，牵涉的人与事越多。骤然落棋，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背后的利益、梯队、黑幕如何处理，对于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清王朝来说，刺马案棘手得很。

现存材料证明，朝廷懵了。在半个月后的9月9日，朝廷才做出正式反映：第一，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由江宁将军魁玉暂时兼职代理；第二，命令代理总督魁玉督促两江相关官员抓紧严讯，尽法惩办案犯；第三，因为南方不靖，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朝廷尤其关注张犯行刺的原由，严令江宁方面严刑熬审。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连连回奏“张犯刁狡异常”，“自知罪大恶极，所供各情一味支离”，张汶详只求速死。在魁玉主持刺马案审讯的阶段，最大的进展是对张汶详身世的调查大有进展。张汶详是太平天国分子，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转战



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的舅嫂罗王氏等都被擒拿到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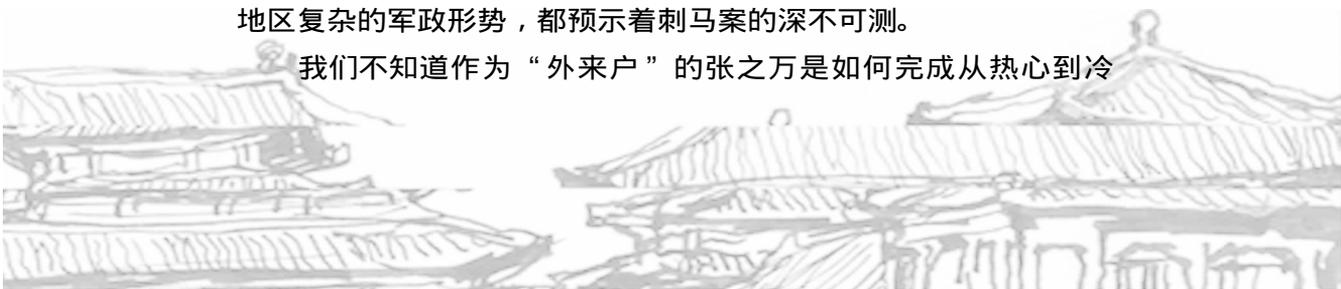
一个多月时间里，案子进展很慢。朝廷对魁玉始终没有触及杀人动机的奏折非常不满。两江的官员们难道就真的不擅长审案吗？非也。陈功懋在《张汶详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中透露自己祖父、参与会审张汶详的官吏陈镜题曾记载，张汶详供认马新贻在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时曾被太平军俘获。马新贻便衣混在乱军中，与一个叫时金彪的人一起释放。当时在座的审问官员大惊失色，书记们都不敢下笔。两江函文山西巡抚，将在山西的时金彪抓获，解向江南。陈功懋证实官府存档的供词是经过审案官员删改的。

就在押解时金彪过程中，朝廷下旨，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审理刺马案。身在河南的张之万9月25日收到吏部咨文，5天后即起身。10月7日，张之万抵达江宁。

张之万到江宁前，还是局外人，可能他觉得这是个人发展、大展拳脚的机会，快马加鞭就来了。到江宁后，时金彪也从山西解到了。魁玉陪着张之万提讯了时金彪两次。每次都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参与审讯。但是这两次审讯都没有留下任何录供。

张之万是老谋深算之人。高手略一过着，就知道了水深水浅。作为空降的钦差，他清楚一个官场漩涡正在形成。马新贻简历中最大的波折是“庐州战役”。马部惨败，马本人又应丁忧，但因为巡抚、钦差等一再保荐，马新贻依然官运不错。江宁收复后，湘军出了大气力。当时两江一带，遍布湘军部队；南方各省，几乎为湘军所控制。然而朝廷平地一声雷，突然发表文官出身、功劳资历都不显著的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场又有传闻，说马新贻之前任闽浙总督，进京陛见请训期间，曾经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密谈。宫中盛传，马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朝服浸湿，惊恐万状。刺马案审讯至今，张之万不得不思考如何评价马新贻的问题了。马新贻背后的官场关系网、朝廷与马的关系、两江地区复杂的军政形势，都预示着刺马案的深不可测。

我们不知道作为“外来户”的张之万是如何完成从热心到冷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处理的转变的。只是之后有人催促加快审讯进度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老奸巨猾的张之万不愿意去踩这趟浑水，他怕弄不好惹祸上身。这一点，他非常认同主持审讯一个多月而毫无进展的江宁将军魁玉。这位满洲人出身的八旗将军，地位崇高，依然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更何况他张之万了。

于是张之万也慢慢地审，耐心地等，等待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到来。

从10月初到12月初的两个月时间里，张之万只是和魁玉联衔上奏，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要求追究防护失职之责。案子拖延不结，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朝廷自然也不满起来，在12月9、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魁二人。

时已入冬，3个月前就出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是没有到江宁来。

张之万、魁玉二人熬不过，在12月12日抛出了《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折既无确凿证据，又无供词，最后用“尚属可信”四字结案，敷衍之意明显。朝廷批示“不足以成信”，并宣布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撤换张之万，一点情面都没给张之万留下。张之万琢磨这么久，虽然没有涉足浑水，依然是大败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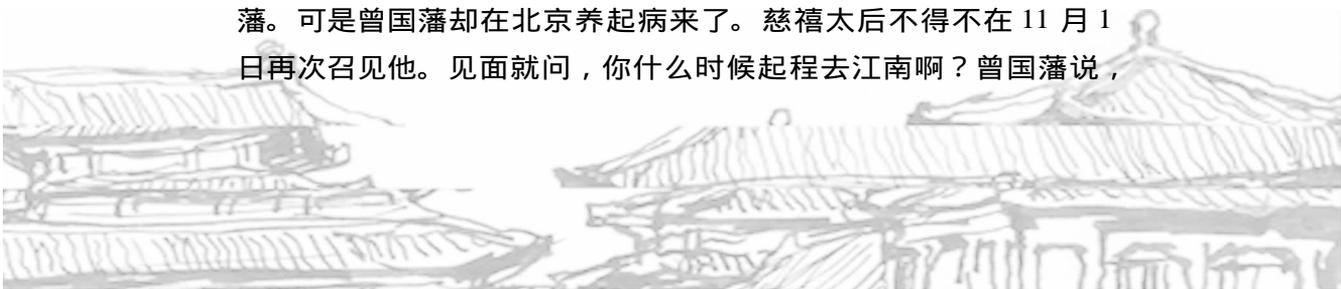
这时候湘军领袖曾国藩在干什么呢？8月21日，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案发，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上谕，调他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感到愕然，急召幕府和丁日昌、毛昶熙密商。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候补道孙衣言等给他频频来函。10月5日他给魁玉去信询问：“刻下廷旨已飭张子青漕帅驰赴金陵，妥为讯办，未知渐有端倪否？”曾国藩密切关注江宁的一举一动。丁日昌更是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的消息。

回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来说有种难以言语的感觉。曾国藩刚处理了天津教案，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残民媚外”。回任两江，利在可以使自己脱身天津泥潭。但当初曾国藩正是因为湘军遍布南方各省，功劳卓著，人才济济，引起了朝廷的猜忌。所以不得不离开南方老巢，来紧挨着北京的天津任职的。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首席功臣之后，“功高震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朝廷在收复江宁后即裁撤湘军、空降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马死后，朝廷让保持低姿态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实质上是出于两江地区军政复杂，需要曾国藩这个实力派首领去控制乱局的考虑。这并不是信任，而是利用。

曾国藩并不起程，相反在9月2日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的折子，向朝廷辞去两江总督的职位，并说自己健康恶化，视力衰退，要求连自己兼任的大学士也一起辞去。

朝廷自然不轻信，3天后答复：“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意思说，有病也必须去，谁让你是朝廷的支柱呢。

10月2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东间就任命一事专门召见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却在北京养起病来了。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1月1日再次召见他。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起程去江南啊？曾国藩说，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快了快了。慈禧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心中大定，嘴上说，奴才谨记。

此时，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也擅自上奏，要求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这是因为舆论对刺马案的猜测，开始将凶嫌的矛头引到了他的头上。两江时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这是有根据的。同治八年十月五日，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逛妓馆的时候与丁日昌之子、知府丁惠衡，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将徐有得40军棍，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传闻到京，朝里也是沸沸扬扬。

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上奏：“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其子未知曾否到案，仍时往来该抚任所，臣所闻之言止此。闻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闻者亦非一人之言，其言时皆相顾叹息，及向根询，则皆畏累不敢尽言。臣思陕西僻在西隅已有所闻，江南必有确实公论，属吏或难兼采，京师相距较近，亦必有所传闻。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难悬揣。”

即使是两江的实权人物、湘军骨干，丁日昌此时也顶不住了。他急需“老大赶回来再罩着自己”。遗憾的是，在曾国藩赶来前，上谕已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朝廷借舆论之口，行抑制藩镇之实。丁日昌成了刺马案中落马的第一位湘军大将。

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的旅途。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



了。曾国藩也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等，等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到来。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平常只是接客聊天，翻看《阅微草堂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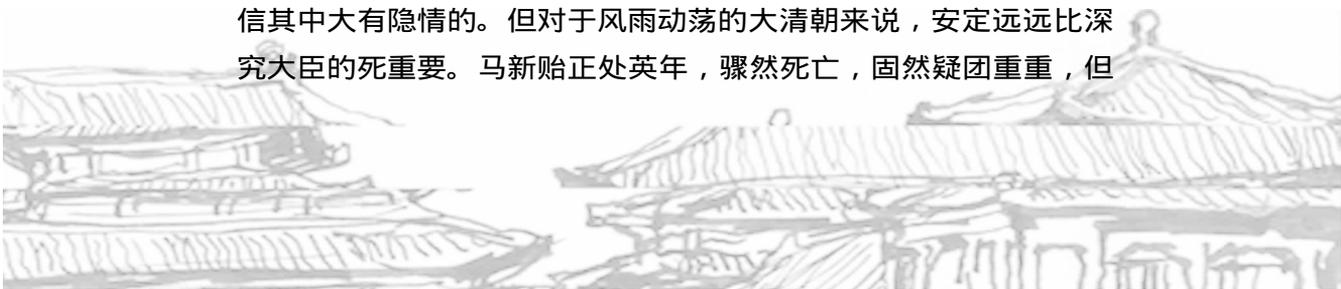
时论有言：“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

同治十年一月七日，郑敦谨入宫请训，随即装束就道，驰赴江宁。随行有现任刑部郎中颜士璋等人。颜士璋将此行成书，名《南行日记》，成为此案的重要记录。日记记载郑敦谨一行星夜奔驰，时值大雪封路，坐轿难以行走，他们徒步涉雪而行。途中多人冻伤。二月十八日江宁时众人衣衫褴褛，不堪入目。这一天正是大年除夕。

正月初二，雄心勃勃的郑敦谨即关门审案。连讯14天，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半个月中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未了，他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虽刚，但不傻，马上明白这个案子是不能深究的。对付这样情况的最好方法是尽快脱身，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装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三月十九日，郑曾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比张魁的定拟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换汤不换药。一是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是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参加会审的一些官员认为过于潦草，拒绝在奏结上签字。郑、曾二人便根本不提这些人参加会审一事。

拖延既久，江南既定，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三月二十六日，谕旨下达，准郑曾二人奏结。四月四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建马新贻专祠。糊涂案既结，舆论依然沸腾。想来朝廷和民间都是确信其中大有隐情的。但对于风雨动荡的大清朝来说，安定远远比深究大臣的死重要。马新贻正处英年，骤然死亡，固然疑团重重，但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总不能为了他去动摇大清江山吧。

《清史稿》写此事极简：“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鞠汶祥，词反复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藩覆讯，仍如原谳，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将张汶详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剜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予以抚恤，总算也没亏待了马新贻。

刚硬的郑敦谨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就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盘缠，他分文不收。随行的颜士璋收了湘军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一行人到江边，郑敦谨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走到清江郑敦谨就停了下来，打发颜士璋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实际上是发情绪。曾国藩于是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他，百般安慰，劝他回京赴任。朝廷迭下谕旨，命其回京。郑敦谨终以有病为托词，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回京的颜士璋在一个月后被调任兰州知府，不久回原籍赋闲。

张之万不久升任浙闽总督，但因为母亲年老，“乞养归”。直到光绪八年，他才被起为兵部尚书。恰好当时两江总督空缺，老年张之万调补为两江总督。遗憾的是，当时曾国藩已死，湘军四散，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刺马案在民间远没有结束。当时和之后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透露了很多马新贻被刺的原委。主流观点是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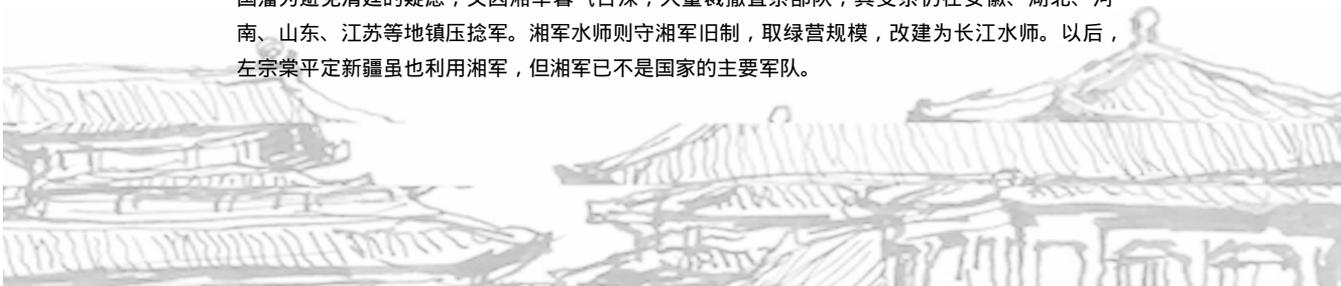
黄腾达以后，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却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诱杀了把兄弟。张汶详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马新贻实在是个渔色负友的禽兽总督。

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的确是带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去湘军大本营抑制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经营多年。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太平天国经营十几年，各种粮饷、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尽入湘军之手。为了灭迹，湘军又放火烧了几天几夜。中饱私囊后，湘军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尤其令朝廷坐立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太平军在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太平军既平，曾国藩和湘军在江南坐大就为朝廷所不容了。^①

于是朝廷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在同治七年朝廷又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马新贻没有自己的基本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后就遵循朝廷意思，组织自己的班底和军队。他以两江“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2500人屯江宁，亲加训练”。在短时间里编练了5个营，以亲信总兵刘启发督率。出自湘军的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指曾国藩）莫办。”而马新贻深犯其忌。

^①湘军是中国晚清时期曾国藩以湘乡练勇为基础，在湖南创建的一支军队，又称湘勇。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声势愈大。曾国藩为避免清廷的疑虑，又因湘军暮气日深，大量裁撤直系部队，其支系仍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镇压捻军。湘军水师则守湘军旧制，取绿营规模，改建为长江水师。以后，左宗棠平定新疆虽也利用湘军，但湘军已不是国家的主要军队。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那么，马新贻的死幕后是否有湘军的影子呢？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帮会组织。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祥（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高拜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说：“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更为蹊跷的是，张汶详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杀死马新贻。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湘军将领还给张汶详立碑。马新贻也非善人，把柄不少。死后，有人抓住桃色绯闻和复仇凶杀情节不放，将马逼入道德败坏的山崖，既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也无人敢施援手。环环相扣，仿佛有高人暗中指使。《南行日记》直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相掩盖起来。后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①

^①关于“清末四大奇案”，众说纷纭。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张汶详刺马”、“杨乃武小白菜案”，“清代大狱戊午科场舞弊”，“咸丰户部蒙钞处贪污舞弊案”四大案。另有说将后两案替换为“杨月楼诱拐卷逃案”、“杀子报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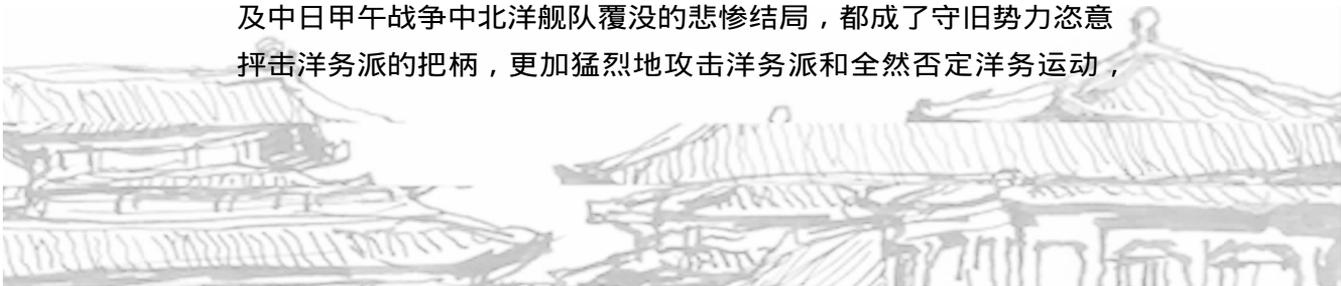


第二章 | 天要变了

没有失败的洋务
刘永福和黑旗军
如此大捷
大清公使——曾纪泽
北洋水师的覆灭

第一节 没有失败的洋务

翻开中国近代历史的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清朝覆亡，政界和社会上嘲弄与攻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不绝于耳。而且，每有引进或仿造西方新事物之举，必有顽固派极力阻挠，乘机扩大事端，成为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例如，洋务运动初期，大学士倭仁纠集顽固势力，处处与洋务派作对，并乘机利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一事小题大作，极力宣称学习西方的结果必然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1页。）他们排斥一切新事物而梦想恢复昔日闭关自守的局面，成为洋务运动的极大障碍。又比如，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由汉口经河南至北京的两条铁路，引起政界一场大争论。顽固派接连上奏极力反对，有的指斥铁路有“三大弊”，有的指斥铁路有“五害”，有的断言铁路有“九不利”，或断言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就连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以铁路妨碍民生和厘金收入为理由而反对修筑铁路。然而，每次争论的结果多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也给修筑铁路制造了莫大的障碍，延误了时机。特别是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和福州船政局遭到法军突然袭击而毁灭，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覆没的悲惨结局，都成了守旧势力恣意抨击洋务派的把柄，更加猛烈地攻击洋务派和全然否定洋务运动，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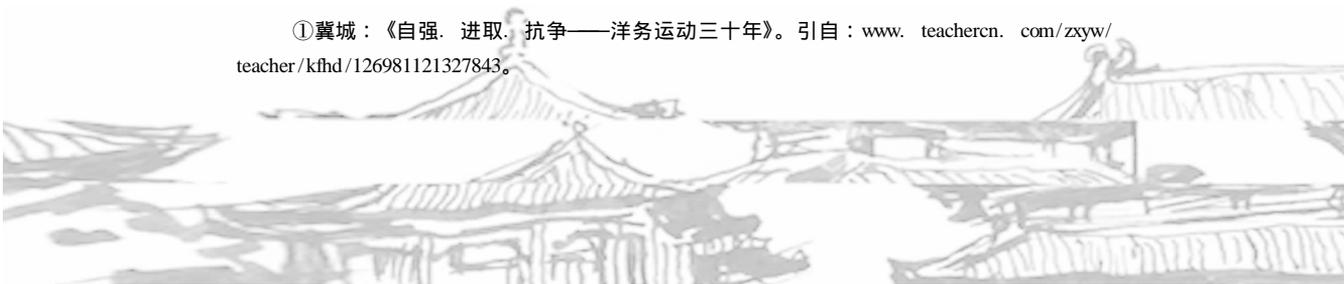
他们甚至幸灾乐祸，把洋务运动一概视为“彻底破产”了。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破产”之类的论调弥漫朝野。从此，“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几成“定论”。直到清朝覆亡后，这种论调才淡薄下来。谁来还洋务一个公道呢？只有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第一次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炮舰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沉睡的封建帝国中，一部分人开始醒来，看到了中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遭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和失败，严峻的形势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他们明显地意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提出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人士显著增加。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在中央以奕訢、桂良、文祥等权贵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拥有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一批渴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民间工商人士。

洋务派能在这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还有一个历史契机。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权力欲极强、而又素与顾命大臣肃顺等人有嫌怨的慈禧，趁机联合恭亲王奕訢等人密谋政变，一举夺取了朝政大权。史界有种说法认为，在奕訢集团和后党势力紧密配合下的政变成功，标志着新兴改革力量对顽固守旧力量的胜利。从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新兴势力领导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①

1862年春，太平军在江浙一带与清军激战正酣。39岁的道员李鸿章带着刚从合肥老家募来的7000名淮勇，分乘8艘英国轮船由安徽安庆驶抵上海。此次长江航行，使李鸿章眼界大开，他在应邀参观了英、法的军舰之后，深感外国军舰之坚固、大炮之精良、

^①冀城：《自强·进取·抗争——洋务运动三十年》。引自：www.teachercn.com/zxyw/teacher/kfhd/126981121327843。



弹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开始下决心要虚心忍辱学习西洋的长处。随后，他采购西式枪炮装备自己的淮军，果然作战能力大增。次年，李鸿章立即安排专人在上海筹办洋炮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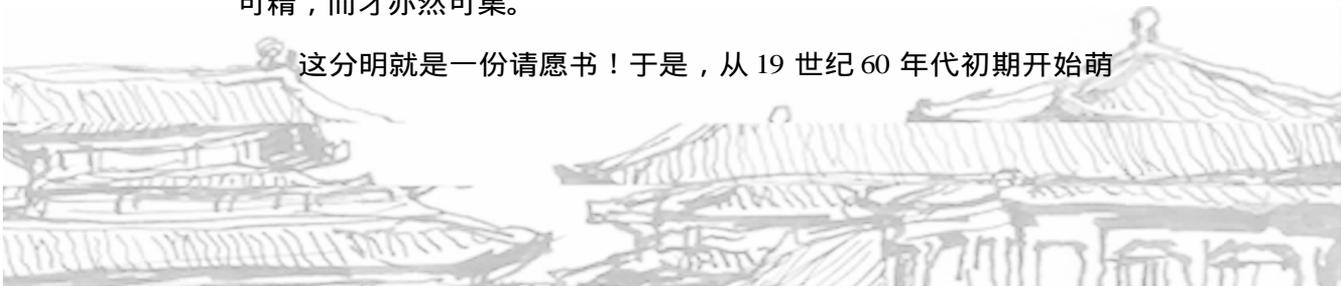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自杀，清军剿灭太平军之大局已指日可待。第二天，由恭亲王奕訢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奏折，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这份奏折犹如一份宣言，在暮气沉重的北京城激起冲天反响。这份奏折郑重提出：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购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固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这份奏折等于是向皇帝大声疾呼，切莫错过可贵的机遇而失去自强的前途。不但如此，总理衙门的这份奏折之后，还附呈有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其中数语，为当时高级官员们不敢想更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而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共鸣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然可集。”

这分明就是一份请愿书！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发的这一场颇具声势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而人们习惯称为“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伺之下，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大幕。

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军械所仿造的“黄鹄”号轮船下水。这艘轮船性能并不十分先进，但其从设计到建造，“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诚为可贵。同一年到达上海的李鸿章在参观了英、法军舰之后说，“若驻上海而不能资取洋人之长技，咎悔多矣。”1865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开办的一家旗记铁厂；转而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家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不久，它便建造出可以航行于外海的轮船，此后，江南制造局的名字便同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紧密地联在了一起。

在发展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中功绩卓著的当数福州船政局。1866年，悉心于经世致用和研究外洋事务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向朝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若之何？！”针对严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被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他特别留心注意到，不仅西洋各国的舰船越造越精，而且东邻日本也开始仿造西式轮船，并派人去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他断言，数年之后日本亦必有大成。他就此诘问道：“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誓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誓犹使马，彼跨骏马而我骑驴，可乎？！”

在左宗棠的多次恳切请求下，清朝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造舰育才的大基地。

创设于福州闽江口内马尾的福州船政局，由造船厂和船政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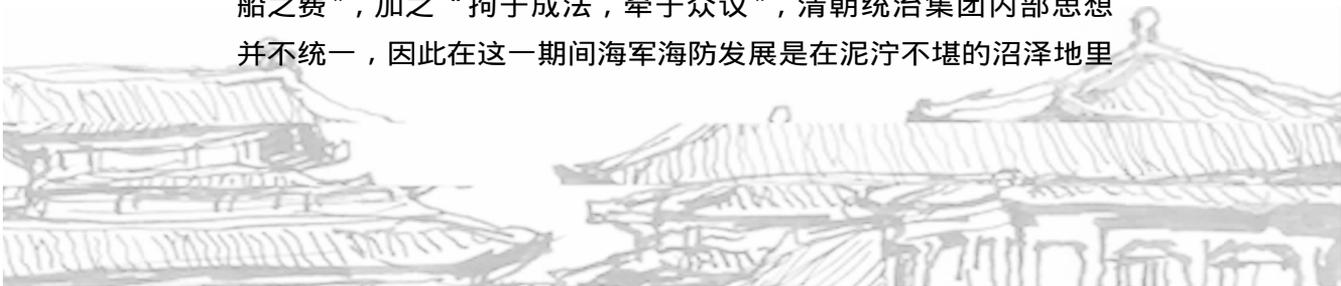


两大部分组成。1869年夏，刚刚开工仅一年的马尾造船厂就将其建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推下了船台。及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出34艘舰船。

福州船政局对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其开创了近代中国的造船事业，而且更在于它为近代中国海军培养造就出第一批优秀人才。福州船政学堂由培养造舰军官的前学堂和培养海军指挥官的后学堂组成，聘请西方海军教官分别以法语和英语授课，学制为4年。这所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与方式培养海军军官的海军学校，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输送了第一批极为宝贵的人才，其中不少毕业学生还被选送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海军院校留学深造。他们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杰出将领和专业栋梁，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后来北洋海军的总兵（相当于舰队副司令）刘步蟾和林泰曾，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官、教育家兼社会启蒙思想家严复。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堪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著名摇篮。

然而，中国自造军舰发展海军的道路并不平坦。1872年，内阁大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止自造军舰，理由主要是“糜费太重”，于是引起一番争论。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的力争之下，清朝政府否决了宋晋的意见；但“糜费太重”却依然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福州船政局初创时，左宗棠计划在5年之中，用300万两白银建造16艘舰船。但5年之后仅造出6船，耗费已高达340万两。为解决经费之难和财源之缺，李鸿章于1872年倡办轮船招商局，他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因而“今倡办华轮，实为国体、商情、财政、兵力展拓之基局”。按今天的话来讲，李鸿章不但懂得招商引资，而且是在努力探索一条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官办与商办相促成，海军发展道路，但仍是举步维艰。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的落后，使“中国造船之费，倍于购船之费”，加之“拘于成法，牵于众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因此在这一期间海军海防发展是在泥泞不堪的沼泽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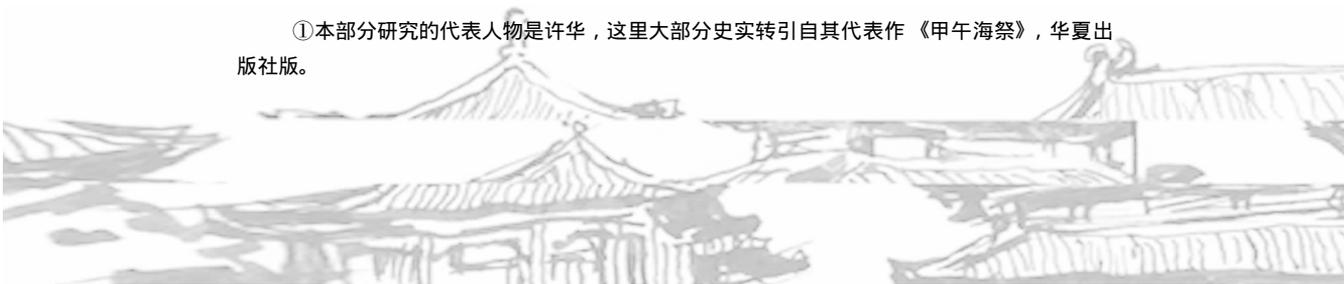
艰难前行。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一大步了。^①

在以往的对外交涉过程中，洋务派最先感到的是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訢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3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

细细数来，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30多年间，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相当可观，其中犹以军工企业、军民两用企业 and 三洋海军的创建，成效最为显著。在近30个军工企业中，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的规模最大，供应全国各地枪炮、弹药及其他军需用品。福州船政局不但自造轮船、巡洋舰，还自行设计和制造铁甲船、舰船供沿海数省使用。此外，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等省相继建立了军工厂。虽然这些大小军工厂存在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经费不足和衙门式的管理等弊端，但它们毕竟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为近代国防建设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30多年的军民两用和民用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成效尤为显著。其中，尤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近代化企业的规模最为宏伟，成绩尤佳，不仅收益显著，还同洋商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而三洋海军的创立，当是中国军事和国防近代化的里程碑。所谓三洋海军是指南洋、北洋和粤洋3支海军。1875年（光绪六年）开始创办，1884年初具规模。其中的粤洋海军又称“福建海军”。3支海军拥有舰只43艘，共计22124吨。虽然福建海军建立不久即遭法军偷袭而全军覆没，但是北洋海军则加速建设，仅在4年之内就从英、德等国购进铁甲舰、新式快船和鱼雷艇共14艘，还用巨

^①本部分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许华，这里大部分史实转引自其代表作《甲午海祭》，华夏出版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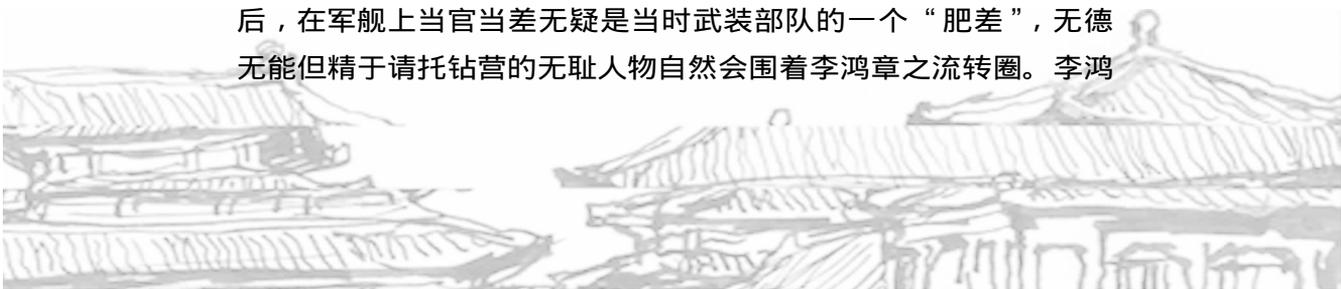


款修建旅顺和威海卫军港，营造船坞，修筑炮台，聘请外国教官教练官兵。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舰队，当时被人视为“世界第四大舰队”。近代化海军及其庞大舰队的建成，当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

洋务派还大力制造轮船、修筑铁路等新式交通，创办电报与新式邮政也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此外，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为国造就新学和各类技术人才。新知人才的培养，是当时洋务事业的根本。

可惜的是，洋务的发展挽救不了制度上的缺差，其本身也在挣扎中慢慢溺毙。洋务运动从表面上看去做得有声有色，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实质与表象有太大的差距。基于下面列举的几方面原因，洋务派多年的努力不过是在花费巨资后搭了一台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并在随后的中法、中日战争中灰飞烟灭。

一是清政府花费巨资购进了巨舰巨炮，但由谁来指挥和操纵这些巨舰巨炮，就不是“实用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属于体制和制度的范畴。洋务运动的宗旨是在不变更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而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靠的是“等级”、“资历”和“任人唯亲”；西洋人事体制则是“兼容并蓄”和“任人唯才”。在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下，恭亲王、李鸿章之流不会想到去民间挖掘人才，只会在清政府的官僚队伍里寻找较为“合适”的人选，而清王朝的官场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再清正的人在官场混上几年也很难保存“理性”和“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李鸿章出于“公心”（事实不可能）以“合适”为标准（在没落政府已经很难得）来用人，所谓“合适”的人选也不过是“矮子里的长子”，不是全社会的优秀人才。而最先进的武器应该由最优秀人才的来驾驭才能充分利用并发挥其功能。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因为缺乏科学性，“权力”和“责任义务”脱节；“公利”和“私利”找不到可以“互存互利”的“结合点”。当第一批军舰驶回国后，在军舰上当官当差无疑是当时武装部队的一个“肥差”，无德无能但精于请托钻营的无耻人物自然会围着李鸿章之流转圈。李鸿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章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人物，自然会任用看上去“舒服恭顺”、给他“好处”或和他沾亲带故的人物当舰长。舰长也根据同样的用人标准去任用下级军官和重要岗位（多半是与经济沾边）的人选。即使偶尔任用了一个有才且称职的人选，也不过是把这人当作遮眼的“招牌”，他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还会陷于“孤立”和“不好的名声”；就像正经女人在妓院会“孤立”和“名声不好”一样。由这帮人去指挥操纵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就像妓女当修道院院长和小学生当大学教授一样，不用和谁打赌就可知道巨舰巨炮的命运。

二是中国传统的人事财政体制是“暗箱作业”，使贪污腐败的病菌得以侵蚀官场的各个角落。洋务运动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财政黑洞”，为“回扣”、“送礼”和“报假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结果在“洋务”的招牌下花掉的大量金银，只有部分用于办“洋务”；另一部分不是被浪费掉就是中饱私囊。如果是在制度较为科学完善的英美，同样的金银可以购买更多的军舰、开办更多的工厂和办更多的实事。尤其是“海军衙门”成立后，海军几乎成为慈禧太后的私人金库，她可以随意挪用“洋务”名义下的银子供她个人挥霍享受，而置国家的千秋大业（也是慈禧太后的个人家业）于不顾。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用于营造豪华盖世但与富国强兵没有任何关系的颐和园，供她一人休闲玩耍。海军自此不能增添新的舰只，也不能更新装备。

三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把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而在西洋价值观里二者是统一的。当中国封建统治者决心让国家富强起来时，首先想到是让老百姓做出牺牲，让老百姓勒紧裤带把钱节省出来交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这笔钱拿去从事重点工程建设和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这样做的结果很容易使国家在短期内呈现一派热闹堂皇的景象，乍看上去好像是强大起来了。其实这样的“强大”是没有根基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当国民贫困无知时，堂皇的外表只不过是敷在创伤外面的一块彩色纱布。试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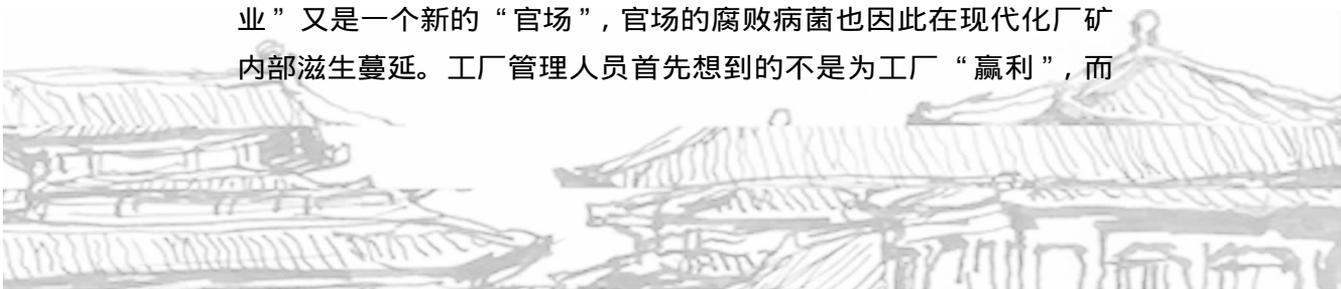
想，当士兵的家人在地方官的压榨下饥寒交迫时，你怎能指望他爱他的国家并随时准备为国家做出牺牲，怎能指望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当国民缺乏最基本的购买力时，现代化的工厂就像建筑在沙堆上，制造出的现代化产品就只能堆积在仓库里，产品不能转化成资本，现代化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当“洋务运动”到达高峰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民百姓，无不认为“洋务”成功了，只有极少数人发现了隐伏的危机，驻英公使郭嵩焘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按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报告汇集出版。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往往是寂寞的，他的过人见识没有几个当权人物能够理解，相反被官场的那些貌似忠贞爱国的卫道士骂成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

四是洋务派开办的工厂和“实业”绝大多数是“官办”的。实业是靠“利润”推动的，“官办”实业则与“利润”无缘，而是靠“官场”的运行规则来推动。在这种背景下，每一个“洋务实业”又是一个新的“官场”，官场的腐败病菌也因此现代化厂矿内部滋生蔓延。工厂管理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为工厂“赢利”，而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面——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安插亲信就业和“损公肥私”。结果“洋务实业”绝大多数都亏损。如张之洞开办的“汉阳兵工厂”在早期就曾陷入不可救药的亏损，本国造出的枪械成本反比进口价格高出许多。国民为洋务捐出许多的钱，等到应该拿回报时，才发现还必需继续捐钱养一大帮“闲人”和支撑一个“烂摊子”。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愚蠢固执的满洲权贵和“皓首腐儒”的无知、排外和随性妄动也对洋务运动起到了阻挠作用。

洋务运动最显耀的成果是“北洋水师”（北洋舰队）。

而甲午中日战争则为“洋务运动”划下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沉重句号，“洋务运动”的成果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但是，消失不等于失败。一场战争的胜败不足以衡量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而且用一场战争的成功与失败来衡量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是缺乏根据的。不能抛开运动的目的和历史使命来评价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30年，虽然最终以中日甲午之战中的失败，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样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其所创办的一些工业企业，后来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些企业甚至成为现代企业的雏型。以山东为例，一些在洋务运动中所建起的一些军用工业和开采的矿业，都为建国以后轻重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政治层面的意义来看，“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毕竟阻止和延缓了殖民化的进程，并且以自己渐渐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实力，提高了与列强较量的能力。就其思想意义来看，洋务运动毕竟让国人开了眼界，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而落后就要挨打也日益成为国人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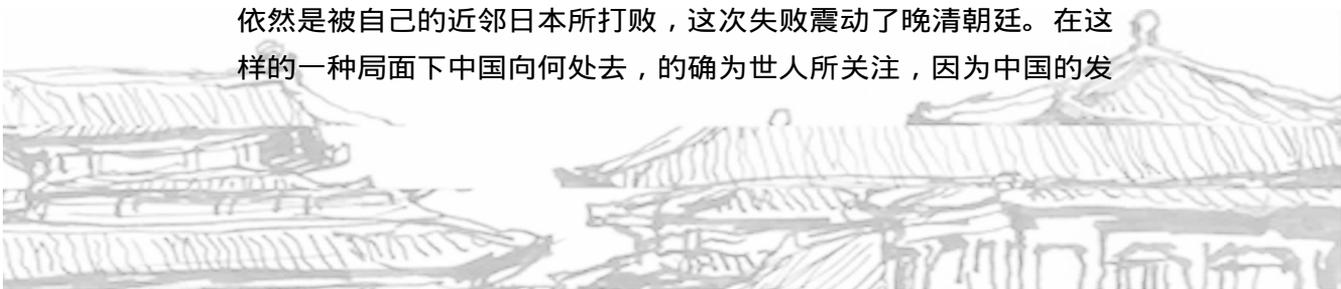
以上各类洋务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尽管出现不少营私舞弊、糜



饬玩公和产品质量差等腐败现象与弊端，但显著的成绩是洋务运动的主流，洋务不仅有利于防范和抗击外国侵略，还主动与洋商争夺利权，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进一步大开，并造就了一批批具有近代化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特别是近代化的工矿交通企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仅就这些成就即足以说明：洋务运动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现。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正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激流漩涡，不忍国家灭亡而勇于抛弃“华夷有别”的陈腐教条，发愤图强，以谋求自强自立。以上所述的洋务企业的建立、近代交通通讯的引进、近代海军的创建、新知人才的培养、人们思想意识的更新等等，充分显示了洋务运动的业绩及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景。

然而，顽固守旧势力睁眼不看事实，却把洋务事业视为祸害国家的巨患，即所谓：“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学士麟书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51页。）他们处处攻击和讥讽洋务事业，宣扬“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学习西方就是“丧失国体”、“以夷变夏”之类的陈词滥调。正如左宗棠所说：“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甲午战争之败，更成为顽固派攻讦洋务派及其洋务事业的把柄。甚而对北洋舰队的覆灭也幸灾乐祸，把洋务事业的部分失败夸大为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任凭顽固势力随心所欲地摆布的。

人们基本上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一个竭力鼓吹和推行了这么多年“洋务运动”的国家，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被自己的近邻日本所打败，这次失败震动了晚清朝廷。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中国向何处去，的确为世人所关注，因为中国的发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展和世界列强对中国觊觎的局面，使中国感到了民族的危亡，仅仅用所谓纯粹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能真正强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时并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形下，企图依靠洋务运动就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向西方学习毕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有人曾把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也称之为“自强运动”，其实在中国人面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形成之初，一些有为之士就有了自强的思想，但是中国的朝廷对于洋务运动与清朝命运的认识并不深刻。因为当时所谓的“洋务”在中国，不过是一些朝廷重臣和一些外省督抚，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和眼光，在看到了中国时局的一些弊端，以及睁眼看世界之后提出的主张，但是作为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阶级，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放弃自己“家天下”的，这种专制主义，其实正是中国近代化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同时，当洋务派在中国的沿海一带继续推行洋务的时候，清帝国内部，则是在忙于镇压各地不断爆发的起义和重建帝国的秩序。试想在这种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中洋务运动的挣扎以及命运，其实在开始进行的时候，结局早就有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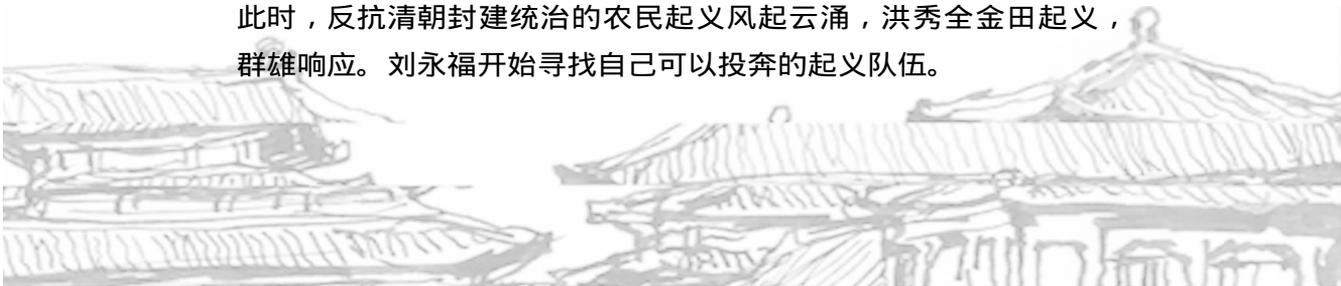


第二节 刘永福和黑旗军

刘永福是黑旗军的创建者，是农民出身的杰出军事家、政治活动家。在 19 世纪发生的援越抗法、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他率部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为后世所景仰和垂念。

刘永福（1837—1917 年）原名建业，号渊亭，排行第二，俗名刘二，时人尊称为刘义，祖籍博白东平，生于防城小峰，长在上思平福。

刘家世代贫寒，为生活所逼，一再迁徙。永福青年时代，依靠堂兄弟在平福开荒种地过活。尽管永福身强力壮，膂力过人，勤勤恳恳，但仍赤贫如洗，无法糊口。刘永福当时所处的社会，正是中国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他出生后的第三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战争以清朝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告结束。战后割地赔款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压榨下，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爆发了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尤其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将无数分散的农民起义汇聚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加之天灾人祸的打击（刘永福 16 岁那年，父母及叔父因贫病交加先后不幸去世），刘永福的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火种。也正在此时，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洪秀全金田起义，群雄响应。刘永福开始寻找自己可以投奔的起义队伍。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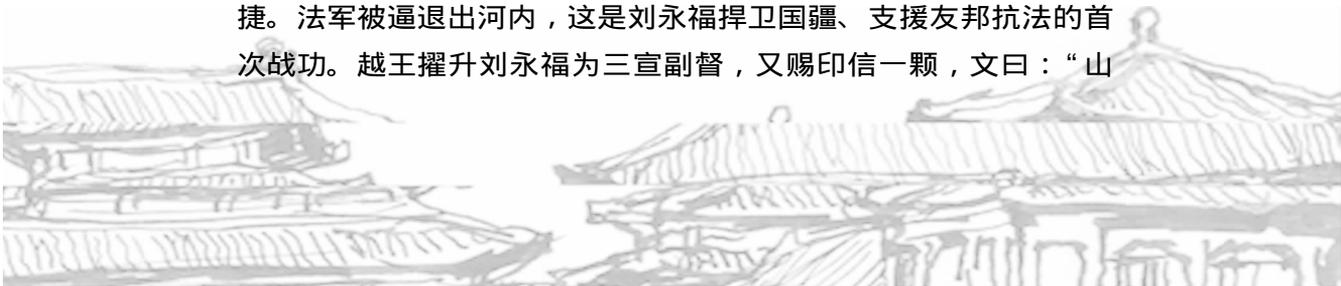
1857年，也就是刘永福20岁的时候，他毅然地离开几乎已不存在的家，束发投奔天地会旗头郑三领导的起义队伍，走上反抗压迫剥削的道路。最初刘永福在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的部属郑三手下任先锋。他率部打垮巫必灵为首的地主武装，队伍迅速扩大。后来，清朝政府在围攻太平天国天京的同时，也加紧对广西农民起义军的“清剿”，吴凌云壮烈牺牲。1866年，刘永福带领200余人同吴亚终（吴鲲）汇合，经过扩充整编，组成一个旗，刘永福被任命为旗头。由于刘永福“胆艺过人，重信爱士”，深得部下爱戴和拥护，不久就成为吴亚终农民军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三哥头”。刘永福着手操练士兵，整肃纪律，选择人才，统一军令。当时他扎营于归顺州（今靖西）安德圩的北帝庙，看见北帝神像旁边的周公像手执着一面绘有“北斗七星”图案、镶有狗牙白边的黑色三角旗，就仿造黑旗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从此以后，这支队伍就常举黑旗作战，人们称之为黑旗军。

1867年秋，清朝政府派广西提督冯子材调集重兵进攻桂西南农民军，拉网扫荡。农民军伤亡惨重，军需粮饷难以为继。加上这支队伍的首领吴亚终、黄崇英及刘永福意见不一，只得分道扬镳，各自率领所部转移到越南。吴亚终进入北宁后在清兵追击中牺牲；黄崇英盘踞河阳（河江市）；刘永福带领黑旗军200余人，从归顺州的波斗，翻越崎岖的大岭，进入越南苏圩。此后又不断扩展地盘，据有安礼、高平、左大、六安等地，直至把势力伸展到与云南隔河相望的保胜（老街），并以保胜至河阳广阔的河谷平原和深山密林为根据地。“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安定民心，自耕自养，积蓄力量。当时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盗匪猖獗，残害无辜。1869年，刘永福铲除了白苗土霸盘文义匪帮，此举深得当地群众拥护。1870年，刘永福又率部进剿称霸保胜的匪首何均昌，恶战数月，终于消灭何匪，从而控制了保胜附近10余个州县。接着又马不停蹄，乘胜进击，同勾结法国殖民者的黄崇英黄旗军进行激烈的战斗。黑旗军协同越军和清军三方面配合，“包围合击”，经过4、5年艰苦清剿，黄崇英部就歼。从此越南北圻出现“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



安定局面。越南人民赞誉不绝，有口皆碑。

刘永福举义之日，正值越南多难之秋，内忧外患，国无宁日。法国侵略者妄想把越南变成其殖民地，采用蚕食鲸吞的手段，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强迫赔款割地。1867年法国侵略者强行侵占了越南的南半部之后，就疯狂地发动对越南北部的进攻，妄想灭亡越南，进而从西南入侵中国，建立一个所谓“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那时，越南阮氏王朝“政令酷虐，民不聊生”，弄得田园荒芜，衰微破败，面对法国的侵略，只好采取屈辱求和、妥协投降的态度。1873年11月，法国殖民主义的先锋杜布益企图以武力打通红河，搜刮我国云南矿产资源、开辟进入西南腹地新商路的阴谋受阻后，法国当局派安邨带兵180名和两艘炮舰于11月20日晨突然轰击河内，越南总督阮知方奋起抵抗。但武器差劣，士气不振，不堪一击。法国侵略军配备有最新式的精良武器，诸如来福快枪、卡乞开司机关枪、开花弹大炮等。安邨命令轮流开机关枪扫射，发炮轰击城墙。阮知方的儿子阮林在城头被炸毙，阮知方受伤被俘，拒医绝食而死，以示不屈。越王迫不得已，派人分别往谅山和保胜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援助。但清军无动于衷，只有刘永福见义勇为，挺身抗暴，亲自率军2000，翻越宣光大岭，日夜兼程，南下抗法。12月21日黑旗军在河内郊外罗池与安邨殖民军正式开战。法军按照步兵战术，排好一字雁队，分前后两排，前排鹅步持枪瞄准射击，后蹲跪填装弹药，轮番射击，交替前进。刘永福传令全军沉着应战，先派出一部分兵力，向左右两侧运动，猫腰跃进，迂回包围；接着又出动敢死队正面迎敌，接火后佯装败退，诱敌深入伏击圈。法军大摇大摆直上。黑旗军装上刺刀，霎时间伏兵四起，杀声震天，展开惨烈的血刃战，打得法军抱头鼠窜，败不成阵，争先恐后缩回河内城。黑旗军的先锋营吴凤典横冲直砍，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安邨，击毙这个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其部属百余人都成了刀下鬼。这一仗缴获枪械百余支，弹药一批，取得“诱斩安邨，覆其全军”的大捷。法军被逼退出河内，这是刘永福捍卫国疆、支援友邦抗法的首次战功。越王擢升刘永福为三宣副督，又赐印信一颗，文曰：“山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以彰表功绩，并命刘永福扼守红河两岸。

河内首战全胜，越南境内稍得粗安，推迟了法国殖民者并吞越南，觊觎中国的日程。但事隔10年之后，法国国会于1883年拨款550万法郎作侵越经费，任命殖民头子李威利为侵略军总司令，率领法军2000人先后攻占河内和南定。接着又分兵进犯越南国都顺化及北宁、山西，局势岌岌可危。越军望风披靡，清军观望不前。刘永福满怀“为越南平寇，为祖国屏边”的宏愿，于5月6日率领黑旗军3000挺进河内，会同越军把河内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且发挥近战、夜战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先下令大刀队执行巧计引敌上钩的战术。法军冲杀出城，黑旗军大刀队纷纷扑地卧倒，速将预备好的猪血、朱砂涂在身上，假装战死。待法军呼啸而过后，猛然翻身跃起，使敌兵腹背受敌，陷入重围，枪炮已不起作用，法军被砍得人头滚地，鬼哭狼嚎。法军统帅李威利也被大刀队剁成肉饼。这一仗打死敌军七画将军总司令李威利和五画校官副司令韦医（注：军装袖口镶白边，画多则官大）及以下军官30余名，打死法兵200多名，夺得军械弹药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纸桥之役。越王为了表彰刘永福纸桥大捷的军功，晋升他为三宣提督，加赐一等义勇男的爵号。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当局惊慌失措，但又不肯善罢甘休。任命孤拔为司令统率兵舰4艘，陆军3000，再次侵犯越南。他们分兵两路：一路由孤拔指挥，再度进攻国都顺化；一路由波特指挥，进攻北圻黑旗军。时值越王阮福时病歿，发生内讧，无力攘外。法国殖民者强迫越南政府签订卖国的《顺化条约》。刘永福面对法国殖民者野蛮的行径，义愤填膺，指出：殖民者“不独虐越，实欺中国”；立誓坚决“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1883年夏秋之际，刘永福率部与法军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怀德之战。黑旗军武器差劣，新式的后膛快枪和开花弹大炮为数甚少，大部分是简陋的粉枪、急枪、铁炮，还有部分大刀、长矛。法国侵略军则是“船坚炮利”，一式全新的枪炮，水上还有铁壳舰。但经过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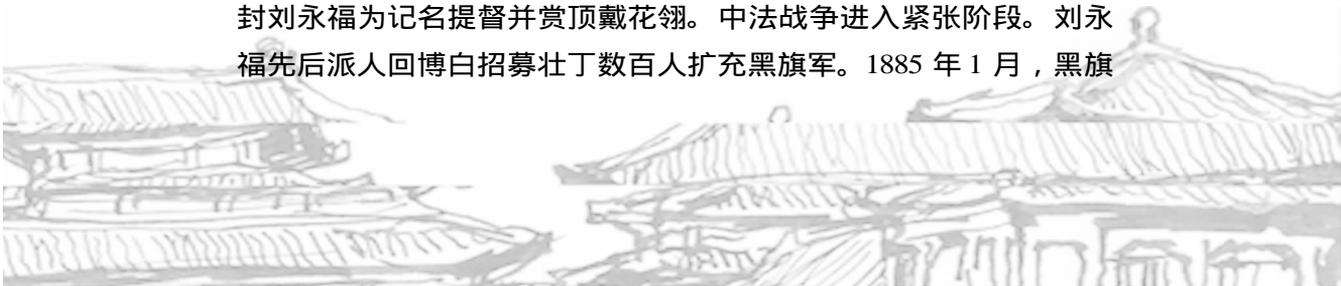


恶战，波特还是吃了败仗。他为了挽回面子，使出了极其阴险毒辣、惨无人道的伎俩，深夜炸崩河堤，使怀德府方圆数百里顿成泽国。在这万分危急关头，越南群众撑来一批木船、竹筏，把黑旗军救护至地势高亢的丹凤。

8月底，波特又率领侵略军3、4千，配备军舰11艘，大木船9艘，水陆两路进犯丹凤县。刘永福派黄守忠、邓士昌紧急带队前去迎敌，两军在堤围上发生遭遇战。基围内水深没顶，河堤狭窄，弹雨密集，法国兵舰又从江面发炮轰击，黑旗军前后受敌，形势非常危急。刘永福派人向清军求援，但清军按兵不动，催促多次才派来两营兵力支援，调拨子弹一万发。双方血战3日3夜，黑旗军艰苦卓绝，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而转守为攻。“是役歼灭法兵亦以千计”。正在这时，孤拔在东线战场不费吹灰之力攻陷顺化，强迫越南政府在《顺化条约》上签字生效，包括开放红河和割让保胜给法国，责令刘永福退兵。刘永福满腔怨愤，只好退守山西。

山西是越南北部一个军事要地。刘永福为了确保山西，收复失地，命令部属急造木排、竹筏拦江，截阻法军从河内来的兵舰；又部署在河岸修筑炮台。每隔10丈置1门铁炮；还抢修加固城墙和在周围筑起五重木栅，东、西、南、北4个门分兵把守，在城头上加强巡逻戒备。城内除黑旗军3000人外，还有张永清的清军和黄炎佐的越军。1883年12月11日，法军出动兵舰12艘，板船40艘，弹药车500辆，水陆并进气势汹汹地向山西杀来。刘永福率部众冒着枪林弹雨，沥血鏖战。但由于城外一炮台陷敌，西门城墙被法军炸塌，越奸阮廷润等叛国投敌，其余越军亦贪生怕死，穿上白衣，打开城门投降。协防的清军也望风逃遁。山西遂于12月26日沦陷。

援越清军畏法如虎，苟且偷安相继退出北宁、山西、宣光等重镇，龟缩广西边境。1884年，法国派海军舰队突然袭击我国福建马尾军港和船厂，清朝政府被迫下令正式对法宣战。同年8月清政府封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并赏顶戴花翎。中法战争进入紧张阶段。刘永福先后派人回博白招募壮丁数百人扩充黑旗军。1885年1月，黑旗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军与援越清军包围了宣光法军。刘永福在离宣光 10 余里的左育驻扎重兵，并用竹排、木筏拦河拒守，断绝法军运送粮械接济。宣光守敌被围月余，成为瓮中之鳖，危在旦夕，遂向河内法国全权大臣寄信救援，说：“宣光被围，弹药将尽，速派兵援。”刘永福断定河内法军总部得悉，必派援兵，且取道左育，便选择在左育附近野茅丛生的大荒坡，埋下大批炸药，铺上草皮伪装坟墓，准备一举歼灭敌人。一天，法军援兵从太原向宣光张牙舞爪地冲来，待敌人进入伏击地段时，黑旗军拉动火引，一阵震天巨响，山崩地裂，硝烟冲天，法军被炸死炸伤 4、5 百人，其中军官 20 多人，伪军死伤不计其数。法军吃了苦头，咬牙切齿施以报复，利用密集炮火轮番射击，组织兵力猛烈冲锋；宣光城内法军乘机反扑，黑旗军力不能支，宣光之围被解，黑旗军退守临洮。

1885 年 3 月 23 日，法军进犯临洮。刘永福联络奉命抗法的滇军和越南义勇队，共同阻击来犯之敌。鏖战一日两夜，敌军精疲力竭，死伤惨重，只得黑夜潜逃。刘永福挥师乘胜进击，连克临洮府和广威府等 10 余个州县，有力地策应了东路抗法清军，转败为胜。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还光复谅山、高平等重镇，扭转了战局，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由于越南王朝和清朝政府腐败昏庸，同年 4 月 19 日宣布停战，前方将士忍气罢兵。

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战争中英勇不屈，身经百战，取得了辉煌战果，使法国侵略者和中国投降派极端仇视和不安，一心要把他铲除。清朝政府为了逼刘永福率部回国，一个月内就连下 9 次上谕，采取胁迫利诱、恩威兼施的手法，赐予刘永福“依博德恩巴图鲁”和“三代一品封典”的荣誉。越南人民得知刘永福要离越归国，远道赶来挽留。后来，黑旗军有部分人员不愿回国，留下来参加当地抗法义勇队；有部分人散落各地成为华侨或越籍华人。1885 年 8 月刘永福带领黑旗军 3000 人从保胜启程入云南省文山县南溪，于同年 11 月抵南宁。清朝政府又以种种借口裁减了 1500 人。同年 12 月刘永福奉令带领黑旗军 1500 人顺水东下，直抵广州，驻扎于燕坊，又被张之洞裁减去 1000 人。最后黑旗军旧部在刘永福身边只剩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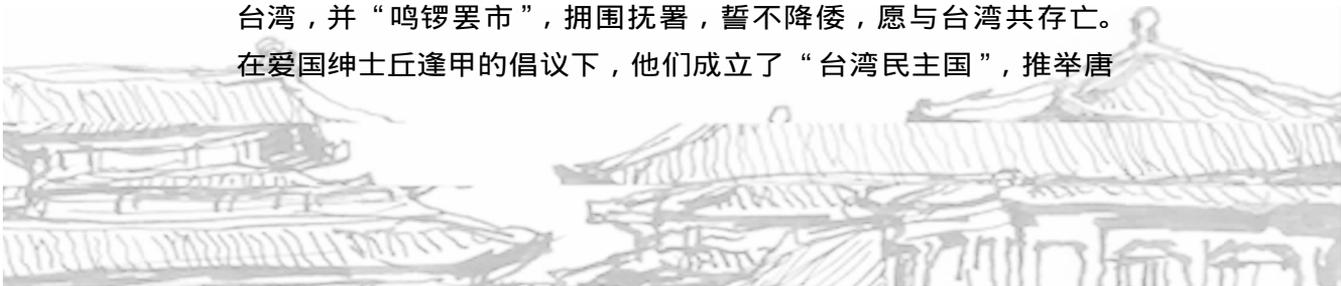


4百人。1886年春清朝政府委任刘永福为闽粤南澳镇总兵。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台湾地位十分重要。清政府命刘永福赴台湾帮巡抚邵友濂办理防务。

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抵达台湾后，驻守于台南地区。为加强防备力量，他从台湾游勇中招募4营军士，将黑旗军扩充到8营，近2000兵力。当时台湾岛上有清正规守军20余营，分散地驻守在台北、台中、台南和台东各地，由于一向战备松弛，军务涣散，所以台湾防务犹如一盘散沙。而接任台湾巡抚兼主理台湾军务的唐景崧虽以“儒将”自称，但实际上并无军事指挥能力。而且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在台湾防务的部署上一筹莫展，无所改进，仍如以前一样将台湾防务划分为台北、台中、台南3个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的独立防区。除台南由刘永福率领8营黑旗军把守外，台中防区由道员林朝栋率领10营台勇把守，台北则由唐景崧本人率领12营把守，3个防区的正规守军合兵力只有3万余人。如此分散的防务体系，既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又不利于各防区间的协调行动，很难集中优势兵力变被动为主动。刘永福对此深为忧虑，他电奏清廷，指出台湾防务“势处孤悬，四面受敌”，提出了“必南北联络一气，临时堵御，呼应方灵”的改进台湾防务体系的方略。可是，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并没有给予重视。刘永福又亲往台北面见唐景崧，力陈分散防守弊病之所在，以及对台北实行重点防卫之必要。从全局利益考虑，刘永福主动提出将黑旗军移驻台北，并自请协助唐景崧指挥全台防务。可是，唐景崧并无决心坚守台湾，对刘永福的建议拒不采纳。刘永福见劝说无效，只得慨然长叹，返回台南加固阵地，构筑炮台，操练军士，做好迎击来犯之敌的一切准备。

1895年3月，清军在辽东决战中惨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除赔款2万万两外，还将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消息传出，引起全国人民的莫大愤慨。台湾更是全省悲愤，人们奔走相告，坚决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并“鸣锣罢市”，拥围抚署，誓不降倭，愿与台湾共存亡。在爱国绅士丘逢甲的倡议下，他们成立了“台湾民主国”，推举唐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景崧为大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勇统领，领导人民进行抗日保台的斗争。为了逼使台湾人民投降，日本派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于5月27日从冲绳出发，分兵两路进攻台湾。其中一路日军从貂角强行登陆，攻占基隆。接着，又进犯台北，这时，曾发誓死守台湾的巡抚唐景崧等人畏日如虎纷纷逃回大陆。6月7日台北陷敌，林朝栋亦相继逃命内陆。台中空虚，台南形势紧迫。台湾人民纷纷组织抗日义军，他们共推驻守在台南的刘永福为义军的军统，领导抗日。刘永福毅然接受推举，公开表示：自己已将近60岁了，如能够保卫同胞利益，万死不辞。同时他指出，要守住台湾，最重要的是军民要气味相投，大家精诚合作，互相援助，杀敌争先。他宣布自己的军队一定放在最主要的战场上，带头作战。

6月28日，台南地方绅民推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导抗日斗争。刘永福坚辞不受，仍以帮办之职，统率防军与台湾义军抗敌保台。

日军攻占台北之后，随即南侵新竹。新竹内负崇山，外濒大海，为台中门户和战略要地。刘永福令副将杨紫云统率新楚军会同台湾生员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领导的义军据险而战，杀伤大量敌人。6月下旬，由于义军军械不继，粮食断绝，新竹陷入敌手。

1895年8月中旬，战争转入台中。为了保卫彰化，黑旗军和台湾义军在大甲溪一带同敌人展开激战。黑旗军在大甲溪南岸设伏狙击，静待日军靠岸就突然四出截堵，日军仓惶北渡，刚渡至河中间，徐骧指挥义军猛烈冲杀，日军船只被打沉冲翻，纷纷落水淹死，岸上的日军四散逃遁。这一仗，抗日义军取得全胜，缴获敌军枪械甚多。日军不甘心失败，收买奸细带路，偷袭黑旗军后路，大甲溪遂为日军所占据。

大甲溪失守后，日军步步进逼，又靠优势兵力攻占台中等地。刘永福的部将吴彭年率军退守彰化。8月2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彰化城北的八卦山。吴彭年带领士兵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击毙号称日本最精锐的近卫师团1000余人，打死少将山根信成。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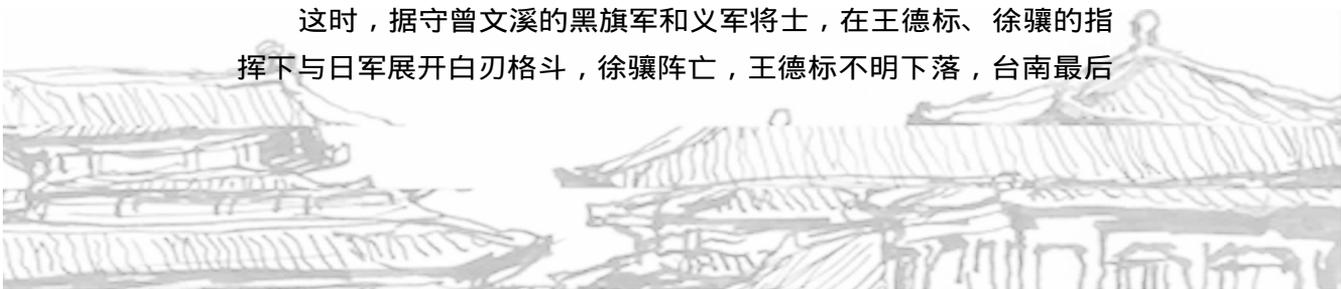
场悲壮的血战中，义军首领吴汤兴中炮牺牲，吴彭年英勇战死，刘永福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 300 余人也壮烈殉难，彰化失守。云林、苗栗亦相继沦陷，义军首领徐骧带领余部数十人杀出重围，退往台南。

接着嘉义告急，1895 年 9 月 11 日，日本又派第二师团增援台湾。在其海军的配合下，于 10 月 8 日，疯狂地进逼嘉义城。守将王德标在城外暗埋地雷，炸死日军 700 多人。其余仓惶溃退，半路又被伏兵截击，死伤甚众，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亦重伤毙命。翌日，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城墙崩塌，日寇拥入城中。王德标率领黑旗军和义军战士与敌人展开巷战，终因势孤力弱，只好退到台南曾文溪一带。

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台湾抗日武装面临着严重的军饷短缺问题，台北库存的巨款已被唐景崧卷走。刘永福以台湾省台南官银钱票总局的名义发行的台南官银票却被英、法等国银行拒用。

在财政陷入极端困难之际，刘永福曾派人赴大陆请求援助和接济，清政府百般阻挠，派李鸿章坐镇上海，将一大批大陆官民援助台湾抗战的军械和粮饷截留下来。清政府还诏令沿海各处：“台事无从过问，所有粮械，自不宜再解，致生枝节。”并严令闽浙总督谭钟麟“着海口、官弁严行禁止”，千方百计封锁和断绝了大陆对台湾抗战的一切联系和援助。刘永福目睹此情形，不得不发出锥心泣血的悲鸣：“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10 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在相继占领台中、新竹、彰化、嘉义等地后，又集中兵力南北夹攻台南。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刘永福组织抗日义军进行最后抵抗，与日寇决一死战。这时，台湾军民坚持抗日已 4 个多月了，缺粮饷、少军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部属要求刘永福接济，但他已无能为力。10 月 15 日，日舰进攻台南东南的打狗港。刘永福的养子刘成良率军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来守卫炮台的兵士饥饿不能战，成良退守台南。

这时，据守曾文溪的黑旗军和义军将士，在王德标、徐骧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徐骧阵亡，王德标不明下落，台南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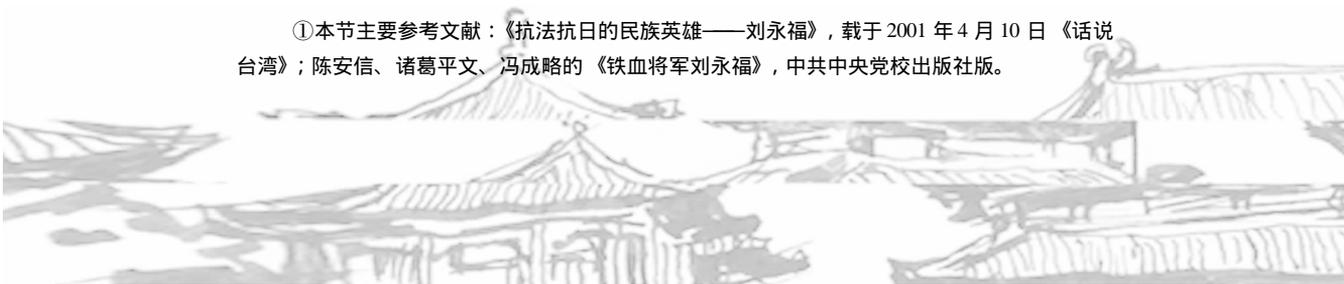
一道防线失守。

日军攻占曾文溪，立即调集海陆精锐部队，夹攻台南城。10月18日，刘永福召集部将会议，商讨战守之计，未得结果。次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刘永福亲手点燃大炮，轰击敌舰。当晚，日军攻城益急，城内弹尽粮绝，在艰苦的恶战中，士兵精疲力尽以至不能举枪挥刀。当时城内秩序混乱，刘永福欲冲回城内，部众极力劝阻道：“各路倭兵大至，此城万不可守，请公去。”刘永福见大势已去，仰天捶胸，呼号恸哭说：“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当天深夜，刘永福带领刘成良等10余人乘坐小艇，然后搭上英国商船“迪利斯”号内渡厦门，而其他仍在台的黑旗军将士则坚持与日军血战到底，最后绝大部分光荣殉国。21日台南陷落。台湾全境被日寇占据。

刘永福的晚年，仍关心国事，体恤民瘼。1907年，钦州三那（那桑、那黎、那彭）群众在刘思裕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刘永福对此予以同情和支持。1911年，刘永福加入同盟会，参加推翻封建王朝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应广东都督胡汉民的邀请，出任广东民团总长，不久辞职回家。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约》，刘永福义愤填膺，拍电谴责袁世凯卖国求荣，并表示，如果日本逞凶，他愿以老朽之躯充当先锋，与宿敌决一死战。1917年1月9日，这位威名远振的反帝爱国将领溘然长逝。享年80岁。^①

刘永福所领导的抗日保台斗争最终因清政府的无耻出卖和弱不敌强而告失败。但是，历史从不以胜败论英雄。在台湾危难的严重关头，刘永福从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大义立场出发，顶住了清政府的压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肩负起领导台湾爱国军民开展抗日保台斗争的历史重任，成为台湾军民进行抗战的希望所在和重要支柱。在整整5个月的艰苦斗争中，他身先士卒，领导台湾爱国军

^①本节主要参考文献：《抗法抗日的民族英雄——刘永福》，载于2001年4月10日《话说台湾》；陈安信、诸葛平文、冯成略的《铁血将军刘永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



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共杀死杀伤日寇官兵3万多人。日本侵略者在侵台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超过其在整个甲午战争海陆主战场上所付代价的一倍以上。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保台斗争，也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悲壮篇章，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斗争，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的气概和勇气。

纵观刘永福的一生，他从一个反清斗士成为反帝骁将，为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先后同法国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战斗，屡建奇功，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军事家、著名的民族英雄。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三节 如此大捷^①

1884—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是法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安南势力的一步步扩张，夺取对安南藩属权的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越南古称安南，分为三个部分：北为东京（即北圻），中为安南本部，南为交趾支那。它最早受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3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时期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所设的安南督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受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藩属国。但这种藩属关系的实质内容即是4年一次的礼节性朝贡。安南王国独立地统治这片地区，中国并不驻军保护，也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说如果安南受到攻击，中国必须派兵援助。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这种自古以来的关系受到了冲击，并最终被打破。法国和安南的渊源始于1787年安南内乱时请求法国援助的一纸《凡尔赛和约》，大革命结束，王政恢复后，法国企图在印度支那扩张它的势力。1862—1867年，法国吞并了交趾支那6省。1873年安南在黑旗军的帮助下打退安邺所换来的却是1874年灾难性的《西贡条约》，它使法国人获得了对安南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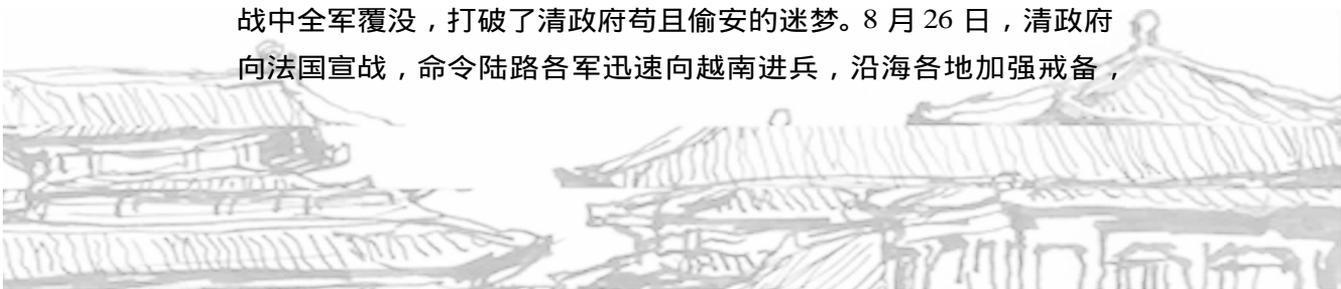
^①本节主要参考文献：杨全顺的《李鸿章和局思想与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何龙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接受“不败而败”条约的原因》，载于《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载于2005年3月24日《香港商报》。



权、传教自由、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进行贸易的权力，对印度支那的占领也得到了承认。法国已俨然代替中国成为安南的宗主国。此时正忙于马嘉理事件和台湾危机的清政府，无暇从行为上对付法国人的这一挑衅，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这一条约。1882年12月20日，李鸿章与法使保海在上海签订协议，双方撤兵，两国共同保证安南的独立，“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中国设法使云南境内土物运往保胜畅行无阻……”，和平似乎可以恢复。然而殖民分子茹费里上台，并在国会通过远征东京的军费案，同时，黑旗军取得纸桥大捷，击毙李威利。这样，双方都已箭在弦上。1883年8月，法国借安南肆德王逝世，幼主继位之机，逼迫其签订了《顺化条约》，使1874年的《西贡条约》获得确认，安南成为法国的傀儡。清政府大惊，却竭力坚持对安南的宗主权。1883年12月至1884年2月，清军在山西、北宁被击溃，由此导致1884年5月11日的《李一福协定》签订。协定约明，“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由法国保护越南；在中越边境，“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决不插入妨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云云。然而，在双方约定的退兵日期内，法军度日页上校那冒进的900名妄图占领谅山的部队在北离被击败，对此事的谈判也因法方的无理要求而不了了之。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广西前线的清军在清政府投降路线的影响下，军心涣散，全线瓦解，镇南关为法国侵略军占领。法军统帅尼格里派人在废墟上插了块牌子，狂妄地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镇南关周围的中国老百姓针锋相对，在关上奋笔直书：“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热潮的激励下，以冯子材为首的爱国清军积极展开了抗法斗争。

镇南关大战是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军的一次战斗。1884年8月23日，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打破了清政府苟且偷安的迷梦。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命令陆路各军迅速向越南进兵，沿海各地加强戒备，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严防法军侵入。

中法战争在海上和陆路同时展开。

海上战场。1884年10月，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强占基隆。

台湾守军在刘铭传指挥下退守淡水。孤拔亲率舰队驶抵淡水港外，炮轰淡水炮台，并派兵登陆，被守军击退，法军进攻受挫，改用封锁方法，孤立台湾守军。1885年3月，法军攻占澎湖。但当他们北犯镇海时却遭到中国守军的炮击。孤拔座舰也被击中，只得率舰队退往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陆路战场仍集中在中越边境地区和越南北部。1884年底，刘永福的黑旗军配合西线清军，围困占据宣光城的法军达3个月之久，城中法军几乎弹尽粮绝。但随着法国援兵的到来，宣光未能攻克。1885年2月，法国再次增兵越南，在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re d'Isle）指挥下，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2月23日，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炸毁关门。

由于潘鼎新的战败，清政府革去他广西巡抚职务，任命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领导镇南关前线的抗法斗争。最初李鸿章认为他年老体衰，不是法军对手，只给了他一个督办高、雷、廉、琼4府25州县团练的名义。冯子材在一无实权，二无饷源的情况下，几个月间，成立了9个州县的团练，其中他亲自挑选和训练的500名钦州练勇成为日后“萃军”的骨干。

同年5月，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冯子材主动上书，要求统率1.5万军队，从钦州进入越南东北的广安、海阳，开辟陆路第三战场。张之洞很欣赏这个建议，同意他编成18营军队，准备开赴越南作战。就在这个时候，冯子材率军赶到前线，毅然担负起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重任。行前，他祭别祖先，嘱托家人：万一军有不利，百粤就非我所有，要带家眷、奉香火驰归江南祖籍，永为中国民，免得受外人奴役。他还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准备万一战死沙场，好料理后事。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前线清军各部之间多



存派系门户之见的情况，首先召集敌前诸将晓以大义，使各将领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各将领共推冯子材为前敌主帅，统一指挥协调各军的行动，这就为挽回败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当时，法军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已从镇南关退至文渊（关外15公里处）、谅山，准备组织新的进攻。

2月25日，冯军进驻凭祥，预备与法军决一胜负。尽管法国侵略军势焰正张，但不难看出他们面临许多困难：远离后方补给基地，失去了游弋于江河中的炮艇火力的支援，兵力也很薄弱，能战之兵只有4、5千人。而清军这时已集结了包括大批生力军在内的部队2万余人，背靠后方补给基地——龙州，士气日渐高昂。

3月9日，法军一部企图绕过镇南关，经扣波进占荊封、牧马，威胁龙州。冯子材根据越南民众提供的情报，派“萃军”5营前往扣波，派苏元春和魏纲部前往牧马，阻住法军通道。

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马上召集各路将领开会，商讨对付法军的办法。他听说当地有个叫蒙大的人很有名，就亲自上蒙家村去拜访。冯子材请教蒙大有什么办法能打退法军。蒙大指着村外的山谷说：“这关山如同大鱼张口，法军孤军入关，插翅难逃，地形对我们是很有利的。”根据当前敌情和镇南关周围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采纳了蒙大的意见，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为预设战场。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4公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1公里的隘口。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筑起一道长1.5公里、高2米多、宽1米多的土石长墙，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1米多深的堑壕，东西岭上修筑堡垒数座，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地形防御体系。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率所部9营扼守长墙及两侧山岭险要，担任正面防御；总兵王孝祺部8营屯兵于冯军之后为第二梯队；湘军统领王德榜部10营驻守在关外东南的油隘，保障左翼安全并威胁敌之后路；冯子材另以所部5营屯兵扣波，保障右翼安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营，屯兵关前隘之后2.5公里的幕府为后队；另有12营屯兵凭祥作为机动。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一切准备就绪后，为了打乱法军的进犯计划，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3月21日，冯子材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占据的文渊，击毁敌炮台两座、毙伤法军多人，取得较大胜利。清军的主动出击，使骄横的法军恼羞成怒。法军东京军区副司令尼格里上校决定不等援军到齐即发起进攻。

3月23日晨，法军1000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内，另以千余人屯关外东南高地为后继。上午10时许，入关法军以炮火为掩护，分两路进犯关前隘，攻占了东岭3座堡垒，并猛攻长墙。冯子材一面命各部迎战，一面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并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在丢失3座堡垒的危急关头，冯子材大声疾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守卫清军在冯子材的爱国热情鼓舞下，英勇抗击，誓与长墙共存亡，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率部赶到东岭参战，王德榜部也自油隘袭击法军，并一度切断了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子材守长墙，王孝祺部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冯子材还另调驻扣波的5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3路再次发起攻击，沿东岭、西岭、中路谷地猛扑关前隘。冯子材传令各部统领，无论何军何将，都不准后退，违者皆斩。当敌人逼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全军为之感奋，一齐涌出，与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惨烈。战至中午，中路法军败退。与此同时，陈嘉部、蒋宗汉部在东岭与法军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傍晚时分，王德榜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被占堡垒。这时，王孝祺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断绝，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退，尼格里只得下令撤退，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冯子材挥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凉山，歼敌千余人，重伤尼格里，取得重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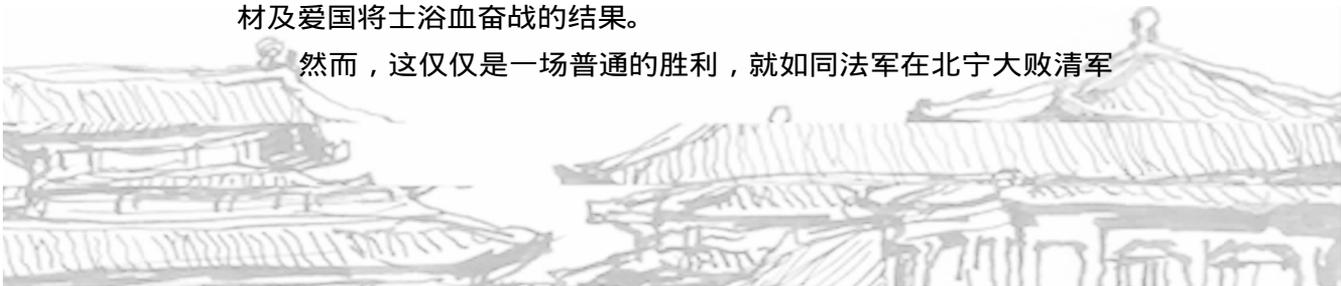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3月26日，冯子材率“萃军”和“勤军”突袭文渊，还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袭其右翼。文渊之敌本是惊弓之鸟，与冯军战不多时，头目中弹落马，余部溃散，冯子材乘势克复文渊州。

尼格里为了等待援军，挽回败局，决定固守谅山。他以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高地，以确保驱驴，屏蔽谅山，另以一部兵力配置在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留下老弱残兵驻守谅山城垣堡垒。冯子材深知清军攻击能力不强，待法军布置妥当，谅山便很难攻取，便与苏元春、王孝祺密商，定下“正兵明攻驱驴，奇兵暗取谅山”之计。3月27日，他派杨瑞山部间道夜行，散伏于谅山城外。28日，冯子材率各部分3路逼攻驱驴。下午，尼格里在激战中胸部负重伤，副手爱尔明加下令全军退往淇江南岸，清军乘势冲进驱驴。谅山守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一部分法军不得不泅水逃命，溺死很多，大批装备物资也委弃不顾。29日拂晓，杨瑞山部乘乱冲入谅山，法军残部狼狈逃窜。清军乘胜追击，至31日，尽复船头、郎甲以北的许多城镇。

镇南关之战，清军各部在冯子材的调度指挥下，密切协同，严密防守，与法国侵略军激战数日，打退了法军的进攻，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和干粮，取得了中法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法战争的形势，使中国反败为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爱国将领冯子材能够团结前敌诸将，在战前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局面，从而有效地集中了兵力，最后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全体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政治上导致了法国内部矛盾激化，迫使茹费理内阁倒台，在近代中外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月4日，中法签订“停战协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既不割地也不赔款的停战协定，它是冯子材及爱国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

然而，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胜利，就如同法军在北宁大败清军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一样，皆非决定性的战略性转折。这仅仅是在边境上的胜利，整个北圻仍在法军控制之中；虽经此役，法军在安南的主力并未有伤，遭败的只是冒进犯关的部分法军，何况以后法国国会还进一步向越南增兵拨款。再者，此时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已从陆路转至海路，同时大捷的意义又被法军攻占澎湖所抵消。1885年3月21日，法兵舰窥台湾之澎湖据之，这一打击对清政府是致命的。“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而法军“得之则以塞援台之路而为水军停船之区”，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澎湖失陷，难怪李鸿章评论道：“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然而，传统教材总是大肆渲染镇南关——谅山大捷，对此节却鲜有提之，乃至看到《中法新约》中法军撤出澎湖的内容颇感奇怪。

“清军在接连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反而与法国缔结和约，双方停战，这是清政府卖国外交的又一奇耻大辱。”这是各教科书中普遍流行的说法。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以思想认识论代替了政治外交论，不敢认同。相反，《中法新约》的签订，以最小的代价遏制了法帝国主义的入侵危机，是清政府外交上难得的胜利。

首先从和约签订的国际环境分析。如前所述，《中法新约》的基本内容源自2月间金登干赴巴黎时的议和条款。当时，海路战场制海权受制于法，台湾被封锁不说，陆路战场清军在谅山、宣光、镇南关吃了大败仗，局面一片溃败。而《中法新约》的草约，4月4日由金登干代表清政府与法在巴黎签订的《中法停战条件》，如前所述，中法一胜一败，且战局向着有利于法方的形势发展。对于战和的态度，在当时清政府纷谕各督抚、统将的上谕中的分析较为客观：“桂军复甫谅山，法军既占澎湖。冯子材等若不乘胜回师，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争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属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此时既已得胜，何可不图收束。”

可见，清政府分析了各种利弊，对整个战局的把握是比较客观的，并非盲目地妥协求和。不要忘了此时，除了在安南与法国间周旋，在另一个清政府的藩属国——朝鲜，中国同样受到了来自日本



的威胁。日本外务省有意勾结法国夹攻中国。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入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11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

让我们看看交战双方——中、法两国的实力对比吧。当时法国业已完成工业革命，虽受普法战争的影响，其国力仍是当时世界第二。就战时的1884、1885两年来看，法国的钢产量达到503000、504000吨，煤产量达到20024000、19511000吨，海上力量有孤拔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海军上将率领的远东舰队，共有大小舰只 20 艘（约 20000 吨），其中多为当时先进的木壳巡洋舰、装甲巡洋舰。当时的中国，正值洋务运动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化刚刚起步。钢产量直至 1910 年仅有 5011.3 吨，尚不及法国 1884 年的百分之一。在越南的兵力（包括黑旗军）共 30000 人，清军“武器残旧，尽是火药枪、长标、大刀，敌不过有开花炮和针枪的法军”，且“内部不齐，各归各的”甚至法军“派几个娼妓就能麻痹当时的北宁守将黄桂兰”，从而冲破原本严密的防线。军官贪污军饷，克扣士兵口粮，至今广西该地区还流传着反映此情况的山歌。再看海上，“闽仅有三轮分守福、厦、台，台、浙仅有两轮分守宁、温，江南兵轮仅三号可用，北洋只有两快船，有事未可远驾”。李鸿章对战前双方兵力有过精辟分析，认为清军陆路可敌而弱于海路及海陆配合：占据险要地方近身肉搏是我们的优势，但武器、操练不及法兵。战争就是在双方这样的实力对比中打响的。

镇南关大捷不能看作是战争对于中方的胜利转折，法军在更具战略意义的东南沿海战场占据压倒性优势。综上，至 1885 年 3 月底从整个中法战争的全局看，中国在陆上固然是暂时占优势，然而在海上，自马江海战后，中国一直未能扭转败势，制海权仍受控于法，孤立无援的台湾战事因澎湖的被占而险象环生。所以，中法两国面临的是同样的战局：陆、海两路，各自一胜一负。且陆路尚有变化，而海路战局已定。中国可以说是“不败”，但法军却也难说全然“不胜”。

此时，李鸿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显示了其高明的外交眼光，《中法新约》的签订，是纵观整个国际国内环境，以最小的代价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明智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清政府外交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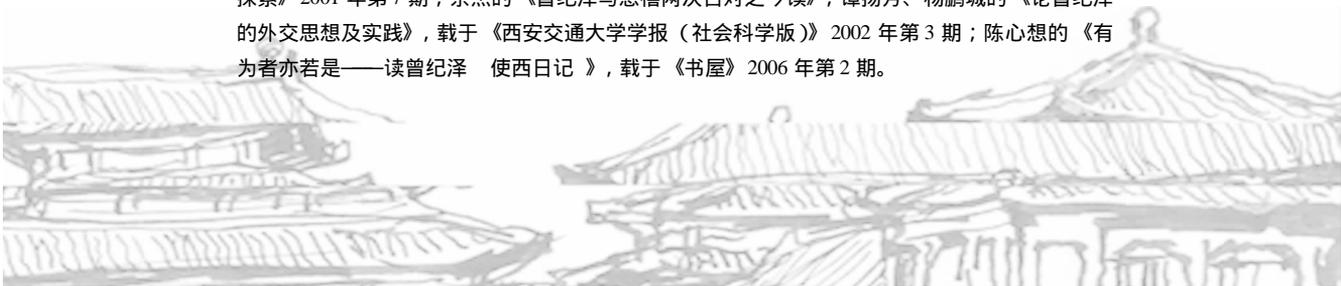
第四节 大清公使——曾纪泽^①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出生于1839年，即鸦片战争前一年，1890年去世，距离甲午中日战争4年。他是处于内忧外患大变局时代少有的开局先锋之一，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

曾国藩以其道德文章治兵方略，加上唐浩明的小说精彩，其名头家喻户晓。其实几十年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便是中国人推崇景仰的人物。青年毛泽东也不能免俗，甚至连字“润之”也取自胡林翼（润芝）。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服的应该是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治兵方略。晚年毛泽东批判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镇压了一场农民革命，也就是挂着洋教招牌，行改朝换代之实的太平天国“起义”。

可知道曾纪泽的人就少多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是对内，对同胞的胜利，而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才华横溢的儿子，是真正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是对外的胜利，比如出色的对俄交涉。如果没有曾纪泽当年成功地对俄交涉，今日中国版图的雄鸡尾部，大片的国土就会失去，且将新疆南北分割，不管是战略上还是

^①本节主要参考文献：危兆盖、于贯生的《曾纪泽的时局观与爱国精神》，载于《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7期；余杰的《曾纪泽与慈禧两次召对之今读》；谭扬芳、杨鹏城的《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载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陈心想的《有为者亦若是——读曾纪泽使西日记》，载于《书屋》2006年第2期。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资源上，对中国都极为不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纪念曾纪泽，而不是他父亲曾国藩。

纪泽（劼刚）为曾国藩长子。曾国藩以诗礼传家。子弟半耕半读，体验艰辛。喜的是，纪泽的爱好极为广泛，经学乐律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无不兼顾，独不擅科举八股，虽为“同光中兴”的第一名臣之后，却参加了3次科举考试都没有功名。这在所谓“腐朽没落”的封建时代也算是件稀松平常之事。

曾纪泽向乃父提出退出科场，曾国藩欣然赞同。纪泽的诗书画水准俱在其父之上，且乐此不疲，晚年在京城，王公大臣求墨宝者不绝于门。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与之酬唱往来，光绪皇帝也曾向他索画。遗著有《曾惠敏公遗集》。身为名臣之后，世袭罔替的一等侯爵，曾纪泽原本可以优游山林，享受人生。但他志不在此。其父亦赞他“天分甚高，胸襟颇广”。绝意科举后，纪泽专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投身外交事务，并以32岁“高龄”延聘外教学习英语。纪泽的英语口语如何，我们无法比较，但纪泽在出任驻英使节时，曾用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发表，为提升中国形象欢呼鼓舞。

纪泽之学英语，有别于琴棋书画，后者是他乐于夸耀于友人的。那么他苦学英语是为什么呢？光绪四年（1878年），纪泽奉派为驻英法公使，行前循例陛辞。名臣之后，还能说洋话，这在落后守旧的晚清不用说是个少见的人物，即使慈禧太后也免不了好奇。君臣间关于办外交说外语有一番对话，后来办外交者不可不读。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仰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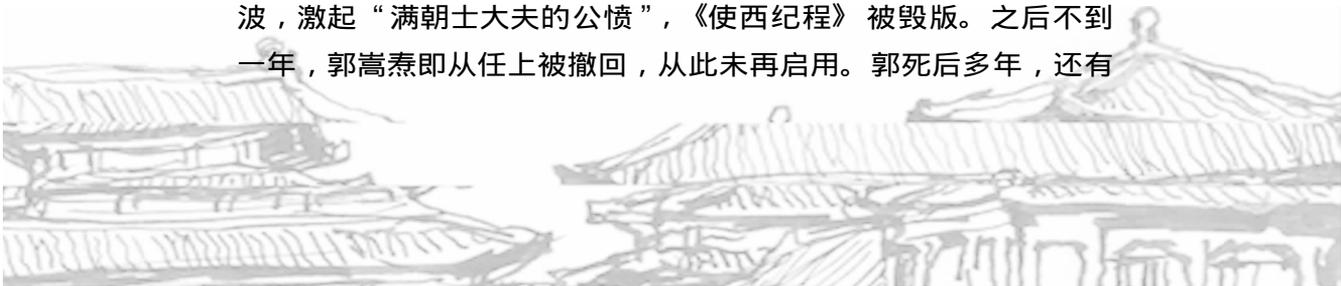


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人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与外国人谈论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藉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纪泽这段应对清楚地表明，外交官熟悉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在对外交涉时，借语言优势，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不是要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语言天赋。何况在盲目排外的清流党人看来，办洋务的必是洋奴，“倾心泰西”，就必然“吐弃周孔”，和今日一说“西化”必是“全盘”有异曲同工之妙。纪泽的英语长才在当年并没有给他带来可供炫耀的资本，后来临危受命出使俄国，廷议仍有人依此攻击他崇洋媚外，就差没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了。

1878年11月22日（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纪泽乘法国“阿马松”号邮船离开上海，远赴欧陆，出使英法。曾纪泽使西时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是：俄国强占了伊犁，法国攻入了河内，日本割去了琉球，英国吞并了缅甸，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使臣威妥玛等，公然在呈递给清政府的文字中叫嚣：“将来中华天下，不免分属各邦”，“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

在国内，“清议”之流诋毁西学和洋务。中国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他者为夷狄蛮邦，可是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天朝心态不免大受冲击；顽固派为代表的士大夫觉得列强还是蛮邦，不过一时“奇技淫巧”武器上占上风，承认天朝落后于夷狄，心理上却承受不了。因此，对洋务人士诋毁甚烈，如对郭嵩焘，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后来，郭嵩焘的使西游记把西洋的文明说成2000年，不同于从前的夷狄，显示了他的非凡见识，却在京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使西纪程》被毁版。之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启用。郭死后多年，还有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由此可见一斑。但清流也分三等境界：

上焉者，矜矜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媚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此其下矣。

以上这段话就是引自曾纪泽答复好友杨商农的信。杨商农“来函谆谆恳恳，以清议为言”，“不甚以洋务为然，规余（曾纪泽）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而这些清议之流都认识不到的，最后为曾纪泽指出来的真实状况是，“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天运”也就是时代的潮流，形势如此，“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纪泽告诉他们，空谈高论于事无补。“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从来都有明理之人、办事之人以及庸俗愚蠢搅局之人。曾纪泽既是明理之人，亦是办事之人，因此就要和庸俗愚蠢的搅局者斗争。

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办洋务就尤为困难了。曾纪泽在出国前两宫召见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远见卓识。曾纪泽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慈禧对曾纪泽说：“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对曰：“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



大局。”

两宫召见之后，曾纪泽去接被朝廷上下讥讽辱骂从而罢了官的郭嵩焘的缺，可以想像是什么样的压力。面对时局，曾纪泽认识到必须做到“办事之人不怕骂”。他不仅要做到“不怕骂”，还要不辱使命。郭嵩焘为国人士大夫所骂，而郭的杰出外交作为却为西方人士所赞赏，所以曾纪泽对内要顶得住，对外还要拿得出手，至少不能表现得比郭嵩焘差，辱没父亲曾国藩。曾纪泽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出使前的心情：

奉旨以来于此二者（道路遥远和风涛凶险）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现任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上累前徽。郭筠仙长在欧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

曾国藩晚年就是栽在天津教案处理的外交上的。曾纪泽深知外交事务其中的艰难，能够忍辱负重，要何等勇气和胸怀！后来的实践证明，曾纪泽不仅没有辱没先人盛名，而且由于其卓越的表现，弥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受的委屈，难怪左宗棠说他“孝不违亲”。

可是，为了不被骂成“卖国贼”，当时多少英才不敢作为。连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都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则，他“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及李鸿章”，威妥玛谓中国无意求进步。郭对曰：“……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不敢任耳。”威问何故，郭曰：“直苦人言杂，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动辄怕说是汉奸。合淝伯相亦是半明半昧。”郭曰：“合淝尽透彻。”威言：“吾与办事甚多，纯是一种猜疑。”郭曰：“合淝直是不能主持，无从直切定议。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淝助之，天下事尽可为。中国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轻视也。”威曰：“我持论亦如此。政府无人便无如何。”郭亦不能置对也。中国有人才，而政府无人才，真是一对矛盾，后来恭亲王和李鸿章还是没有逃脱卖国贼的骂名！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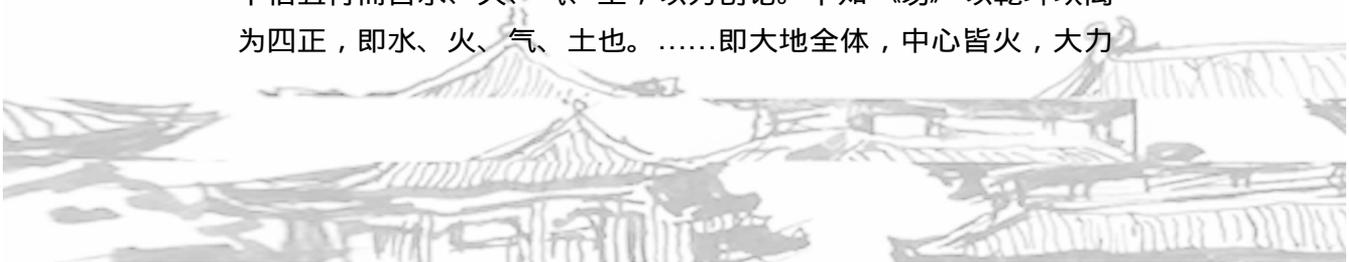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在中国开始办现代外交的草创期，奠定制度基础是很重要的。作为开局先锋的曾纪泽凡事从长远打算，从以下两件事情可见一斑。一是驻外国买房还是赁房的小事。慈禧问：“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曾纪泽答：“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买自造。中国使臣赁房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二是学习语言文字与做外交官的关系的处理也是从制度建设上着眼。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及，在这段对话里，使用翻译又反映出曾纪泽考虑的是朝廷体制，是“常局”。语言文字能力和办外交办洋务确实是两种才干，“术业有专攻”，后来纪泽与沙俄谈判，他并不通俄语，而获得了大成功，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曾纪泽说翻译之不可少，但同样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自己听懂了，可以在翻译传述的时候想应对之策，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学习外语的，不仅英语，还有法语。

面对天朝的崩溃，中华文化的先进和落后，曾纪泽试图找到中国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地方，以求获得自信和勇气，才能在外交上有底气。比如这样一则日记：“二十三日夜，与松生一谈。松生言，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意者，老子为周柱下史，其后西到流沙，而有周之典章法度随简册而俱西，但苦无确证耳。其说甚新而可喜。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人物与吾华上古之世相近……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从这里看，曾纪泽认为中华文明仍然是先进的，西方文明依然是落后的，而且西方学习的是上古时代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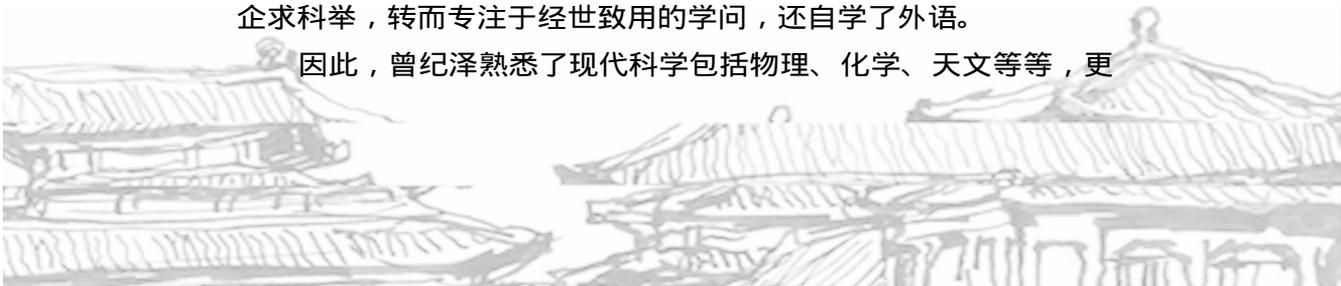
曾纪泽还将西方近代科学技艺的发展溯源于《易经》。“西人不信五行而言水、火、气、土，以为创论。不知《易》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即水、火、气、土也。……即大地全体，中心皆火，大力



相摄，斡旋不息，故得自转以成昼夜，绕日以成岁之说也。……震、既济皆言‘七日得’；则礼拜之数，亦圣人所前知。西人纪数号码，九与六颠倒相背；《易》则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凡爻之阴阳皆为九六别之。……则火轮汽机以制舟车，以勤远略，圣人亦于数千年前见之矣。……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安得谓之无关学问哉！”这种将西学比附中学的说法，也不是曾纪泽独创，颇能代表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今天看来，这类比附实在牵强。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以及落后和先进问题，见仁见智，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这种比附确实可以为曾纪泽找回一点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尊。

尽管有这种不当的比附，曾纪泽还是以扎实的西学为起点和基础，走的是从西学到洋务的路子。平心而论，曾纪泽学习西学的机会与他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有关系。曾国藩的幕府人才荟萃，有西洋经验和西学背景的人才如华蘅芳、徐寿、薛福成、容闳等，并接触西人如马格里、戈登等，交往颇密，成为朋友，同时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器械新玩都有见识的优势。比如，1871年，在其父两江总督府邸中，他可以见到寒暑表、自鸣钟、千里镜、天文灯、照相机、显微镜、洋书、手枪等等西洋器械设备。因此，曾纪泽写出来的《几何原本序》、《文法举隅序》和《西学述略序》，都有着对西学的真知灼见。在《几何原本序》里，他说：“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但是，这种物质环境条件只是提供了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另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曾纪泽没有执著于科举，而是实事求是地学真学问，这是非常难得的见识和罕见的选择。在当时士大夫看来，科举才是正途。曾国藩洞察到了科举的弊端，一直不赞成曾纪泽早学八股时艺，而曾纪泽在科场上也实在运气不佳，几次应试，皆告落第，难得的是他绝意企求科举，转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还自学了外语。

因此，曾纪泽熟悉了现代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等等，更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面——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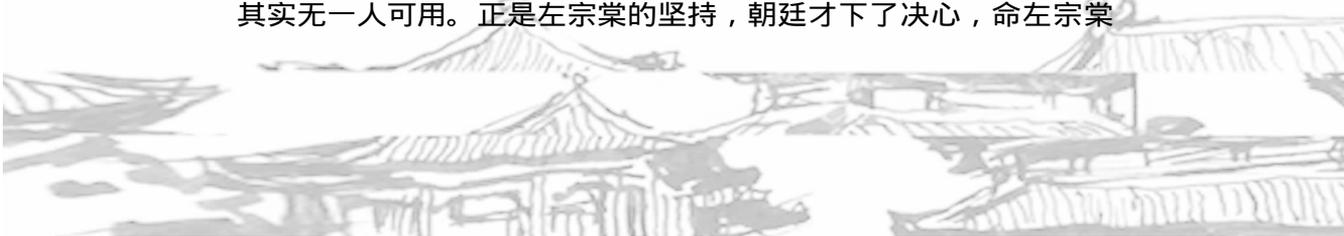
容易了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达之物质基础；熟悉了西方的法规制度和国际关系规则，更容易了解西方社会的运作，从而采取应对措施。没有西学做基础的洋务是肤浅的，曾氏重视了解西方，从日记中长篇大论录写下马建忠的上书，就是一个好例子。在现存的日记中，这种长篇幅日记确实很少。

现在来看看曾纪泽的杰作：对俄谈判。无论曾纪泽如何博学多才，而且出使英法，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就不会有我们的杰出外交家，曾纪泽可能就注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曾国藩的荫庇之下，后人可能只有研究曾国藩家史的专家才会知道曾纪泽这个名字。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一个真理：弱国同样有外交。

新疆自乾隆朝纳入中华版图，国家每年拨银300多万两维持军费。1864年新疆各地发生暴乱，迅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主政的满蒙将军们大都腐败无能，不堪一击。来自浩罕国的阿古柏在英、俄、土的支持下，以宗教和民族为号召，占领了新疆大部地区，是为今日“东突”的开山祖师。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的边界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声称叛平定后归还。老毛子料定中国无力平叛，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当沙俄进一步要为中国“代收”乌鲁木齐时，才引起了朝廷的严重关注，由此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之争。

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为国家的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略奉正朔可矣”。主张以有限的军费加强海防，拱卫京师，对付日益强大野心勃勃的日本。李氏的“放弃论”已为历史证明为荒谬。

陕甘总督左宗棠较李鸿章资格更老，况新近平定捻乱，士气正锐。国难当头，他打消了乞病还乡的念头，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以垂暮之年，主动请缨。满朝文武，率军西征，除左宗棠外，朝廷其实无一人可用。正是左宗棠的坚持，朝廷才下了决心，命左宗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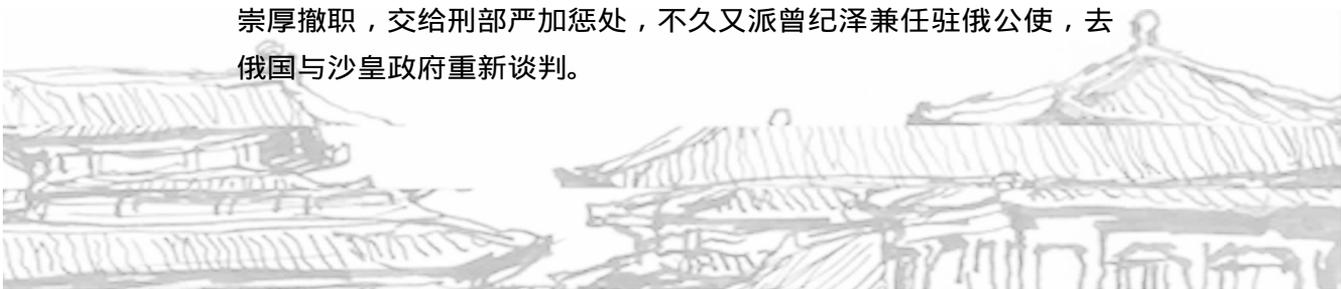


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公以近古稀高龄，抬棺亲征，整军经武，将腐朽的绿营兵打造成仁义之师，其西征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气”。军事上，左公精心策划，使西征军前后方“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阿古柏叛乱，于光绪四年（1878年）光复新疆，兵临伊犁城下，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清廷有利。于是，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去俄国同沙皇交涉伊犁问题。

崇厚十分昏庸无知，他以为只要收回伊犁就什么都解决了，结果在俄国官员的威胁和欺骗之下，他擅自签订了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据说，当时是因为崇厚家里出了点事情，造成急欲早日归国的私念，为沙俄所利用。崇厚路经巴黎返国，曾纪泽问到对俄交涉，崇厚回答是：“事已了结，十分周妥！”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怒。清廷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怕与俄国人打仗，主张妥协，接受这一条约；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要求修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把失去的主权收回来，同时做好开战的准备，万一谈判失败，就在战场上与俄国决出个胜负。左宗棠说到做到，积极备战。他分兵3路，向伊犁进军。不久，他自己带着一口棺材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出发，表示不收复伊犁，决不活着回到关内。

经多方努力，俄国又被迫同意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在这种“反悔”前约、天下汹汹的情况下，曾纪泽被推上了历史的大舞台。在全国民众的一片抗议声和爱国官员的坚决要求下，西太后不得不把崇厚撤职，交给刑部严加惩处，不久又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去俄国与沙皇政府重新谈判。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曾纪泽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此次谈判难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

格尔斯故意拖时间，不作答复。曾纪泽就派人去催。格尔斯也派了人来回答说，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

来人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

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

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国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沙俄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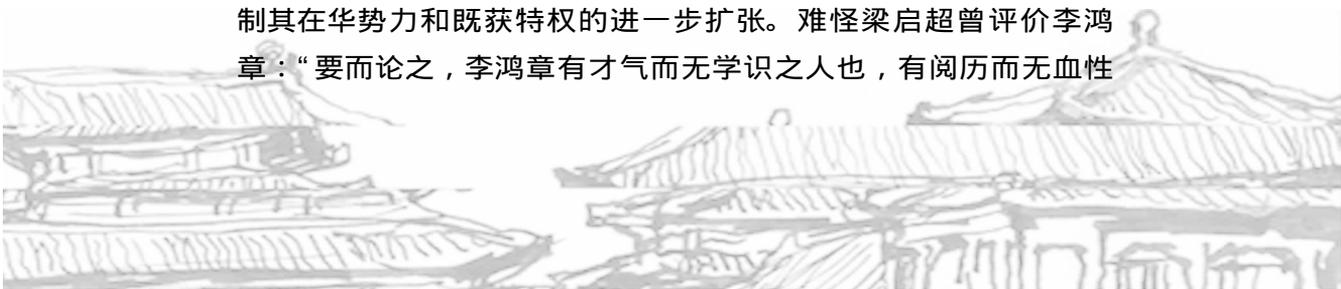


交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但是，清朝政府的赔款却增加到了900万卢布。

曾纪泽凭着酌情据理的谈判艺术和“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不怕赴汤蹈火的高度爱国热情，为中国争回了不少权益，使中国少受若干损失。这在清朝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此，《中俄伊犁条约》一签订，中外舆论均为之一振，清政府对此颇为满意，认为曾纪泽是“握要力争，顾全大局，深为不负重任”。西方人士也表示惊叹，盛赞曾纪泽的才华。美国人马士写道：“像曾纪泽这样不流血的胜利，还是个创举。”英人评论说：“俄人力求广地，日肆狼贪，所据疆域，未有争而复得者。有之，自伊犁始。”即使他的谈判对手格尔斯也对他的才智表示敬佩，“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他还感叹说：“我办外国事件42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责爵办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也。”曾纪泽不愧为杰出的爱国外交家。

在这次谈判中，曾纪泽的一个观点尤为重要，就是争取以金钱换土地，因为钱可以再生，而土地不会再来。作为弱国，有些不能马上定下来的，可以悬而不决，以后还可以谈判，不能悬而不决的就争取最大的利益。曾纪泽以非凡的毅力，“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增减之中将此前条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于是，只由原来的500万卢布再加400万卢布赔偿就换回了有“塞外江南”美称的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约传回国内，受到战和两派的交口称誉。这么一次成功的外交，在1840年以后的清代外交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是爱国主义历史教材中不可少的一笔，可惜这类理性和智慧行为往往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简单的话语里。

在办外交上，与李鸿章相比，曾纪泽确实高出一筹。李鸿章办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想在中外现行条约的基础上应付各国，以抑制其在华势力和既获特权的进一步扩张。难怪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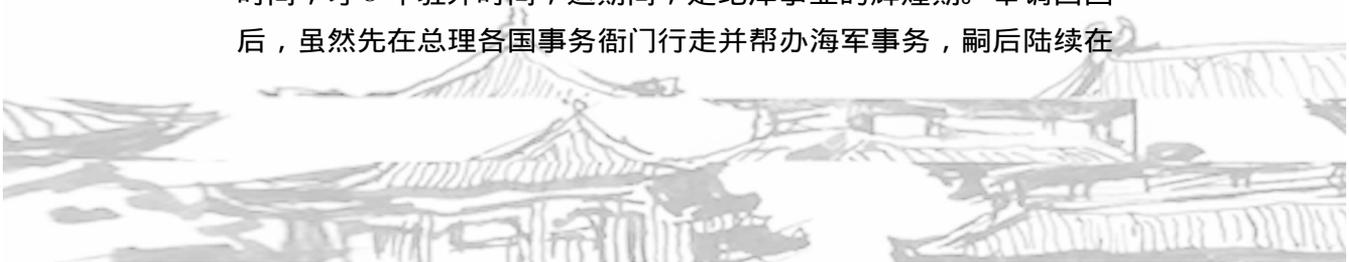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心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消极的，被动的，并无长远积极目标，以至于逐渐被挤出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而曾纪泽学识兼备，则能不畏惧各国船炮的威力，能充分运用国际间的时势矛盾和外交技巧，以增强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能高瞻远瞩提出撤废不平等条约和加强中国与藩属间的宗属关系等具体外交目标，他显然抓住了中外关系中最具有关键性的实质问题。比如关于修约一事，他在日记中说：“清臣又言，‘修约之事，宜由中国发端。明告西洋各国云，某年之约，有不便于吾民者，现定于某年某月约期届满之时截止，不复遵行。则各国必求颁一新约，易就范围。西洋诸小国，以此术更换英法之约者屡矣’。……此说赫德亦曾言之，盖系西洋通例。如此，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盖壤地之借属，如香港九龙司之类，则系长约不变。其余通商章程，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并非一定不易者。主人寻客，名正言顺，无所庸其顾忌也。”在另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载：“余谓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

我们看看几位中外人士对曾纪泽的评论。左宗棠称道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则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仪，志殷补充”。“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梁启超则把他推崇为和魏源、郭嵩焘一起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美国史学家摩斯（Hosea B. Morse）则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了先例。

曾纪泽接任郭嵩焘出使英法大臣时，只有39岁，加上延长的时间，才8年驻外时间，这期间，是纪泽事业的辉煌期。奉调回国后，虽然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嗣后陆续在



户、刑、吏等部任侍郎等职，却因为受满人贵族的掣肘，等于是闲职，在琴、棋、书、画中消磨时光。人说曾纪泽是接替李鸿章的最佳人选，可惜他英年早逝，享年才 51 岁，正是甲午海战前 4 年，正当国家多难的多事之秋，一个开局先锋走了。曾纪泽在英文论文《中国先睡后醒论》里所表达的宏伟目标，也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实现了。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五节 北洋水师的覆灭^①

1840年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史的开端。一个与天朝上国相隔万里的国家用为数寥寥的40余艘船舰（其中半数为运输船）居然从广州湾横行无阻地打到了渤海湾，控制了数万里海岸线，更打败了全球GDP产值第一的庞大却已经老朽的帝国，并迫使这个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帝国有海无防的虚弱在西方强盗的眼中一览无余。

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以及邻国日本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带来的威胁，清政府也许还会坚持已经破败不堪的禁海政策。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曾上书朝廷要求建设中国的现代海军，但是被朝廷驳回。林则徐也曾经购买过外国军舰，但只是放在港口充当海上炮台，最后被一伙英国水兵爬上船开走了。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则算是第一个提出详细海军建设方案的人，不过那只是纸上谈兵，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直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楨才实现了林则徐的中国海军梦，和李鸿章两人一南一北建设了清代中国的正规海军，一度军事实力排名世界前列，但是最后却在甲午海战中败在了排名十几位的日本海军面前，自此清朝的海

^①本节主要参考文献：老枪的《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出版社版；《走进110年前的北洋水师》，载于2004年9月21日《法制晚报》；《沉没的龙旗——中国海军史略》，根据中国海军网（<http://www.C801.com>）编辑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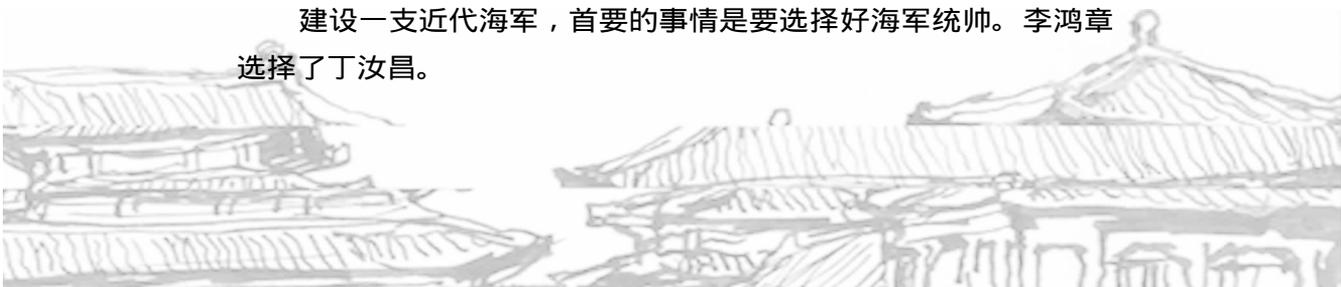


洋梦彻底破灭了。

在朝廷决定组建两洋新式水师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历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开近代化历程的，却是南洋水师。其原因就在于南洋水师有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沈葆楨和丁日昌。此时的南洋不仅近代舰船较多，而且率先实现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但由于沈葆楨在 1879 年病故，而丁日昌也在 1875 年底就因重病被迫离职，南洋水师失去了领导人物，北洋水师却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很快就超过南洋，成了清朝的国家海军。

1870 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开始密切注意海军的建设，但直到两年后他兼任北洋大臣时才从南洋水师处划拨了两艘兵船到天津。北洋水师快速发展的契机是 1874 年 5 月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中国受辱后李鸿章力主购置外国军舰，加强沿海防务。朝廷在李鸿章等洋务派施加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拨款 400 万两白银作为筹建南洋和北洋两处海军的军费，但即使沈葆楨将这笔费用全部让给北洋水师，以全力保卫京畿，最后落到北洋水师手中的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的白银。不过通过李鸿章等人的努力，清政府在此后的 10 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从英国和德国等处购置了数艘军舰，成为亚洲最强大的海军。拥有“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大型军舰的北洋水师从军事实力上来看远远超过日本，甚至超过世界上海军力量最强大的英国的远东舰队。恭亲王、李鸿章等强调先行建设北洋水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攻击大沽炮台，并进而攻破京津的教训。而 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等 7 国军舰云集天津、烟台一带威慑，更令清廷统治者记忆犹新。李鸿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后，利用职权和其统辖的淮军系统，将山东、奉天各地海防权力统归于己手，使得北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而这种优越条件是沈葆楨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设一支近代海军，首要的事情是要选择好海军统帅。李鸿章选择了丁汝昌。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的部下，后随程部投降了曾国藩。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属，丁也就跟着归属淮军体系。丁汝昌在镇压太平天国、进剿捻军中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为李鸿章所赏识。然而丁为人柔弱，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李鸿章当年组建淮军时，手下能干将吏原本就甚为少有，丁汝昌也曾向李鸿章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的学生统领海军，但李鸿章最终选择他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军。这实际上给后来北洋海军内部的纷争和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隐患。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查阅晚清户部档案，其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羨、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银达5230万两之多。朝廷左支右绌，深感财力维艰。而近代海军更是一个费银子的事业。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后，最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为此专折上奏：“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措，展布何从？”

尽管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困难，恭亲王等人加强海防、购买近代大型军舰的决心不变，为此，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海关税）和厘金（工商业税）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合计约达400万两。尽管由于各地财政拮据，且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地方军阀兴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而导致每年实际解送款数达不到这一标准，但对于日益艰困的晚清财政来说，也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了。由此也可见晚清的户部官员们虽然在历史上籍籍无名，却为洋务运动和近代海军的缔造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也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功臣。

正当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经营下日趋红火之时，南洋水师却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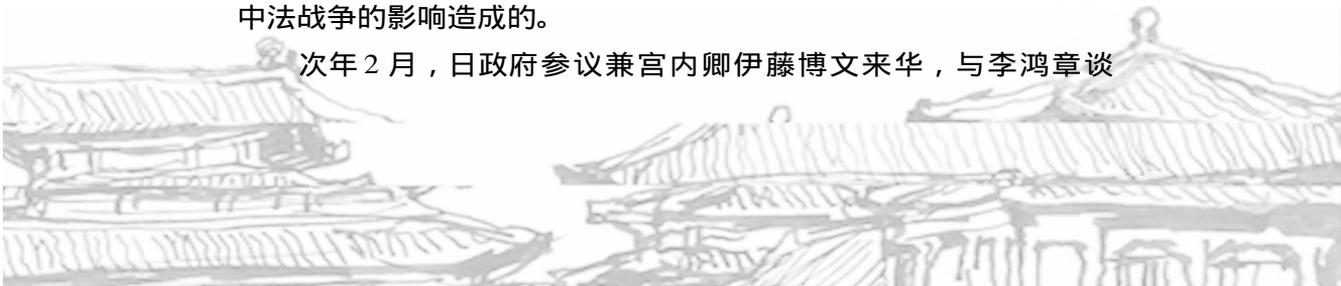
于经费、精锐舰船几乎尽归北洋反而萎缩。福州船政局所造的大批旧式炮舰中，鉴于技术、性能等原因，各地调拨走的只是一部分，剩余部分单独组成了福建船政水师。其舰艇性能甚至更远不及南洋水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中国近代海军迎来了第一个考验，也是第一次悲剧。在中法马尾之战中，中国大败。

在南方中法交战的同时，北方的朝鲜此时的政局也是暗流汹涌。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刺杀多名亲华的事大党官员，史称“甲申政变”。尔后，开化党伪称清军作乱，邀请日军开进汉城“保护”，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织新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6日，清驻朝军由袁世凯率领，应朝鲜议政府右议政沈舜泽的请求，发兵攻入王宫，打退日军，将朝鲜国王迎入清军营中，甲申政变失败，日本公使竹添放火烧毁日本使馆逃亡回国。日本随即利用此事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政前大臣西乡从道在御前会议上提出对华宣战，借助中法战争的机会从北方进攻清军。一时间战云密布。

清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北洋舰队调回原南下开往台湾战区的“超勇”、“扬威”二舰，并增派“威远”载运方正祥军一营赴朝增援。

日本国内虽然非常希望“干涉朝鲜内政，务必予以并吞”，更希望借此发动战争击败中国，从而“永为东邦之盟主”。但政府主要阁员认为，两国在朝鲜发生战争，鉴于朝鲜对于中国更加重要和直接，必然导致清军主力北上援助朝鲜，客观上为法国人侵占台湾火中取栗，而台湾则恰恰是日本在南方的战略目标，这是相当不划算的。而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方也明确表示，战争准备远远没有做好，开战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政府最终派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朝谈判。尽管清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汉城的局势，并派出了吴大澂为钦差大臣，但最终还是默认了《朝日汉城条约》，没有追究日本责任，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这显然是中法战争的影响造成的。

次年2月，日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判，双方签定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李鸿章本以为这样就使得日本没有再次驻军朝鲜的借口，却没有想到这恰恰成为了甲午战争的根源。

也许应该把双方天津会晤后各自对对方的评价记载于此：

李鸿章：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至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

伊藤博文：“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

双方的评价都留在这里，此后的史实也是都有所了解的，不必多说，只是不知道10年后这两人在马关重逢，心中又当是怎样的一番感慨……

1894年9月17日，大清国北洋舰队从朝鲜返航至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时，等候在那里的日本海军舰队迎面而来。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主炮首先开炮……持续5小时、重创北洋水师和洋务派现代军队建设理想的惨烈的黄海大海战至此开始。



“超勇”管带黄建勋：“超勇”与“扬威”重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后“超勇”起火沉没，黄落水后，有人抛长绳相救，他不就而亡。黄为人慷慨，尚侠义，性沉默，临危不惧，从容赴死。

“扬威”管带林屡中：军舰进水，无奈撤退，后搁浅近岸海边，水兵纷纷跳水逃生，林愤然蹈海成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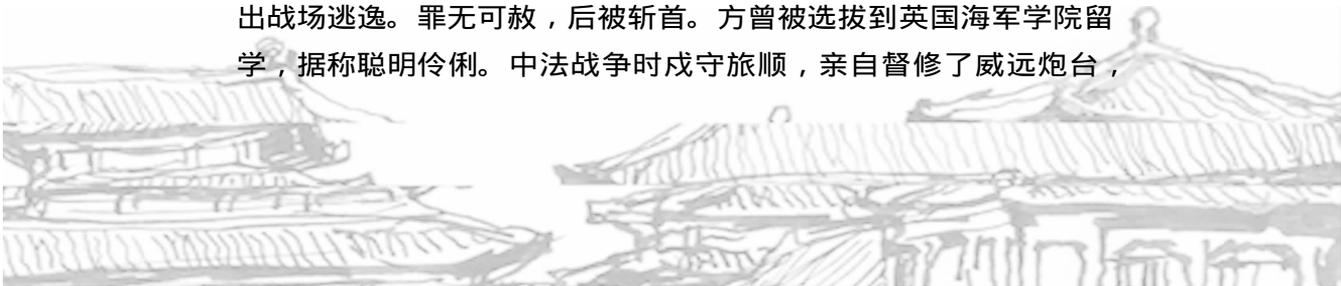
“致远”管带邓世昌：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主力舰“吉野”号迎头相遇，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那些还活着的清军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等待着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众日舰见状，向“致远”发出雨幕一样的炮弹，除7名水兵获救外，全舰官兵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爱犬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邓死难之日，是他45岁生日，据记载，邓“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

“经远”管带林永升：林永升为人温和，和部下感情深厚，遭4艘日舰合击，临危不惧，从容发炮，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后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先后殉国，“经远”亦沉。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被“定远”号主炮第一炮的后坐力震落于指挥台下负伤，拒绝进舱避弹，坐在甲板上继续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已被打坏，其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中国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事迹感人。“镇远”主炮在发射中忽然中弹，一个炮手的头骨当场被炸碎，血迹飞溅。其余炮手毫无惊惧，将尸体搬开后继续射击。炮手长的弟弟战前来舰访兄，因故未能离舰，此时也在炮台上协助作战。为了防止通气管把甲板上的火焰引入机舱，水手们把风斗卸除，这样，机舱内温度升至90度，舱内人员冒着高温工作不息。“来远”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弹中，脚跟被炮弹削去，竟毫无察觉，依然奔跑如飞。

“济远”管带方伯谦：方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驾舰退出战场逃逸。罪无可赦，后被斩首。方曾被选拔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据称聪明伶俐。中法战争时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炮台，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因费用低廉颇得好评。但在此前的丰岛海战中，曾悬挂白旗辱国。

“广甲”管带吴敬荣：见“济远”状仿效。后被革职留营。

1895年1月18日，日舰3艘在山东登州（今蓬莱）海面游弋，转移清军视线，牵制防御力量，以掩护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真实企图。21日，由于清军派系隔阂，日军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登陆。2月2日，威海沿岸为日军占领，北洋舰队所在刘公岛危若累卵。

2月5日，日本鱼雷艇潜入港内，天亮后为北洋海军发觉击退，但其中一艇发射鱼雷击中“定远”左舷，军舰赶在沉没之前搁浅在刘公岛南岸，当天下午，因海水汨汨而入，锅炉熄灭。管带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劝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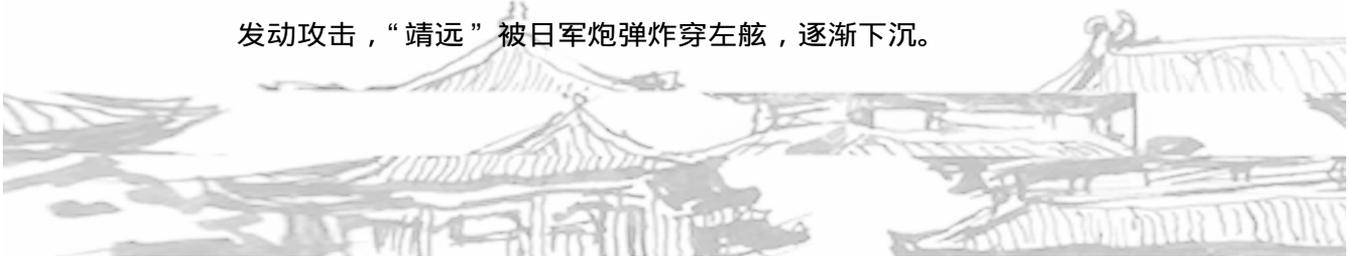
6日凌晨，日指挥官伊东故伎重施，继续用鱼雷偷袭。北洋海军为加强防范，不断用探照灯四处照射，反使日本人能看清港中军舰的位置，鱼雷攻击再次奏效。“来远”、“威远”、“宝筏”中雷后沉没，仅烟囱和桅杆露出水面，一片凄凉景象。3舰伤亡官兵200余人。两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上岸嫖妓未回，幸免于难。

7日，日军向刘公岛发起总攻，7时38分，空前激烈的威海卫海陆攻防战开始了。短短20分钟，5艘日舰先后中弹。

接下来，清鱼雷艇出击。不料“左队一”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济远”鱼雷大副穆晋书等人却密谋趁机向烟台逃跑。当时，双方炮战正酣，北口木筏门忽然打开。13艘鱼雷艇及汽艇向外冲出。伊东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哪知这些鱼雷艇却向西逃跑。于是日第一游击队立即实施追击。鱼雷艇毫无斗志，大多数一出港便被击毁或搁浅，蔡廷干被俘后，被关押在日本大阪（蔡是容闳第二批选派到美国留学的幼童），后乞留日本。

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护军死伤300多人，但仍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

8日夜，日军派汽艇偷入东口，用炸药爆破防材，用斧锯切断铁索，南口防材门户洞开。9日上午，趁着漫天大北风，日舰再次发动攻击，“靖远”被日军炮弹炸穿左舷，逐渐下沉。



刘公岛的陷落迫在眉睫了。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又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属下卢毓英的住处，适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无意中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一笑，当晚，服鸦片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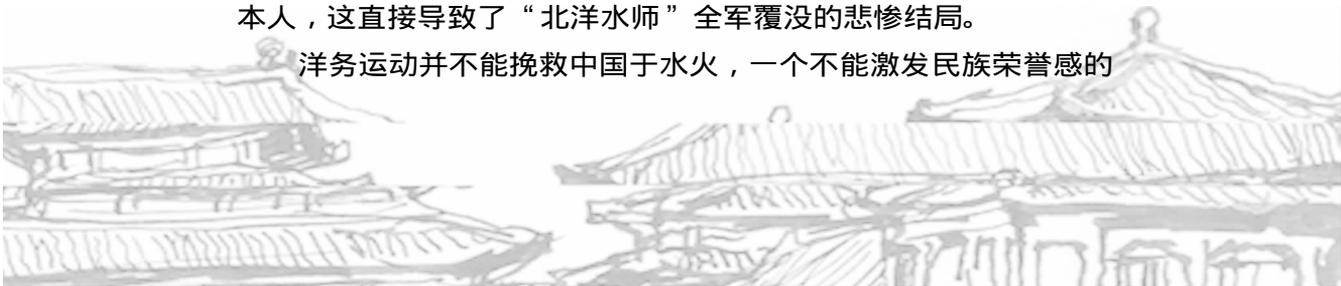
卢、沈二人也买回烟土准备自尽，后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尽乐，临到自杀再想办法。于是点起烟灯，吞云吐雾，对外间事不闻不问。

12日上午，在得知支援无望之后，“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悬白旗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杨是北洋海军中惟一未经学堂正规培养而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高级军官。上年黄海海战中，为防范有人降旗投降，他亲自将战旗钉死在桅杆上。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他口诵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手枪自戕。他发出的，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黄海大海战与威海卫海陆攻防战仅相隔数月，北洋水师在这两场战役中的迥然表现，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在甲午年的覆灭。为什么拥有邓世昌的精神，还会走向崩溃的结局？为什么决战黄海的勇气，到威海卫就分崩瓦解？好的制度能让士兵勇敢，而在坏的制度下，即使受过再好教育的人也会腐化。“北洋水师”的装备不可谓不精良，将士不可谓不用命，可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败得如此屈辱、败得让人如此痛心疾首，是谁断送了这样一支装备精良、将士用命的舰队？！

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当权者的无能和清政府的腐败。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权者不是积极备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英、俄的调停上。在黄海大东沟海战胜负未分之际，清政府“旋命水师退守刘公岛以自保”，把渤海、黄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洋务运动并不能挽救中国于水火，一个不能激发民族荣誉感的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制度，就不能让人民为之奉献热血。中国人百年来的耻辱，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整体的懦弱，而是因为缺乏制度的保证，缺乏勇气的发动机。

北洋水师不仅有亚洲最强的海军舰队，也有经过严格培训的海军人才。李鸿章在1881年于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是人员数量和素质都不能满足北洋水师的需要。直到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马尾舰队受到重创，5年前已经去世的沈葆楨苦心孤诣建设的南洋舰队实力削减了一半。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领他的淮军旧部去支援，并将南洋水师中的官员大量调入北洋舰队服役。这些官员大都毕业于马尾水师学堂，这是由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办的，当时名“福州船政局”。学堂聘请法国人普罗斯佩·日意格为总教习，任期5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海员的训练。左宗棠奉调新疆后，便由沈葆楨继承其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院校，第一期有学生约60人，于同治五年（1866）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在完成五年学业和实习之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深造3—5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者到德国和法国的船厂，见习造船。如此严格的培训为南洋水师造就了大量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后来又成为北洋水师中的绝对主力。中国在甲午海战的12艘军舰共有舰长（管带）14人，基本上都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其中有10人是马尾一期毕业生。由此可见下面的中层军官中也基本上都是马尾毕业生。而这14名舰长有4人在海战中殉国，3人因战败随提督丁汝昌自杀。

很显然，北洋海军官兵都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头几年的歌舞升平气氛中，纪律明显松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事实上却非如此。方伯谦在6年里先后自建购买6处住所，并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分别金屋藏娇。《北洋海军章程》颁布于北洋舰队管理得最为严格的时候，但违规的行为依然各行其是。将士们纷纷移眷刘公岛，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丁汝昌本人更是在岛上盖起铺屋出租，收取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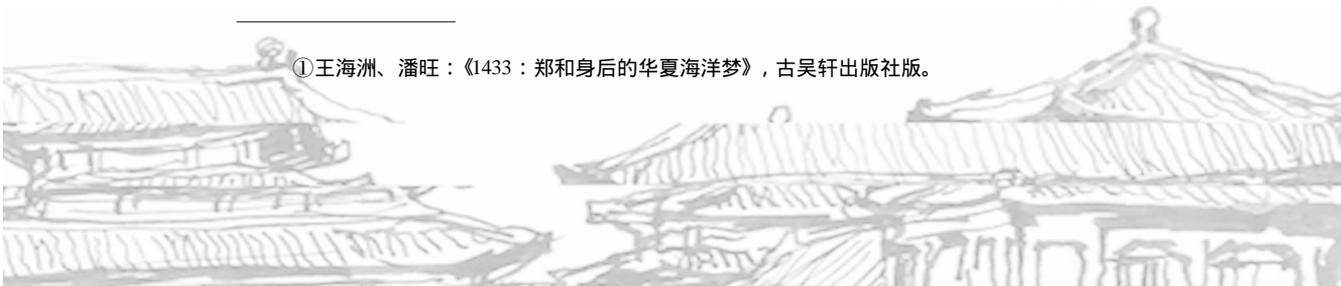


金，并同方伯谦在出租房产之事上发生龃龉。邓世昌在船上养狗，也是章程所不允许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马尾水师学堂成立的3年之后成立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专门培训海军人才。从外国人对中日两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的评价中，我们也可看出中日两国海军建设理念的不同。1874年，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在参观了马尾水师学堂后说：中国学生的课堂笔记非常整洁，智力上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但缺乏一种精神，甚至有些女孩子气。在课后从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而另一位英国人在参观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后写道：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彻底贯彻。为磨炼学生“意志”和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除了正常的军事课程外，学校经常举行残酷的训练。因此，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他们可以不惜一死。在海战中，不同气质的中日两国海军将领也具有不同的战斗精神和策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军虽然在装备上整体不如中国，但是在对战争的适应和理解上要高于北洋水师。作为北洋水师的直接领导人，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处理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却是不争之事实。每每舰队庆功请奖之际，军中必有管带等滥用权力，夹杂进大批无关人员。当事人明知无耻，却轻易地原谅自己。奖惩制度被亵渎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就一钱不值。^①

此外，北洋水师的消极防御政策并不能为其壮大赢得时间，日本对中国的覬覦已经不能坐看中国海防力量加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失利也可以说是其战略思想的失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的缺点，将北洋水师送入了毁灭的境地。北洋水师建制看似齐全，实质混乱。其在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是北京海军衙门的海署大臣

^①王海洲、潘旺：《1433：郑和身后的华夏海洋梦》，古吴轩出版社。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醇亲王，但舰队实际归李鸿章节制。李鸿章作为朝中重臣公务繁多，常常无暇顾及北洋水师的具体发展。于是水师的日常管理由李鸿章当年的淮军部下丁汝昌负责。后者没有受过海军的系统训练，常常被那些从水师学堂中毕业的部下轻视。而他所依赖的外籍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并导致了军中以前的英国海军舰长琅威理的去职，不仅使北洋水师失去了外国先进军事思想的训练，而且也导致和英国交恶，后者停止了向中国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提供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对北洋水师困扰非常大的，也是在历史上被提及最多的原因是海军经费的严重不足。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的数目从未足额，而且慈禧的挪用和海军衙门官员的贪污更让需要大量经费支持的北洋水师捉襟见肘。在1888年之后清政府再也没有购买军舰，而到了1892年，户部以慈禧太后庆贺生日需要开支为由，建议海军停购舰艇2年，并得到了同意，而两年之后就爆发了甲午海战。同样在这几年中，日本却大力购买各种军舰壮大海军实力，在中日海战之时，综合势力已经和中国在伯仲之间了。在甲午海战中，中国部分舰船出现了武器弹药储备不足，甚至设备和武器老化、弹药失效的致命问题。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习成风，视为故态。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官兵聚赌于香港。北洋海军还用军舰载客跑运输挣钱，甚至利用军舰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另外，各船每月有数百两行船公费，管带常私扣归己，致使船舱机器擦抹不勤，零件损坏，大炮生锈。北洋海军将领多受过正规西式教育和训练，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第一批受到最好的启蒙培养的先行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忧国忧民之心。但在国家优渥的待遇下，他们在经济上却贪婪不止，出现了结构性和共生性的腐败。

进一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李鸿章只注重用粮饷来驱使官兵。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因嫖妓与日方发生冲突。事后李鸿章却对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大。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和激励，养成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传统和必胜信念，这支用新装备包裹起来的军队中的许多人，在封建军队的酱缸里，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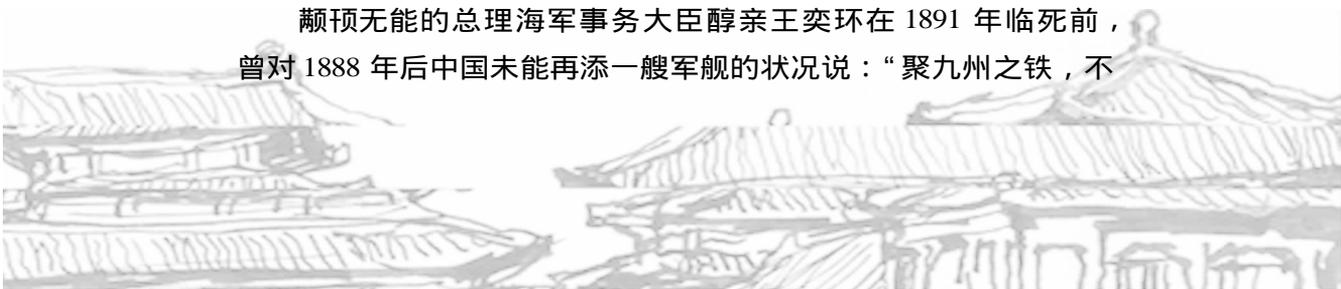
速地被同化了。

对照中日甲午海战，规模宏大的北洋水师被毫无名气的日本海军一触即溃，活生生就是一场“虎”吃“驴”的“表演秀”。或许有人对此不解，而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日本“虎”对吃掉北洋“驴”早有打算，早有安排，早有部署。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确定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其近邻朝鲜和中国，精心策划如何征服中国，征服亚洲，最后称霸世界。而满清王朝这头大“驴”没有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沉浸在虚幻的安全感中，等到“小老虎”按照预先布置，突袭而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据说，日本曾两度“谦虚”地邀请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访日，清政府为了一显大清“国威”，欣然接受邀请，豪迈而潇洒地将当时亚洲最大最强的铁甲舰开到日本。刚一靠岸，中国水兵就一哄而上，目空一切地嫖娼、吸鸦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日本当局则下令：不要刺激中国人。日本人还发现一个令他们欣喜不已的“细节”：中国水兵的衣服，就挂在舰船的炮杆上晾晒。这两次“历史性”的访问，清王朝的“威”是扬足了，水兵的“气”是吐够了，但日本人也完全摸清了北洋水师的装备和实力，彻底看清了北洋水兵的狂妄自大和麻痹大意，充分弄清了清政府对“虎”吃“驴”的毫无预见和准备。如此看来，甲午海战的结局就并不意外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北洋水师当了被吃的“驴”，苦心经营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在海战后还要充当被吃的“驴”。1895年4月17日，提倡“海军立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中国和谈代表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要求两个月交割，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则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简单6个字，“虎”性贪婪一览无余。

颓废无能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环在1891年临死前，曾对1888年后中国未能再添一艘军舰的状况说：“聚九州之铁，不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能铸此恨也。”在几年后的甲午海战中终于得到了灵验，而甲午海战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的银两都可以造出一支白银舰身的北洋水师了。至此，中国和中国的海军一起，进入了半个世纪的衰败期。

虽然中日甲午战争已过去百年，但今天笔者面对曾经的战场，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想起那场还未开始就已注定失败的战争；不愿想起那些被抛弃、在绝望中浴血奋战的“北洋水师”将士。“北洋水师”覆没了。它带走了一个曾经的“富国强兵”之梦；大清帝国覆灭了，却永远带不走那段属于它的没落和耻辱。



第三章 | 稍纵即逝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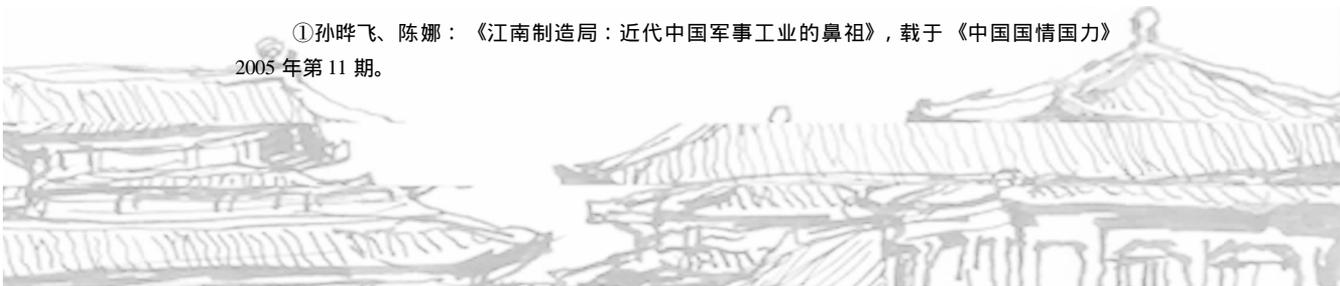
江南制造局
旅西纪程
同文馆的困顿
公车上书
状元张謇的事业

第一节 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是整个晚清时期，清政府先后兴办的 40 多个兵工厂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江南制造局的全称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 1865 年（同治四年）在上海创办。它的建立，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完全采用机器生产的先河，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第一厂”。江南制造局从它创办的那一刻起，便将现代科技作为强国强军的巨大“推进器”。^①

1865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第 25 个年头。在帝国的余晖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开始从求购“坚船利炮”中寻求出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雨中，走上历史前台的。而它的创建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时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的李鸿章。1865 年 9 月 20 日（农历八月初一），两江总督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和同治帝。他那 2000 余字的《置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奏折》，几乎就是一份缩微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最古老的文物便是李鸿章的那份奏折，那隽永的小楷字体浸入发黄的纸面，至今仍清晰可见“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等字样。这就是 1865 年李鸿章创建江南制造局的

^①孙晔飞、陈娜：《江南制造局：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鼻祖》，载于《中国国情国力》2005 年第 11 期。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初衷。当时，西方列强的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恭亲王奕訢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购买和仿造洋船洋炮、加强军事实力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

如果说社会上一般有志之士，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必须引进学习西方新式船炮和自己应该赶紧拥有西方机器设备，还停留在理论上认识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亲身感受到这种落后状态，因而他的变落后为先进的迫切感远远超过上述这些“有志之士”。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深感武器不精良，而且太平军某些部分已使用洋枪，湘军屡遭重创。这引起曾国藩对洋武器的重视。笔者认为，清王朝不了解国外情况的官僚御史们最顽固守旧，而亲自在前线与敌军作战的军人统帅们，对新式锐利的武器最为敏感。因为在战场上打仗，就是要杀伤敌人保护自己。仍然使用弓箭刀矛的清军远不是使用新式洋武器的对手，做不到多杀敌人，自己少伤亡。因而凡是在前线作战的将领们都最易于接受和学习洋武器，并不惜重金购买。曾国藩虽未直接与外敌交锋，却在与内敌交战中体验到洋枪炮的杀伤力远过于刀矛和土制枪炮。但购买洋枪炮费用太贵，且往往难以到手。他意识到中国武器必须更新，而武器更新与新式机器工业的创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他具有了“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徐珂：《清稗类钞》）的思想。要抵制，必须自己办机械等新式工业。要办这类工业，必须有新式人才，尤其是新式技术人才。于是他广招贤士于自己的幕府。1861年在攻陷安庆之后，曾国藩于当年即创办了第一个半新半旧的安庆军械所，试制新式武器和试造小轮船。与此同时，他到上海等地招聘徐寿、华衡芳等科学家，广罗天下贤士。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重点礼聘的新人才。

容闳在1863年被招到安庆商谈关于创办新式工业等事。这里将容闳对曾氏幕府集中人才的盛况证述录于下：“当时在总督大营住着至少200名官员。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和追求，他们从中国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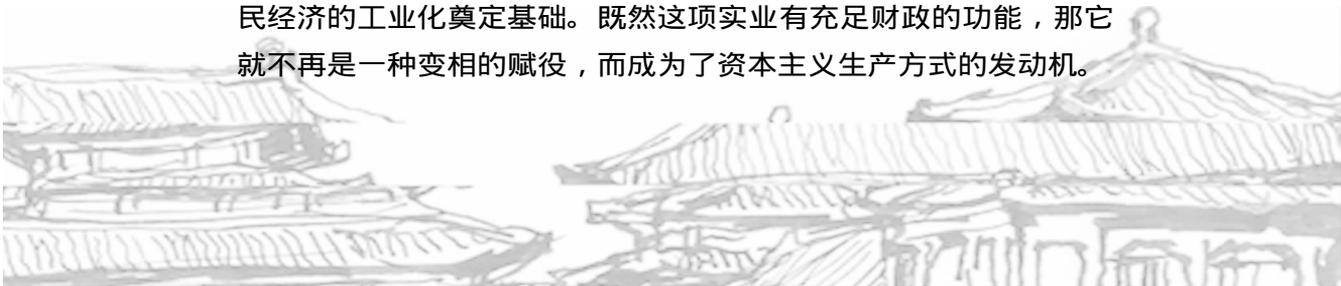


地汇聚于此。其中总督幕僚不少于100人。除幕府外，还有候补官员、学识渊博的学者、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总之，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人物，都被他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钦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显然，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即将胜利之际，驻守在较为安定的安庆，立即办了军械所，除修造一般火器外，还试造小轮船，并招揽了在全国有造诣的第一流人才，尤其是科学技术人才，逐渐形成创建第一流机器制造工场的想法，并有着紧迫感。所以当容闳向他提出建立“制器之器”的工厂时，曾国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立即付诸实施。容闳的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看他与志同道合的曾与曾国藩讨论过建机器工厂的徐寿、华衡芳、张斯桂等人一段谈话就可明白。容闳说：“从我个人在美国的观察和依据通常知识，我以为目前中国需要建立的应是通用和基础性质的而不是专以特种用途的机器厂。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建立的机器厂是本身能够创造或再生产出许多同类性质的机器厂；每个和所有这些机器厂又能够生产特种机器以制造专门或具体物体。更明白地讲，他们应该建立通用和基础性的机器厂以便制造特种机器。一个机器厂包括不同种类和型号的车床、刨床，它能生产出用以制造枪炮、发动机、农业机械和钟表等等的机器。”

这比之曾国藩、李鸿章原来的想法，即只造枪炮轮船，显然要高明许多。中国古代有不少直接由官方举办的实业，比如历代之官窑，明代宦官督办的矿务、盐务，清代汉族旗人所担任的织造；然而设立这些实业的目的不过在于充足财政，或者补充禁中内府用资以及皇族享用品。如果存在不对称交易，就有掠夺民脂民膏的嫌疑，对经济民生便无一利。

而注重“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就不一样了，制造通用的机器设备，再由这些设备去制造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机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奠定基础。既然这项实业有充足财政的功能，那它就不再是一种变相的赋役，而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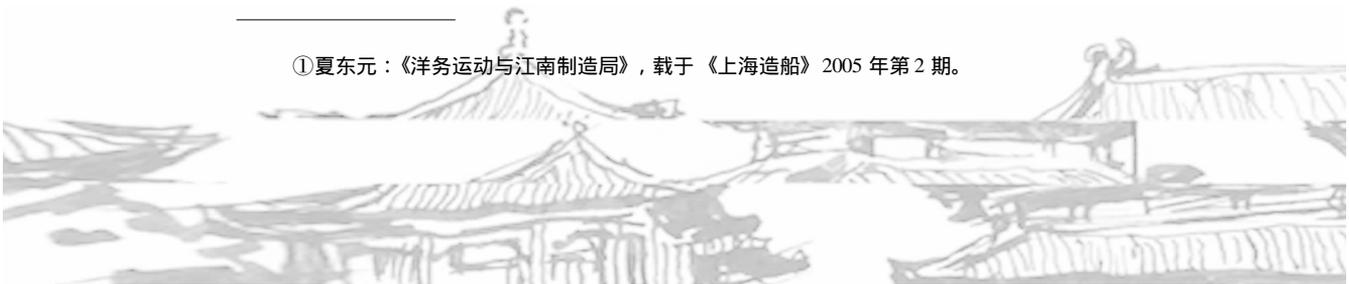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容闳在第二次被曾国藩召见时，将上述见解向曾氏陈述。曾氏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并立即召见徐寿、华衡芳等人，按容闳的建议作出决定，授权容闳携款前往美国，订购这种“制器之器”的母机，并且要最先进的最新式“母机”。容闳携带6万两白银巨款，到美国选定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城订购在当时堪称新型先进的“制器之器”的母机运回上海，于1865年建立位于上海高昌庙的江南机器制造局。这座机器制造工厂，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先进的机器制造企业，它标志着中国机器工业的起步。容闳说，这座机器厂应该作为纪念曾国藩的纪念碑，纪念他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是有道理的。^①

为了说明曾国藩对机器制造业关心、支持和期望，兹节录其几年后，即他任直隶总督的1870年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送呈给他《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所作的批示，其中说道：“……第四条论制造之法，先致力于制器之器，尤为探本扼要之论。五、六两条编辑机器图说及制造源流，俾西人冥心独造之境，可以即法明理，因委穷源，此巨观也。近年轮船、汽机、汽炉，该局已能自制，其余机器亦大半自行制造，研求精熟，日起有功。若广制造之器，将来各项机器，皆不必购自外洋，更为自强之要术矣……”（引自石建主编的《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资料》）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李鸿章。1864年春，李鸿章在上海求购外国工厂机器，准备在试办炸弹三局的基础上，兴办一座大型的军火工厂。同治四年（1865）五月，李鸿章果断命人在上海虹口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和苏州两个洋炮厂并入，再加上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来的机器设备，建成江南制造局也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九月二十九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江南制造局成立。同治六年自虹口迁往高昌庙，不断加以扩充，渐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李鸿章是江南厂的“第一任厂长”。其实，这并非玩笑。当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

^①夏东元：《洋务运动与江南制造局》，载于《上海造船》2005年第2期。



臣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最高职位——督办，而以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

江南制造局下属机构包括：机器厂、铸铜厂、铸铁厂、炼钢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汽炉厂、公务厅、工程处、炮队营、广方会馆等等。职工人数 3000 余人，房屋 2000 余间。其产品主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并能修造轮船，中国第一台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即由江南制造局于同治七年制造。江南制造局的创办经费为 543000 两，自同治六年起拨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 30—70 万两不等。其机器设备及主要原材料基本上依赖外国，技术大权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也于民国六年（1917）改称“上海兵工厂”，抗战爆发前停办，所留厂房及部分机器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拆毁，厂地并入江南造船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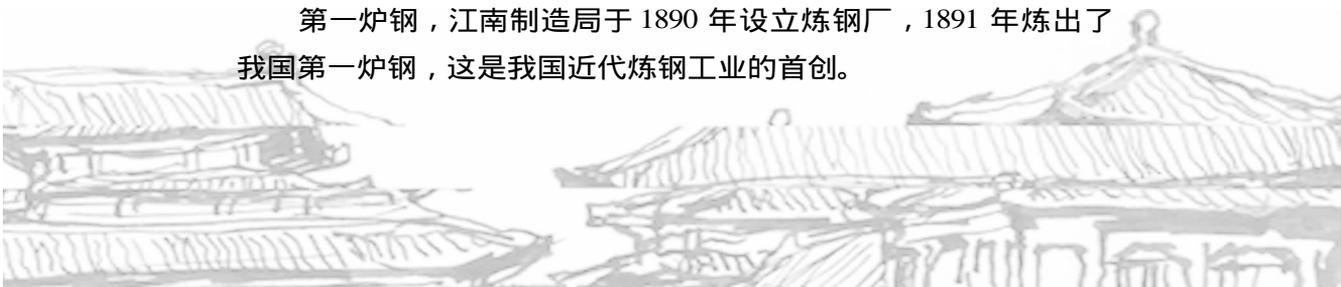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一个集军事工业、科技研究和造船于一体的大型民族企业，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工业的开端，标志着中国产业工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的确立。

江南制造局以其优越的机械设备，在国内率先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生产，创造了许多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

第一批枪炮，江南制造局创办初期，主要从事枪炮等军火生产。从 1867 年至 1894 年间，共生产枪支 51285 支，各种炮 585 尊。军火供应范围遍及全国各行省所属军队。

第一艘兵轮，1868 年 7 月，在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的主持下，中国第一艘用机器制造的兵轮“惠吉号”下水。该船船身系木质构成，载重量 600 吨。由于它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机器轮船，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当时上海《教会新报》在介绍轮船航行情况后说：“而先有轮船数只皆系买之西人，兹此船乃本国始初自造也。”

第一炉钢，江南制造局于 1890 年设立炼钢厂，1891 年炼出了我国第一炉钢，这是我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一磅无烟火药，江南制造局于1874年于在龙华分局开设火药厂，开始制造黑色火药，1894年生产栗色火药。1893年引进德国克虏伯厂全套火药新设备，建立了无烟火药厂，于1896年生产了第一磅比栗色火药更为先进的无烟火药，年产量6万余磅，其规模在当时已相当庞大。江南制造局在生产管理方面一开始就仿效外国企业，对工种定额和主要产品建立了成本核算制度，已具有近代企业特色。^①

在洋务运动时期，如果说制造轮船不是江南制造局的经常任务的话，制造枪炮弹药却是它所担负的始终不懈的职责。

先谈枪的制造。江南制造局开始造洋枪是仿照英国的兵枪、马枪，也就是旧式的前膛枪。湘淮各军曾拥有这种枪支10余万杆，除部分向外国购买外，多为江南所供给。不久，外洋兴起后门装送子药的后膛枪，制造局即试造后膛新型的林明敦枪，为此买进这类机器和雇洋匠4人，于1871年开造。

但泰西各国枪式不断改进，日新月异，种类繁多，到80年代林明敦式后膛枪又显陈旧，且“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局中积压达万余杆。鉴于此，制造局一方面将原有的林明敦枪加以改造，克服其容易走火的缺陷；另一方面仿制外国新式枪械，即在奥国的漫利夏枪和德国的新毛瑟枪基础上进行仿制，这两种枪在当时号称最为精利，制造局于1893年试制成功，并有所改进。

次谈造炮情况。江南制造局制炮始于1870年所造的称作“开花子轻铜炮”，共造成254尊，专供陆军行营所用。嗣后又仿美国式样造成4斤重铜炮40尊。1872年制成1尊可装12磅炮弹的前膛来福炮——乌理治炮。1878年制成了可装40磅炮弹的阿姆斯脱郎炮2尊，效果良好。但诚如郑观应所说：“邯郸学步，何能精妙入神？”“我方诩为新奇，彼已嗤为陈腐”。阿姆斯脱郎炮又已陈旧了。

除制造枪炮轮船而外，制造局在炮弹、枪弹、火药等物的制造方面数量也较大，到90年代大约每日能造各种子弹90000颗，每

^①姜立：《江南的历程上》，载于《上海工业》2004年第11期。



月能造地雷 200 枚，每年造无烟火药 60000 余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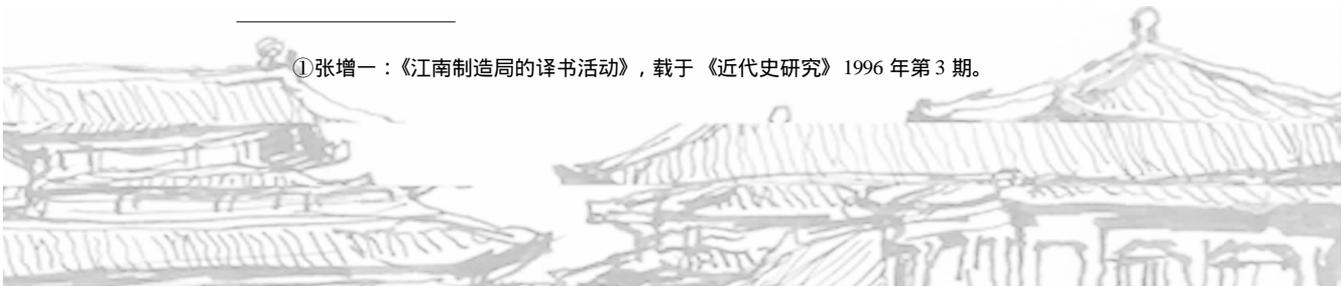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江南制造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洋式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 1891 年炼出的。制造机器枪炮需要各种原材料，其中尤以钢材、钢管等件最为关键，这些本全部购自外洋，价值既昂，运费又贵，平时尚可买到，战时海上交通梗阻，且有买不到手之虞。制造局乃于 1890 年筹建炼钢厂，向英国购买 15 吨炼钢炉一副，次年即炼出了第一炉钢。

此举比汉阳铁厂炼钢早了 2 年。1891 年虽只炼出 10 吨钢，但却是从无到有，表示了良好的开端。到 1904 年成立造船厂止，最多的一年曾炼出 2059 吨钢，一般年产均在 500 吨上下。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制造局在“西学东渐”上的贡献。1868 年制造局成立翻译馆，随即将李鸿章于 1862 年在上海县城旧学宫旁成立的广方言馆移于厂内，与翻译馆合在一起。广方言馆主要是招收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学校，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后来，特别是迁入江南制造局后，除学习西国语言文字之外，也加学一些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知识。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 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轫》、《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 1868—1907 年约 40 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印刷的西书有 159 种，1075 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 30 余种关于文科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①

江南制造局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有贡献，除在生产实践中训练了大批熟练工匠之外，在机械制图上曾办有带学堂性质的画图

^①张增一：《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载于《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房，教授学生外文、算学、绘图等课，机器图样大多由他们绘制。这实际上就是容闳建议设立的所谓兵工学堂。到1898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艺学堂。当然，应该承认，江南制造局在培养人才方面赶不上马尾船政局，这是一个缺陷。

不管是制造轮船，还是制造枪炮弹药，都是为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做准备——海上强国。

1405年，一支由260多艘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在郑和的带领下，载着2万多人，航行13万多海里，向沿途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了中国造船业的光荣。哥伦布比他晚了87年才带着3艘小型的轻快帆船和87人，开始了西方国家的第一次远航。但郑和带着浩浩荡荡的船队从西洋航行归来之后，中国的造船业陷入了300余年的沉寂。

作为一个拥有3万公里海岸线的国家，中国的海上实力曾经令人瞩目。郑和七下西洋被视为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阶段。但此后，明统治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相反，停止再造出海大舟，并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个中原因为何，学术界至今还在争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航海事业从此由兴转衰。中国的国运衰落也从海上开始。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挂着外国旗帜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

从江南造船所的诞生开始，中国的海上大国梦想重新苏醒。李鸿章创办江南船所是这个传奇故事的开端，而且影响深远。这个有着“中国第一厂”称号的古老船厂试图在未来重振辉煌。江南造船所的建立，结束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停滞时代。重造中国大船，此时被赋予了振兴国运的期望。从晚清到民国的江南造船厂不断地根据图纸和科学著作，让“西方制造”在中国落地生根。

中国在1868年制造出第一艘载重600吨的明轮兵船。船所自己设计了木质船壳，安上了自己造的汽炉和从国外购买的旧机器，在7月23日那天，它从浦江出发，驶至美英两公馆时，开炮庆贺。第一炉钢在1891年炼出，当时有参观者记录：“用极大水力之钢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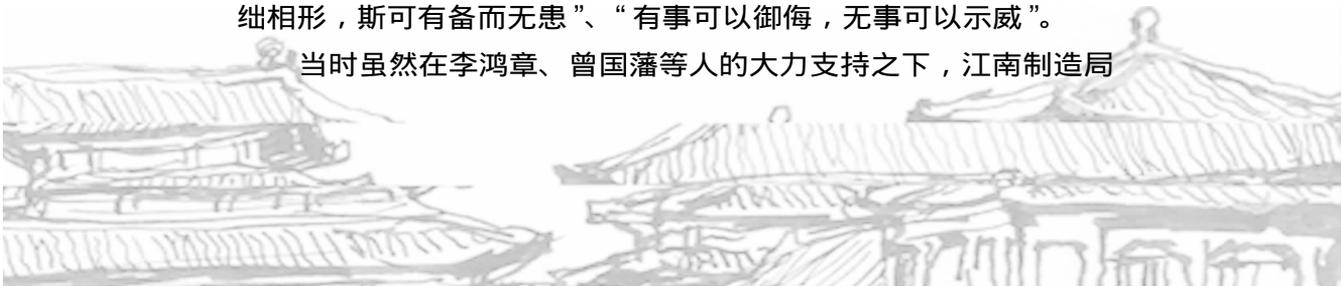


压之，每方寸之力，重3000吨，殊骇听闻。”按照西方图纸制造的中国最早的后膛炮现在还存放在今天的江南造船厂博物馆中。1918年，从江南制造局独立出来的“江南造船所”接下了中国第一张国外造船订单：为美国运轮部造4艘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的运输舰。两年后，4艘起着中国名字的美国船陆续下水，引起世界重视，中外报刊竞相报道，称“除日本不计外，乃为远东从来所造最大之船”。“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江南制造局发展到主营造船，与近代科学家徐寿大有关系。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曾国藩说徐寿：“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评价极高。1862年，曾国藩将徐寿推荐到安庆军营内军械所，专办制造事宜。1867年，江南制造局创办第二年，曾国藩、李鸿章就把徐寿派到局门，入住高昌庙。由此，江南制造局开创了造船新纪元。

从1868年到1884年，徐寿主持了10余艘兵轮的设计建造，从明轮到暗轮，从木壳到铁甲，从600吨位到2800吨位，为中国人自己建造轮船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1868年建成的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号）试航时，轰动了上海。船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木质，锅炉自造，主机用外国的旧机器改装。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兵船惟靠进口、不能自造的历史，当时的封疆大吏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行，称赞“坚致灵便”，并为其命名为“恬吉”号，寓意“四海波恬，公务安吉”。此后，江南制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驭远”等多艘兵船，锅炉与主机都是自造，船上能装配26尊大炮、载容500名水兵。1876年，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号，又在江南制造局诞生。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到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4艘万吨轮，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造的最大的船，也是中国从未签订过的最大的造船合同。这些正应验了李鸿章当年在奏折中的所说，“庶几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当时虽然在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支持之下，江南制造局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在设备和规模上不但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亚洲也是位居前列。但由于大部分原料无法在国内获得，因此价格由于水运和保险等费用而暴涨。1875年之前总投资中超过50%的资金就是耗费在这样的花费上。

对于这样的状况，曾国藩曾经明智地制定了一个控制经费预算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制造局的总办和3个独立机构将参与每一件财务的处理。但这一制度随着曾国藩的去世而日益消亡，局内官员营私舞弊之风也日益发展，据上海英国领事估计，1867年初，江南制造总局在采购方面滥用的经费，相当于所购置的物资和机器设备实际价值的两倍。另据报道，一家外国商号付了20%的佣金给该厂负责订购他们物资的每一个官吏。

与此相对的是，局内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因为没有合适的岗位而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和流失，以致广方言馆“精算术绘图之技”的人员被派到机器厂去“司工账”。另一名在数学和机械制图方面颇具才能的员工，在局内薪水仅为每月10到20两，此人后来成为外国某矿工程师，月薪100两。

甲午战争的结局显示了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近代化进程在结果上的大相径庭，而江南制造局的发展史也表明，在一个没有实现彻底变革的社会之中，单纯地引入先进技术最终是无法承载富国强兵的梦想。^①

^①孙晔飞、陈娜：《江南制造局：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鼻祖》，载于《中国国情国力》2005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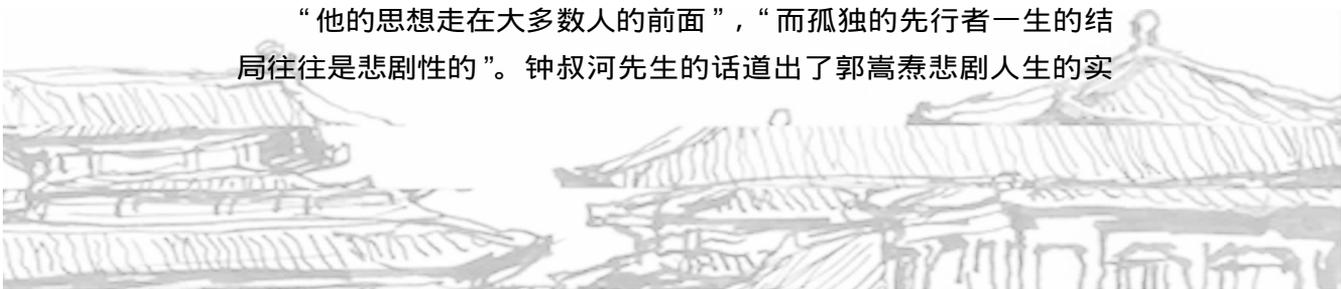
第二节 旅西纪程

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从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倒，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一生，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

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历史大幕下，郭嵩焘孤独地进行着一场演出。对于时人，谁会来问津这充满“夷”味的剧目。显然，剧场里的座位上经常是空空如也，偶尔会来几个捧场的，已属万幸。当然，光临此地的人究竟是来看戏或是把屁股一放，做一场春秋大梦的，笔者不知道，郭嵩焘更不在乎，这几十年总是在一片骂声、指责声中度过，早已习惯了不容于世的感觉。

但是，当后代人重将这幕戏搬上舞台时，引来的却是阵阵不绝的惊叹声及冷静思考后啧啧不断的议论：黑脸？白脸？抑或是爱国的能人？敏锐的智者？好学的才子？软弱的孬种？也许这正是现实中的历史，它刻意地制造了郭嵩焘的人生悲剧。

“他的思想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而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钟叔河先生的话道出了郭嵩焘悲剧人生的实



质，原来超前先进也有“罪”。

说实话，郭嵩焘一生值得悲叹的地方太多太多，是造化弄人？或是飞蛾扑火，引火上身？

面对他出生、成长直至老去的年代，笔者哭笑不得。他出生于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对于天朝来说，这已不是一个平静安定的日子。在中华大地的某个村庄的农田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农民们憎恨的目光；当他们望着炽热的烈日，望着豺狼般的官吏，望着仅有的粮食化作赋税，诅咒声从他们每个人的口中涌出。而在远隔万里的欧罗巴，使中国蒙受百年耻辱的一批批“坚船利炮”已经出厂了。

1840年，以鸦片命名的战争爆发了。自命不凡的天朝大厦的地基松动了，一块块陈砖碎瓦散落到地上，发出骇人的“啪啪”声，崩溃已在所难免。这时的郭嵩焘正值弱冠之年，风华正茂，好学上进。可惜，他也不能免俗地苦读经书，求取功名。国家虽有难，世局未大乱。御夷宜少谈，先把功名占。于是乎，他踏上了艰难的科举征途。

命运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予郭嵩焘的是一个坦进仕途的机会。他17岁入学，19岁中举，29岁中进士、点翰林，完全符合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培育人才的程式。而且，似乎是适逢其时般的，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命运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曾国藩曾经如是评论郭嵩焘：“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找到了用武之地。

太平天国的爆发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的命运。不可否认曾国藩日后的烜赫地位正源于此；谁能断言若不去镇压“长毛贼”，左宗棠能轻易摆脱“湘上农人”式的困苦生活；而后来的政坛巨擘李鸿章要是不凭此发迹，又会任职何处？当然，郭嵩焘此时也是幸运儿之一，为镇压农民起义积极奔走，献计献策，终于迈入仕途且加官进爵。

纵观郭嵩焘的一生，他的确是志大才疏。但这时候却是志高才卓。他是个好说客，先劝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大干一番，又硬是将



生性刚烈、避乱山中的左宗棠“拉”出山来。曾、左二人的联手，使湘军的完全成型及领导集团的构建最终成为定数；他又是一个实干家，统兵作战，筹建水师，推行“厘捐”、“盐捐”、“劝捐”，哪一件不牵系着湘军存亡兴衰的生命线？他还是一位理论家，湘军集团的许多文件、告示皆出于郭嵩焘的妙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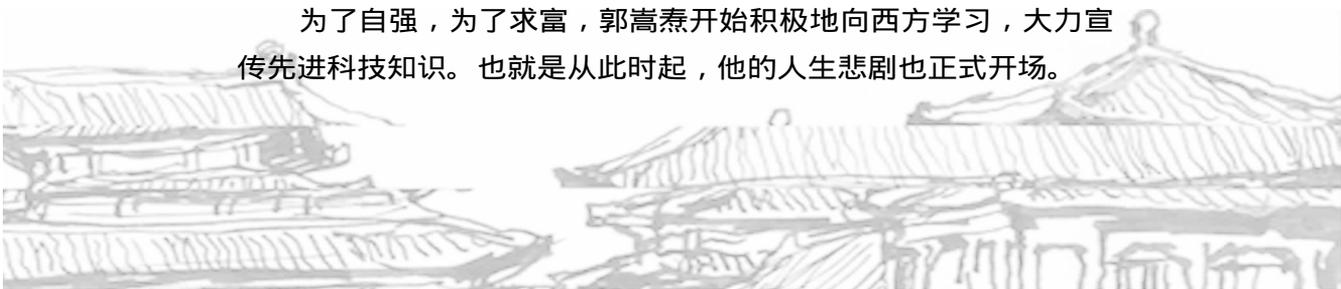
在湘军大帐中，笔者看到端坐在曾国藩、左季高、胡林翼身旁的郭嵩焘正用自信且略带骄傲的眼光环视着周围的诸位咸同英杰，“粮草、钱资、补给、水师、战术……哪一项缺了我，谁会玩得转”。

1864年夏季中的一天，天王洪秀全瘫坐在天王府的龙椅上，带着巨大的恐惧和无限的悔恨，他离开了人间去追寻“上帝”。刹那间，太平天国已群龙无首。洪秀全的死宣告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太平天国的运动史，另一个便是湘军的创业史。

缘于此，郭嵩焘离开了熟悉的湖湘苏浙战场，赴任北国。关于北上的原因，细想起来，的确耐人寻味。其一是曾国藩考虑到剿灭太平军后若湘军依旧保留原有建制，功高震主，引起猜疑，集团的尾大不掉之势若震惊朝廷，将会祸及整个湘军，因此主动请求裁军，郭嵩焘也从中游离出来。其二便是由于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郭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得到了中央的“赏识”，遂被纳入朝中任职。

北上后，郭嵩焘的生活、仕途大变。先是出任天津海防，转而管理山东海防，此间又办理过江苏事务，后来又一下子调往华夏的南端，也正是当时天朝大国的敏感部位——广东，担任巡抚大员一职。通过在沿海地区的长期任职，这位曾是镇压人民反抗起义的“高手”渐渐认识到自己一直用来升迁的资本和夸耀的凭借，当摆到洋人面前时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值一提。井底的青蛙由于涨水有幸跳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当它睁眼看世界时，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为了自强，为了求富，郭嵩焘开始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大力宣传先进科技知识。也就是从此时起，他的人生悲剧也正式开场。



天朝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122

在天津，尽管郭嵩焘竭力辅佐僧格林沁，劝他修炮台，练兵勇，但这位自负的名将却并不把郭的知己知彼之言放在心上，吃败仗在所难免。郭嵩焘也因郁郁不得志而赴他地任职。在广东，郭嵩焘不仅要耗气伤神地去收拾一个破坏不堪、问题重重的烂摊子，而且又要受到多年至交左宗棠的弹劾，本已烦得可以，又遭背后一刀，两人至此恩断情绝，反目成仇。不知此时站在海边，望着碧水蓝天的他，心中将是怎样一种滋味？说实话，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的参劾，实在是不义之举。郭嵩焘疏于行政管理的短处使他在粤的政绩平平，又成了左的矛头所向。作为多年挚友却不相互谅解，反而落井下石，这实乃左宗棠人生的一大污点。这次，朝廷给了郭嵩焘一个体面的虚衔，“打发”他回乡闲居，把他长期“雪藏”起来。外面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乡亲，何况北方的横蛮，南粤的构谄，已让他身心俱悴，休整一下，倒不失为良方。郭嵩焘显然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的“下放”，并未心灰意冷，反而积极地在湖南开学讲课，著书立说，成就了一番文化功业。

也许连郭嵩焘自己也没料到，他在湖南一呆便是长长的8年。虽然他在这期间写下了许多闪烁智慧光芒的文章，培养了一批希望之才，但依笔者之见，实际上他亏了，亏大了！8年，对于一个官品不低且拥有一番政治抱负的人来说，8年政坛的淡出意味着以往的一切已不复存在，其政治影响力的大为减弱，其政治敏锐感的急剧衰退，更意味着当他再次踏入官场时，已几乎无法认清前面的道路上布满的究竟是美丽的鲜花还是阴霾的陷阱！8年，对于一个政坛要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中会有几个8年？况且，他所处的时代已是外侵日亟、社会剧烈转变，瞬息万变的情况让当政者都应接不暇，隔绝在山间乡里的他8年中毕竟也会不自觉地减弱自己的政治观察力的，想起来，真可怕^①

郭嵩焘是一位积极坚强的乐观主义者，淡视名利，锐意进取；

^① 沧浪云：《个人的悲剧，时代的幸事——我看郭嵩焘的人生旅程》，载于2003年1月14日《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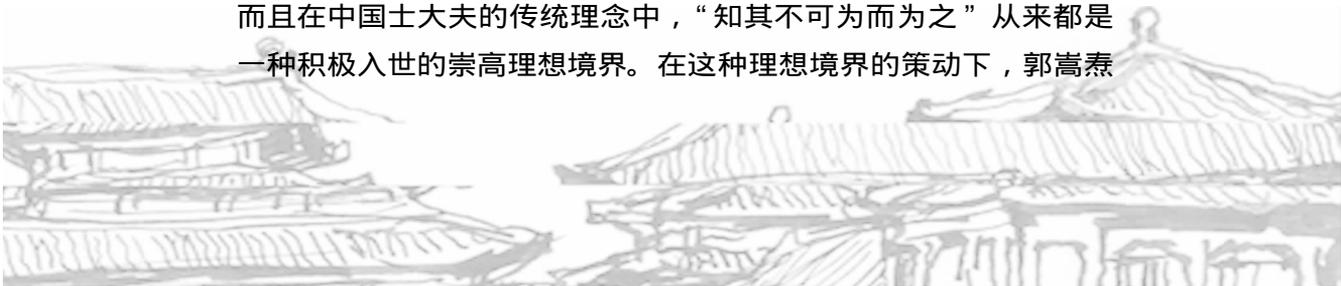


而近代史却有意地为他编排了一出曲折艰辛的悲剧，千回百转，黯然淒厉。历史的年轮并不一定要按人们精心预设的轨迹去行驶，常常南辕北辙，反其道行之。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性、规律性所在吧。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以这次事件为借口，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专一办理马嘉理案赴英道歉之事。消息传开，不只谩骂之声遽起，当时还有人集句为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他的湖南故乡，竟至于有人出于“义愤”要毁坏他的老宅，他的朋友也多劝说他辞谢使命，的确，“谢罪”并不光彩。但是，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出国考察和常驻外使节的制度，是中国顺应全球历史潮流的必由之路。在天下观念的熏陶下，国人对于触动这个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晚清的悲剧也正在于此。郭嵩焘勇于出使，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行为的实际影响。而且，在平定“发捻之乱”期间与抚粤任内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本身思想上固有的一些超前性思维，使郭嵩焘认定“意以为时难方艰，无忍坐视之理”，因为时局维艰之时，正是士人报效国家之时，而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更是方今要义。其实，早在1859年他就给咸丰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而且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来都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崇高理想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的策动下，郭嵩焘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124

毅然接受了使命，即便这时保荐他的汶详已经去世，总署大臣沈桂芬等“不免上下抵牾，必挤去之而后已”，郭嵩焘仍然抱着“通察洋情”目的，怀着深入探究西学与西方制度人心的愿望，置世人白眼非难于不顾，以将近六旬之病躯踏上了7万里的慷慨之行。

1876年12月1日，英国邮船 Travancore 号于当晚12点准时自上海虹口码头起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就此开始。

实际上，郭嵩焘此行原定乘坐法国轮船出洋，此次乘英轮出行，已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使团翻译马格里爵士在其日记中写道：之所以坚持要求使团搭乘英国轮船，乃是因为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各港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可以使得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见到的都只是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也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①

由此可以看出，煌煌上国的理念其实也算不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与当时这位马格里爵士的“帝国即世界”的情结相比，我们的自豪感与现实的距离似乎更为虚幻，甚至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上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郭嵩焘在出国以前，已经有了“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的认识，但在刚到英国一个月的时候，他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

^①车玉铸：《忍辱负重青山留——孤独的思想者郭嵩焘》，载于《书屋》2006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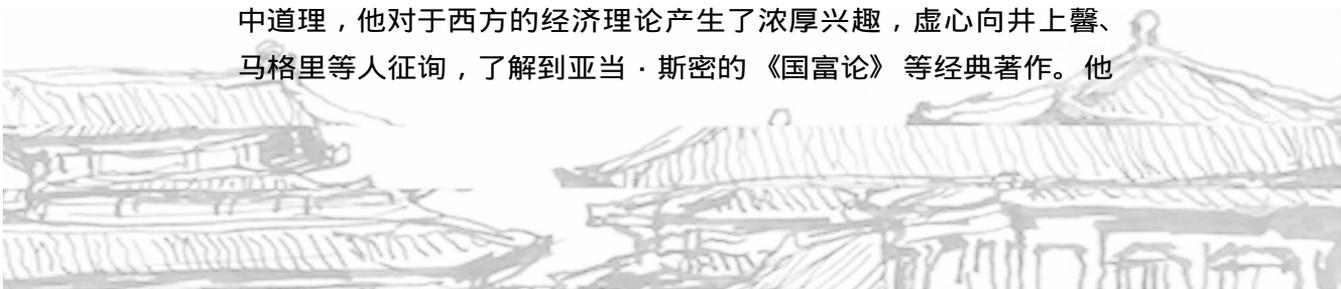
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可经过近一年的考察，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

郭嵩焘作为一名精通传统文化、熟谙中国旧政治，明了“洋务”内情的资深中国学者与政府公使，他比之早前亲历欧美并留有著述的许多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以对西方政教人心进行系统考察与比较研究。

早在 1875 年，出洋之前的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他比较了西洋与中国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个“本末之论”，究其实质，说明郭嵩焘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于“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为意，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仿效西方。这种主张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来“戊戌变法”的内容，此处，郭嵩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维新先驱。但两年的使西历程中的所见所闻，让郭嵩焘更进一步上升到“心性”层面并结合器物文明与制度文明这两个要素，开始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多层次思考。

在英国，郭嵩焘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历史。在其日记中，郭嵩焘将议会（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将市政厅翻译成买阿尔（mayor）衙门。

郭嵩焘对西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观察，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探究“泰西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孜孜于“富国”。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虚心向井上馨、马格里等人征询，了解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他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还积极与英、日等官员反复讨论，日记中多见“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等类似记载，在得知英国税法规定，其所得税“俸人三百镑以上，亦一例输税”后，认为“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嵩焘颇为关注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情形。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得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结论，并且以为这比我们传统上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在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后，他认为“巴力门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衙门自选”的进步性，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适得其反”，从而否定了绵亘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论！

郭嵩焘还注意到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在给沈葆楨的信中力陈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华夷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其中心内容便是：“内中国而外夷狄”，从来“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并且认为“道历千载而不变”，将中华文化直接等同于“道”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出使英国之前，郭嵩焘就已经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郭嵩焘对于西方的伦理教化有了更确切的认识，不禁顿觉锥心之痛：“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



人，伤哉！”这里，郭嵩焘已经直接承认了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就连伦理教化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现在的实际情形居然反倒是西洋诸人视中国为野蛮半野蛮国家，所谓“夷夏之辩”于此竟有乾坤倒转之虞！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①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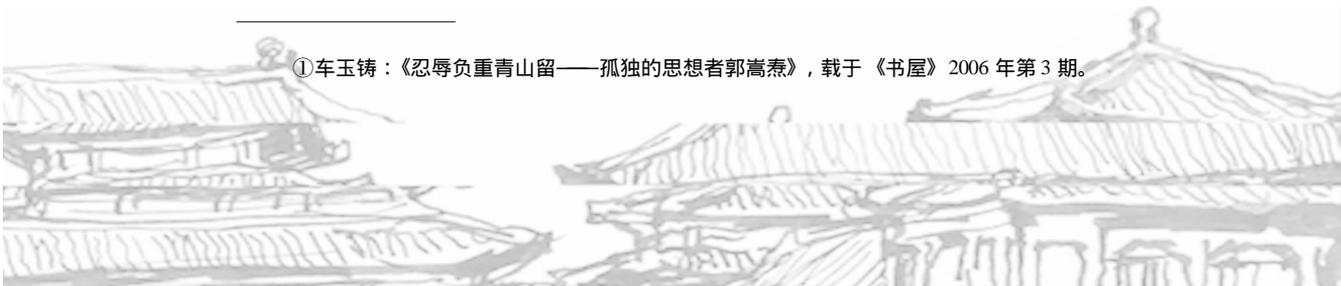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2. “见泰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3.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

^①车玉铸：《忍辱负重青山留——孤独的思想者郭嵩焘》，载于《书屋》2006年第3期。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1年零7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些都是郭嵩焘为开展理性外交，适应西方外交场合，继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理举措。如“败坏国教，不成体统”，说的是郭嵩焘以如夫人的名义举办茶会。原来郭嵩焘原配去世后，如夫人梁氏还未扶正。颇具个性的郭嵩焘硬是带如夫人出国。所谓“茶会”，实际是宴会或者晚会，根据欧洲外交惯例，新到一国的使节，需要以女主人的名义举办宴会，宴请各国驻该国使节。而郭嵩焘此次携如夫人梁氏西游，各国公使皆知。既然郭嵩焘已经参加过他们的茶会，理应回请。

但是，这件维护国体的事在国内却被拿来作为郭嵩焘的罪状。刘锡鸿后来背地里弹劾郭嵩焘令梁氏学英语、四处应酬，并令梁氏出入戏园，首先请客以开往来之端，云云。其实，此时郭嵩焘已萌生退意，正在向总署请辞。以梁氏名义举办茶会是其公使生涯的一个辉煌的结尾。这也是郭嵩焘冲击传统礼教的一枚重磅炸弹。在郭嵩焘的刻意安排下，梁氏成为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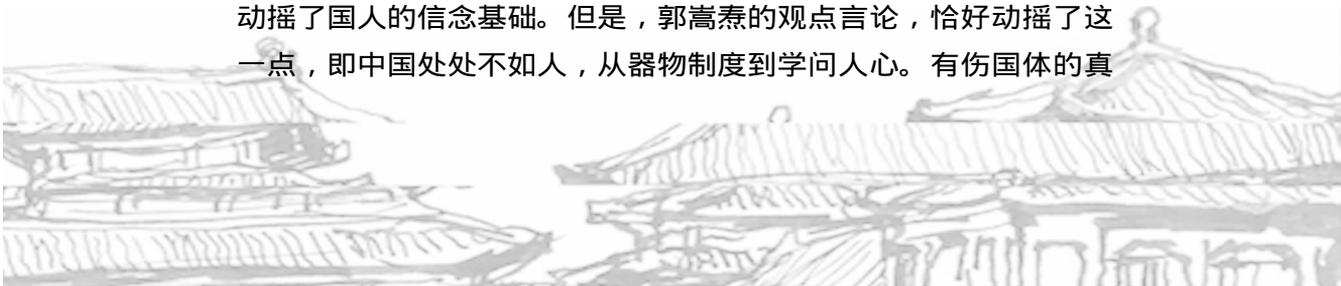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的悲剧在于他走在了历史的前面，他对西方的观察，超越了他的时代。洋务派的核心主张在19世纪80年代才最终被张之洞确立为“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路数，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文化和政治方向。而郭嵩焘的结论早就走出了“中体西用”的命题。他认为，李鸿章等洋务派只知道购买洋人兵器，或者派人学习制造兵器，“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在他看来，西洋文明先进之本首先在于其政治制度。在参观了英国的监狱、议会和新闻部门等机构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由此论之，郭嵩焘的主张其实不能完全算作洋务派的主张，而是带有强烈革命性暗示的主张。

当然，郭嵩焘和近代大多数官僚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简单地感叹和维护自尊的议论上，而是深刻的分析中西差别的背景，并最终走向文化意义上的自省。他发现，西洋文明的原动力，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学术和教育上的原因。

最终，郭嵩焘从观察者变为反思者，并进而由反思而怀疑中国政治，并且越来越激烈地走向对顽固的士大夫的沉痛鞭笞。他反对以夷狄之名来称呼西洋，呼吁承认现实。

郭嵩焘真正开罪国人的，不是小节行为，而是大胆议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著述中，盛赞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所谓“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赞叹西方富甲天下，船坚炮利，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感，因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华夏天下，礼教国家，是朝野人士惟一可以自恃自傲自卫自慰的，动摇了这一点，就动摇了国人的信念基础。但是，郭嵩焘的观点言论，恰好动摇了这一点，即中国处处不如人，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有伤国体的真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正含义，是有伤国人的观念。在国朝人眼里，西方人即使富强，也不过是些诡服异行的野蛮人，所谓“夷”、“外夷”、“逆夷”、“洋夷”、“夷人”。中国人即使屡遭战败，屡受屈辱，也不失天朝上国的尊严与体面。将西方夷狄化，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也关系到国朝政治秩序的安全，因为夷夏传统已成为天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了中国四夷的观念秩序，同时也就动摇了满清皇朝的合法性，尤其在大敌当前、灾祸连绵、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艰难时刻，就更不容动摇。郭嵩焘不见容于天下，可想而知。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发生已经30多年了。后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朝野人士竟无动于衷，用林则徐的话说，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实际上，这并不是纯粹因为愚昧麻木，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所致。从林则徐感慨到郭嵩焘出洋，35年过去，国人已经知道，世界广大，天朝并不际天极地；西方强盛，商贸器物，无不胜出中华。但是，即使明白这番事理，人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旧是鬼夷模样。

流俗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郭嵩焘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说“夷狄之民，与吾民同”，而且更有甚者，说在西方眼里，中国才是夷狄，这样自然就触犯了众怒。林语堂曾经分析过中国人文化优胜的自豪感：“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惟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惟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惟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郭嵩焘却将这种文化优胜观颠倒过来。中国有华夏、夷狄、禽兽的世界观，西方则有文明、半文明、野蛮三分天下国家的世界观。在西方人看来，欧洲诸国，属于文明之邦，中国、波斯、土耳其这类国家，属于半文明国家，非洲则只有野蛮人。但让人伤心悲愤的是，中国还没人知道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没人觉悟到自己的半文明或半野蛮的处境。中国强盛时，视其他国家为夷狄，如今西方强盛了，也同样把中国看作夷狄，可惜中国人不明白这番事理。

而1875年前后，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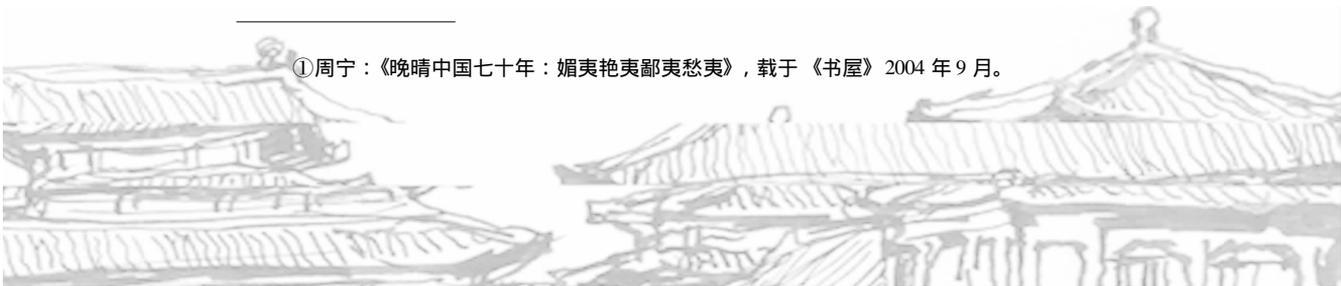
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①

郭嵩焘自 1879 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 3 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郭嵩焘本人对其毕生的政治经历与遭际，一直都有着相当超脱的心态，特别是他那种对所守信念的自信和笃定，许多时候怕是要令今时自诩“现代”的人们所自惭。他曾自题小像：“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 年，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着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 9 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郭嵩焘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他死后的第三年，即 1894 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著名的甲午战争。洋务派建造的北洋舰队在这次海战中全军覆没。他死后的第九年，即 1900 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大批的农民喝了符水走上街头，去与洋人的枪炮进行殊死搏斗，这个悲剧的结果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又过了 10 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武昌起义，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轰然倒塌。这

^①周宁：《晚晴中国七十年：媚夷艳夷鄙夷愁夷》，载于《书屋》2004 年 9 月。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这个时候，假如郭嵩焘地下有知，不知道他将作何感想？！不知道当初拼命打击郭嵩焘的那些死抱着老祖宗脚丫子不放的爱国贼又作何感想？

其实，郭嵩焘应当知足，这样的时代造就了他这样风格独特的先行者。从经世派的“后劲”，到洋务派的“中坚”，直至维新派的“先驱”，这即是生于1818年而卒于1891年的郭嵩焘凸现且与时俱进的人生与思想历程。他是一座桥梁，连接着“经世致用”、“洋务自强求富”、“戊戌维新变法”三条不断前进的坎坷路途，他又是一座界标，将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不同的思想脉络条分缕析，划分成序。他是上承经世，下启维新，洋务运动中似右实左的思想理论家。虽有几分悲凉，却已无限风光。

该受指责的应当是时代，不应是单单的某个人，集体的“失语”和群体的“无知”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的。个人的悲剧换来了时代的幸事。



第三节 同文馆的困顿

洋务运动时期，在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其中作用和影响最大的是京师同文馆，它不仅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

清代末期，欧洲各国自然科学和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力强盛。京师为中国政治教育的中枢，一些有文化、有远见者屡次上书，要求师法欧美而富强华夏。日益衰败的清政府意识到：欧美各国富强之故，实由于无人不学，无事不学。中国亟图自强，必以育才兴学为要宗。早在总理衙门建立前，恭亲王奕訢和户部侍郎汶详等人就审时度势，提出了6条富国强兵的建议，其中第5条就是计划创办同文馆，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培养外国翻译和外交人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只好将建馆之事束之高阁。总理衙门建立之后，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外语和外交人才，因而创办同文馆已成当务之急。1862年初，总理衙门首任办事大臣奕訢上奏慈禧太后，强调指出，要想谙晓外部世界，必须首先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外人的欺骗和蒙蔽。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于是，同治元年六月十一日（1862）于京师设立同文馆，这是清末培养译员的学校。同文馆位于东安门内北河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沿，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帝旨令徐继畲总管其事。^①

最初，同文馆只设英文、法文课程。乾隆年间，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发生摩擦，所以当时在北京曾设立了一个俄文馆，附属在理藩院。在同文馆成立后，俄文馆并入到同文馆。至此，同文馆设3种外文课程。同治六年（1867），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奏请添设算学馆。

1870年，普法战争（德法战争）爆发。之后，德国日益强大，于是同文馆又增设德文，当时叫“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再往后才改写“德文”二字。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由于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终于失败，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文馆因而又增添了日本文，当时称为东文。

其所以称东文，原因说起来可笑。一因甲午之战，清朝官员为堂堂中国同日本小国打仗，觉得丢人，意思是日本小国不配与中国大国为敌交战，为避免中日合称，而云中东之战，所以称为东文。二因其他4国文字都是西文，因而此名曰东文。实际上都是鄙陋之见。

清帝对同文馆极为重视。钦定的同文馆章程规定了生源“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举人、恩拔副岁优贡人及由此项出身人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服官者由京外各衙门保送，未仕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及本旗图片径赴臣衙门具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定期试以策论等项，考取送馆学习”，学生年龄“务择其年在三十以内者”，“如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藉资印证，以精其业者，其年岁亦可不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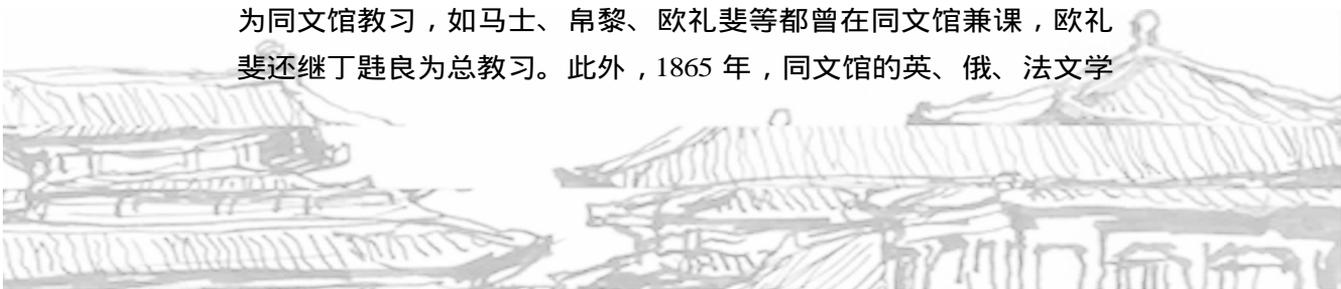
在当时的情况下，同文馆的建立注定一波三折。首先就是经费问题。当时的满清政府正在全力清剿太平天国，国库已经非常空

^①王萍：《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化的助跑器》，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5期。



虚，“太平天国起事仅三年，清政府糜饷已达 2963 万余两，至咸丰三年六月，库存正项待支银仅余 227000 两”。而兴办教育花费确是非常巨大的，没有钱，建立同文馆无疑是空中楼阁。奕訢在奏请设立同文馆的折子中就提出，“近年部库支绌，无款动支，再四斟酌，惟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奏报之期，委员批解臣衙门交纳，以资应用。”由此可见，同文馆创立伊始就与海关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海关的支持，同文馆不可能顺利开办。而海关支持中国近代教育也从此开头，直到民国时期不曾间断。

其次是合格的老师难寻，奕訢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说道，“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用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当时在中国国内对外交往比较久的广东、上海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得不聘用外国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很难想像有哪个外国人愿意千里迢迢来中国当老师，所以不得不高薪聘请，“即令教习诸生，诸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其歆羨之心”。但是奕訢等人不可能出国寻访，在国内的外国人多是商人、传教士、淘金者……这些人根本不能很好地充当老师，所以说就算是高薪聘请也实在请不到合适的老师。最后，在 1866 年同文馆筹建格致馆时，奕訢奏称：“其延聘洋人一事，前与总税务司赫德议及，伊可代为招聘。”同时还任命赫德为同文馆的监察官，这样海关又更进一步与同文馆联系到了一起。是年，赫德回英国过程中，在欧洲聘请了化学、天文、法学、英文、军事诸教习。对同文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 1869 年，赫德推荐美籍传教士韪良为同文馆西文总教习。在丁韪良的帮助下，同文馆自 1869 起开始走上正轨。而且在赫德还不断安排海关人员为同文馆教习，如马士、帛黎、欧礼斐等都曾在同文馆兼课，欧礼斐还继丁韪良为总教习。此外，1865 年，同文馆的英、俄、法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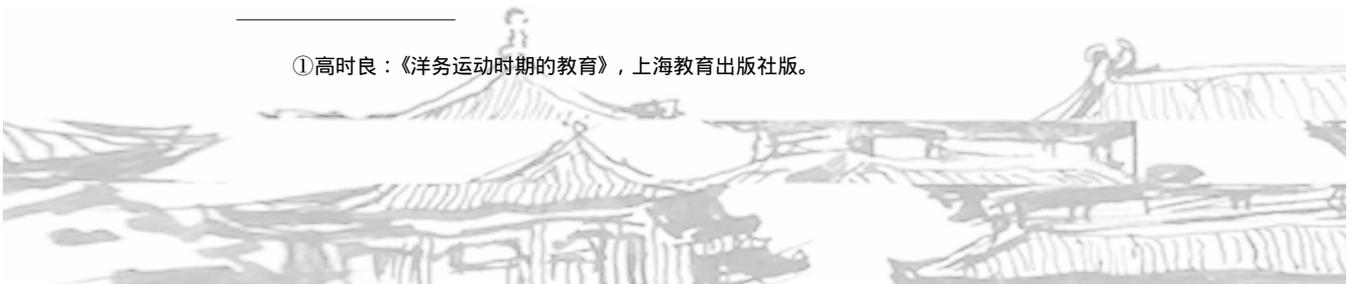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生，学习期限届满，进行考试。奕訢“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与各馆各国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①。

京师同文馆中的教师由于身份不同，因而待遇差别很大。首任英语教师鲍尔滕年薪白银 1000 两，此后凡外籍教师的年薪就按此标准分为两季发给。而馆中的汉语老师年薪不足 100 两，还不到外籍教师的十分之一。

再次是生源问题。实际上，同文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有人以舍中国而从西人为非者，甚至有以中国师西人深感可耻者，人们认为学习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大学士倭仁就上奏称，“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连上层官员都抱这种观点，就更别说普通的百姓了。清政府首先从八旗官学中挑选学生入同文馆。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是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最初被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可托，或者是笨而不用功的学生。后来，兼收年岁较长的八旗子弟及汉族学生。学生入同文馆后，亲戚朋友对他的家庭大为鄙视，断绝亲戚来往。甚至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人对这个媳妇大瞧不起，媳妇因而便受公婆之气。那时，翁同龢的门生、进士齐楔亭由薛叔耘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一书，了解到西洋声、光、化、电（在光绪年间，人们谈论西洋文化永远用此四字代表）各种学问，都比中国新得多，轮船、火车、枪炮等等，都比中国强百倍。于是他求人到北京探听到，自愿进入同文馆很容易。因为不易招生，同文馆还“厚给薪水，以期专致”。除饭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供外，“每月仍各给薪水银十两，俸资津贴，庶内顾无忧，而心益专一矣”，于是齐楔亭将其子送入同文馆学习。学生初进同文馆，便每月得 3 两银子的膏火，这就等于旗门弟子的一份马甲钱粮（即八旗弟子成年入营当兵，每月有一担米之

^①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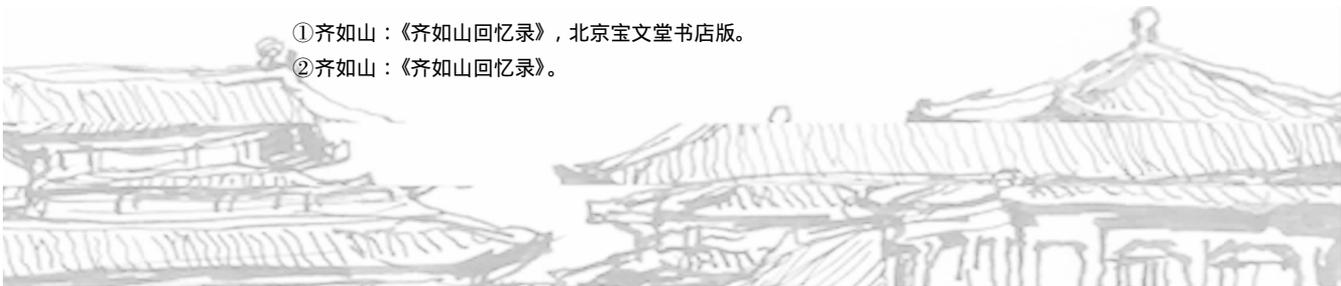
外，还有3两银子），这在当时是旗门中惟一的希望。即便如此，还是没人愿意到同文馆学习。于是膏火逐渐增加。学生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膏火则增至6两，再过一期增为8两，以后又增至12两。学生每月得到8两银子时，除自己学习洋文外，还得帮助洋文教习教新来的学生。同文馆的学生到一定程度，可以担当副教习，月银最高时可以得到15两。而当时，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才不过8两银子。^①

同文馆给学生的待遇极为优厚，除了不管衣服，煤油、蜡烛、纸媒、洋火等等全管。齐如山先生曾就读同文馆，据他回忆：在同文馆给学生的各种优厚待遇中，以伙食为最优。平时，6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个大碗，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虽无大碗，却增加一个火锅。火锅共分3种，即什锦火锅，白肉火锅，羊肉火锅。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佐料等等，应有尽有，跟北平正阳楼饭馆一样，吃不够可以再添，以上所有任凭学生点要。如果不愿意吃火锅，仍可以随意点菜。不但学生如此，倘若学生的熟人来馆探望还可以留饭，也是随意点菜，不但一文钱不用花，而且连赏钱都不必破费。同文馆每年的费用支出需要44000两白银。难怪好几位外国教习慨叹：“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②

同文馆的学生绝大多数在十三四岁以下，一般都须学习洋文和汉文，故同文馆设洋文馆和汉文馆。因为洋文馆在同文馆的前院故称前馆，学生学习洋文从字母开始学起。少数大点的学生能通文不必再学汉文者，名曰前馆的学生。汉文馆在同文馆的后院故称后馆。后馆与同文馆外边的私塾相同，学生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文章，光绪戊戌年（1898）才改作论文。同文馆的汉文教习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招考，应试者多是举人，间亦有贡生，秀才等则无资格应考。考中者，便有了同文馆教习的资格，这等于是一种官

^①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书店版。

^②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阶，要列入履历。每次考试所取，总比应用之额多几倍，以备教习出缺后候补。凡具备教习资格者，不论传到上课者，或备传者，自考中后，每位每月支膏火银4两。不同之处，只在于传到上课的教习另有饭食住处，未被传到者可另谋他就。待遇如此之丰厚，因而每次考试，应试者总在一二百人之多，选拔出来的汉文教习个个中国古典文学底蕴十分深厚。然而同文馆最初的学生，多是不用功的子弟，因而教习也不卖力气，学生的功课可想而知。

洋文教习之职由美国人丁韪良长期担任。各国的教习最早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税务司司长赫德抓在手。凡到同文馆的洋文教习没有一个称得上学者的。当时，在欧洲各国中，凡有学问道德的人都有长久而稳定的工作，绝对不会赋闲。而那些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难以寻觅工作者，方肯来华找饭碗。无论哪国人到了中国，都得由其本国公使介绍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税务司，求派差使，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税务司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初到中国的洋文教习，根本不懂或很少懂得汉文，到中国以后，名为教洋文，实则为学习中国话，学的够用之后，即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几成定例。在光绪中叶，外国教习情况如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会洋文的只有曾纪泽等一二人。同文馆学生的洋文成绩如何，无人能稽查，没人肯过问。中国与外国交涉公事，无论来往的文件都是用汉文。后来外国人强硬，对华公事才改用汉文、洋文两种；而中国对外的公事，则依然只用汉文。

同文馆自同治二年（1863）开始授课，到光绪十年（1884），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竟连一个会洋文的人也未造就出来。后因在中国西北边境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需要俄文翻译，清廷令同文馆5个学生去军机处考试。结果，成绩好的学生只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出来，如何能做翻译？军机处大怒，下公文申饬同文馆，说教学成绩殊属不成事体云云。此后，同文馆的洋文教务归总教习管理，其余一切事务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掌理。京师同文馆对学生业务能力的考核至严至多，为近代所少有。仅考试形式就有4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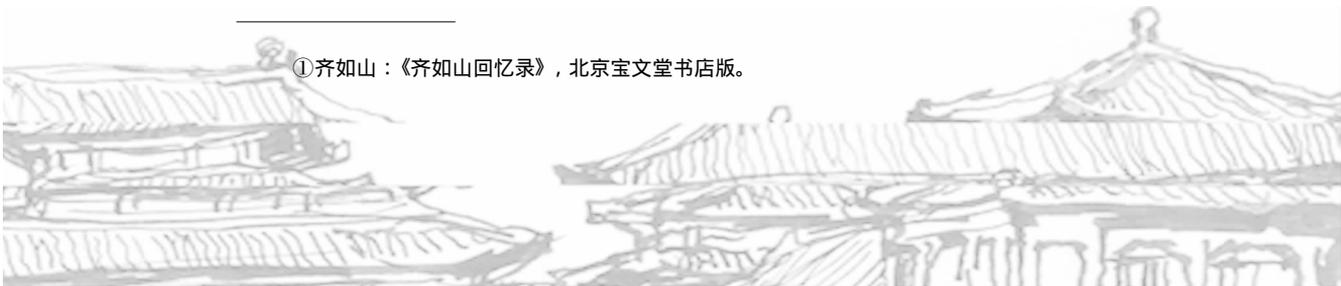


月有月课，季有季考，岁有岁试，每隔3年，还要由总理衙门主持一次大考。学校以考试成绩为依据，奖优汰劣。季考、岁试成绩优秀者奖励白银1到4两，大考成绩优异者由朝廷授予七至九品官职。对差等生的处置，不是降级革职，就是退回原籍。通过这些频繁的考核和严格的奖惩办法，激励和督促学生更加发奋学习，不断进取。

同文馆虽为总理衙门附设的机构，但不直接管理，只派两个司官，员外或主事提调此事，他们的官衔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这是一个很肥的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购买一切东西，固然都有回扣，但大宗的进款，则在厨房，开饭的预算，是按馆中总共有多少学生，就以此数开饭，6个人一桌，每桌菜饭，合银6两。彼时6两银子一桌菜，已经可以有整盘整碗的燕窝鱼翅，而学生吃的菜，在平常说是很阔了，然亦不过鱼肉，鸡鸭便很少见，那时的物价，那样的菜，有2两银子便足，只按菜价，利钱已经很大，而每日开多少桌，还有虚帐。最初学生，不过百余人，后乃增至3、4百个人，6个人一桌，最初每顿饭开20桌，后增至50桌，可是常吃饭的学生绝对到不了一半，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日，各学生都回家，吃饭者不过几个人，而他也照样开帐，每顿20桌或50桌，大家给厨子算帐，平均每天有4个元宝的进项，这笔款当然有一部分给提调，而得钱最多的还是厨子，包办此事的厨子头姓于，人称于八，给自己捐的候补道台，给他儿子捐的郎中。请看这样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①

总理衙门当时在北京是极新的衙门，对于储备人才的同文馆，为什么如此放任，使它如此的腐败呢？一是总理衙门中的官员，我们前面已经提及，没有一个会洋文的，最初只有曾纪泽一二人懂洋文，后来就再没有了，一直到光绪中叶，才有会洋文的人员，然也

①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书店版。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稀少的很，故对于同文馆学生成绩如何，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稽查，也没有人肯过问。二是中国人素来自大，没有人肯学外国文字或语言。中国政界的意思，是外国人来到中国，都应该说中国话，何况同政府办公事呢？按说这种思想并不错，但是自己也应该会才是！但绝对没有人会，他们的思想是，外国人与中国政府办事，应该自己预备翻译人员，倘没有会中国话的人，就不必来交涉事情，堂堂中国政府，出于国家的威严，不能给他们代备这种人才。因为这种思想，所以从前与外国交涉的公事，无论来往都是用汉文，后来外国人强硬，来的公事才用汉文洋文两种，而我们去的公事，则仍只是用汉文。又过了一个时期，外国越强横了，倘来往公事有文字的争执，须以洋文为主，以上是关于文字的。再者，衙门中当然常有与外国人当面商议的事情，外国使臣多懂中国话，而中国官员都不懂外国话，每逢会议，衙门大臣说完一段话后，该公使已经懂得很清楚，但仍由翻译官翻成洋文，这是体制，可是外国占了大便宜，因为公使听完中国官员说的一套话，早已明了话中之意，于翻译官进行翻译时，他便斟酌好了回答之语，及翻译官翻完，他们二人再进行商议。因为公使有预先思索的机会，所以回答的言词较妥，而他们两人商议时所说的话，中国官员又一字不懂，翻译官译成中国话传回来之后，中国官员就得立刻回答，即使斟酌，时间也不能太久，总而言之，没有考虑的余地，于是交涉事件，往往因此吃亏，这才感觉到自己也应该预备翻译人员。以上所谈，乃是光绪中叶以前的情形，到了甲午中日一战之后，风气稍开，自然就好了不少。请想当时政府的官员，都不过是那样知识，他们怎能重视同文馆的事务及功课呢。当同文馆创立之初，是因为曾纪泽他们奏请，又因他们是出使过外国的人员，所以对于他们的奏请，不好不准，只得创设，但终以为不是特别重要，也没有人来稽查，所以办的阔绰是阔绰极了，而腐败也腐败极了。前面已经提到培养了数年不能说俄语的学生，其实不但俄文馆如此，英法文馆也是如此，当时尚无德文及日本文。总理衙门经此次被申饬以后，当然很难过，才提议设法整顿，以后才稍稍有点起色，然仍未能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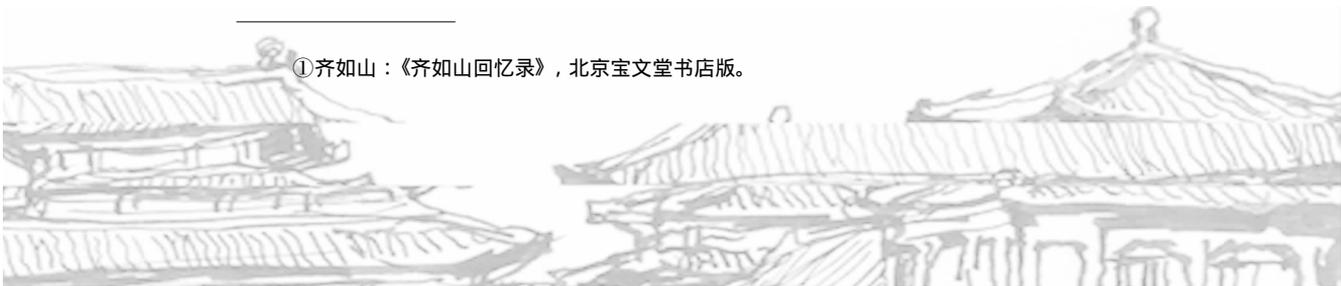
时上课。^①

在行政上，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同文馆的官员均从总理衙门办事人员中遴选。虽说京师同文馆是朝廷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但自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惟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之命是从；经费开支更是要仰仗赫氏把持下的海关总署拨付。难怪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长达32年的丁韪良实话实说：赫德是同文馆的父亲，自己只不过是同文馆的保姆。

馆中汉文教习，洋文教习，以至总理衙门对馆中的情形，已如上述，在这种情形之下，学生怎么会用功呢？再说当初都是硬要来的学生，都是强打着鸭子上架，他们不但不用功，许多学生都是偶尔来一趟，再则是到月终来支一次膏火银，别的时候，凡来者不是为上课，多半是约几个朋友来吃饭谈谈天，几乎等于吃饭馆，这些学生，十之七八就没见过洋教习面目是怎么个样子，何况学洋文呢？则学10年8年，不认识字母，也是平常事体。以上所说乃是不住馆的学生，还有住馆的学生，这种多是十几岁的小孩，他们所以住馆，有两种意思，一是为省家中费用，二是家离同文馆太远，住馆省得来回跑，且路太远，小儿走路，家中也不放心，所以住馆，这些学生同样的也是不用功，间乎有稍微用功者，也只是对于汉文，因为他们入馆之初，家长都有嘱咐，其嘱咐的意义，也大致相同，大约是此次入外国学堂，乃是被迫不得已，入是非入不可，但能够不学，还是不学，好在馆中也有汉文，对于汉文多多用点功就是了。家长都是这样的教育，哪一个小孩还肯用功呢？不用功的人，吃了饭出去玩玩，回来吃饭睡觉，用功的也就是读几本书，写两篇大楷小楷而已。上洋文课者乃绝对少数，就是上课，也就是同洋人说说闲话谈谈天，洋人借着他们，练习练习中国话，于学生毫无益处，于教师之学习中国话则帮助很多。

同文馆的毕业生，最出息最有名的一个，是齐如山，此人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的改革，使梅氏走向了世界。他在戏剧上的造

^①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书店版。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诣，也许跟在同文馆上学待遇过好，课程太松，有时间、有精力和闲钱去泡戏院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同文馆根本就没有近代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了衙门，学生都是老爷。最初连学制都没有，成了混日子的地方。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馆整顿，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才有所改观。不过，除了得到海关的支持，资金比较充足以外，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同时同文馆管理黑幕重重，学校学生不多，可是各种管理人员却是不少，光管理大臣，专管大臣就有21人，多是挂名领薪水的人。而提调更是一个肥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于是历任提调官都是极尽贪污之能事。同文馆遗传了晚清政府的腐败与矛盾，虽然讲述的是西方先进的知识却又不可能摆脱掉封建愚昧落后的束缚，所以说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京师同文馆还没有来得及出现辉煌就直接走向了衰落。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同文馆的老师学生皆属于洋鬼子和二毛子，为团民镇压对象，只得逃之夭夭。从那以后，同文馆陷入停顿，直到1902年，光绪帝一纸圣谕，“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交部，着即归入大学堂”。就这样，同文馆结束了其坎坷波折的一生。而在京师同文馆的历史上，没有能够培养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家，最多只是外交官和翻译者。

京师同文馆有自己的困顿之处，但不能因此而无视其在中国近代所发挥的作用。正是这些外交官和翻译者为中国盗来了西方的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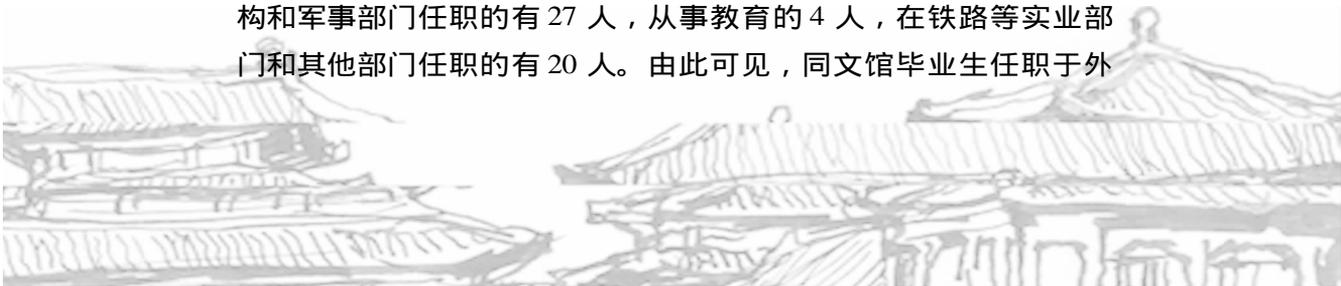
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其出路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政府涉外部门担任翻译；二是出任政府外交官员；三是在洋务派办的企业和新式学校中任职。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历是1866年，促成此行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赫德。当时总理衙门认为：“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经反复斟酌，奕訢



等商议由中国特派使臣赴泰西游历“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但限于费用、礼节等问题，派遣存在困难。恰逢此时，总税务司赫德乞假回国，建议由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他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总署认为此议流弊甚少，并且可以藉此“增广见闻，有裨学业”，便同意下来。总署从英文馆选出凤仪、德明（张德彝），从法文馆选出彦慧，共3名学生。为壮声势，凤仪、德明均赏给六品顶带，彦慧则赏给七品顶带，并派满族人斌椿（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曾在总税务司赫德处办理文案）带领3人前往。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人自上海启程，随赫德赴欧洲游历。此次游历，除去路程上所花费的时间，在欧洲的时间不到4个月（1866年5月2日—8月19日），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11国。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外交任务，也不是清政府派出的正式外交使节，但所到之处还是颇受欢迎的，曾经受到各国国王、王后以及外交大臣们的接见。在欧洲游历期间，斌椿和德明都有笔记留世，留下了他们对欧洲最初的观察和感受。虽然所记表现出对西方国际知识和西方文化的粗浅了解，对国内影响也甚微，但这次破例之举是晚清官方第一次派人前往西方的游历，是中国人接触、了解西方的开始，在外交的近代化方面具有萌芽的历史意义。

此后总理衙门从历届优秀学生中选拔了一批人，专任翻译官，以供清政府官员会见外使之用。此外，他们还为总理衙门翻译外交文件和汇集外国新闻，或任出使大臣随员和翻译。1876年，清政府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使馆译员多从同文馆学员中挑选。据统计，清末共有13名同文馆学生持节国外，在清末所派遣并到任的54名出使大臣中，占24%。1912—1928年，有7名同文馆学生在外国担任公使，在17年中所有派遣并到任的公使中占20%。另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记载，在毕业离校生从事的职业中，在外交部或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27人，从事教育的4人，在铁路等实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任职的有20人。由此可见，同文馆毕业生任职于外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事部门者居多。这批由清政府自己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改变了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受制于西人的局面，在中国近代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倡议办馆，其初衷是想为对外交往培养几个翻译人员，以应急需。李鸿章眼光则看得远些，他把学习西语看作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桥梁。他在奏请章中指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致精微。我中华……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诚如李鸿章所言，后来同文馆在办学过程中，果然承担了传播西学的桥梁作用。出于教学的需要，京师同文馆组织教习和学生编译了20多部教材，涉及了天文、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算学、工艺、国际法、经济学和外语工具书等诸多方面，这些译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法律和国际知识的，如《万国公法》、《法国律例》、《公法便览》等；二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如《格物入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三是学习外语的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等。同文馆所译书籍，均向全社会发行，被当时中国的洋学堂广为采用，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系统传入中国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同文馆所译书籍，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还传播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例如，《万国公法》中不仅有“权利”一词，与此相关的或派生的“权”、“自主之权”、“主权”、“私权”等等，几乎涵盖了《万国公法》的所有卷和章，这是中国近代文献中，最早出现“权利”用语的著作。因此，这些书籍的传播，对于当时仍然处于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可以说，没有同文馆这一抹风雨飘摇中的亮色就没有我们今天

^①叶小青：《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外交近代化》，载于《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第22卷第1期。



的大学。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四节 公车上书

北京宣南地区保存着我们古老首都的最后一片胡同。在其中就有一座“松筠庵”。这座外表不起眼的四合院在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参观者从未间断。院子的居民时常客串一下导游，乐在其中。

松筠庵原名谏草堂，在明朝是杨继盛的书房。杨在此奋笔疾书写成了弹劾严嵩的奏疏。现在房内东墙上还留着两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石刻，内容就是杨继盛弹劾严嵩时列出的“十大罪状”。松筠庵在清代几次修缮扩建，游廊环抱，假山嶙峋，成了文人雅士们游吟唱和、流连玩赏的好地方。光绪年间，著名画家张士保客居京城，就以之为基地，和秦炳文等几位画家联手组织了松筠画社，名噪一时。但是真正让它名扬四海的却是之后的住客：康有为。

康有为来到北京，原是为功名而来。考期里，不想中国在轰轰烈烈的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这一役，中国颜面尽失，在东亚营造千年的朝贡体系面临最后的大崩盘。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之苛刻使得北京群情激愤。

根据康有为自己编的年谱记载，他在北京义愤填膺，发起了上书活动。“李鸿章赴日求和，钗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公历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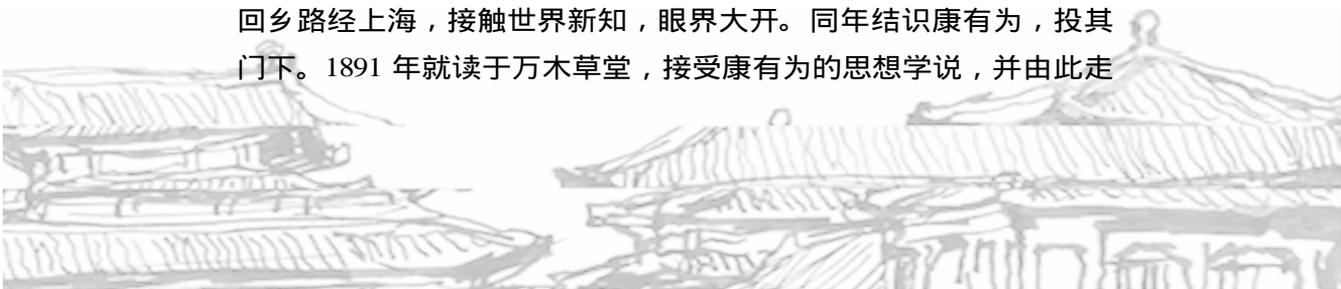


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己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初六七连日大集……至初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汶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

根据康有为自己的记载，1895年春，乙未科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的举子们听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群情激愤。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动举子们在松筠庵集会，商议上书拒绝和议。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康有为并将自己有关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也一并写入。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18省举人响应，1200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18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都察院以皇上已经签约为名，拒绝代呈。同时官府对各省举人施加了压力，无所不用之极，造成多数举人退却。上书一事未成。

在这件为后世深信并一再提起的历史事件中，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两位主角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初年学习传统儒学，但对旧学保持怀疑态度；他结合西方近代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鼓吹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形势险恶，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1891年，康有为刊印《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非孔子之经”，希望以此动摇儒学基础，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在1895年的会试中，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落榜回乡路经上海，接触世界新知，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



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实超其师，时人合称两人为“康梁”。

康梁声称自己主导并发动了大规模的上书活动，不仅“万言书”广为流传，而且社会震动，掀起了变法图强的新高潮。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影响日广。光绪帝最终启用康有为等，发起戊戌变法。两次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康有为据此活跃政坛近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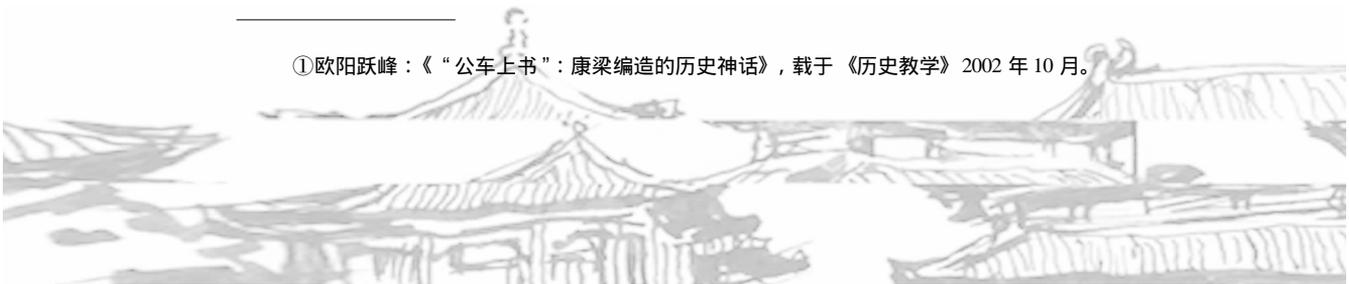
现在的历史教学书对此言之凿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公车上书的评价越来越高。

然而，一直以来还存在着对公车上书的“另解”。《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作者、晚清史学家姜鸣先生就认为传统记载大可怀疑。“公车上书”大多是根据康有为自己的记载为准的。作为当事人、日后的维新领袖、保皇首领，康有为的记叙深为人信；加上当年的北京城的确人情激昂，上书活动不断。但是根据1895年5月24日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5月2日那天，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姜鸣又引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完全没有出现过1300名举人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也证明“被拒”之事子虚乌有。松筠庵是存在的、“万言书”也是存在的，但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中国历史上根本不曾发生过如同许多史书所描述的‘公车上书’事件。”^①

甲午战败，光绪帝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朝野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不单单是康有为等举人们。在职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相谏阻”。其中，各部院台属的清流派和

^①欧阳跃峰：《“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载于《历史教学》2002年10月。



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从4月14日开始，大批官员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3、5人，多则数10人，最多者达150余人。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赢、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询、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唐景秘、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上书和言论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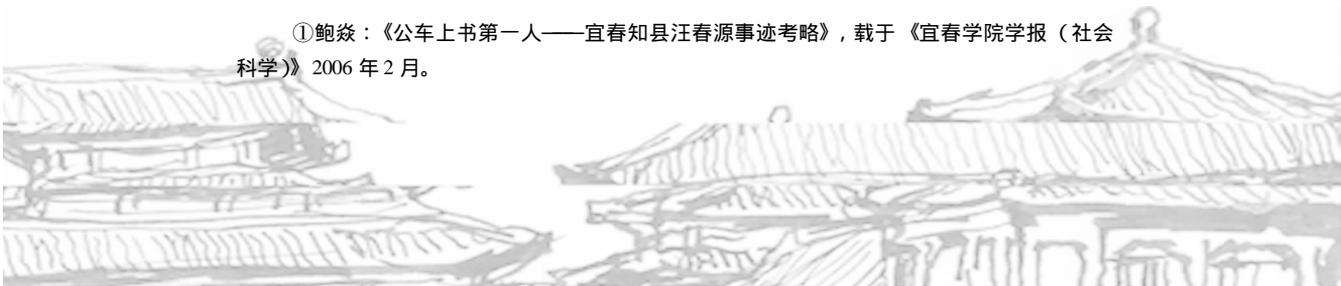
大批在京举人也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7省举人的8批公呈，签名者342人。总计各省举人自行上书有31件，共1555人次签名；另有举人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其中梁启超也加入了抗议的行业，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但他的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

康有为自己记载的热火朝天的千人大上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各省举人在松筠庵的集会是在存在的。康有为原计划召集各省举人于5月1日至3日在松筠庵连续开会3天，让大家传阅、讨论自己起草的“万言书”，鼓动大家在上面签名，而后于5月4日集体至都察院呈递的。5月1日，来者甚多。但5月2日到松筠庵开会的人已经只剩数十人了，5月3日就再没有人再到松筠庵去了。举人的退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光绪皇帝已经盖玉玺、批准了条约。当然这也和部分举人受到政治压力、对康有为的不信任或不赞同万言书的主张等因素有关。

按理，千人联署应该在经过大家传阅、讨论没有异议之后才能签字生效。但是后来连人都走光了（一些第一天同意联署的举人之后还专门派人来告诉康有为，撤回对康有为和万言书的支持），联

^① 鲍焱：《公车上书第一人——宜春知县汪春源事迹考略》，载于《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2月。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署的程序都完成不了，更不用说上书生效了。至于千人同去都察院集体上书的故事更是无中生有。戊戌变法期间出版的康有为年谱第一版和时人的笔记、报刊都表明，千人大上书最后流产了。

康有为和后世所谓的 1300 名举人可能是根据来过松筠庵参加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炮制的。它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

事实是公车上书是存在的，但康有为发动、主导的公车上书却夭折失败了。整个公车上书过程是以在职官员为主的、有举人参加的全民抗议活动。在民族危亡面前，多数举人（包括梁启超）参加了公车上书。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一些政治作用。但是康有为发起的千人上书肯定是不存在的。在当时康梁二人影响有限，更远非是运动的领袖。

松筠庵的集会只不过是 1895 年初北京城政治风波的一个小浪花而已。

但是这个集会日后为康有为所利用了。他为了提升、完善自己维新运动领袖的形象，无视原始记录和旁人佐证，悍然篡改了历史。他把松筠庵会议的时间提前到 4 月 30 日和 5 月 1 日，把上书的时间由 5 月 4 日提前到 5 月 2 日，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梁启超在其中起了帮凶的作用。也许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在之后的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后人们轻易相信了他们记载的真实性，衍生了一个流传多年的错误。

笔者在这里不继续深入到戊戌变法和之后的革命与保皇之争。我们可以从松筠庵的集会事件看出康有为个人的某些方面。对于清末一个重要政治派别的领导人，他迎合并引领部分社会思潮。但是要想成为真正的、令人尊敬的政治家，道德品质的高低是一个硬性指标。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缺陷可能给这支政治力量沾染上了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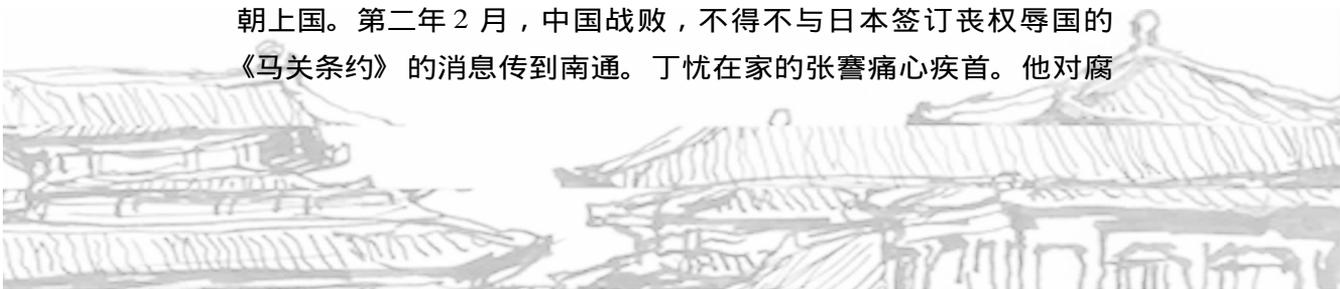
第五节 状元张謇的事业

在古今中国，状元头衔都是一个耀眼的金字招牌。多少人凭它出将入相，博取富贵。但是清末的张謇却在中年获得状元头衔后，依然抛官从商，成为了实业救国的先驱。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南通一户世代耕读之家。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不多。兄弟5人，排行第四。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3岁启蒙，4岁入塾，5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自1874年起，他先后投身于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府）、吴长庆（淮军将领）幕下。作为吴的主要幕僚，他参与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深为吴氏赏识。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之后张謇连考3次进士，都名落孙山。

1894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大寿，清朝开“恩科”取士。原本心灰意冷的张謇在父亲和伯父的催逼上，再次上京科举，不想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不想这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謇满腔义愤，积极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是抨击对日妥协投降的“清流派”干将之一。正在战争正酣时，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张謇依制回乡守孝3年，匆匆离开了京城。这一去，状元公张謇就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中日甲午战争对张謇刺激极大。昔日的蕞尔小国战胜了泱泱天朝上国。第二年2月，中国战败，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南通。丁忧在家的张謇痛心疾首。他对腐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败的政治现实异常失望，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国家富强的“另类”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张謇不得不承认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国之弱，民之贫，自然受人欺负。在走出了正视现实的第一步后，张謇认为民富方能国强，而要国家强大必须要大力发展实业。张謇依然决定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张謇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他与之前的“清流派”形象一刀两断，决心脚踏实地专心实业。作为在职官员，张謇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甲午战争国家新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昭示着之前洋务运动中实业救国的失败。张謇汲取了之前实业失败的教训，决心创办近代工厂。好在满清政府为筹措资金，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为张謇的事业提供了便利。当时的江苏父母官、两江总督张之洞正热心倡导实业，正有在苏州、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听说之前交往的新科状元张謇辞官办实业，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张謇的家乡南通地区滨江临海，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无霜期长，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而闻名天下。同时，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通州大布”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此外，从当时的情况看，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他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短，能较快地获得利益。

于是，张謇决定从办纱厂开始实业救国！

1895年6月，张謇得到了张之洞的正式支持。第二年春天，他联合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上海绅商樊时熏5人集资认股，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并选定南通城北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大生纱厂正式建立。

在纱厂运转之初，张謇就订立了严格的厂规厂约，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严肃规范。为了打破之前洋务实业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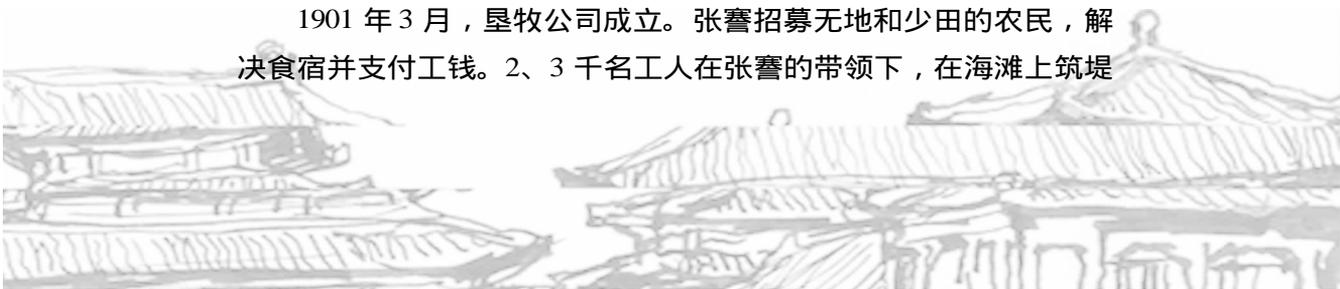
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这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高瞻远瞩，使大生纱厂成为了拥有近代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风气的资本主义企业。

但是仅仅靠近代企业观念和管理制度，仅仅靠状元头衔，离办好近代企业相差还很远。作为总经理的张謇不久就遇到了难题。先是工厂资金不够，没有购买机器的资金。张謇去找两江总督。谁知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虽然态度热情，却不愿意提供实质的资金支持，最后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张之洞将湖北方面从国外订购的一套机器转让给了大生纱厂使用，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机器运来后半个月就不得不停产了。纱厂的棉花用完了，厂里又没多余的资金买棉花。全厂停工待料。张謇当即决定先将厂里纺出的纱卖了去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亲自闯上海滩，筹措工厂周转金。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却不是状元的舞台。张謇在上海奔走两个多月，连一分钱也没借到。向老股东发出的求援石沉大海。窘迫得连盘缠都没有了的张謇，大胆地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宣布状元公将在马路卖字3天，筹集盘缠。回到南通后，张謇靠着卖纱买棉的办法，苦苦支撑着工厂的生产。幸运的是，之后几个月里棉纱售价上涨，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度过了最初的资金危机。第一年年末，大生纱厂获利达到20多万两白银。之后几年，厂子的效益年年翻番。但是没有人知道，作为总经理，张謇有时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连妻子的首饰都卖掉了；办厂的5、6年来，张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取一文钱。

棉花一再的短缺和涨价促使张謇不得不解决原料问题。为了摆脱对棉花市场的依赖，张謇决定成立垦牧公司，将南通沿海的滩涂改造成棉田，建立纱厂稳固的原料基地！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后，张謇以他的名义写一份奏章给朝廷。这份奏章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

1901年3月，垦牧公司成立。张謇招募无地和少田的农民，解决食宿并支付工钱。2、3千名工人在张謇的带领下，在海滩上筑堤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垒坝，个别碱性大的地段，工人们便开渠引水冲洗，改造土质。第二年春天，垦区各处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当牧草、芦苇渐成规模后，公司又放牧牛羊。秋天的时候，沿海会起大风暴。狂涛巨浪往往冲垮堤坝，淹没芦苇和牧草，卷走牛羊。文人出身、年已半百的张謇通常第一个冲到海边，呼喊工人们顶着风浪修复堤坝。凭着干活以身作则、与工人同甘共苦，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几年初具规模，拥有9万多亩良田，年产棉花多达4、5万担。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公司以堤划区，各堤之间都建有居室和厅堂。储物有仓库，吃菜有园圃，工人有成排的宿舍。出宿舍不远就是市场，出门有路有桥，交通十分便利。这在饿殍遍野、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了区域性的成功后，张謇并不满足。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国强。张謇始终尽力扩展事业规模，向各领域拓展。他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使整个南通成为了闻名海内外的世外桃源。1904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利和新入股的资金，投资63万两白银，增添纱锭2.4万枚，所用的机器设备等也逐步加以更新。就这样，到1913年，大生实业集团已经拥有200万两白银、6.7万枚纱锭。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开办了资生铁冶厂。此外还有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兴办实业之外，张謇一生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在他的观念里，发展教育事业是开启民智的主要手段，而民智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兴办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开始，张謇教育救国的实践就没有停止。1902年张謇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的一部分和劝募所得创办了通州师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1920年，他又将纺织、医学、农学3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图书



馆、气象台、医院、公园等，使南通成为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等。在中国近代社团活动中，他是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如最早倡议设立商会和农会，组建和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江苏教育会、中央教育会、通州教育研究会、劝业研究会、盐政研究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清末民初的政治、教育和经济社团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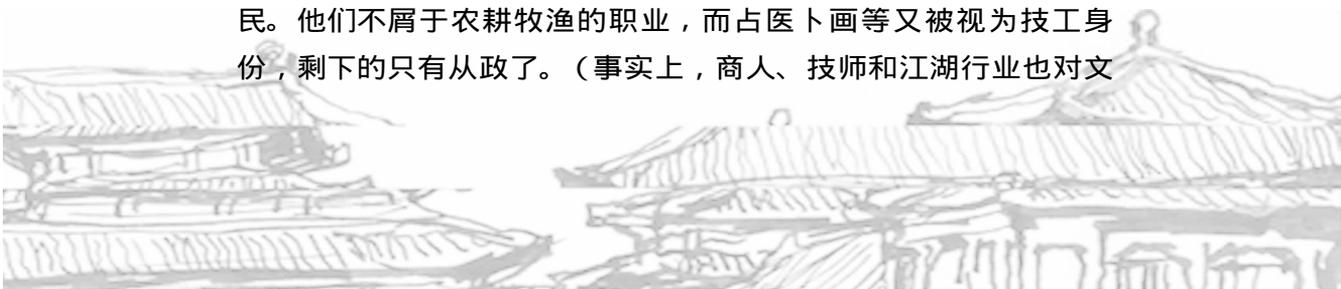
在垦牧公司各乡，张謇也创办了高等小学校，并亲作校歌。歌词是：

“噫艰哉垦牧乡，苇蒿螺蛤今梁梁，沮洳斥卤今井疆，欣欣弦诵兮，今有此乡之高堂，诟争兮礼让，椎鲁兮文章，崛起兮千辛而万苦，相劝兮日就而月将，耕田读书兮百世良，海有旭兮校有光。”

作为从传统科举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张謇对近代科技态度开明。他结合中国国情，欣然接受西方文明。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难得的春天。作为其中骄子的张謇大生集团也达到了顶峰。到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4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同时，张謇在盐、垦、牧方面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1923年，大生集团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两白银。同时张謇的大生集团在社会改良、移风易俗方面积极活跃，形成了大生模式，成为苏南地区近代化的标本和先驱。

行文至此，我们再多谈张謇取得的辉煌成绩是多余的了。我们将思考放宽到张謇所处的近代文人阶层之中，不能不惊叹张謇开创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传统认识中，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做官，而文人的出路似乎也只有从政一途。的确，文人读过书，有了学问后，总要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兼济天下，化世安民。他们不属于农耕牧渔的职业，而占医卜画等又被视为技工身份，剩下的只有从政了。（事实上，商人、技师和江湖行业也对文



天朝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人阶层抱有排斥态度。)从政也的确是实现抱负，济世优民的捷径。遗憾的是，学问不是从政的充分条件，背景、关系、实力等才是。君主专制下，君主集政治、道德、宗教大权于一身，占据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文人从政，面临着保持独立人格和服从皇权，实践理想和适应政治现实的两难抉择。有的人歪曲自身，交结权贵，甚至巴结宦官，窃取权力。华歆、冯道、冯铨等人至今不齿于士林，鲜有人去思考他们的苦衷。第二类文人就只能哀叹“文人不遇”了。他们或者身逢乱世难遇明主，或陷于党争暗斗的漩涡，或个性举止不符合于政坛。总之，文人的禀性难改，大功名自难成。这批文人往往在仕途上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艰难地洁身自好，可能在短时期小范围内能实践理想抱负，但想“达则兼济天下”是不可能的。陶渊明等人领悟了文人的两难，挂冠而去，为文人找到了第三条道路：灭迹仕途，悦老山林。他咏菊南山下，抒写自己悠闲适、不慕富贵的心境。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写出了自己一生的风雨坎坷，到头来宝剑尘封，风烛余生。“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自伤的李商隐不想放下“一生襟抱”，终生难以超脱。

张謇是不幸的，因为他身逢乱世；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所处的乱世不是一般的乱世。近代思想观念的进入，残酷的现实和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他找到了知识分子实现价值抱负的第四条道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套用现在时髦的名词，张謇可谓是现代“儒商”的始祖。客观上，社会的动荡和阶层身份的混乱、政府对结社经商的支持，为张謇也提供的条件。从40岁到70岁的30年实践，张謇似乎证明了，文人实业救国的巨大能量和成果。

因在事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中的巨大成就，张謇的后半生在全国舞台上扮演了更大的角色。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张謇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进京联合请愿，要求召开国会，成为了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任为实业总长，未就职。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辞职南归。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教



育和地方自治事业。

但是残酷的现实再次破灭了文人的第四条道路选择。张謇大生集团的成功是各方面综合作用的成果：官场支持，原料充足，民间支持。进入民国后，国家连年混战，外商在华收购原料（日本经济势力大规模在苏南收购棉花）、对华倾销（日本经济势力直接在苏南开办纱厂），而官僚和买办资本集团虎视眈眈，大生集团各企业在一战的辉煌之后，不久就负债累累。1925年7月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被债权人上海、金城等银行接管。

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起码张謇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之后的读书人启迪深远。他是晚清状元、是改革思想家、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是大教育家、是社会活动家，并几度出任官职。他最成功的是将这么多的角色融为一体。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在张謇死得的时候，平日反对他个人、反对他事业的人也不得不对张謇的逝世表示哀悼，或多或少地表达称赞之情。张謇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声誉极高的人物。

毛泽东对张謇的历史评价最为公允。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第四章 | 大人物的 小世界

一代鸿儒康有为
西学第一人——严复
李鸿章的悲哀
“床下都督”黎元洪
初见中山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一节 一代鸿儒康有为

康有为，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一个出身于破落地主官僚家庭的弱冠少年，在别的孩子懵懂之中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思索，后来写下这样一段极具想像力的话：“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这个少年就是康有为。这段话出自他的主要著作——后来被梁启超喻为“大地震”的《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像自己应做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从小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后来在青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的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 - 政治这一主旨。康有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他在《自传》中说，6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能出此豪言，不仅在于康氏的机敏，还因他生活的广东早已不是那承载潜龙的旧池子。康有为4岁时就被家人抱着观洋人镜画，时间竟然是在习旧学之前，这倒是一般家庭所难有的氛围，也是广东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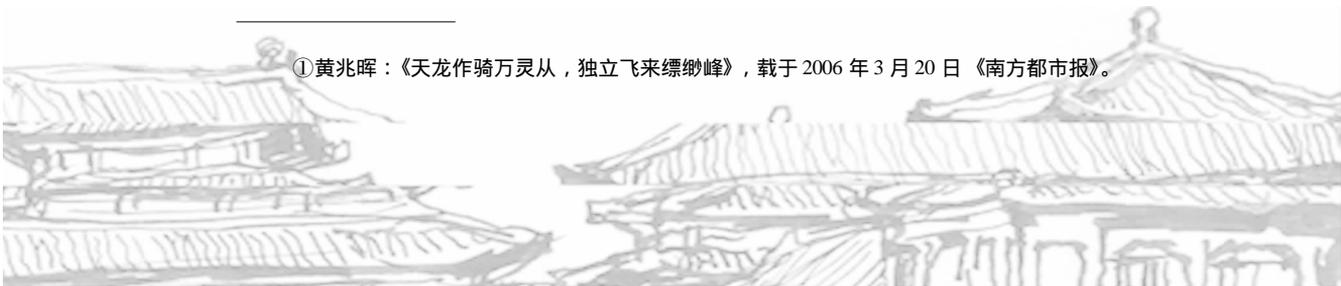


有开明地利之所在。可惜，这种幸福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11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康有为更奋发读书，冀望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19岁的康有为以《史通》的体例撰成20多页的五代史论，他的老师朱次琦喜称这简直是著作而非文章，于是康得意地自夸“乃知著书之不难，古人去我不远，益自得自信”。35岁以前康有为在科场上屡次失意，这期间他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新思想、新学问。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同时从事著述。1893年，康有为中举，两年后中进士。

长大后的康有为几乎是等同于一段历史的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回荡着他焦灼、宏大、激越的声音。他在许多方面开时代风气之先：在中国实践君主立宪制，是“百日维新”的主角；发起“不缠足运动”，迈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公然上书向科举制度发难，探索和创设“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兴办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他的《大同书》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峰，用西学改造中学，用改造过的中学来传播西学。幼年优越的家庭出身、宏伟的抱负和过人的才气，使得康有为一直保持了一种天生的自信。他从小就远离村里的伙伴，兴趣全在书上，落了个“憨为”的绰号；而与人交谈时，三句话不离“圣人”，因此又落得“圣人为”的雅号。他读的书太多，社会实践太少。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身上激发着迷人的书生气质，一种宏大的理想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默默丢失的东西。当我们今天路过中山四路的万木草堂的时候，是否会想起，那里曾经有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一位杰出老师的引领下热烈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①

而当他试图将自己的先进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大多迎来的却是失败，大如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以悲惨的“戊戌政变”为结局，被迫流亡国外；1900年的“勤王”大业，尚未布置就绪，就被张之洞打了下去；以保皇会的名义办公司，最后师生反目，公

^①黄兆晖：《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载于2006年3月20日《南方都市报》。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司破产，支持者大量流失。他的祖辈多有骁勇善战之才，他也生就了南人北相的威严面貌，可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虽然他能够开出解决时政的“上中下”三策，但是现实永远比他想像的更加现实。在变法生死关头的一筹莫展和对袁世凯的轻信，将书生救国的可怜和可叹暴露得一览无遗；而企图利用封建军阀张勋的军事力量，实现其“君主立宪”的宿愿，更是表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异想天开。

和大多数精于政治运行规则的人物相比，康有为更像是个孤独无助的“先知”和预言家。《大同书》的出世在满眼充斥着功利心的芸芸士子之中，总算留住了一丝乌托邦的想像种子，使他比同时代那些热衷经世技术的乱世富豪更多了些对未来的期许憧憬，不过这逆风而动的心绪绽放，在当时显然是个一闪而过的异数，更容易被谬评为荒唐不堪的狂人呓语。

“大同”是中国传统儒家心目中的乌托邦社会。康有为28岁开始着手制定“大同之制”，经过17年的孕育构思，在流亡海外的途中，终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座叫作大吉岭的印度小山城结出果实，完成《大同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同书》是一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百科全书。在书里，康有为将大同之世描绘为一个人性完全解放的人间乐园。在这个理想社会里，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无军队，人人都获得完全的平等、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且，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由社会安排，从属于社会，不再有家庭之累，也不会有私念之牵。因而能充分享受到人间幸福。

人道主义与快乐主义是康有为“大同社会”的原则和出发点。《大同书》综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进化论知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中充满了奇思异想。如在“大同世界”，男女相爱即可到当地的媒妁官处领取信凭，订立“交好之约”，婚约长为一年，短则不少于一个月，感情好者可以续约；男女的结合不是组成家庭，双方无财产和人格上的依附关系。

“三世说”的设计同样染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本来，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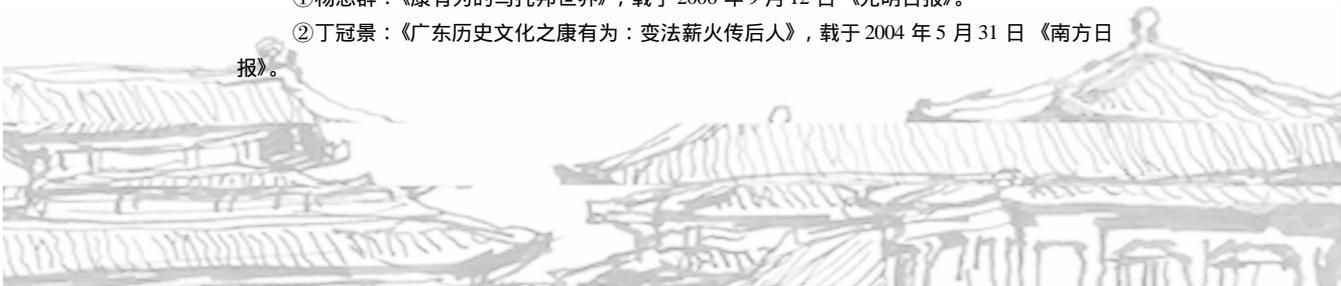
乱——升平——太平的中国历史递进公式是有先例可寻的，不过区别是古史观的治乱终极是指向三代的黄金时刻，是向后看的，康氏的“三世说”指向的却是一个缥缈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将来世界的多彩想像，以至于幼稚地把一场“百日维新”变成了检测预言的试验场。难怪那些自以为拥有后见之明的理论侏儒，或者是脑子里充满成王败寇史观的当代史家，一直不肯原谅他的鲁莽和天真。他们说对了，当康有为幻想出一个缤纷世界的同时，却注定成为一个不谙世事的行动矮人，与精于算计的湖南人相比，他确实是太意气用事，也太不切实际了。机智不羁的想像中透着自负和傲慢，使他们的政治生涯平添了些书生意气的想当然成分，虽是在政治设计上屡战屡败，但也赢得了对信念持之弥坚的美名。^①

与康有为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显然是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从物质文化层次深入触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就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来看，最为紧要的是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关键问题康有为看到了，也提出了，甚至实行了，这就是康有为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康有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论贫富安危，不论在朝在野，都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地深爱着他的祖国，思考着如何拯救和发展他的祖国。正是因为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康有为才身体力行地将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公共性与批判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每有大事，必然少不了他慷慨激昂的声音。他因爱国而讲学，因爱国而上书，因爱国而变法，因爱国而获罪，因爱国而到处流亡……诚然，康有为的思想没有与时俱进。其保皇的顽固、复辟的荒唐，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贤者讳。^② 康有为是一个从小就受到传统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愚忠”思想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康有为

^①杨念群：《康有为的乌托邦世界》，载于200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②丁冠景：《广东历史文化之康有为：变法薪火传后人》，载于2004年5月31日《南方日报》。



天朝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作为一个维新领袖，康有为的历史功绩诚然是不容否定的。问题是，维新运动在仓促中确实失败了，6名志士横死成就了爱国者之名，而他自己一溜烟做了飞毛腿，这不能简单地往“反动派”头上一推了事。而康有为自己，逃亡海外后很快变成顽固的保皇派，甚至成为共和革命的敌人。康有为的立场、能力和动机，甚至人格受到后人质疑并不过分。

康有为是一个孔子迷，终身倡导尊孔、祀孔、学孔；1912年他在上海创立孔教会，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决心把孔教会普及于全国，推广于世界；同时又主张君主立宪，学习日本改变制度。康有为的家庭生活完全是儒家专制的一套，怎能搞君主立宪？

康有为19岁结婚，1897年40岁的他看老婆无子，便纳17岁的梁某为妾。1907年康有为50岁在美国纳17岁的何某为妾。1911年康有为携带两妾到日本，又纳日本人罔鹤子为第四房。1914年冬娶廖某为第五房。1918年在杭州挟妓游湖，把妓女当西施，自比范大夫；后看中一洗衣少女，纳为第六房，于1919年在上海举行婚礼，洗衣女的两位兄弟成了康家佣人。康有为有6位夫人，生了12个子女，因小老婆没有生育，还领养两个子女。

康有为早年家道中落之后，全靠母亲勤俭持家、出卖嫁妆度日，康有为读书无纸墨。康有为出名后流亡期间，靠保皇会和宪政会供给。有人攻击他侵吞巨款，是马扁（骗），他以巨款购买各国文物，说是开发民智，搞展览，最终归他私有。

康有为的哲学是“主乐派哲学”——主张及时行乐。他竭力追求物资享受，在吃喝玩乐住上都追求高标准。他雇佣了大批佣人，其中丫头5人，老妈子5人，男雇员30余人，他在上海的家常住人口达60人，流动食客多则30余人，少则有10余人。每天在



家就餐的人多达 80 余人。4 天吃一担米，仅伙食方面的采购就要用汽车去拉。

他食不厌精，讲究营养，即使下乡也不马虎。据当年的人回忆，康在乡下的家中，中午要吃八大盘八小盘，康有为喜欢吃鸡蛋，一次可吃 10 个蛋。此外，他在杭州、青岛有两处别墅，别墅的留守人员达 10 人以上。每月的经常性开支达 3000 大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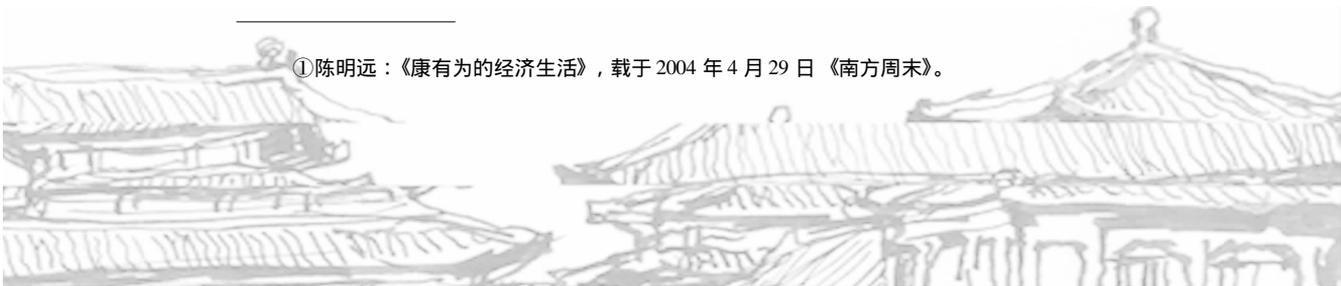
康有为晚年十分迷信风水，热衷于扶乩问卜，他购地建屋、修墓时，都会因风水而行。1916 年起，康有为几次去江苏茅山，看到几处地方风水很好，购了几百亩山地，作为母亲劳连枝、弟弟康广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在墓地之外，他在茅山句容县（现为居容市）还看好一处风水宝地，于是开辟了一个农场。可是他办的茅山述农公司（取其祖父号述之的“述”，取其父亲号少农之“农”）并没因了风水而沾上财气，最终失败。^①

1913 年康有为送母、弟的灵柩回家的场面，空前壮观。香港督派 100 多警察护送，广东省派兵舰 2 只迎于海面，都督率军警千人，民政长官率百吏继之，绅士千数，丧轮抵家乡，众宾数百，观者数万。如此排场，招待费和给军警的赏钱要多少？康有为承认仅 1919 年的丧葬费支出就达 3000 大洋。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

康有为的功利，首先表现在对权贵的巴结。1888 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乡试时，“遍谒权贵”，以求上书推进变法，结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们拒绝。一方面，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为保守的满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面，他的阿谀奉承，“嚣张卑鄙”也引起了官僚们

^①陈明远：《康有为的经济生活》，载于 2004 年 4 月 29 日《南方周末》。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166

的反感。当时的京官们都觉得康有为是“托名西学，希图利禄”，过度热衷功名。1895年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已经是名满全国的维新领袖，他带领弟子梁启超建立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表面上看，他成功地网罗了一批重要官员，组成强学会的几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权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赞助强学会。但据康有为本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记叙，他很快就失望地发现，开明官僚如丁日昌、张之洞的赞助不过是想“籍以渔利”而已，也就是说，尽管康有为刻意巴结高官，他们却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并非改革的忠实盟友，张之洞后来的翻脸果然也证明了这一点。^①

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思想最先进的地方，拥有众多热情支持变法的绅商富贾。康有为当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支 持。但据启蒙思想家、广东籍的上海绅商郑观应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指出，“沪上强学会，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办事者无条理，不允选举商董协力维持。”商人出了钱却不能参与管理，岂不 等于是冤大头？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而当时上海绅商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变法，但对康有为个人的评价并不高，对变法的成功也并不乐观。康广仁曾经劝兄康有为“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在即将接受光绪皇帝召见前，特地面晤郑观应，问，“政治能即变否？”郑当即指出，“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可惜康有为哪愿再等3年？当时旁观者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势，康有为却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掷，其政治头脑和能力不待后世批评，就已有定论。但是，郑观应

^①伍国：《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载于2006年4月9日《世纪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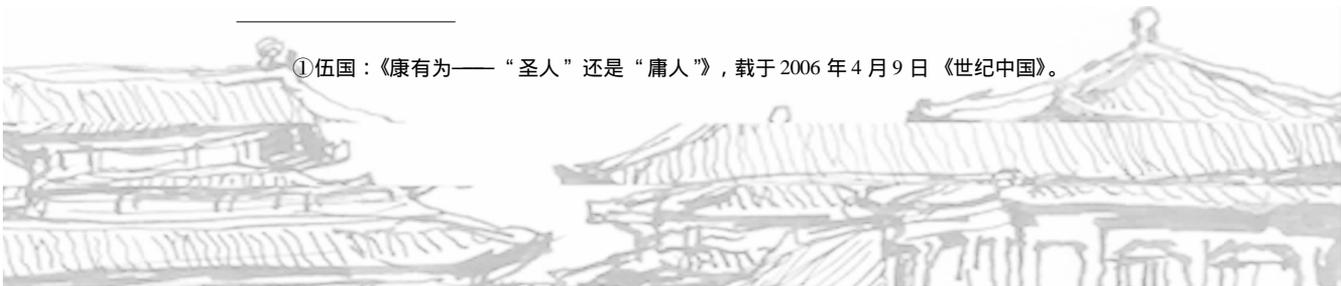
仍然在变法失败后努力保护康有为在上海的弟子，并送给避难于澳门的康有为之父 100 元。在康有为流亡海外后的 1900 年，正是上海的绅商发起一系列政治活动，试图阻止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阴谋，其中上海工商界领袖经元善还因此被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澳门。立宪运动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国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维新的康有为只注意日本的体制变革，而忽略了其社会因素，他似乎没有弄明白，在日本维新成功背后的，正是企业精神的勃兴，工商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康有为面对中国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却不去争取，其势利和缺乏远见可见一斑。^①

最初经张之洞介绍后结识康有为的经元善对康有为的印象也并不好。经元善在致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

“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

这封信中暗示出这样的情况，康有为先写一信给经元善，对维新运动的推动不力大有抱怨不满之意，经元善则在回信中明确指出康有为的缺点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说，10 年前康有为在北京的时候，京官们对他的负面评价可能是守旧者的偏见和误解，那么一个支持变革的上海企业家表达完全一样的看法，就只能说明这是事实了。而“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点明了康有为当时的真实处境，除了几个后生晚辈把他奉为“圣人”，摇旗呐喊，在新旧两面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支持者（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坚定性和否定皇权专制的彻底性早超过了康有为，最铁杆的梁启超后来也一度接近孙中山，差点弃康而去！）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 40 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

^①伍国：《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载于 2006 年 4 月 9 日《世纪中国》。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对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和后来的保皇活动持怀疑态度的，还不止上海商人。当年在日本军校留学的阎锡山读了康梁编辑的杂志后曾叹息，“保皇党岂足以救中国？”后来成为革命党人和伟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经也是维新派争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当即拒绝了维新派的邀请。罗家伦曾经当面请教蔡元培当时为何拒绝，蔡从容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令罗家伦多年后仍觉“言犹在耳”^①。

“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②

胡汉民在自传中也有专文论及康有为和戊戌维新：

“康有为生长广州，聚徒讲学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惟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盖康居乡，为土豪劣绅之所为，热中奔竞，行不践言；治学则剽窃武断，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故当时对之，绝对不生一种信仰……”

看来对康有为的好大喜功，时人均有所感，而在治学上的“剽窃武断”，在后人的权威学术著作中则得到完全证实，并非是因政

① 伍国：《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载于2006年4月9日《世纪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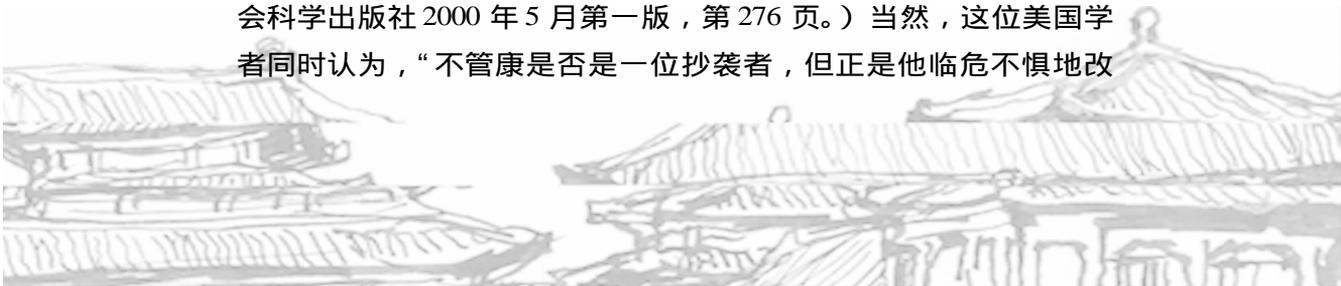
②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见之争而起的诋毁。梁漱溟在 1921 年口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言时说，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评了許多人，“却是除康南海外，其余的人我都尊重”。何以康南海被摈弃在外，不值得尊重，梁漱溟倒没有明说。但史学大师钱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关于康有为的专章里讲得就很明白。他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论著之一《新学伪经考》直接继承自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但康本人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廖平本人对此也颇为不满，认为康有为是在与他谈话，并读了他的著作之后，只一年时间就推出了伪经考，明显有抄袭之嫌。廖平甚至专门致书康有为，批评道，“……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注：此为廖平笔误，应为郭象，汉代人认为郭象剽窃向秀）之谤。”章诒和对康有为有句精辟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

这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 1886 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 1891 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 1897 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第一版，第 276 页。）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变了历史。”

回顾这一生，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关系。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人，比起芸芸众生，他多了份深邃，也就多了份忧患；他多了份清醒，也就多了份苦恼和烦闷。中国为鱼肉，列强为刀俎，“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国家危难，他不忍自弃，明明“《治安》一策知难上”，偏偏“只是江湖心未灰！”一声长啸，足以振聋发聩，奈何宫禁九重，上帝无言，百鬼狰狞，一个读书人的呐喊，在那个噩梦般的世界里是那样的微弱。所幸后来被有意励精图治的光绪帝起用，他也算“李将军遇高皇帝”，如果光绪帝果真能按照他的想法“乾纲独断”，“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能否“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从而改写历史也未可知！怎奈上下制约左右掣肘，积重沉疴，已非人力可为。有心图强、无力回天，本来应有的一段管仲齐桓、张良汉高祖般的君臣佳话，刚刚登场，就被群小轰下台去。一代大家，到头来也只能“土室抚膺，闭门泣血”，经国济世的抱负，眼看着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康有为仍然力主改良和维新，即使辛亥革命帝制被推翻他仍抱定自己的信念，被后世讥为满清遗老。尽管笔者也不苟同他的愚忠，但笔者佩服他作为一个文人的特立独



行，至少他比那些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墙头草、应声虫们强之百倍。

不管康有为自己、他的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是否将他（自己）看成是圣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作为，与先秦的那位孔圣人何其相似：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不愿屈从于主流权势的自由意志，他们同样因此如同丧家之犬到处流浪去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论他们的政治观是维新、是改革、是进步、是保守、是复古、是倒退，他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思想、理想与自由意志并为此热血沸腾地奋斗和惊天动地过。虽然这种兴奋不免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过于天真和不合时宜，在虽已日薄西山但犹作困兽斗的专制政治的强力下不堪一击，从而碰得头破血流，但毕竟曾经像人一样活着过。这些，难道不能使那些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地屈从于主流权势并为之保持高度一致、活了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人感到脸红和汗颜？从这种意义上看，康有为又是一个“圣人”。中天的太阳也有垂薄西山之时，驰骋沙场的斗士也有人老体衰之日，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当一个斗士老了时，还能要求他怎样？

生在晚清，是康有为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正是无边的混暗，衬出了那一点灯火的光明。

不因立于危墙之下而退身苟且明哲保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苟利社稷，不避生死。这也许就是自古以来有良知的文人与腐儒和犬儒的区别吧。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二节 西学第一人——严复

1877年，一艘开往英国的轮船上，一位青年伫立船头，遥望着西方的世界，若有所思。他心里有很多疑问：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今日何以沦落到受尽欺凌之境？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又何以如此富强？

他是幸运的。他获得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都不可能有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身心去亲自领略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进而得以回答萦绕在他脑海的问题。此次留学播下的西学种子，更是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他，就是严复。^①

严复之所以能获得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留学机会，不能不提及他少时所受的传统教育和洋式学堂训练。

严复的父亲严振先是当时的名医，像当时所有的士绅家庭一样，父亲希望严复能通过科举成为达济天下的儒官，就让他自幼跟着他秀才出身的胞叔严厚甫读书，严复学习很勤奋，1865年，严复才9岁，严厚甫就已经无书可教，因此严复的父亲严振先不得不把严复送到“宗彝书馆”里去发蒙。“宗彝书馆”的教师黄少岩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很有学问，“汉学与宋学并重”，在他的教导下，严复了解了宋、元、明三代杰出思想家的处世态度和思想精髓。但教书的环境却非常差，特别是教室设在一个戏班的楼上。上半夜戏

^①重林：《严复：传播西学第一人》，载于2004年10月26日《现代日报》。



班经常要彩排，免不了锣鼓喧天，严复只得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掩着耳朵读书。黄老师见他艰辛，便劝他说：上半夜先睡觉；下半夜等戏班彩排结束后再起来读书。以后严复果然都在下半夜起床做功课，一直到天亮。但不幸的是第三年黄少岩就逝世了，第四年，正当严复沿着父亲所希望的道路前进的时候，不幸再度发生，父亲也病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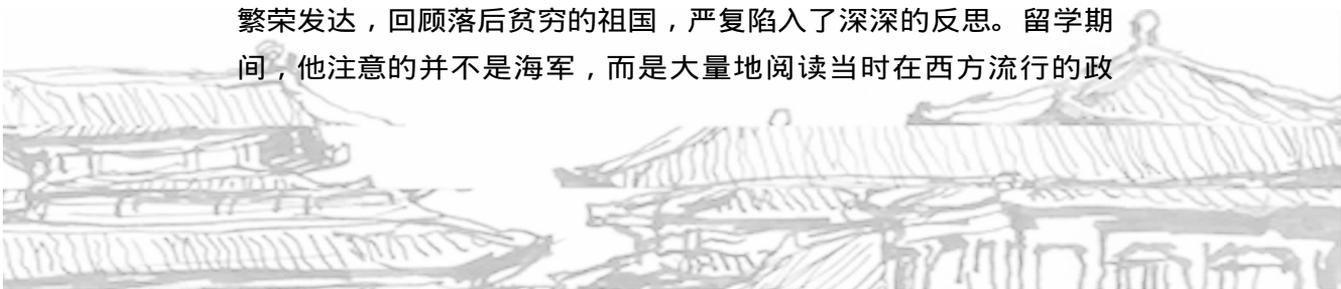
严复先失恩师，后失严父，不但少年失怙，而且经济受到严重的威胁，失去经济支柱的家庭陷入困境，严复只好放弃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之念，不得不报考“公费”的马尾船政学堂。因为他的古文基础非常好，便考了第一名，以后他学习的成绩也屡列优等，不论是月考还是大考，都得了许多奖学金，寄回家去帮贴母亲维持生计。也因此得到钦差船政大臣沈葆楨的赏识。

刚进入学堂的严复内心充满无奈和痛苦。令严复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所接受的教育会影响他一生。他学外语，学西方近代科学，打下了很深厚的根基。

1871年，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到“建威”练习舰上实习；一年后，他被调到“扬武”兵舰。在这里，严复的学识和操作才能得到“扬武”舰英国籍教习托莱西的高度赞扬，在他的帮助下，严复获得了赴英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应该注意的一点是：父亲病故后使严复早早背上了家庭的责任，因为家境贫寒而不得不报考在当时并不被世人重视的船政学堂而去学习西学。出人头地的愿望，也许就是在那时于严复的心中扎根。然而，以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官，而是天生的学者、思想家的材料。严复一生恐怕都是游走于这两极之间。严复性格上的软弱，以及早年不无激进主义色彩的变法主张，和他早年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人们是不应忽视的。

从严复留学英国开始，他就十分注意研究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来拯救已经像一滩死水般的中国。在英国，严复看到了它的繁荣发达，回顾落后贫穷的祖国，严复陷入了深深的反思。留学期间，他注意的并不是海军，而是大量地阅读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政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治、哲学名著，像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等，试图从中探求救国的真理。博览群书以及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真地考察着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对英国得以崛起的思想根源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求得答案而热切地探索着……资本主义的政教文明在他脑海里扎根，君主立宪、自由平等以及达尔文、斯宾塞进化论思想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严复在海外留学的生活也是很勤奋的。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期间，他同样“考课屡优等”，同时他花更多的时间到伦敦图书馆阅读大量的资产阶级哲学著作，还深入社会考察调查，到法院旁听审判，等等，了解和比较英国的社会制度，其学问无人相匹。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是一个十分有学问，也十分自恃的人，但独独钦佩严复的造诣。他对朋友说，只有像严复这样的人，才最有资格出使英国。他自己是很惭愧的。以后严复回国，郭嵩焘特别写信给清政府，力荐严复的学问，请予重用。

两年后，严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国海军大学，回国后在船政学堂担任总教习。1890年，严复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此时的严复，书生意气，“往来于京津之间，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他议论朝政，指陈时弊，往往鞭辟入里，在封建士大夫中声望越来越高。严复毕业回国，是抱着一心救国的伟大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但腐朽的清王朝根本不懂得发挥严复的聪明才智和专长。在北洋水师学堂20年，才从教员升为校长，严复的才能无法得到施展。中法海战失败，严复另谋出路，4次参加科举不第。

不久之后的一场战争，让国人颜面扫地，更惊醒了严复。严复才从科举的噩梦中惊醒过来。通过译文，大声疾呼，从事维新运动。从此，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位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所竭力呼号的教育救国“要道”，毫无反响地变成孤鸿哀鸣，消失于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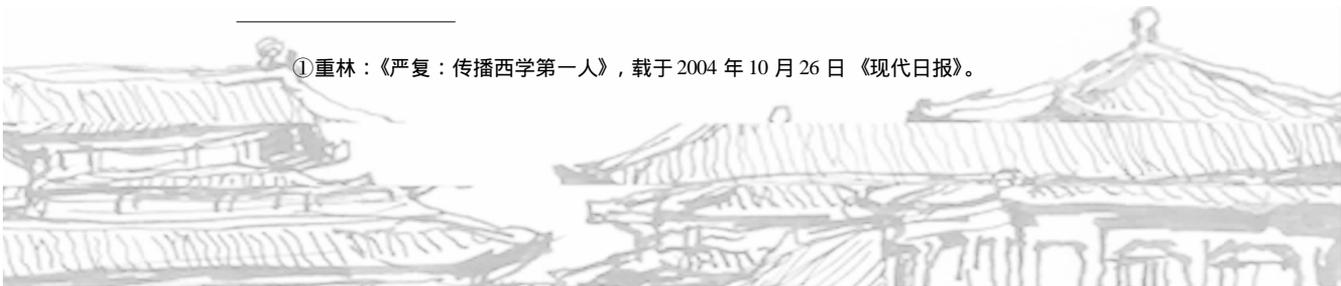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向西方学习不到30年的日本，竟然打败了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主张要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洋务派官僚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但是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还很肤浅。他们只知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不知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迅速崛起。他们已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它的政治制度。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宣传、效仿西政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革新运动。然而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还是局部的，不可能深入。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正处于所谓“学问饥荒”状态。那时西方的理论著作还没有完整地翻译介绍过来，有些人不懂西文，不能直接阅读原著和亲知西方文化，深感心余力绌。而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是多么迫切地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等著作作为理论指导。严复正是在此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面对战败屈辱的局面，严复站了出来，向社会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五千年文明古国面临历史选择，一任固步自封坐以待毙，还是改弦易张死里逃生？

1895年2—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大声疾呼，连续发表了5篇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道德以及风俗一一进行对比，指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①

此后，严复的活动重心由海军界转向思想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转变。在此时期，他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译著《天演论》，即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达尔文用大量事实阐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

^①重林：《严复：传播西学第一人》，载于2004年10月26日《现代日报》。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著的《天演论》，是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著作。他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存在着生存竞争，只有强者及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同于生物界，但是由于生物进化论概括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普遍法则，也是适应人类社会的。严复介绍和宣传进化论，正是要人们认识到这一普遍法则，认识到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前进，中国只有发奋图强，才不会亡国灭种。当时正处在民族危亡时的中国，凡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在苦苦思索、探寻着中国的出路。《天演论》的出现，很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接受，为他们变法革新的合理性提供了思想武器。

但严复在翻译此书时，只取了其中“进化论”部分，用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代替赫胥黎的伦理学主张，同时又抛弃了斯宾塞“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采取了赫胥黎“与天争辩”的积极观点。严复翻译西方著作（《天演论》、《法意》、《原富》、《自由论》等）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国人发出祖国危亡的警告，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天演论》进行了大量的取舍和改写，在书中，严复自己的按语竟然有三分之一之多。《天演论》中阐发的思想，并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却有不同一般的反响。这一方面是严复在翻译时，没有生搬硬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另一个是这一理论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对维新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严复宣传进化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但这是次要的。他介绍、宣传的西方先进思想，不仅在戊戌时期对改良派发挥了重大的启蒙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几代青年爱国者都有着启蒙影响和作用。

在书中，严复宣扬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阐明中国若顺应天演规律，变法维新，就可以“自强保种”，反之则会“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严复希望让民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书中，严复还激励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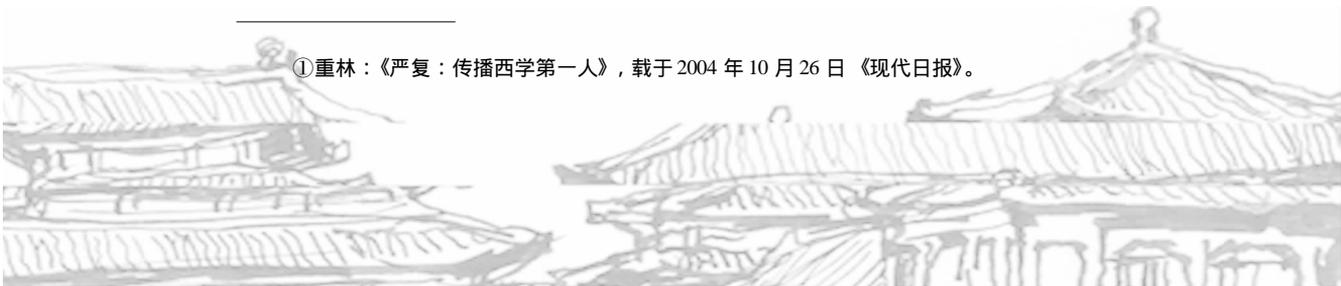
的斗志，强调“变法必可成功”。

严复还主张西方民主，并对西方民主作了多方面的宣传。他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中西社会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例如在政治上：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在经济上：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娱。在文化上：中国美谦屈，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通过这种比较，严复认为，强国要政有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他与夏曾佑、王修植一起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提倡西学。严复办《国闻报》，翻译《天演论》，都是抱着爱国主义激情来唤醒国人，力图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挽救中华民族。他的思想活动和所有启蒙活动，就如严冬后的春雷，惊醒了沉睡多年、做着帝国美梦的国人，点燃了中国新思想的火种^①

这些崭新的观点和语言，开拓了中国思想界的眼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不得不承认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人”。胡适说：“（《天演论》）是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中国的思想界为之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中国的爱国者为之奔走驰命。于是维新变法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以说，严复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以他翻译的《天演论》，第一个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来，震醒了中华民族，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维新改革运动，挽救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严复睡在中国历史的摇篮上，酝酿着爱国之梦。他从西方盗来《天演论》的火种，燃烧着整整的一个中国，使中国人民在火光中觉醒，也在火光中得到新生。

严复本身也身体力行地参加具体的维新活动。他除了发表大量

^①重林：《严复：传播西学第一人》，载于2004年10月26日《现代日报》。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鼓吹维新的文章，还上书光绪皇帝，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案，并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维新没有成功，但严复《天演论》的火种已成燎原之势，促进中国的革命和进步。

在经历了变法维新失败、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事件后，严复从政治活动中“撤离”。此时的他，思想上趋于保守。在文化观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以引进西学为前提，建立以儒学为主体意识的新时代的文化体系，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但严复的回归不同于纯粹的复古派，因为他始终对西学持肯定态度。严复是一个对传统有深切的了解而又“得风气之先”的人，他谈到中国的古圣人崇古并非是不相信人有无限的潜能可供开发，而是有“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终将不足的深长忧虑，加上“和谐”价值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古圣人视“争”为“人道之大患”，“故宁以止足为教”。假如“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中国即使不能说达到“郅治”，也还是可以“相安相养”。但事实是这些东西都已经来了，中国不能不变，怎么变的问题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都沉淀于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之中，中国必须修古而更新之，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才具备可能性、可行性。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能抛弃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和思维模式，要注意振奋民族精神，呼唤民族意识。虽然严复在一些主张上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提出的这种中西文化融合观点，对于我们建设当代中国文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思想界严复是一位学习西方的大师，在家庭生活中，他也贯彻着西方的教育理念，是一位开明的慈父。在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严复却对儿女一视同仁，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儿女的健康，一年四季的饮食起居，严复无不牵挂。春天气候多变，他向儿女们交代：“春气越发，极易生病，善自节宜为要。”秋天西风四起，则提醒：“秋风戒寒，早晚起居，格外谨慎。”冬天将至，就汇专款给儿女添置皮袄御寒。为了预防天花，嘱咐家人请医生为他们种牛痘。当他得知三儿子因困坐勤学致病，就忠告“须



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并即“令此儿晨起每日出户一点钟狂走”，逼他晨跑锻炼身体。他惦念在北方的大女儿尝不到平日爱吃的家乡风味——油酥肉松和调味鼓油，总是尽力设法购寄。

严复留给历史的遗憾在于他晚年偏离了理性原则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进而失去学者的风范去豪赌、吸食鸦片，进而党附袁世凯、走向神秘主义。除却种种光环，严复的性格当中也潜伏着致命的缺陷——偏激，正是由于这一点，严复在晚年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

严复的留英同学中，有很多著名的大人物。伊藤博文学成回国后得大重用，一举改变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胞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也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但他自己却仕途不顺。原因跟他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有关。他的思维超前且喜议论，使得了解他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除此性格缺陷，他的私德也不“乏”可议之处。他意志消沉即吸食鸦片烟，李鸿章得知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①

但是严复并没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他1919年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与熊纯如书》）读史每及于此，笔者不免伤痛不已。

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某种妥协，或曰对现实的过分看重，严氏也

^①余世存：《偏激的严复》，载于2006年6月29日《新世纪周刊》。



清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面——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不可能脱离现实利益的物质诱惑。在1900年以前和清亡民初前后，为维持一笔不菲的家庭开销和吸食鸦片的消费，完全依靠稿费 and 版税来支撑生活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严氏嗜赌的恶习，牌桌上也不可能永远是赢家。不过在赢得一次豪赌后，严复实在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又陵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水师学堂总办大可不做矣。”在这喜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把人生一切都看透了之顽世的严复。人人皆知晚清另一文化巨人梁启超酷爱麻将，但是却没有梁氏一度千金、万金的记录，倒是梁氏的许多妙文奇思却是在麻将桌边完成的。在辛亥革命后到袁世凯和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这段时间，严氏党附袁世凯，除去政治上的原因，是否与严氏的经济需求相关，笔者尚未看到与此相关的材料，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但猜测很可能与此有一定联系。

至于严复晚年喜好老庄、笃信迷信而走入神秘主义一端的癖好，更是为世人皆知的事实。在严氏日记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到类似于“博戏”、“占财”、“占升官”、“问流年”、“占妹临产吉凶”、“占出外贸易”、“占婚”、“占出行”、“占谒贵”、“请丹”、“服罗真人符三道”的记载，从呼唤变法维新到不无激进主义色彩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再到清廷行将灭亡时个人地位的窜升和各种名誉的纷至沓来，严氏的确失去了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批判精神。笔者不才，认为个体境遇的好坏和其批判意识的强弱往往成反比，尽管在思想的掩盖下似乎是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追求，但是体现在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严氏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高尚从来也不可能脱离开世俗而独立存在。

这种偏激的个性担当了为同胞开智启蒙的大任，自然执于偏见而不自知。孙中山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惟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



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因此回答了那句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我们看英美革命、法国革命，都可以看到启蒙思想为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我们于此段历史公案可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天不足，思想家跟执行家并不一致。^①

严复的思想偏激还表现在他的性命无归，他在激进和保守两极跳跃。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中法战争后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便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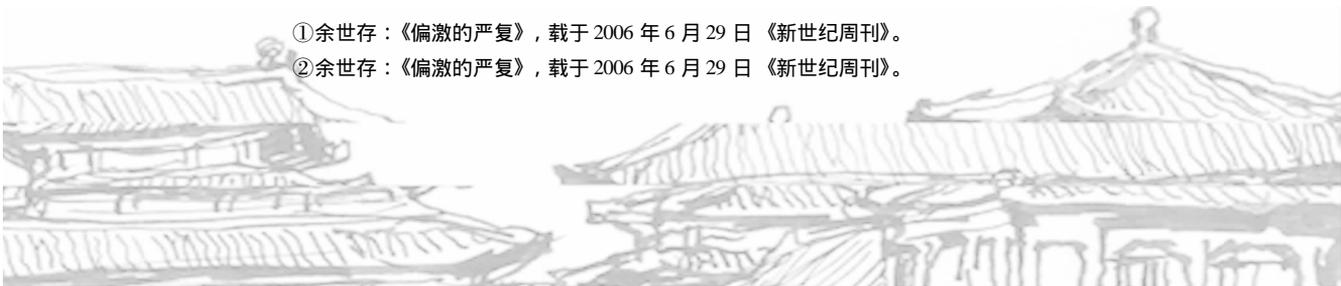
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乃顺理成章之事。五四运动时，他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

晚年，严复怀着苦闷至极、郁郁寡欢的心情，回到老家福州，住在南后街郎官巷寓所。每日除“看云听雨”，“临池遣日”外，“浮休齐得丧，忧患塞乾坤”。深重的忧患意识时常伴随着他，并在诗篇中流露出来。“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1921年，严复面对“落日青山一片愁”无可奈何地赍志而歿。临终时，留下了“须知中国不灭”这句爱国名言。

他的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敦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

^①余世存：《偏激的严复》，载于2006年6月29日《新世纪周刊》。

^②余世存：《偏激的严复》，载于2006年6月29日《新世纪周刊》。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由此可知，严复的启蒙思想家一称实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

回顾历史，严复曾经是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他主张引进科学、民主和西方文化；他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尽管他后来退化为保守者，却依然对国家命运和中国文化前途非常关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他第一次建立起中西哲学汇合、以近代科学为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严复不仅是一位教育家、翻译家，还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思想家。

当百日维新失败后，当“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溅洒菜市口土地之时，严复曾以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戊戌八月感事》一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在诗中，思想家的愤怒、伤痛、悲叹和决心溢于言表。据记载，“孔子……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因“讳伤其类”，当年的孔子临河而退。思想家引此故事表明自己并未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心灰意冷。可惜的是，在日后的岁月里，思想家并未以这一决心坚定地走下去，而是给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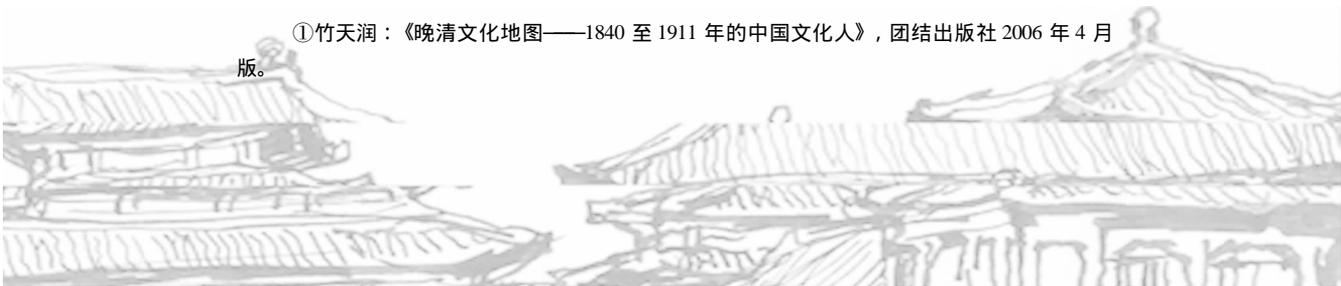
史平添了一丝遗憾和恨意……^①

第三节 李鸿章的悲哀

李鸿章是 19 世纪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显要人物，他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灭亡的全过程。可以说，不了解李鸿章就不了解近代史，所以，很多名家对李鸿章都有评价。康有为称李鸿章为“维新之同志”；日本人说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说李鸿章“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讲堂录》中评价他：“水浅而舟大也……”当然，也有更多的人评价他是一个大卖国贼，是个崇洋媚外的典型人物。

人物的功过是非一直难以盖棺论定，这是不足为怪的。尤其对于像李鸿章这样牵扯到大是大非之人更是如此。李鸿章可谓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 40 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

^①竹天润：《晚清文化地图——1840 至 1911 年的中国文化人》，团结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有愧于国家，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死后均遭世人唾弃。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辩之理，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笔者是安徽人，曾参观过合肥李鸿章的故居，在故居的展览中，记录着李鸿章一生创建的许多“第一”：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第一次设立工兵制度；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次仿制后膛枪；第一个官费派留学生；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条自建铁路；第一次设立电报局；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这其中包括1873年李鸿章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就是它，在初办的3年多时间里，使外轮公司损失1300多万两白银，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因不堪赔累而被招商局归并。创办民用企业与洋人争利这难道也是“民族败类”所能为？从影响上看，李鸿章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作用。也许会有人说洋务运动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统治制度，只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维护封建统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李鸿章作为一名清廷重臣，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位置上迈出社会变革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是一次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样的一步，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将不会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将难以起步，诸多国外新文化，新技术将无以探入国门，诸多才子志士将无机会留学海外，报效祖国。可见，李鸿章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把“民族罪人”的字眼贯之于李鸿章的头上，是否合情合理，不言而喻。

李鸿章并不是一个见识短浅的人。相反，他对于时事还是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的。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里曾谈到他对当时中国的局势的看法，足以说明李鸿章对整个大清帝国危机的认识



是很清醒的，他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很大了。他也委婉地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变革：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媾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方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力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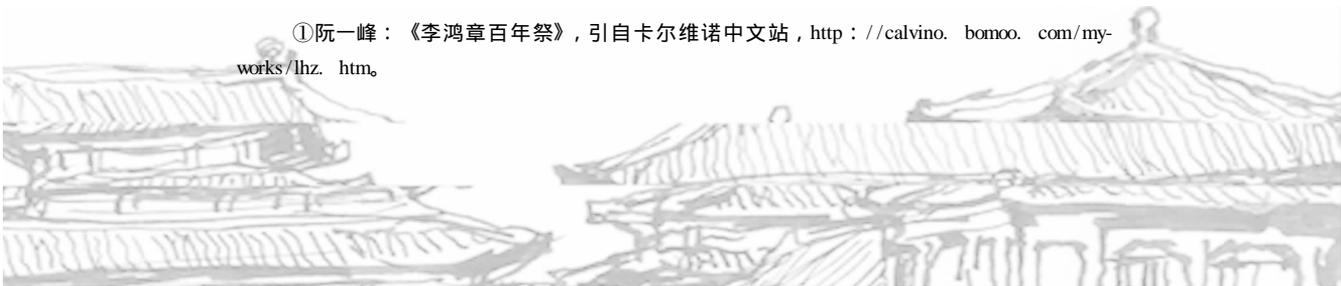
从这个奏折可以看出，虽然李鸿章没有明说，但实际上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进行从未有过的“现代化”运动。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李鸿章。于是，他办洋务，兴工业，新教育。

对于他的这些举措，梁启超称“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美国总统格兰特退休后周游世界，称李鸿章是他遇到的“四伟人”中的最伟大者（其他3位是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法国总理甘必大）。

但是这些措施，在他生前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反而因为耗资巨大，使李鸿章备受朝内“清议派”官员的抨击。一旦甲午海战失利，李鸿章的下台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措施的意义极其深远，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社会。也许李鸿章并没有想到，20世纪中国现代化采取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实际上是由他开创的。^①

有着长远眼光的李鸿章对个人生活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在这个方面，他是无可指摘的。李鸿章的生活很简朴，酒量尚可，午餐喜欢喝两杯。他喜抽水烟袋，对鸦片十分痛恨，经常组织各地戒

^①阮一峰：《李鸿章百年祭》，引自卡尔维诺中文站，<http://calvino.bomoo.com/my-works/lhz.htm>。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烟。史料记载，严复在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吸食鸦片，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李鸿章为政也比较清廉，死后没有给后代留下多少财产。

王树增先生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事实上，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主持晚清朝政以来，就一直饱受上下官员的责骂，甚至是辱骂。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对李鸿章来说，最重要的1894年来到了，扭转了乾坤。这一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轻易全歼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举国哗然，纷纷指责李鸿章指挥有误。李鸿章的仕途开始走下坡路，自甲午战争始，人们就一直在指斥他：战前，一味对日退让；战端既起，多年经营的战备不堪一击；战败后，亲赴马关求和、签约割地赔款，“由误国而卖国”。甲午战败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屈辱，也使李鸿章成了汉奸的典型。而梁启超则指出：“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掣肘者半，由于李鸿章之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半”；并借西方评论感叹道：“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此言自非赞叹李氏之英豪，更是讥讽满清之衰朽。史学家分析说：因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以及主战派翁同龢等对李“借事倾陷，乘机排挤”，满清未战已“先呈败形”。这实在是为李鸿章好好地鸣了一把冤！以他一人之力，怎能独支将倾之大厦呢？不管最后结局为何，这一份忠君报国之心不变！

而且不容辩解的是，如果没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就不会存在。是他建议成立新型海军的，是他千方百计保证供给海军军费的，是他派出国培训海军将官的，他自己也要亲自到码头查看舰队从国外购进的每一艘铁甲舰船。可就是这样一支他花费无数心血培育的舰队，到头来却被曾经弱不禁风的日本轻易地打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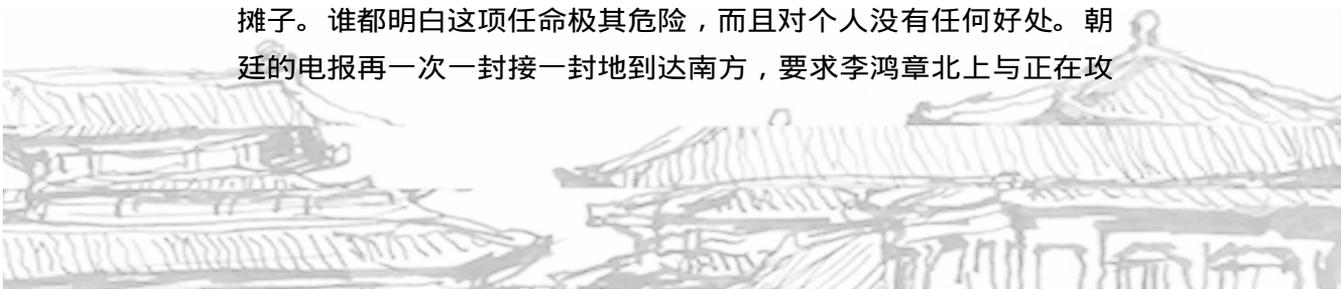


李鸿章的作战指挥失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吗？即使换了一个人指挥，甲午海战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在那里撑着，中国的战败也许在很多年前就发生了。至于为什么要李鸿章来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其实很简单：清政府发现偌大的中国除了他竟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谈判的官员了。可怜的是李鸿章竭尽全力做了无可奈何、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之后，得来的全是骂名。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6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只说了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这么一句回答，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战，削减战争赔款1亿两，最后两害取其轻，毅然签署了《马关条约》。

他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固然是无法让人原谅的，但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梁启超语），这样的结果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

可以说，甲午海战失利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对李鸿章的打击是致命的，李鸿章一度成为国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卖国贼。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一身伤痕的李鸿章于1895年4月回国了，却发现他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清政府指责他办事不力，同僚说他丧权辱国，老百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实职。

对此，李鸿章的回应是不予解释和抗辩，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没有想到，再次陷他于不仁不义的时机紧接着到来。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际才想起了77岁下台近5年的李鸿章，命令他赴京主持与八国的谈判，收拾北京的烂摊子。谁都明白这项任命极其危险，而且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原本可以在南方观望时局，可他却不计77岁高龄，于1900年7月，拼着老命应诏到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据时人记载：“京师陷，中外皆延颈望和”，“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不但崇拜他的人颂扬他此次议和有“扶危定倾”之功，使自己“黄花晚节，重见芬香”。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为“当代第一伟人”，“不独朝廷倚之为长城，即中外人民无不望之如山斗”，此次进京，“中外人民莫不举手相望，以为和局指日可成，銮舆指日可回，旋转乾坤，非异人任”。（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48页）

由此，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实是为国捐躯！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据说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一个月后，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6项原则来进行议和谈判：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原则严重损害了大清国国家主权，李鸿章已经意识到列强犹如“虎狼群”，他更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病势严重。在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之后，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



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气力进行惩办问题的谈判，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的场面是他无法接受的，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没有答应，普通的官员就不是他能力所能及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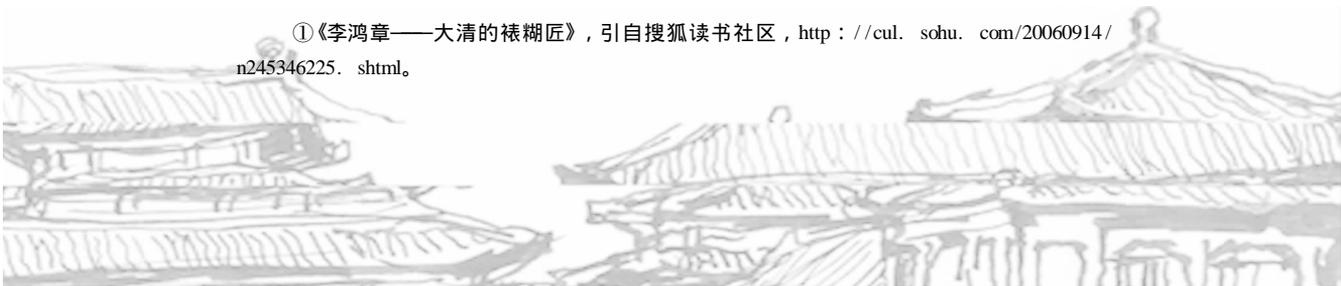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这时李鸿章病情加重，已经没有力气再与洋人对抗了，以大清这副架子争也争不来什么，当时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西方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签字回来后，他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1901年11月6日，《辛丑条约》签订后4个月，李鸿章因为受尽洋人的气而病危，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本已穿好寿衣，却挨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

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其目遂瞑，须臾气绝。周馥曾赋诗以志怀念曰：“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①《李鸿章——大清的裱糊匠》，引自搜狐读书社区，<http://cul.sohu.com/20060914/n245346225.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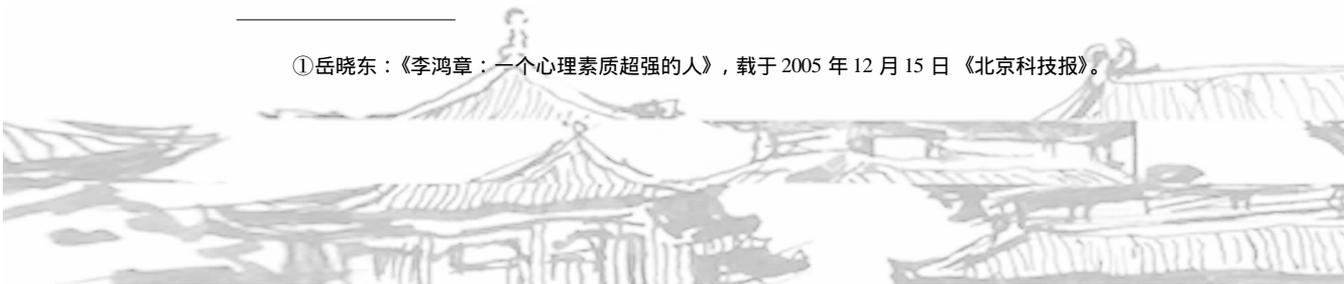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周恂慎公全集》诗集，卷4)李鸿章就是死到临头，也表现出其超强的心理素质。他似乎在向世人呼吁：我受了一辈子的气，我不甘心啊！^①

以往讲《辛丑条约》，只有列强罪行、拳民惨剧、满清“国耻”，绝少提及李鸿章的外交努力。然而，当时李若偏安广东未曾北上，或虽奉命议和却乏谋略，甚至哪怕因病耽搁若干时日，列强必在北京另立傀儡。如是，则日本或俄国在东北、德国在山东、法国在西南、俄国或英国在新疆、英国在广东及西藏……不弄出几个“独立”国来，才是咄咄怪事！而后列强再争势力范围，以及康梁们推立宪、孙黄们搞共和，其疆域，怕就只剩华北、华中、川陕，顶多再加东南几省了！史学家指出：“统一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面对外国野心必须作出的紧急的、现实的选择。”显而易见，李鸿章之主动“选择”及其作为，对从根本上扭转当时颓势，以传承这份历史遗产，既收到立竿见影的实效，更有其深刻久远的影响。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天津，进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①岳晓东：《李鸿章：一个心理素质超强的人》，载于2005年12月15日《北京科技报》。



比起同朝的官僚们，其实李鸿章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有更清醒、更开放、更切实的认识。在晚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王树增先生感叹：“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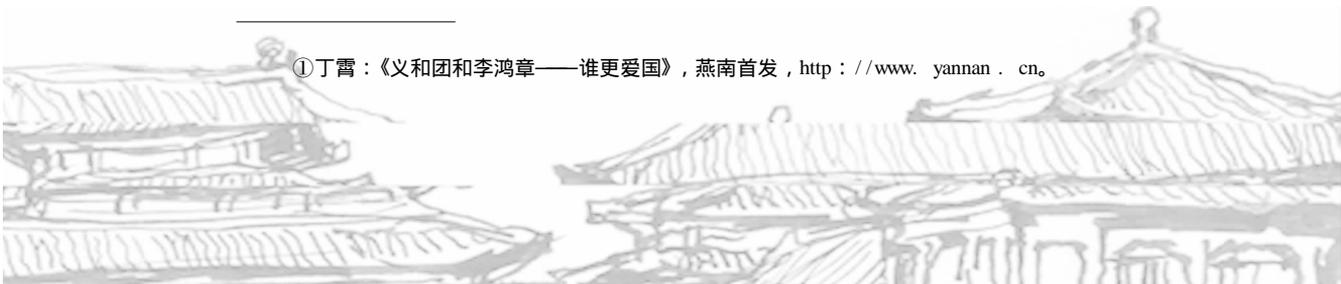
可惜，历史和大清朝没有给李鸿章一个机会，积贫积弱的国家只能沦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李鸿章生在这个时代，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注定了要背一世骂名。

李鸿章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影响、左右中国政坛长达40多年。李鸿章一生的成就：一是洋务，二是外交，三是军事。而为国人之诟病，也是如此。洋务上，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外交上，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军事上，甲午战争中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李鸿章在为曾国藩写的挽联中这样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一直以曾国藩的门生自居，确实他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正如姜维是诸葛亮的传人一样，如果说曾国藩在“立德、立言、立功”上是一个成功者的话，那么李鸿章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者。

^①丁雷：《义和团和李鸿章——谁更爱国》，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曾国藩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曾国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生中以维护清朝政统和儒家道统为己任，当时，中国动荡，太平天国无时不在威胁着清朝的政权。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已被剿灭，国内危机缓解，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稳定期，后世称之为虚假的“同光中兴”，而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却加深。客观上如此，在主观上，与他的学养、才气、作为一个大国、弱国的掌舵者很不相称。同时，人格也大大值得怀疑，有副对联这样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说李鸿章借洋务而中饱私囊。这点没有多少历史依据，不过足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人对他的不信任。

李鸿章出访德国，有人比其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其实，李鸿章何曾可与俾斯麦相比，李鸿章倒是有一些如曾国藩所说的“拼命做官”，好汉打掉牙和血吞的“痞子”之气，可是他没有德皇对俾斯麦的器重机遇，清政府对汉族官员还是处处掣肘。

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镇压太平天国后，悲哀地认为，整个官场已经腐烂到底，同样，他的继任者李鸿章也不可能挑战规则，官场潜规则，无论办洋务，还是建海军，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所以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和灾难，归咎于一个人身上，这是很荒谬的，也许，从短期来看，历史人物的偶然行为会决定历史走向，但是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和制度决定的。

清朝专制的政体决定了这一切，除非倒掉、重来，否则是不可能通过改良式的修修补补而获得重生的。

即使是花费了李鸿章一生心血的洋务运动只是经济上的不完整的工业化，而政治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整个统治阶层并没有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和太平天国的教训，因此，注定了洋务运动这种官营式的企业不可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形成任何潮流，这种致命性的政治缺陷，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这种只学技术而不学制度与文化注定是要失败的。

晚清从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到底应该不应该改革，到底怎么



改革，整整讨论、拖延或者无动于衷了40年，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弊端。这种政体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拒绝任何既得利益的丧失，宁愿等死，也绝不改革。

而李鸿章只是专制政体的一个螺丝钉，一个机器而已，任何对他的拔高或过誉，都是虚妄的，都是荒谬的。

清朝的政治只是中国封建的回光返照，虽然比明朝要好一些，在这种政体之下戕害的是一代代想有所作为者。在这种政体下，能爬上去，其人格、道德大大值得怀疑。李鸿章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改革家，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官僚而已。生逢民主革命的前夜，历史把他推上这个舞台，他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场场话剧，仅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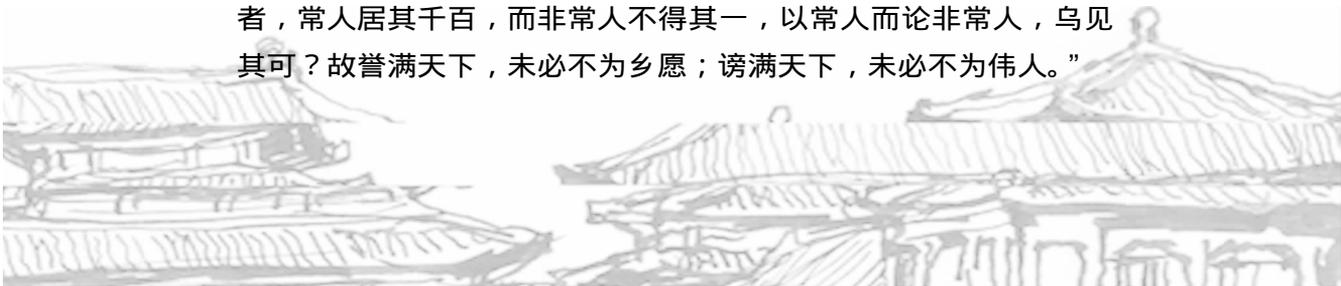
他没有商鞅的坚定，也没有王安石的勇气，更没有张居正的手腕，他反对康梁变法，反对孙中山实行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项措施，用人上也不行，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把黄钟当瓦砾，严复和伊藤博文在英国留学时，是同学，严复比伊藤博文学习还要好一些，但是二者的机遇却差若天渊，伊藤博文归国后领导了明治维新，而严复归国郁郁不得志，只好重走科举之路。

此时的朝廷正如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自己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好，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就可敷衍一时。”确实是神伤之语。从专制政体的用人来看，奴性是一个人能否有所用场的先决条件，如此政治，中国焉能不败。而李鸿章死后30年，日本大举入寇，这即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之演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不能真正发奋图强的结果。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这样评价李鸿章，为李鸿章鸣不平。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其意为：天下只有庸人没有过错，也没有称誉。就是天下人都诽谤他，他也不一定是奸雄。就是天下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一定是豪杰。为什么呢？评价者中，常人是大多数，而真正有见地者如凤毛麟角。以没有见识者去评论大人物，往往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因此说，誉满天下，未必不为好好先生。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李鸿章曾经概括自己的一生是“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是甲午战争的烽火使他“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从权力的顶峰坠落后，长期赋闲在北京贤良寺，这才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是间“破屋”，而自己只是一个“裱糊匠”，“裱糊匠”虽有办法把“破屋”的外表裱得光鲜漂亮，但“破屋”是绝对禁不起暴风雨的！

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李鸿章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第四节 “床下都督”黎元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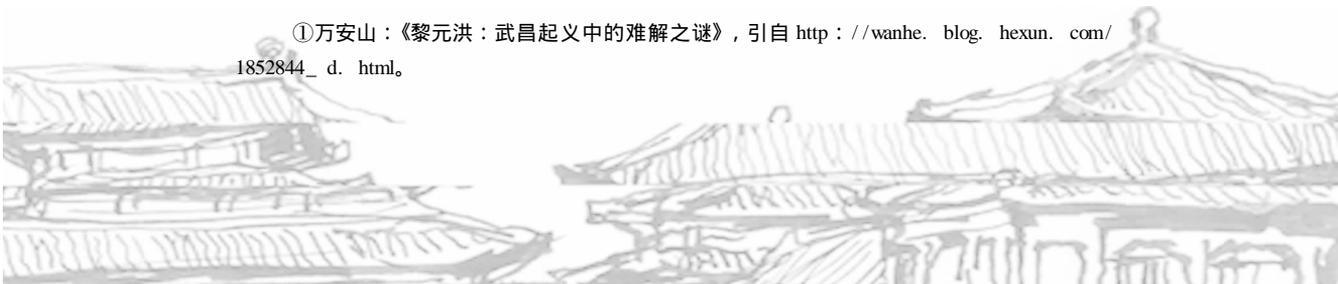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

按照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和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记载，黎元洪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因缘际会，他莫名其妙成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继而一再侥幸，由鄂军大都督而副总统，而总统，然后又因“府院之争”而不敌段祺瑞，灰溜溜地下台。然而历史上真实的黎元洪到底是什么的人呢？

黎元洪，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汉阳，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黎朝相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军后，祖父黎国荣又去世，他和姐姐衣食无着，一起讨过饭。饥饿难捱时到别人菜地里偷萝卜，聪明的他拔出萝卜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好像萝卜没人动过一样。14岁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20岁时他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刻苦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肯于吃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为师长严复、萨镇冰等人所赏识。入学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又刚刚结婚，生活非常困顿。每次回家探视，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只为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①

1888年毕业后，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

^①万安山：《黎元洪：武昌起义中的难解之谜》，引自 http://wanhe.blog.hexun.com/1852844_d.html。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二管轮等职。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他所在的“广甲”号战舰也投入战斗，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在逃跑途中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他步行回到旅顺，又到天津候职，却被监禁数月。出狱后他到南京，投奔到当时的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

甲午战败，清朝海军全部覆没，马关签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清政府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北方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小站练军和南方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张之洞初见黎元洪，就称赞他举止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详，是数年未得一遇的干练之才，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又任命他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他是学海军的，在天津水师学堂，分配到军舰上工作，参加过甲午战争海战，军舰被击毁他游水而生还。在这前后，还曾在枪炮厂工作，这次奉令到多处去负责修过炮台，炮台的质量不知如何，但会修是没问题的。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他为张之洞筹练新军尽心尽力，官运亨通，先任护军马队营帮带，继任马队营管带，又任护军前锋四营督带，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督司，复晋为副将。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

1898、1899、1901年，黎元洪3次受命赴日本考察其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生产，不仅在军事知识与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编为两镇，总兵张彪任第八镇统制，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张彪是张之洞最亲信之人，妻子原是张之洞心爱的婢女，因此被称为“丫姑爷”。但张彪粗鄙无能，胸无点墨，湖北军界真正的佼佼者无疑是黎元洪。

平日治军，黎元洪一反清末军官苟且敷衍、松弛腐败的积习，勤勉有方。他从不克扣粮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还专门设立被服厂制发军服，因此所辖部属穿戴整齐，与其他队伍服装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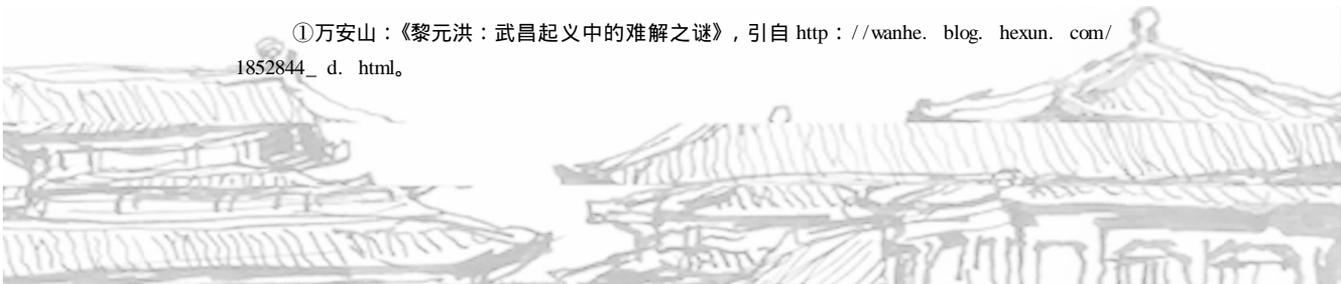
烂的状况恰成反照。别的军官多住宿在私宅，他却长住在军营中，甚至过年也不回家，让子女到营中拜年。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的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他从不虐待士兵，士兵有过失都交执法官审讯定罪，由此获得士兵广泛拥戴，威信极高。

1905、1906、1908年，清政府在北洋河间、河南彰德、江苏太湖举行了3次秋操。参加演习的清军当时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由北洋军组成，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张怀芝、曹琨指挥；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在这几次演习中，黎元洪指挥得体，调度有方，特别是第三次秋操，他指挥南军在三大战役中均击败北军，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可以说，从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后，黎元洪实际上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能够一呼百应的首领。^①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位清廷重臣竟能成为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当权者！

1911年10月17日，湖北军政府门前祭坛高筑。祭坛前香烟缭绕，坛上黄帝轩辕氏灵位庄严肃穆。灵前摆设香案，陈玄酒，旗立两侧，鼓乐喧天，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跪读祝文，三军鸣枪，全体跪拜，山呼万岁。这是湖北军政府祭黄帝仪（一说为祭天大典）的盛典，也是黎元洪就职的庆贺大典。

辛亥革命首义取得成功，照理说应该推选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渊源，且一直视革命为大敌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关于此事之颠末，外间传说不一，至今几成疑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一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黎元洪因此而有了“床下都督”的雅号。有的革命党人回忆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军政要员纷纷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

^①万安山：《黎元洪：武昌起义中的难解之谜》，引自 http://wanhe.blog.hexun.com/1852844_d.html。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首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即今阅马元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以上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木菩萨。

也有人持另一种说法：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革命军在黄土坡找到了黎元洪，当即将他带到楚望台，接着又拥至咨议局，让他出任都督。但黎元洪执意不肯接受。他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像怕被蛇咬一般，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黎元洪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周围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道，“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干脆给他个枪子儿吃算了”。在场的李翊东也大怒，他举枪对着黎元洪吼道：“你本是满清奴才，当杀！我们不杀你，举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你甘心做清朝奴才，我枪毙你，另选都督。”说着就要扣动板机，吓得黎元洪面无人色，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不思米食，缄默不语，他抱定主意既不再做清朝官吏，亦不宜担任革命军职务。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在军政府。他整天愁容满面，心思重重，心想，这下可完了，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妻妾儿女，不得见面，如有手枪在身，莫如饮弹自尽，一致了之。由此可见，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以上两种传说，反映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的事实。^①

黎元洪成了湖北军政府都督，是“最高领导人”了，但心里

^①《床下都督黎元洪》，引自永吉档案信息网，2005年10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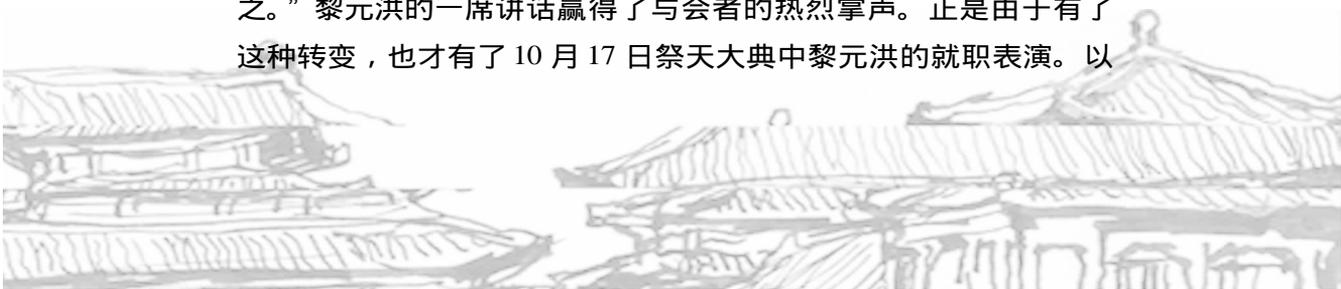


又反感又恐惧，担心造反不成会掉脑袋，要留后路，所以一言不发，呆坐着，无表情，很快就得到一个外号“黎（泥）菩萨”。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汉口、汉阳的先后光复，以武昌为中心的革命大有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看到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于是，他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剪掉长辫。

10月13日，革命军的炮队击退了清政府的兵舰，黎元洪得知此消息后，表面上一副苦愁，但暗中已开始盘算，准备接受革命军的要求。这天下午，他开口同革命党人甘绩熙和陈磊说起话来。甘说：“你这几天总是苦脸对待我们，太对不起我们。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今天成绩，抬举你做都督。革命成功了，你可做华盛顿；革命不成功，你可做拿破仑。你很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你。”黎元洪答复说：“你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激烈，我在此近三日，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们？”陈磊接着说：“你的辫子就对不起我们，现在武汉三镇人人都剪辫子，你身为都督，就该做个模范，先剪掉辫子，以表示决心。”黎此时也顺水推舟地说道：“你们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剪辫子，我早有此意，你们找个理发匠来，我把辫子剪去就是了。”

甘绩熙见此状，立即报告有关方面，并请来了理发师。理发师请示道：“都督剪去辫子，留多长头发？”黎元洪回道：“剃个光头。”不到半小时，理发师便给黎理了个光头。这时的黎元洪头是圆的，肩是圆的，身子也是圆的，肥头大耳，顶放青光。蔡济民在旁打趣道：“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嘻嘻一笑说：“像个弥勒佛。”一句话惹得周围开怀大笑。黎元洪去掉发辫后，吴兆麟还特地买回一挂鞭炮，以示庆贺。接着士兵们请去掉长辫的黎元洪训话，黎元洪说道：“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黎元洪的一席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转变，也才有了10月17日祭天大典中黎元洪的就职表演。以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上就是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一段曲折经过。^①

武昌起义后，被逼上梁山的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军推为鄂军总督，之后相继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始终是一个傀儡。但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很多人都说他和蔼而谦虚。

号称“民国弥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推之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锋。他见了什么都要骂，只有黎元洪是他惟一的歌颂者。在他的笔下，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到武汉，第二天与黎元洪见面。他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一文，对黎元洪推崇备至。他写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值得人们首肯的，不是他这些“优点”，倒是他的另一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们，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为王，有的从安全着想，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你们不要说了，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他便装面对前来祝贺的权贵，口称袁氏为“大总统”，并拒绝受封：“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断不敢冒领崇封，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祝贺，实愧不敢当！”^②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他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作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赞成。而黎元洪坚决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

①《床下都督黎元洪》，引自永吉档案信息网，2005年10月11日。

②《黎元洪的另一面》，引自凤凰网，<http://www.phoenixtv.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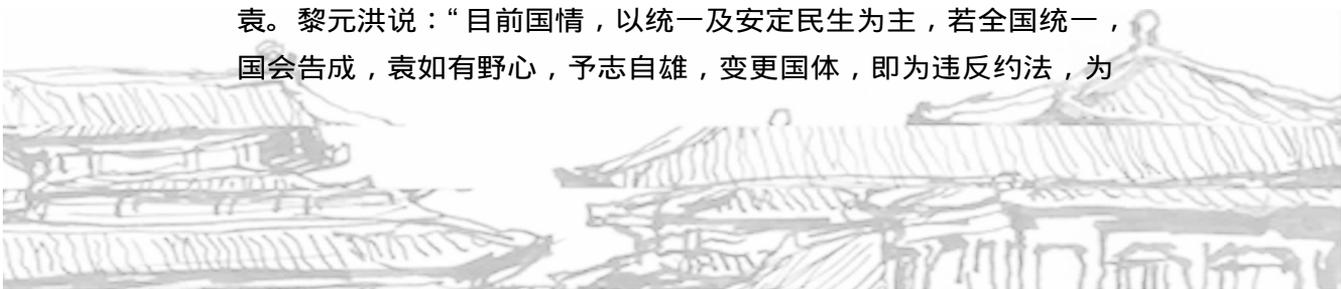
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议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黄陂原籍休养，但都没有得到袁世凯的允许。他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袁世凯才同意他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甚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命令发布后，袁世凯命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恩即日就封。当百官在国务卿陆征祥率领下，宣读贺词恩封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仍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做亲王制服。黎元洪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几天，政事堂以公文送武义亲王府制至黎邸，封面大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被收文者误剪，没看见公文封背面有“武义亲王”字样，呈黎阅时，黎元洪大为恼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武义亲王之公文！”飭令退还。

19日，袁世凯又下令劝他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便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且说袁还打算加黎为“副元帅”、“辅国大将军”之类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元洪已经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将来只能落个骂名，虽然他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决不肯做这个见不得人的王爷。

在此两年半前，人们就看出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劝黎加入反袁。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面——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誓死反对，并遵守两年前与国民政府的约言。

黎元洪与袁世凯是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双方有年礼馈赠。就在袁称帝这年，袁送黎礼品用红帖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一看，大怒，拒绝不收。第二天，袁改用“姻愚弟”，黎才收下。

闻知蔡锷举义旗，黎元洪击节赞叹：“松坡不愧英雄本色！”——为了维护民国政体，他执拗地捍卫着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气节。纵观黎元洪一生，当了几次傀儡，身不由己，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但这一回真的硬邦起来，自己说了算一回。人言“黎泥菩萨”、“好好先生”的黎元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册封为王，做得是那么坚决，让后人窥见了他的于大处绝不糊涂的一面。^①

黎元洪是欧美生活的崇尚者，他的生活方式趋于西式。他喜欢穿西服和制服（竖领），很少穿中式服装；中年之后，在吃的方面，几乎每日三顿都是西餐。据黎元洪之子黎仲修先生回忆讲：黎元洪中年时得过一场胃病，大夫说中餐淀粉多，宜发酵，建议他吃西餐。他家里有一个中餐厨房和一个西餐厨房。他和子女吃西餐，夫人及办事人员吃中餐。谁来为黎大总统做西餐呢？当时西餐厨师很难找。就由管家带领中餐师到西餐馆吃西餐，边吃边问，逐渐心神会，回来后学做西餐，当然，出自中餐厨师的西餐难免带有中餐味。大家知道西餐是不炆锅的，但这位改做西餐的厨师往往还炆锅。

黎元洪的西餐菜谱是：早餐吃牛奶麦片粥，午餐和晚餐都是一汤、一鱼、一肉、一素菜，另吃一片面包，最后喝一杯咖啡。绝对不吃米饭。儿孙们陪他吃饭也是如此。但一年之中有3天例外要吃中餐，那就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除夕、端午节和中秋节，一定要在大饭庄叫一桌酒席来吃。儿孙们围着他循序坐定，陪他吃饭，实际上是他看儿孙们吃。他自己也就是每种菜尝上一口，以示中国

^①《黎元洪的另一面》，引自凤凰网，<http://www.phoenixtv.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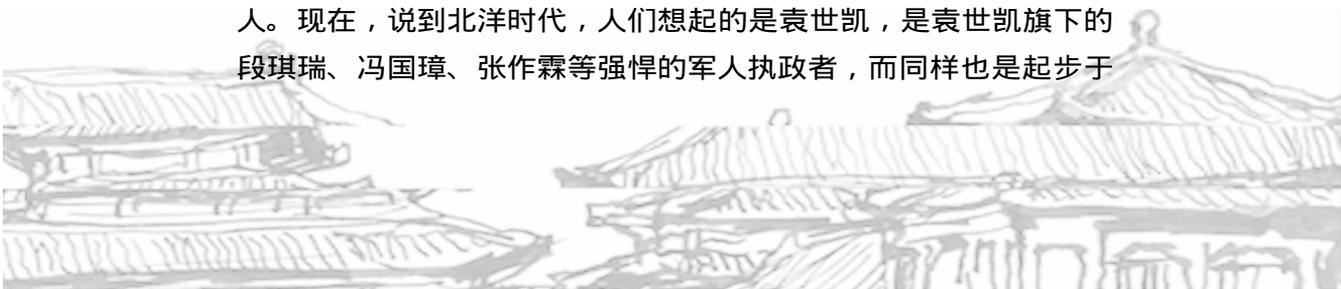


人不忘本，不失传统之意。除此之外，只有遇他伤风咳嗽，才暂时改用中餐。

黎元洪常在德租界容安别墅（今解放南路市政协泰达大厦址）接待中外宾客，大家坐在铺着白色台布的餐座上一起动刀动叉。据吃过的客人讲，黎府的西餐味道还是挺好的，是当时天津宅门菜中的上品。1926年，世界青年会组织代表来津，约有2000人之多，黎元洪为每人备茶点一份。黎元洪在寓所还接待过美国木材大王罗伯特·大莱、英国报业巨子北岩公爵、美国钢笔大王派克等。派克特意将一支特制的朱砂色金笔送给黎元洪，还请黎用这支笔为其签字留念。至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孙、卢木斋、张彪等更是黎宅的常客。黎元洪对来访的客人总是要留他们用便餐。每逢元旦、圣诞，黎元洪总要在寓所举行庆祝招待会宴请中外客人。宴会召开的前几天，他总要按照西方的习惯发出英文正式请帖，并请答复；对日本客人则用中文的正式请帖。按照礼节，每逢宴会黎元洪必穿礼服迎接客人。客人来到前，黎总要亲自检视餐桌上每位客座前已摆好的外文菜单。他宴请外国人不完全是西餐，每次都有鸽蛋汤或鱼翅汤等。时逢节日，他还要在私人戏院里（今烟台道小光明影院址）举行舞会。戏院楼上备有西式冷食、果汁、饮料等，供客人享用。春节时，他还邀请京剧名角和杂耍艺人到私人戏院演出，招待社会各界人士。

袁世凯死后，他接任大总统。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拟按美国模式在中国实行地方分治，并延请李大钊参与起草有关法案；倡导实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

但从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人们眼中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琪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



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黎元洪虽是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3次东渡日本，考察政治与军事，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较为开通。他喜欢吸收有文化的特别是有新思想的秀才兵入伍，并积极选送人才出洋肄习。清末湖北留学人员为全国之冠，就是黎元洪向张之洞积极建议的结果。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在湖北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黎元洪的开明政策不无关系。

好容易等到帝制失败，袁世凯一命呜呼，他这个副总统转成了总统。但却不是“苦尽甘来”。他属下的总理段祺瑞压根儿看不起他。

段祺瑞有理由，黎不过是个“旅长”，段早就是“师长”、“军长”，还代理过“湖广总督”，比黎高多了。在北洋军人中，袁死后段就是“老大”，眼睛里哪里有什么玩意的黎元洪！

就连段的秘书长徐树铮对黎“总统”都没有好脸色。

总统府和国务院常闹矛盾，所谓“府院之争”。

黎总统免了段总理的职，段不服气，出走天津，仍以总理自居，闹成僵局。这时冒出一个“调人”张勋带部队进京。

张勋是来捧废帝溥仪复辟的，黎元洪当然得滚蛋。

过了5年，直系军阀又把黎捧出来做傀儡总统，一年光景吧，直系头子曹锟想过总统瘾，急不可耐，用贿选的办法当了总统，把黎赶下台。

作为政治家，生当那个武人专制的时代。貌似武人而实为文人的黎元洪是玩不转的，所以，他屡屡被军事实力派逼迫得仓皇而逃。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确实有诸多难得的秉赋与见识。当他接任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被迫离开政坛后，他在天津做寓公，投身商海，经营房地产、金融、矿业等，先后投资的实业达 70 多个，而且大获成功。获利之后，他仗义疏财，颇多善举，尤其热衷投资教育。

他临终遗言尤有意味：“……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

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朗与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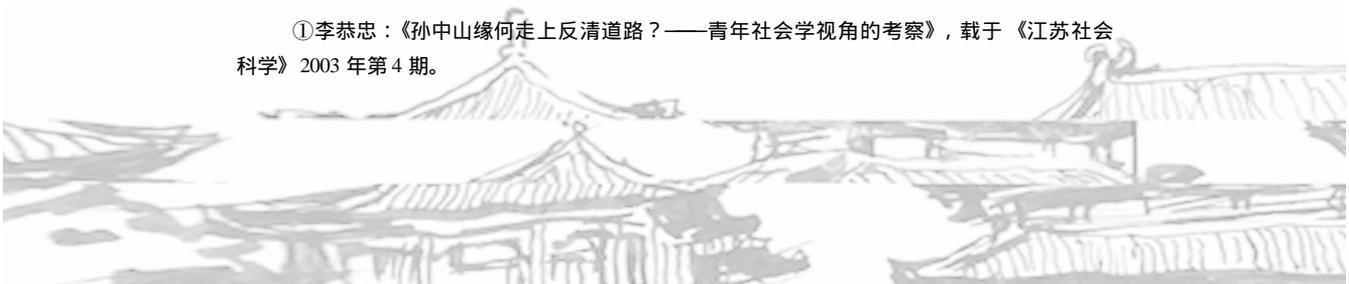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五节 初见中山

19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两个边缘社会。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或者受诱骗、劫持而被贩卖到国外，或者自愿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侨群体。他们虽与故乡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远离故土，生活在另一种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下，因而逐渐游离于国内正统社会之外。而其中一小部分新进分子，则已经“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祖国能顺应世界潮流，革除专制，增进民主；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后半期中外交往的发展，另一个更具颠覆力的边缘社会逐渐形成。其地理基础，是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而以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为中心；其经济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其制度基础，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其社会构成，则是中外商人、业主、雇员、外交官、传教士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制度架构、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接近，而与以清廷为核心的正统社会，则距离更远。冯自由在其《华侨革命开国史》一书中，将香港、澳门也纳入华侨地区加以处理，由此可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早已认识到了这两个边缘社会对于近代中国转型的共同意义。^①

^①李恭忠：《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青年社会学视角的考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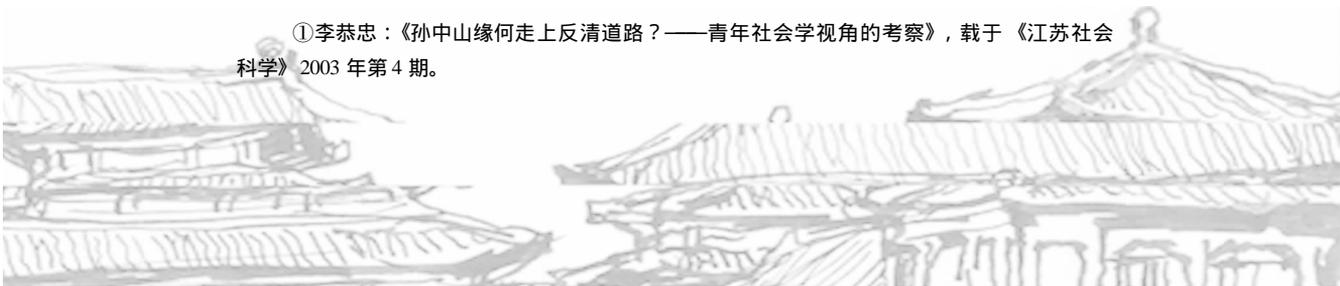


孙中山先生的个人背景，恰好在这两个边缘社会中展开。他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虽然岭南在明清之际以“富而通”著称，但他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却不富饶。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农民生计艰难，他出世时的家境亦颇困苦。父亲曾在澳门充当鞋匠，后返乡租田耕作并兼任更夫。他从6岁起就参加一些劳动，“农家子”的生活使他“早知稼穡之艰难”。10岁方入村塾读书，但对机械地背诵而不求甚解的教学十分不满。周围的封建陋习令他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和缠足等等愚昧卑劣的现象。

然而，故乡蕴涵着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传统却在孙中山的稚嫩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就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的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刚刚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显然给少年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传统哺育了孙中山，使他这样深情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①

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他在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之余，沉浸在游水、捉鱼、放风筝、踢毽子、与小伙伴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活动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着外部新世界。如果没有别的机会，他也许将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后终老于乡。但是，由于毗邻澳门、广州这一地缘优势，香山县的农民具有内陆中国农家所没有的机会，那就是出国谋生。他的哥哥孙眉在19世纪70年代加入了离乡背井到异域去谋生的行列，并渐次由佣工而成为拥有农场和商店的企业主。孙中山终得在12岁时随母亲前往

^①李恭忠：《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青年社会学视角的考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檀香山，此行拓展了他的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当时的檀香山属于夏威夷这个弱小的君主专制国家，而美国正在极力吞并它。当地土著居民的激烈反击与当时国内清政府接二连三的退却求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孙中山在这里“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这里的厄运也勾起了他对祖国前途兴亡的关心。“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然而这只是一种心愿而已，并不是能救人于水火的真谛，改良祖国也决不是改良清政府那样简单，而是要从社会地层开始逐步深入，清政府实际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但孙中山并没有发觉到，这可以从他书李鸿章要求改革看出，而上书失败也同时就预示了革命是必然的趋势。

在檀香山的5年多时间里，他开始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给予孙中山以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中山于1883年返回祖国，但在故乡居留短暂，与好友陆皓东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动颇遭非议，改良乡政的尝试难以奏效。他不久被迫前往香港，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和西医书院。由此，他的一家，包括孙中山在内，便与国内正统社会日益疏离，而与海外华侨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孙中山在疏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魅力。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随着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渐次展开，这种感触在孙中山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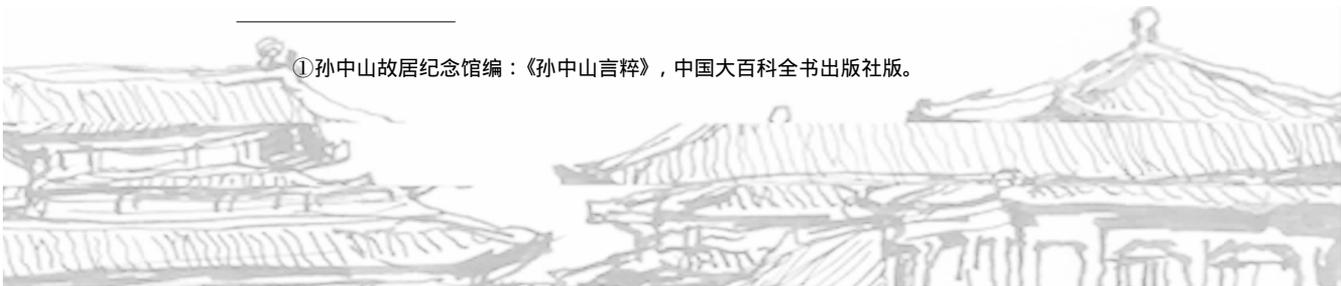


里逐渐变得强烈，一种改造中国的愿望，也逐步滋长起来。^①

就在孙中山赴港求学的这一年，爆发了他亲身感受的一场侵华战争——中法战争。严峻的现实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不断用暴力推行殖民主义，致使古老的中国从封建末世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被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所桎梏。对外缺乏真正的独立，对内没有起码的民主，贫困而又落后——这就是严峻的现实。为了拯救和发展中国，先进人士和群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随着民族资本的萌发而出现了新的因素。维新志士们较为系统地引进了“西学”，广泛传播了社会变革观念。中法战争及其结果所导致的尖锐的内忧外患促进了人民的反抗和维新思潮的扩展。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不败而败再次给孙中山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后来说道：“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这只是一种想法，并没有付出很多实际行动，毕竟当时的孙中山对清廷还抱有一丝幻想。这样的矛盾之所以会产生，与孙中山思想上的不成熟有关，而且尚无法摆脱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维新改良思潮。

1886年至1892年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研习医学。他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政治学说。进化论和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给他以深刻影响。正是在这些学校读书期间，他主动结交了区凤墀、王煜初、喜嘉理几位牧师，康德黎、孟生、何启几位师长，以及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左斗山等教友。1891年春，他还参加创立了香港教友少年会，号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渐坠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这种交往，逐渐将青年孙中山引入一个职业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向上流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而这些东西，他既无法从中国正统社会中获取，它们也与传统的社会流动资源迥异。因此，孙中山的个人发展愈是依赖于这

^①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言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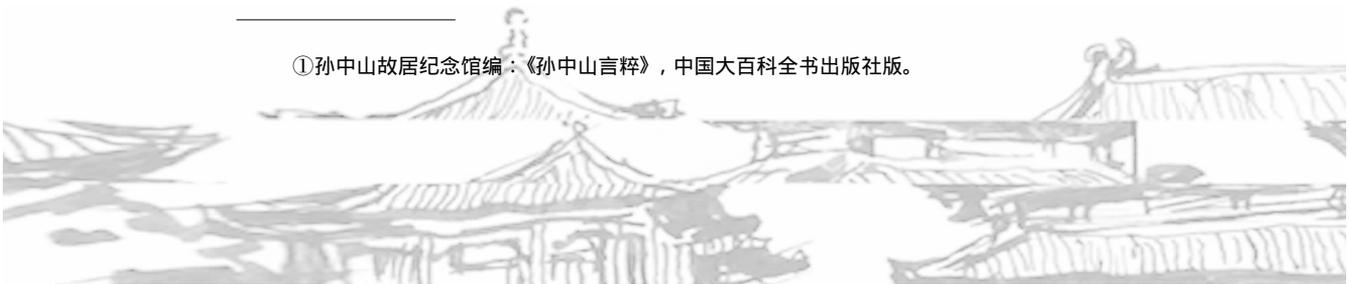


些资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远离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念书期间，经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在杨的家中聚会。郑、陈二人与孙中山年龄相仿，都有变革社会的志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同学，少习武术，与绿林豪侠和洪门会党有着广泛的交游，而后者所联系的下层秘密社会，此时已经显示了强大的颠覆力，1891年长江教案便是明证。孙中山对他“一见奇之”，遂引为知交。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国秘密社会中潜藏着的力量。陈少白则是一位文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曾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不久之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也入香港西医书院。孙、陈后来都回忆说，他们两人加上尤列、杨鹤龄，经常聚在一起，“放言”“纵谈”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称为“四大寇”。与四大寇有过密切关系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这些人以后大多加入了兴中会，成为中华革命的先驱。^①

所谓“四大寇”的传说，也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叙事，用它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剥开这个叙事的虚饰成分，它的原型便跃然纸上，这就是青年学生特有的一种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助长对方的想像世界。青年人本就富于想像，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倾向，不过这种反叛不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时候是表现在言语、想像中。对于一般青年而言，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这种想像可能比较强烈，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在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它也会逐渐萎缩。然而，三两位个性比较强烈、心志比较坚定的好友能够长期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言”“纵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等于是一张温床，不知不觉中，一个共同的想像世界，便逐渐被建构起来。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孙中山等人本就心怀变革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还不甚明晰。而通过这种“纵谈”，他们

^①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言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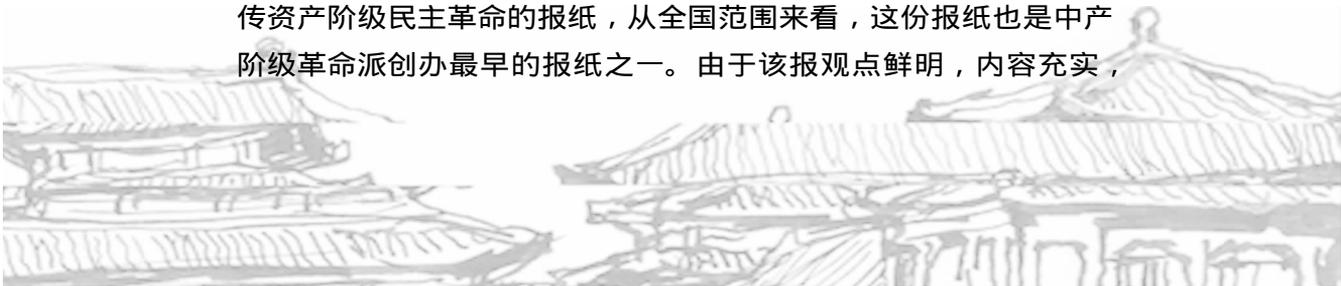


对于新社会的向往更加迫切，一种“革命”志向，逐渐在他们心里升腾起来。尽管它还不太明确，还很难与改良区分开来，但它已经融汇到孙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并将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果然，青年时代结交的这些密友，日后大都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这一时期被孙中山自己称作“革命的言论时期”。

然而，这批青年也同样只是高谈阔论，却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并且他们的言行还带有明显的封建改良主义色彩。其实自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思想便已存在了，但只是由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和知识分子表达出来，孙中山在与郑观应的交往中也就不免受其影响，因此他的一些思想与洋务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洋务派的失败则充分说明了用改良主义的思想来改造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在校期间，孙中山曾致书退居香山的官员郑藻如，提出仿效西方的主张，建议兴办农桑、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社会活动，结交会党和各界志士，酝酿建立团体，日渐放弃“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孙中山先生走上社会的第一站就是澳门，他通过澳门这扇窗口认识世界，从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澳门，青年孙中山一边行医，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其中创办《镜海丛报》是他的重要活动之一。在行医期间，孙中山深感“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国难未已，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民智需开启，国民需唤醒，于是他决定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救国主张。经过紧张筹备，1893年7月18日，《镜海丛报》在澳门下环新街3号创刊。《镜海丛报》是澳门第一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份报纸也是中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最早的报纸之一。由于该报观点鲜明，内容充实，



清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风格新颖，很快风靡一时，不仅在澳门畅销，还发行到中外各地，国内的发行点有：氹仔、湾仔、前山、石岐、广州、佛山、香港、福州、厦门、上海、北京；海外的发行点有：美国旧金山、葡萄牙、横滨、马尼拉等。

但孙中山的事业刚刚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人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孙中山内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他曾经对当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尝试过结交正统社会的上层人物，指望借助于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革新理想。他选定的首位结交对象，是同乡先贤郑藻如（1824 - 1894）。郑是一位退隐于乡的官绅，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曾任江南机器制造局帮办、津海关道，以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3国大臣，属于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干将。1890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国家，“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翘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书总理衙门指陈时势，又考虑到尚无实践经验而作罢。因此，他提出劝农桑、戒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请郑藻如牵头提倡，先在本县试行，然后必有别的地方起而效仿，则可风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请郑藻如牵头，孙中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恐怕没有号召力。显然，对于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局限，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借助上层人物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以图一展抱负。可是，病老于乡的郑藻如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孙中山盼望中的机会落空了。

大学毕业时，机会似乎再一次降临了。据江英华回忆，当时他和孙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们的老师康德黎便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请他向李鸿章推荐孙、江二人。李鸿章答应他们赴京候缺。可是，当孙、江二人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两广总督府领取前往北京的证明物事时，总督衙门多方为难，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他们便赌气离开，决定不去北京了。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因此与这所学校的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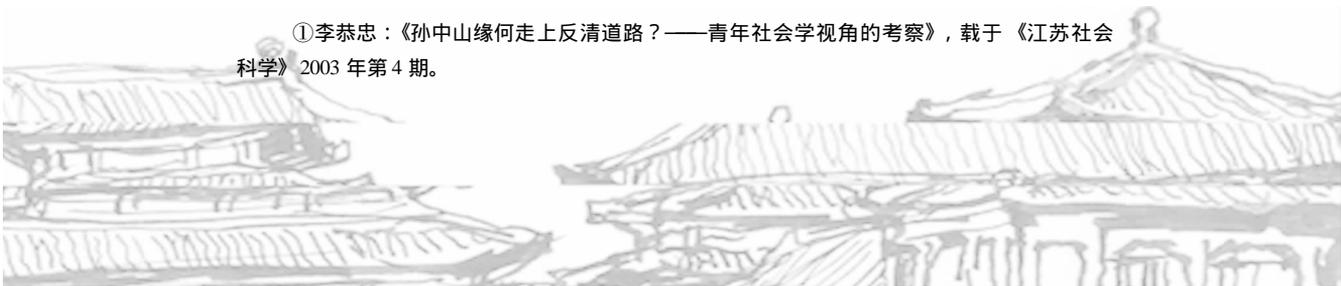


业生之间，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孙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求助于他，既符合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不失为一条施展抱负的捷径。但这一机会的失去，其中既见青年人的情绪冲动，但更体现了正统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机制，即“填写三代履历”云云。由此事，孙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背景与正统社会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对于清廷的不满也进一步增强。^①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到故里翠亨，闭门不见任何外客，专心起草给李鸿章的上书，表达他要求改革的思想 and 心愿，“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又奋起”。他在上书中提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概括来说便是人和、地利、物资及贸易4点，可以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但是思想深度却不够，这就充分暴露改良主义的弊病：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实质性的措施。在上文中，也夹有对李鸿章的溢美之词，并表示了希望能入仕朝廷的心愿。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经过几度转辗，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①李恭忠：《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青年社会学视角的考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但孙中山一腔热血的上书却石沉大海，李鸿章对此毫无兴趣。而不久后，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激战之时，慈禧却动用军资为她自己庆寿，这更使孙中山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让他完全地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改良主义向彻底革命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的决心，并且使他走上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光辉道路。

在中日战争的炮声中，他前往檀香山并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894年11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诞生。兴中会把斗争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首次出现了共和国方案，虽然还只是雏形，却显示了划时代的意义。孙中山开始了历史性的超越，踏上了正规民主革命的道路：既摈弃了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又抛却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和渐进手段。翌年，孙中山又在香港与杨衢云等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先期事泄，致使计划流产。然而，“乙未广州之役”作为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诸史册。

但是关于政体、政治方面的政纲都没有成型。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兴中会章程，都没有这方面的明确阐述。孙中山对于“共和国”的感知，得自于1894年夏威夷的政治变革，当年7月，夏威夷实施了一部新的宪法，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国。但孙中山在那里停留未久，且忙于组织兴中会，纵然对这一新事物有所共鸣，对于“共和国”的认识也不可能很深。与香港兴中会其他成员一样，孙中山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知识和体验，主要是通过在香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获得的。正因为此，这批青年志士的政治知识，恐怕还不如久居香港政界的何启。他是一名资深律师，担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对于洋务派的改革路线，以及政制建设，都提出过批评性的改良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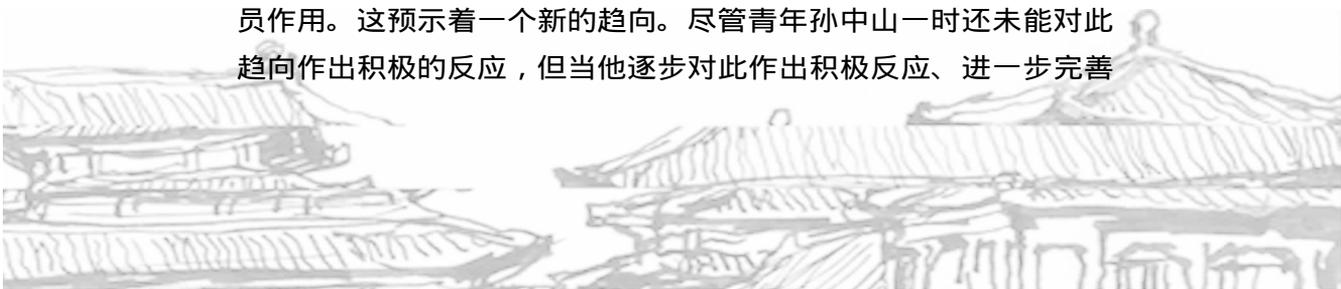
另外，兴中会对会众的动员方式，亦可以反映青年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程度。组织檀香山兴中会时，他指望通过利益的驱动力



来动员会众，“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檀香山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1895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所筹得的款项中，会员会底银和股份银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于革命事业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这一迹象，一方面表明，传统的利益驱动方式难以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新的趋向，即政治动员已经开始在群众（尽管还只是少数）中产生影响。

可是，青年孙中山的群众动员意识，显然没有因此而立即改变。1895年初，这一方式作为一项详细的筹款方法，明确写进了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本会……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每股科银十元，……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生财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等等词语，甚至将之与清廷的捐纳相比较，发起人以利益刺激会众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动员方式，在性质上与传统秘密结社的动员方式没多少差别。这表明，孙中山此时的群众动员意识，还未完全超越传统反叛者的程度。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一种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强大动员作用，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都还比较遥远。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贬低孙中山的形象，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分析青年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程度。

因此，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看，孙中山此时对于革命前景的设想，还并不十分明确，更谈不上具体。萦绕于他头脑中的，主要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成熟的革命思想。但是，这一强烈的革命理想，在1895年前后，便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动员力量。一部分会员的大额捐款，占了檀香山兴中会和香港兴中会所获资金中的主要比重，便是直接证据。虽然少数商人捐出巨款，并不一定全都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但毫无疑问，革命理想亦在其中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这预示着一个新的趋向。尽管青年孙中山一时还未能对此趋向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当他逐步对此作出积极反应、进一步完善



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也就是革命从理想转向思想之时。

不久，陆皓东等在武装反清斗争中壮烈牺牲，孙中山偕同郑士良等逃亡日本。尽管行色匆匆，他还是在横滨建立了兴中会分会。之后，断发改装，赴檀香山、美国和英国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政府驻英使馆馆员诱骗绑架。由于他在西医书院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孙中山才免于被押解回国处死的厄运。他在被囚禁12天脱险后曾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国际影响。他留居伦敦期间还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危机，使他“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之运动也。予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1897年秋，孙中山离英赴日。他的革命活动得到国际友人——特别是日本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也援助了菲律宾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趋于高潮时，孙中山在10月发动了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在兴中会阶段所策划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规模达到两万余人。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朝政府业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工具，它们共同压榨群众。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如火如荼；知识分子日益革命化；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在这种从低谷趋向高峰的形势下，孙中山迅速认清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混淆革命与保皇的险恶用心，并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扫除保皇邪说”。孙中山在檀香山等地对保皇党徒们进行了口诛笔伐，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充分表现了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时，他确信“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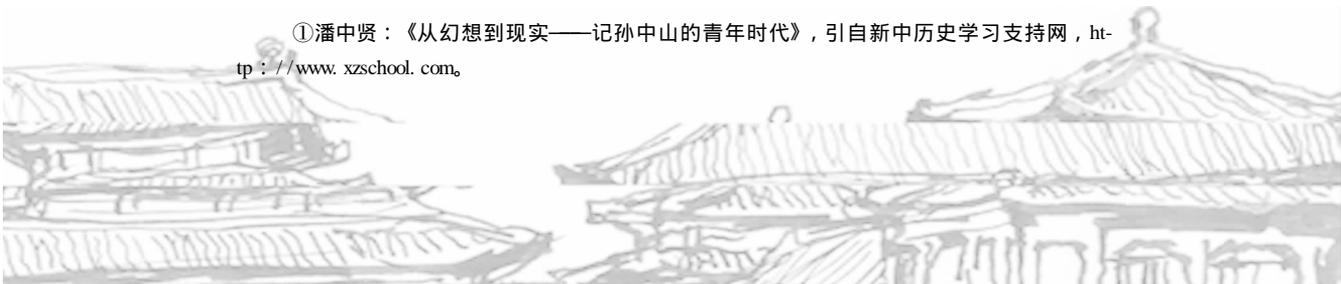


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组织成为当务之急。

应该说，孙中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转变对其一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对世界也必然有着特殊的认识。出身贫穷让他亲身体会到了地主剥削阶级的本质；檀香山见闻让他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并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而求学时肆无忌惮地漫谈奠定了他的伟大志向；中法战争、上书失败及中日甲午战争给予他接二连三的刺激，激发了他内心深处革命的火花。这一切贯穿着孙中山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也使他思想发生本质性的转变。

任何人都会经过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走好这一步至关重要。孙中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个 28 岁的青年，带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沿着宽敞而曲折的道路前进着……^①

^①潘中贤：《从幻想到现实——记孙中山的青年时代》，引自新中历史学习支持网，<http://www.xzschool.com>。



第五章 | 不确定的时代

铁骑踏进了北京城
泣血黄花
辛亥年的枪声
谁是总统
宋教仁之死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一节 铁骑踏进了北京城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直就不如欧洲和美洲的。这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可见一斑。还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对中国也有很高的评价。西方曾称赞中国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等等，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度，与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很多。特别是唐、宋、元代。大唐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这具古老的躯体丧失了青春的活力，慢慢地衰落下去，闻风而至的敌人也在寻找着机会。正如《草原帝国》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说：“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这些野蛮人吸引到中国来。”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标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认同感。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一些富有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赶不上衰败的速度。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官僚体制时要有更多的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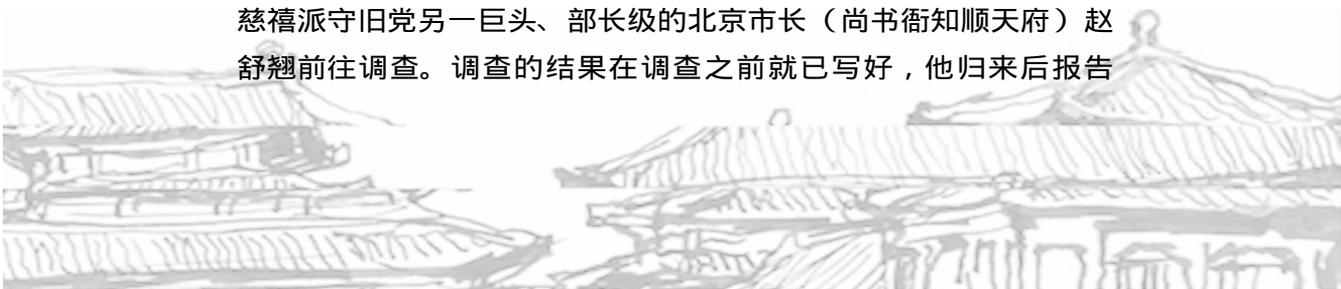


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历史课本早已将 19 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同道者所听懂，可是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然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

我们只能说，戊戌变法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虽然激起了一丝涟漪，可是没有办法惊起千重浪。

知识分子失败了，中国的农民站起来了。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于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 1899 年起事态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卷整个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对抗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膛炮装备的八国联军。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灵魂的屈辱。只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蹂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农民是愚昧的，他们的排外没有任何的选择性。

义和团，始发于山东，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扶清灭洋，刀枪不入”。1900 年，义和团在涿州（河北涿州）、保定（河北保定）一带，杀害铁路上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使馆提出交涉。那慈禧派守旧党另一巨头、部长级的北京市长（尚书衙门知顺天府）赵舒翹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在调查之前就已写好，他归来后报告



天 朝 末 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说，义和团都是忠义之士，确实确实不畏任何枪炮。守旧派意在利用义和团来向洋人发难，这样可以一石两鸟。于是慈禧停止了对义和团的镇压，招抚并命令义和团开进北京“抗洋”。

慈禧还把义和团首领请进宫中，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曹福田向老太后保证，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所有洋人杀光。直隶（河北省）总督裕禄也迎接女领袖黄莲圣母到他的官署，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黄莲圣母宣称，她已命令天兵天将降下大火，把外国人全数烧死。皇太子溥隽在颐和园里，一副义和团装束，自称是副领袖（二师兄），誓言扫除那些阻碍他立即登基的洋鬼子。

一向禁卫森严的九城向这些红布包头、红布兜肚的粗汉们全面开放，任凭他们到处设坛作法，操刀执杖，喊打喊杀，出入王府官邸，担当教师爷和门房大爷，向清兵传授刀枪不入之术，白米白银一批批赏下来，并许以首领们高官厚禄。他们扯起灭洋扶清的大旗，烧教堂、杀洋人。慈禧大加赞许，恣意纵容，于是义和团群情昂扬，争先恐后蜂涌所向，如火如荼，不可收拾。北京、直隶（河北省）和稍后任命毓贤当省长（巡抚）的山西省，全陷于义和团的风暴之中。不仅外国人，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洋事务有关的中国人，如带西洋眼镜、穿洋装的人，同样厄运当头。跟西洋有关的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也都被焚烧。

义和团在北京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在北京，义和团烧了前门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义和团漫入直隶，横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发现穿制服的学生，就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

各国对这种流血的动乱，十分震惊，驻北京的一些使节纷纷向中国政府要求火速派兵保护。他们还不知道，摧毁使馆正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计划。守旧派愚蠢地认为使馆是夷狄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夷狄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5月15日，



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到火车站探听援军的消息，在中途遭遇义和团，被拳勇肢解剥为肉酱。5月24日，德国公使克拉德不顾劝阻突出使馆，亲自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衙门却人去屋空。在中途被皇太子之父载漪所统率的军队（虎神营）射杀。北京对外电报、铁路等一切交通通讯都告断绝，慈禧太后认为时机已到，下令清军跟义和团联合进攻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第二天，即5月25日，慈禧下诏向世界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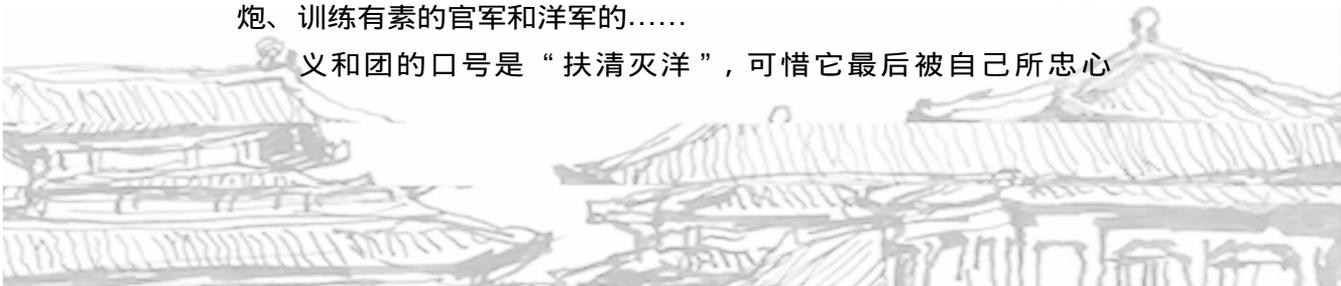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4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英、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

义和拳勇们自恃刀枪不入，举大刀挺长矛，以血肉之躯进攻使馆，各公使馆枪声大作。霎时，使馆门前成为血与火的海洋。各国使馆虽然只有400人守卫，清军跟义和团数万人进攻，都无法攻破。

此时慈禧太后已带着奴才们跑到承德山庄逍遥游，暗中却下令城中清军炮队乘乱轰击外国各使馆。炮队队长深知利害重大，不敢妄为，发空炮虚应慈禧，避免了大祸。

无奈，义和团们奋愤地喊起了“反清灭洋”的口号，可谁都知道一伙无知无识、迷信神灵的平头百姓，是不可能抵挡住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官军和洋军的……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可惜它最后被自己所忠心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的朝廷出卖而遭到扼杀。这次运动却给西方国家入侵制造了口实。

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国，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64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很快，8个主要国家组成联军，开进了紫禁城。1900年8月14日，是北京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这一天，由世界上8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侵华联军占领了北京城。

当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门、朝阳门破门而入。

英人当日记道：“日本人和俄国人所面对的满城城墙，高60英尺，顶部宽40英尺”，“城墙的顶上聚集着军队，这两支军队整天都被阻截住。作了无数次用强烈棉炸药轰开城门的努力，但是，每次派人去点燃引信时都被打倒了。这样持续到日本人和俄国人都各遭到了100人被打死的损失。”美军攻打东便门时，“城墙只有30英尺高，9英尺宽”，且“离中国人的火力较远”。于是美军“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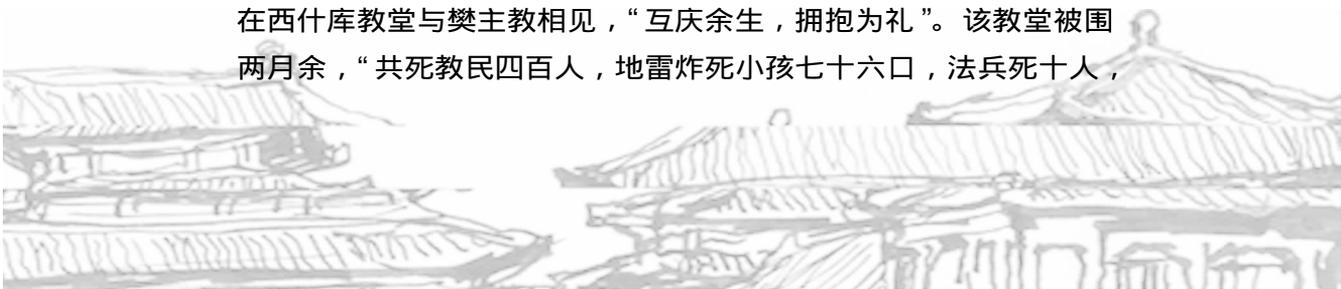


从城墙的角上用梯子爬上去，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爬了上去”。不过，虽然这是首先进入北京外城，“他们暴露在从满城城墙上射来的令人苦恼不堪的炮火之下”。中午，英军向宣武门冲击前进，“在10到12发炮弹放出之后，城门就打开了”。

15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内城及紫禁城进攻，美国人说：“已经决定攻打皇城，沙飞将军就命令美军在前门集中。在15日早晨7点30分左右，在前门上面内城城墙上架了4门大炮，”“3门大炮瞄准西边1.25英里的顺治门，敌人的步兵和可怜的炮兵正在那里开火。另一门炮正对准皇城”。当联军冲开天安门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门进攻时，“遭到城墙上、城楼上猛烈火力的攻击”。这日，炮声不绝，齐向内城轰击。美军在正阳门上发炮，前三门内火烟滚滚。及夜，北望城内，半天通红，照耀如昼。深夜子时，“闻排枪不绝，正官兵在天安门接仗”，“以洋兵炸炮力猛，势遂不支，收队入午门”。清军虎神营守后门、景山一带，列阵而待，黎明之时，“与洋兵鏖战许久，阵亡士卒甚多，尸横遍地。炮火来去，将后门轰毁，波及两旁房屋，尽成劫灰”。守安定门的是前吉林将军延茂，知大势已去，遂下城楼而去。“于是京师内九门全为英、日、美、俄四国所得，而树其旗帜矣。”清军在各街道与联军巷战，联军与清军交战一日，彼此均不甘休，日、俄、英各军渐渐驱逐清兵退至西北两方。美军则带炮兵进攻皇城南门，“当即毁去数门”。

16日，清军继续在京城各处激烈巷战，目击的美国人说：“有数千人自前日下午，已藏于宫墙之内，以候机会。中国枪弹亦甚猛烈，予由破裂倾斜之门跑进，心中跳动不已。”“有中国死尸在地，此皆性质坚毅，遇攻不退，死而犹烈者也。”法国大主教樊国梁当日记道：“街上防垒甚多，皆以米袋为之。除拳匪及屋内官兵不计外，街上驻守之官兵其数至少也达一千五百，皆持快枪。”

早7时，日兵、法兵救援西什库教堂，在西华门与清兵激战，清兵战死800人，法兵死2人，伤3人。10时许，法公使、提督皆在西什库教堂与樊主教相见，“互庆余生，拥抱为礼”。该教堂被围两月余，“共死教民四百人，地雷炸死小孩七十六口，法兵死十人，



意兵死五人”。至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

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痛苦之中，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分区占领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瓦德西到北京后住在慈禧太后原先居住的西苑仪鸾殿（后为怀仁堂），其内藏有珍宝极多。不久该殿即遭焚毁，据称这是偷盗者纵火灭迹。抢劫更是随处可见，瓦德西在《拳乱日记》里说侵略军攻陷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皇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劫后残余的《永乐大典》，此次又“失去三百零七册”。此外遗失的珍贵图书“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百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大肆屠杀，被捕的义和团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说是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侵略军把西四北太平仓胡同的庄亲王府放火烧光，当场烧死1700人。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法国军队路遇一队中国人，竟用机枪把人群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不留一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杀人时，八国联军全副武装“监斩”，并从各个角度照相，企图恐吓中国人民。这些照片如今成为八国联军罪行的铁证。

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挎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



劫掠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瑞澄在家书中称：“各国洋兵已满九城，火光冲天者三日夜，地安门桥以南烧尽，西四至西单烧尽，朝阳门楼、前门楼均烧化为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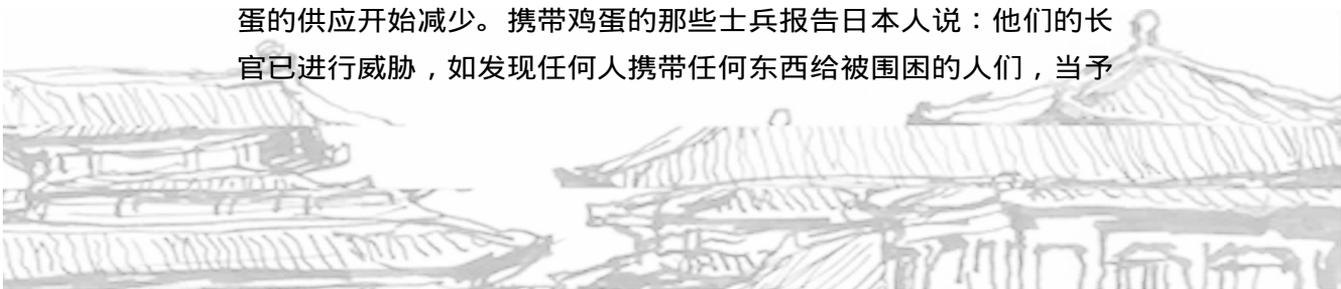
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实事求是地讲，这时的中国兵多、武器也不差，那怎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八国联军打败了呢？只能说是战斗力极低、极差而已！义和团我们且不说它，那是一群迷信刀枪不入、崇尚大刀长矛冷兵器的普通农民。单说说官军，这是一支自从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装备洋枪洋炮、按照洋式方法训练出来“新军”，号“武卫军”，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每军万余人，总共5万多人。此时，除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去了山东、宋庆的“武卫左军”驻扎山海关内外，“前、中、后”三军布署在津京一线，北京城中也还有宫廷卫队和八旗亲兵。京城内这万余官军，攻打区区不足千人守卫的外国使馆区，大炮轰步兵冲挖地道放火烧，忙活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攻克，甚至连人家屋顶上的外国旗帜都照旧迎风飘扬，这不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又是什么呢！

战斗力低下的根源，首推腐败，清末的政治腐败、官场腐败、军纪腐败是尽人皆知的。读史读到细节处，每每看到上层的惧洋媚外、底层的吃里扒外。举两个例子：

一是6月19日清廷决定宣战后，攻打使馆不克，7月15日闻讯天津失守，西太后遂“命总理衙门向各国使馆馈送西瓜果品及各种食物”，以讨洋人欢心。弄得洋人“疑为有毒而不敢食之”。7月25日清军接着又继续攻击使馆。

二是给“日本人开辟了一个买卖鸡蛋的小市场。中国士兵把鸡蛋藏在他们宽大的袖子里面带过来，卖给我们的人”。“24日，鸡蛋的供应开始减少。携带鸡蛋的那些士兵报告日本人说：他们的长官已进行威胁，如发现任何人携带任何东西给被围困的人们，当予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处决。23日，日本人看见有两人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斩首。”向洋人卖鸡蛋的这些士兵当中，有一人甚至在洋人出价250元之后，为其往返天津送了3封求援信。

面对战场上的敌人，“统帅送西瓜、士兵卖鸡蛋”，像这样的队伍还能打胜仗？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军队！

此时的清廷已经逃跑了，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后来避过了风头的慈禧太后对列强还保留着大清朝还是暗自庆幸的。毫无疑问，在八国联军横扫了华北的京津地区以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以及军政、军民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制肘的现状，使原本就昏庸无能的清王朝统治者彻底放弃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念，它们转而卖身投靠、乞求在洋人的庇护下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统治。于是，李鸿章与列强诸国（11国）的代表们经过半年多的谈判，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想安安稳稳地过最后的几年。

有了条约，就该老老实实在地执行吧，对此，慈禧老佛爷可说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史载：她对洋人之所求无不“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不时入宫，与闻内”。1902年2月1日，慈禧亲自接见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子女，据美国公使康格夫人后来说，太后一把抓住她的手，抽泣哽咽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后悔莫及；又赶紧摘下自己手上的贵重戒指和手镯给康格夫人戴上。

见此情景，就连有些有点良心的西方人、包括像英国的狄龙博士先生这样的人，都不免有些看不上眼去，1902年2月9日他说道：“觐见活动进行得太好了，以致有些爱挑剔的人们认为有些热情过分，因而怀疑是虚伪的。特别是在接见夫人们的时候，皇太后的风度潇洒极了！据说本月28日还将举行一次觐见。”

就在老佛爷风度潇洒地享受着和平日子时，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清政府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的国土划为“交战区”，供人家打仗；西藏爆发了江孜之战——电影《红河谷》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此战，中央政府驻藏大臣有泰不是和藏族同胞共同御外，而是要使抗英的藏族失败，好由他向英军乞降。他在奏折中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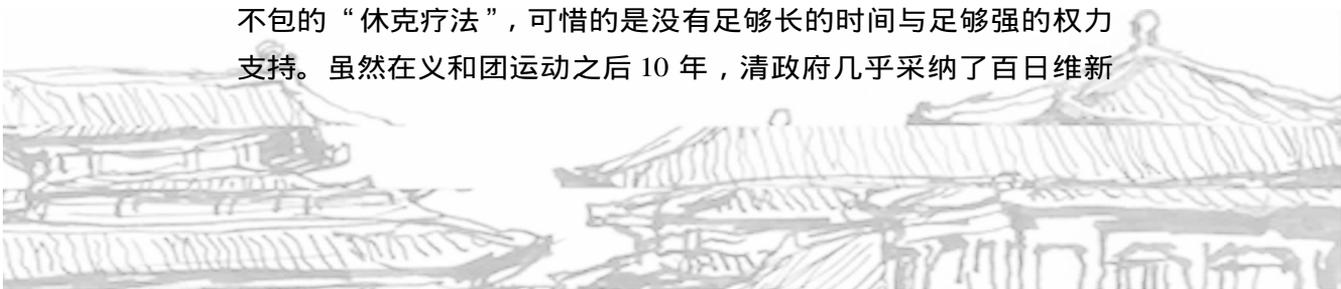
“惟藏番执拗无理，胆大妄为，……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令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7月6日江孜陷落。达赖喇嘛十三世等在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前星夜北走，使全藏无人主持。英军则沿途劫掠、烧杀之后，竟得到有泰亲下英营表示的“欢迎”，及送去的米、面、牛、羊的“犒赏”。

自此以后，积弱的中国门户大开，那门边上的看门人都成了黄头发白皮肤的洋大人。俄国在东北，英国在上海、武汉和西藏，法国在南方的云贵两广，德国在山东，日本在东南台闽，而美国则后来居上的要求利益均沾。这些洋大人们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从中国丰厚的资源中攫取了数不尽的利润回去。就这样整整又闹腾了十几年，终于民国了，北伐了，抗战了，又是十多年，这才在“十一”28响礼炮声中，迎来了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

古老的中国在19世纪末一点一点地沉没，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却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一切。道光由此断送了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也都没有让中国这头被拿破仑称作“睡狮”的狮子醒过来。同样，30多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再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却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对面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太后仍然可以相对而言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情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可惜的是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



天 朝 末 日

清
朝
最
后
五
十
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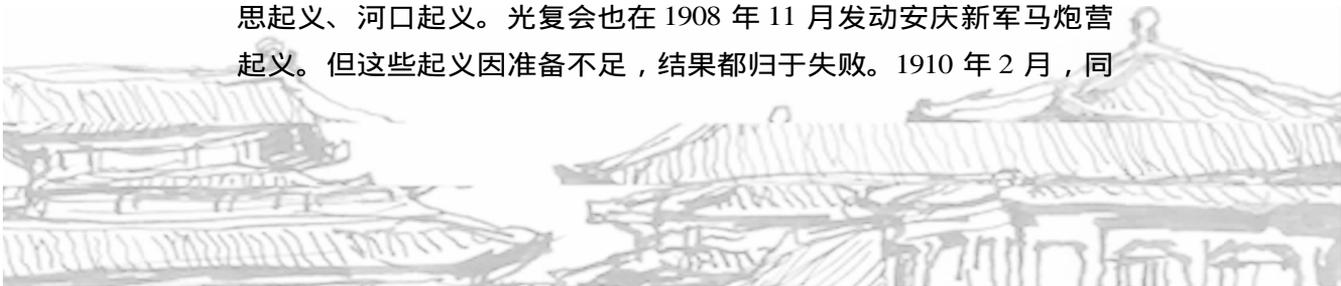
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它腐败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被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它，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第二节 泣血黄花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小日本，割让台湾，赔款4亿两白银，激起了全国民众极大愤慨，也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无数爱国青年认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发动中国民主革命，方能求得中国的富强。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但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



天朝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232

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 3000 人起义，又遭失败。

自 1895 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来，革命党人已经发动过十几次起义了，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不少同盟会的干部及会员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如孙中山所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十几次反清革命起义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转而走上暗杀道路。

面对严酷的革命现实，是半途而废，还是不屈不挠继续前进，这对革命领导者来说是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孙中山屡败屡起，不屈不挠。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英勇悲壮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动的。

1910 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檳榔屿（又称庇能），打算再举起义。孙中山先是给南洋各地革命党负责人写信，约集他们集中到檳榔屿开会。如 10 月 28 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说，“足下关怀大局之深，良足钦感”。“弟今另有所见，必须足下牺牲数礼拜之时日，亲来商助，则事望可成。见信之日，无论如何匆忙，必请早临为禱。至急！至要！余容面谈。”

各地党人接到孙中山的信后，陆续来到檳榔屿。11 月 13 日，在大石街檳城书报社（有说在孙中山寓所四间街决醒园）召开秘密会议，到会者有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及华侨代表共 53 人。会议开始后，孙中山首先发言说，现在时机紧迫，我们应当作破釜沉舟的计划，款项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我们不乏热心的同志，可惜以多而分散，而且没有事先准备妥当，好比临渴掘井，并没有长远的计划。现在检讨以前的失败，所以要集全力进行，更须首先集齐款项，成功和失败，都由我们现在去决定了。

接着，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孙中山的意见，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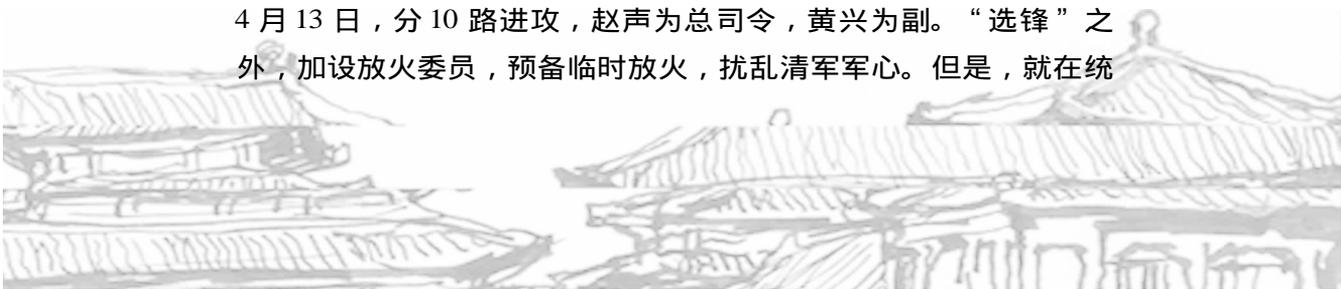
了发动起义的具体问题。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另选革命党人 500（后增至 800）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槟榔屿会议刚一结束，孙中山又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筹款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假如起义再失败，他就荐贤自代领导革命。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大家当即捐出 8000 元港币由赵声带回香港作准备活动的费用。

筹款工作安排大体就绪后，孙中山准备在南洋各地发动筹款。但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的活动，尤其是最后这次秘密筹款会议，为保皇会分子所获悉，他们不但报告给了殖民政府，而且还在当地的一家英文报刊上刊登了孙中山的秘密演说全文。先是荷印政府不准孙中山入境，继之马来亚也限期令其出境，日本、越南等地限制入境期均未满。这样，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觉开口之为难也”，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恰逢此时，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孙遂只身前往，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 年 1 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 月 8 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起义日期定在 4 月 13 日，分 10 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但是，就在统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起义日期不得不推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5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10路进军计划改为4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越墙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3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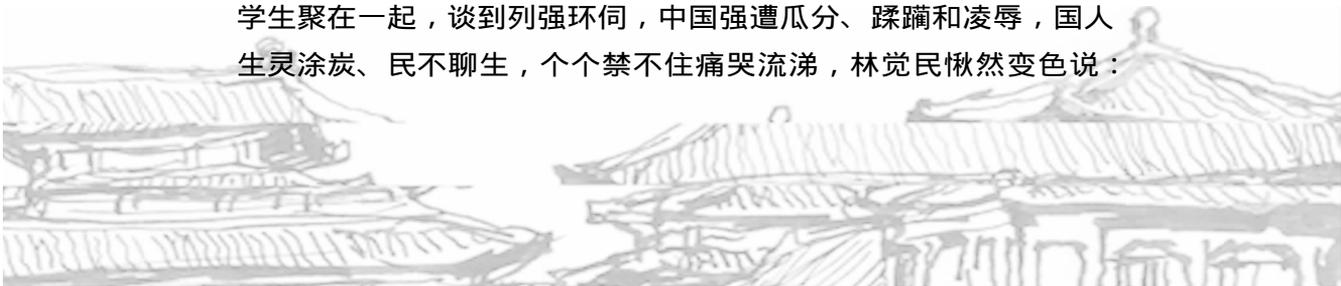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台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黄花岗之役死难烈士共100多人，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在这72人中仅福州籍就有23人，林觉民是其中的一个。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72烈士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大概算是林觉民了。

林觉民，福建福州人。他出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饱受煎熬的1887年。林觉民少时厌恶科举，1900年遵父命应考童生，这位年仅13岁的孩子在考卷上留下的只有“少年不望万户侯”7个大字，第一个交卷掷笔离去。父亲对儿子寄予厚望——学而优才能做官，才能光耀门庭。然而，父亲没有想到，15岁的林觉民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参与反封建革命斗争。1905年，林觉民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发表了《六国宪法论》等，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与留日学生聚在一起，谈到列强环伺，中国强遭瓜分、蹂躏和凌辱，国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个个禁不住痛哭流涕，林觉民愀然变色说：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中国危殆至此，男儿死就死了，何必对泣，凡是有血气的男子，怎么能坐视亡国惨状？

1911年他受孙中山的委派，回国筹备武装起义。同盟会对此充满信心。为了准备这次起义，他们动员了所有的精英。临去广州的前一天，林觉民回到家里，这是他与家人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有了身孕。家里人不会想到，这是他们与林觉民见的最后一面。

1911年4月24日深夜，广州起义前3天，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挑灯写下了那封几乎每一个上过高中的人都熟悉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全书婉转千余字，读之断肠，催人泪下，即倾诉了对妻子真挚的爱，更抒发了他忧国忧民，为了中国的前途勇于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另外一封绝笔书是写给他父亲的：“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公而忘私，为国杀身成仁的决心。

林觉民在战斗中与清军展开肉搏血战，身受重伤力竭被捕。主持审讯的是两广总督张鸣岐。

当然，张鸣岐和林觉民共同明白，大堂上的吆喝、惊堂木、刑具以及声色俱厉的控告都已丧失了意义。身负镣铐的林觉民心怀必死之志。老父牵挂，娇妻倚门，24岁的人眼神清澈，步履轻盈，但是，林觉民还是坚定地往黄泉路上走去——那么多的福州乡亲已经在鬼门关那边等他了。半个月之前，林觉民潜回福州，召集一批福州的同盟会会员秘密赴粤。他们在台江码头分搭两艘夹板船抵马尾港，随后换乘轮船出闽江口，沿海岸线南下广州。总督衙门一役，殒命的福州乡亲多达20余人。林觉民深为敬重的林文已经先走了一步。东辕门遭遇战，林文企图策反李准部下。手执号筒的林文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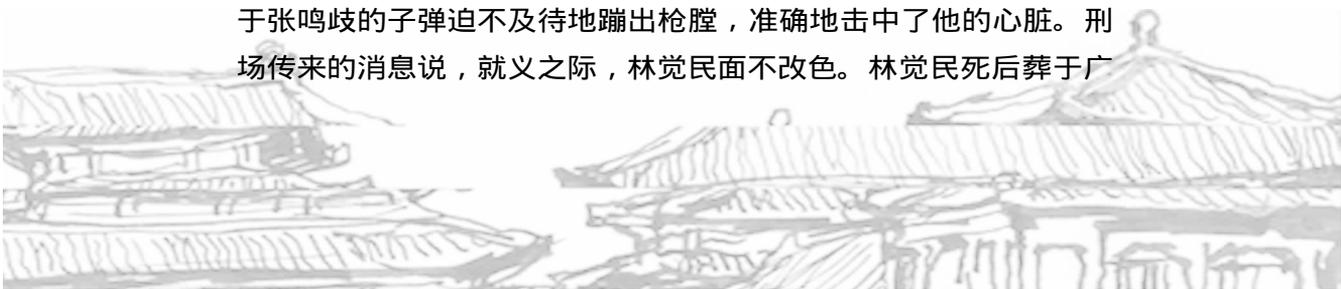


身而出，带有福州腔的国语向对方高喊“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应声而至的是一枚刻薄的子弹。子弹正中脑门，脑浆如注，立刻毙命。冯超骧被“水师兵团围数重，身被十余创，犹左弹右枪，力战而死”；刘元栋“吼怒猛扑，所向摧破，敌惊为军神，望而却走，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血流满面，移时而绝”。还有方声洞，也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的福建部长，曾经习医数载，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随后孤身被围，“数枪环攻而死”。林尹民、陈更新、陈与桑、陈可钧、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他们或者尸横疆场，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刃，林觉民又怎么可能独自苟活于天地之间？

想用囚犯的演说打动审讯者，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林觉民的灼灼目光与慷慨陈辞还是震撼了在座的清军水师提督李准。世界形势，清朝的朽败，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事业，林觉民血脉贲张，嗓门嘶哑，激烈的手势将身上的镣铐震得当啷啷地响。即使是一介武夫，李准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林觉民身上逼人的英气。他挥手招来了衙役，解除镣铐，摆上座位，笔墨侍候。林觉民揉了揉僵硬的手腕，坦然坐下，挥毫疾书，墨迹淋漓飞溅。刚刚写满一张纸，李准立即趋前取走，转身捧给张鸣歧阅读。大清王朝忽喇喇如大厦将倾，蝼蚁般的草民茫然如痴，革命者铤而走险，拳拳之心谁人能解？林觉民一时悲愤难遏，一把扯开了衣襟，挥拳将胸部擂得嘭嘭地响。一口痰涌了上来，林觉民大咳一声含在口中而不肯唾到地上。李准起身端来一个痰盂，亲自侍奉林觉民将痰吐出。

目睹这一切，张鸣歧俯身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的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杀！”

林觉民被押回狱中，从此滴水不肯入口。数日之后，一发受命于张鸣歧的子弹迫不及待地蹦出枪膛，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心脏。刑场传来的消息说，就义之际，林觉民面不改色。林觉民死后葬于广



天朝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州的黄花岗荒丘。

风和日照，黄花纷纷扬扬，漫山遍野，阴雨绵绵，那就是72个英魂相聚的时节。坟莹之间啾啾齐鸣，议论的仍然是国事天下事。

参加广州起义的全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而非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缺乏经验、资金、武器乃至中国人的理解，也许会被嘲笑为不自量力的激进愤青，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决心。起义前夕，年轻的革命党人表现出对亲人仍然难离难舍的情绪，也有少数对起义缺乏信心，想打退堂鼓，林觉民当时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惟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革命前仆后继，决无退却之说！不可失信于海外侨胞和国内同胞。”这是何等坚定不移，义无反顾的决心。

除了林觉民，在这场起义里还要提及的一个人就是赵声。赵声是此次起义的总指挥，在著名的槟榔屿会议结束后，赵声第一个抵达香港，设立机关，联系新军，组织“选锋”，确定计划步骤，开始了这次伟大义举的各项准备。在组织起义过程中，他任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课课长，废寝忘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一点是不能不提及的。此次起义的总目标在于挥师北伐，取长江而直捣幽燕，由此积极联络和发动各省做好响应广州起义的准备，非常重要，此项工作由赵声兼任课长的交通课筹划进行。赵声派人携款到苏、鄂、湘、浙、赣等长江流域各省联系党人，筹建机关，发动新军，组织力量，为响应广州起义做好一切准备。当时，赵声所走出的这一步，在革命党与清政府的决斗中，可谓着力的一招，虽然由于黄花岗3月29日之役失败而使北伐流产，但这一部署却构成同年10月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并为各省一呼百应的光复，显出了威力和光彩。



起义行动前夕，由于赵声在新军中深深重望，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悲愤欲绝，加之长时间劳累积疾，回到香港就病倒了。4月8日开始病情加重，17日开刀手术，不久病情恶化。19日，他将陈英士等同志召于床前，勉励甚切，悲愤地说，“我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并连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声泪俱下，自后再不能说话。第二天下午1时与世长辞。

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所有的人力、财力，作了长期的准备，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起适合武装起义的权威领导机构，参与组织起义的一些重要骨干在起义即将爆发的紧急关头，仍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致使起义日期一改再改，临到起义，各部除黄兴一路外均借故不发动，造成了孤军奋战的局面；二是计划不周密，起义尚未爆发，消息就已走漏，使清军早有准备，而革命党方面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枪械运输），最后只得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仓促发难，自然难保成功；三是没有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起义只是少数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许多历史著作记载了辛亥年三月份广州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那时的广州是搁在中国南部的一座发烫的活火山，革命家和志士仁人穿梭往来，气氛紧张诡异。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许，总督衙门附近砰砰地响成一片，流弹噓噓地四处乱飞。枪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大清王朝的历史却被打出了许多窟窿。

5个多月之后，也就是辛亥年九月，公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民国成立。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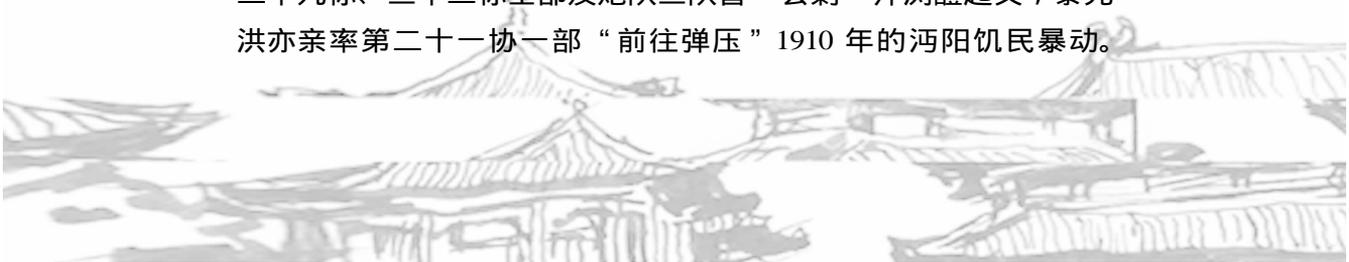
第三节 辛亥年的枪声

在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里，辛亥是一个普通的纪年称号。但是在历史走到公元1911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一年，中国推倒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一年，正是中国农历的辛亥年。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必须追溯到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清政府强行接收粤、川、湘、鄂四地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地的保路运动沸反盈天。四川尤为激烈，成都发生血案。清政府急忙调遣湖北新军入川弹压，湖北的革命党乘虚奋勇一击，长长的锁链终于哗地解体。

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清末，遍及城乡的抢米抗税风潮、会党起事、反洋教斗争以至自立军起事、萍浏醴起义等，都是以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会党分子等社会下层群众为主要参加者。湖北新军作为震慑两湖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时常被派去镇压群众斗争。第八镇第十五协之二十九标、三十二标全部及炮队三队曾“会剿”萍浏醴起义，黎元洪亦亲率第二十一协一部“前往弹压”1910年的沔阳饥民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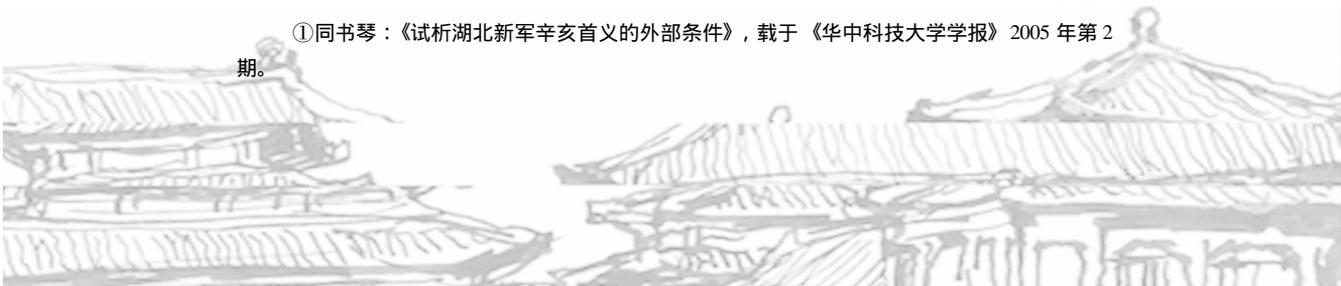


然而，新军士兵却与他们要镇压的所谓“暴民”、“乱党”多具共同的社会背景，都来自社会下层。这使得新军士兵比较容易理解、同情这些因饥饿、贫困乃至为民族大义铤而走险的人们，以致在执行命令时“受到良心的自责”而产生“普遍厌恶”情绪。

当时，部分新军官兵也亲身参加到了当时的政治风暴中。唐才常创自立军，“以军人、会党及农民为多数”。萍浏醴起义，驻汉阳兵工厂的新军官兵“亦有参与者”。一些新军士兵还加入了具有鲜明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有的营队内部甚至形成会党组织，马八标就有以士兵张国荃、李秀昂为首的江湖会。特别是湖北保路运动，新军的参与可说是这场运动的特色之一（尽管它没有发展成四川保路运动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激烈的程度）。在汉口四官殿、奥略楼侧之张文襄公祠等处举行的各次保路集会中，均有不少新军官兵参加，并有“陆军军官、……兵士代表演说，慷慨激昂”，甚至出现了新军士兵陶勋臣为保路怒而挥刀断指的壮举，轰动一时。为筹集铁路股款，“军界黎统领元洪、曾统领广大、陆军测绘学堂刘监督邦骥，已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显然，湖北新军从士兵到军官确有许多人参加到保路运动中来。^①

早在广州起义之前的1911年1月，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武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作持久抵抗。谭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北响应。惟独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并历数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张之洞督鄂以来，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很有成绩，武汉可以说是械精饷足之区；武汉系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灵通，粮秣运输的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半壁，传檄可定；瑞徵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同载沣表里为奸，国人恨之入骨，

^①同书琴：《试析湖北新军辛亥首义的外部条件》，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义旗一举，全省百姓都能为我所用。兵力、武器、地势、人情这四个条件，是广州无可比拟的。

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这些流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些流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悠关的流言。^①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加速了武汉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两个革命团体的有识之士深感起义责任重大，日益产生了联合起义的思想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多次协商，于1911年8月最终决定联合。这期间，湘鄂川粤等地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四川尤甚，已发展成保路起义。清廷慌了手脚，四处调兵遣将前往镇压。

9月21日，清政府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抵川，鄂军第八镇所属第十六协大部分兵力入川，另一部分兵力驻防汉阳、汉口和周围他县，省城内外兵力仅14个标约7000余人，其中参加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士兵约占三分之一以上。战争打响以后，还会发生官兵反正。形势对武昌首义极为有利。

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召

^①黄岭峻：《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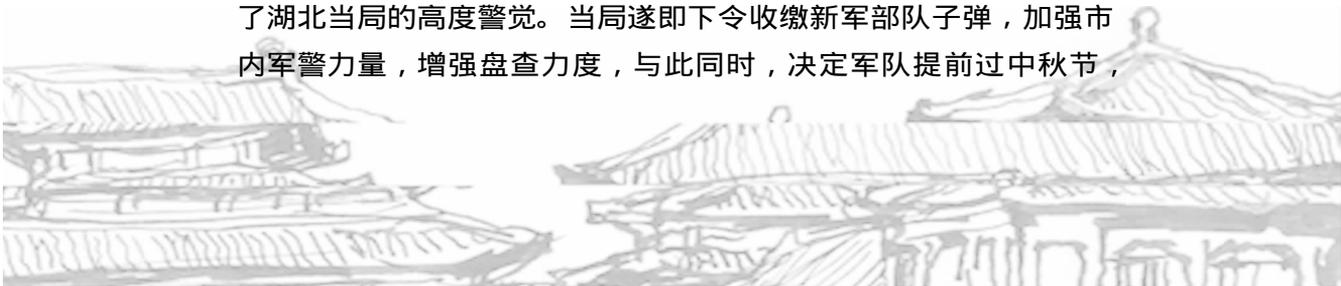


开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代表 60 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制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人选，军事上，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武昌小朝街 85 号文学社机关内，政治筹备处设汉口宝善里 14 号。起义日期定为 1911 年 10 月 6 日（中秋节）。在分途准备中，痛感时间紧迫，起义日期又延至 10 月 11 日。这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担心武汉一地发动起义靠不住，黄兴也有 11 省同时发动起义方能取胜的说法。这些消息传到武汉，又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一度迟疑。

革命党人在新军的宣传组织活动，时常被湖北当局觉察，但当局开始采取息事宁人的方针，尽量不将事态扩大。如，1910 年 4 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欲调湖北新军前往弹压，同志决议乘机举义。查光佛、孙昌复等潜运炸药事泄，张彪恐激成事变，不欲深究”。继而采取釜底抽薪之计，以达“消灭革命于无形”之目的。

湖广总督瑞澂为防备新军中党人图谋“不轨”，遂从 1911 年 7 月起，陆续将“不稳”新军调离武汉三镇。其调动情况是：第八镇所属第二十九标第三营调防郟阳；第三十标第二营移防汉口，以一队驻钟祥；第三十一标全标由第十六协统领邓承拔、标统曾广大率领开往四川；第三十二标第一营作为端方卫队随行（时清廷任端方为铁路大臣，率军赴四川镇压保路风潮），第二营驻宜昌，第三营恩施待命。第八标第二营以两个队出防枣阳，第三营开襄阳、双沟一带换防。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出防宜昌，第二营两个队驻沔阳，一个队驻岳阳。第四十二标驻汉口、汉阳以迄京汉铁路黄河南岸为止。调离武昌的新军约占全部新军的二分之一。

由于革命党人分散而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9 月 24 日会议后有关革命党“中秋起事”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24 日当夜又发生南湖炮八标三营左队党人暴动。“中秋起事”消息与炮队暴动，引起了湖北当局的高度警觉。当局遂即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加强市内军警力量，增强盘查力度，与此同时，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八月十五不放假。革命不得不延期。

10月9日中午，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武与军事筹备委员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正全神贯注、小心翼翼把几年前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包炸药装配成炸弹，供起义时使用。不一会儿，邓玉麟因有事暂时离开，室内只剩下孙武一人，继续埋头作业。正在这时，政治筹备处总理刘公的弟弟刘同走了进来，嘴里叼着支烟卷，边抽烟边看孙武装配炸药。吸了两口，他习惯地弹了弹烟灰，不料烟灰弹落在炸药上，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起火，孙武头部被炸伤，刘同被吓得不知所措。在隔壁印制钞票的理财部长刘作栋等见孙武受伤，忙拉过一件破衣服，将他的头蒙住，抬着他从后门逃出14号机关，到德租界同仁医院抢救。在不远处巡逻的俄国巡捕听到爆炸声，马上奔来搜查，发现了放在机关里的旗帜、文告、印信、符号、名册及自制钞票等，立即将情况报告了驻武汉的领事敖康夫。敖康夫将搜到的东西送交给清政府湖广总督瑞澂，并报告了情形经过。瑞澂立即宣布戒严，调集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分道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所在的武昌机关总部，也遇到军警袭击，蒋翊武逃脱，但多人被捕。起义的文件、印信、旗帜等重要机密被搜走。与共进会机关相邻的刘公寓所亦被查抄，刘公之弟刘同等4人被捕。湖广总督闻报搜查和提审情况，深感事态紧急，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址搜查革命机关，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

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9日和10日两天中，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坏，不幸被捕人员多达30余人。当瑞澂得悉新军中亦有不少革命党人时，又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士兵出入，并收缴了士兵手中的枪弹。风声大紧，恐怖笼罩，起义指挥部领导人伤的伤，逃的逃，被捕的被捕，起义几乎无法进行。幸运的是，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认为与其坐等待毙，不如奋起一搏，在革命党人首领或伤、或逃、或亡，群龙无首的危难关头，革命党人破釜沉舟、猝然发难。就在宝善里机关失事的当天，小朝街军事指挥部正召开各标营代表会议，讨论起义日期展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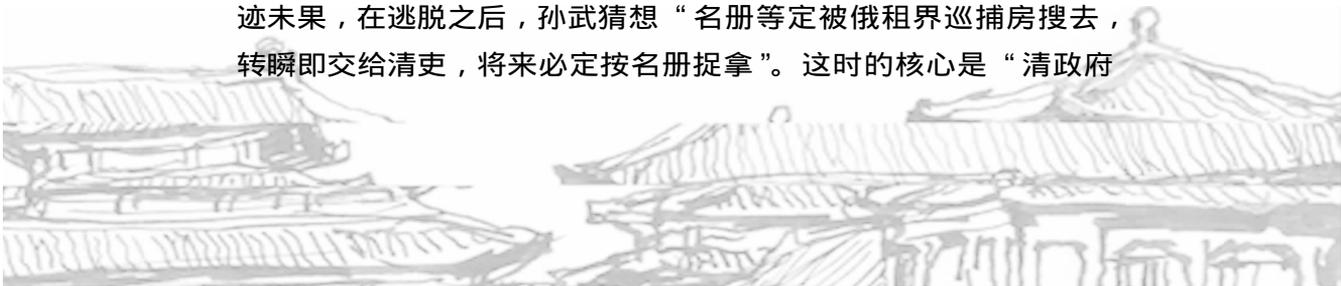


事宜。会议期间，传来宝善里机关失事的消息，军事指挥部与会同志群情激愤，决定于武汉三镇同时举事，蒋翊武悲壮表示：“大好头颅，同拼一掷”，“遂下令于夜半发动”。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刘复基等军事负责人，得知汉口出事，起义计划暴露，深感已是千钧一发时刻，如不尽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断然决定起义提前至当晚12时发动，以中和门（今起义门）外炮声为号，随即派人火速向新军各兵营革命党人秘密传递起义命令。

当晚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慌忙中投弹未炸被捕，彭楚藩亦被捉，蒋翊武因身著长袍马褂且蓄长辫未被军警注意，乘隙脱逃。党人杨宏胜在给各营送弹药途中被军警跟踪，投弹失误自伤而落入敌手。由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命令未能按时送达城外炮队，当晚12时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应该说，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澂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3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但一则流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这则流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流言的流传有了可能。当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这时的核心是“清政府



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

其次，当天，彭、刘、杨3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流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3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第三十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流言的真实性。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流言。^①

历史的这一幕又回到了我们的眼前。1911年10月10日当天的白天，湖北清朝政府还在正常地运行，把3个企图造反的党人（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现在湖北武昌的一条街道彭刘杨路就是为缅怀他们而命名的）砍掉了脑袋。到了晚上，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里有几个老兵油子（其中就有熊秉坤）闲着无事在营房的一个墙脚里议论这件事情。这时，他们的哨长（相当于现在的排长）走过来了，见他们这么晚了还不睡，就骂了一句：这么晚了，想造反啊，作死！几个兵油子本来就对这个平时人五人六喜欢在当兵的面前作威作福的哨长一肚子不满，听他这样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时火起，对骂一句：造反就造反！拿出枪一枪就把哨长打死。于是兵变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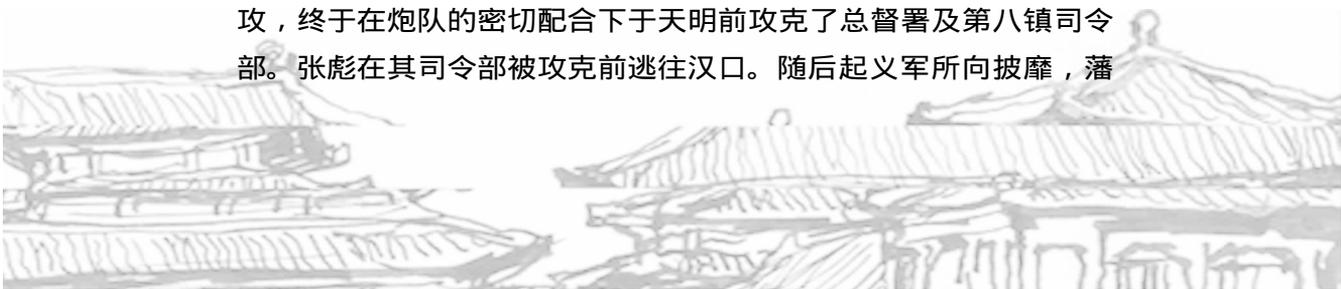
紧接着，三志士在湖广总督署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开，军警的搜捕仍在紧张进行。许多革命党人和发动起来的新军兵士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起义形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晚7时许，驻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

^①黄岭峻：《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房里，首先发生兵士哗变，响起了枪声，有几个官佐被击毙，该营党人总代表、新军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见状，立即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奔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在本营驻防军械库兵士的策应下，占领了军械库，并打开了库门。起义部队得到军火，士气大振。这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士兵约300余人。由于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在军警搜捕时脱逃，其他起义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现场上群龙无首，无法统一指挥。在场职位最高的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负责现场指挥，尽力稳住军心。这时，有士兵建议，把起义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来当总指挥。熊秉坤胸怀全局，考虑自己职卑位低，恐难左右局势，给起义带来不良后果，于是欣然顺应士兵要求，推举吴兆麟当临时总指挥。吴原系日知会会员，后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此人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吴不负众望，他立即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同时再次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城内外得知事起的革命部队纷纷向楚望台集结。

在各起义部队向楚望台集结的同时，吴兆麟、熊秉坤已率起义部队向湖广总督署内（今武昌造船厂）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很艰苦，不克而返。南湖炮队入城，楚望台、蛇山等处的炮击开始以后，战局出现转机。新军各标营更多的士兵起义响应，营以上军官绝大多数见势不妙，保命离营。此刻，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兼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起义，并组织可靠兵力保卫督署，全剿起义士兵，致使进攻督署之战，连连受阻。受挫以后，起义军再次组织兵力进攻督署，且兵分三路，在大街小巷展开血战。由于天黑又下雨，目标能见度低，炮屡发不中，于是有人冒死冲往督署附近纵火，以火光为标志，提高炮击的命中率。接着，督署签押房被击中。瑞澂和铁忠见大势已去，慌忙中打破署院后墙逃往长江的一艘兵舰上。张彪仍在其司令部（第八镇司令部在督署附近）顽抗。起义军经过三次进攻，终于在炮队的密切配合下于天明前攻克了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张彪在其司令部被攻克前逃往汉口。随后起义军所向披靡，藩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抗抗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台衙门很快亦被起义军占领。

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州，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在汉口的孙武与逃奔武昌的蒋翊武也失去联络。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军政府的首脑应由社会上有“资望”的人出任，才能号召群众。这样，旧军官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立宪党人汤化龙作了民政部长。

黎元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后升任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他一贯仇视革命党人的活动，武昌起义的当晚，还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当推举他任都督时，他竟喊道：“莫害我！”起义士兵举枪逼他上任，黎元洪无奈，被迫就职。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武昌起义枪声一停，湖北军政府即于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恐。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廷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11月1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次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一个多月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



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 2000 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同时，各省立宪派和封建官僚投机革命，控制了大部分地方政权。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江苏宣告独立时，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巡抚程德全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江苏都督。

湖南建立军政府以后，革命党人焦达峰任都督，很受群众欢迎。立宪派以“军民分治”为名，要求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出任军政府的民政部长。焦达峰等革命党人竟对立宪派妥协。在谭延闿的煽动下叛军冲击都督府，焦达峰被乱刀砍死。政变以后，谭延闿当上了湖南军政府都督，政权落入立宪派地主官僚手中。

革命虽然成功，可是对中国内在的撼动仍是相当有限的。在近代，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革命的主力军。但革命党没有把重点放在领导农民革命上，没有造成深刻的农村变动。这一思想在鲁迅的《阿 Q 正传》中有深刻生动的反映。鲁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刻画了阿 Q 这样一个贫苦农民形象，阿 Q 热切向往革命，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假洋鬼子”不要他革命，阿 Q 不仅不能参加革命，最终还被新的“革命政权”当作盗匪枪毙了。这是阿 Q 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民主观念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深入人心，政坛混乱。所谓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成了一具躯壳。由于辛亥革命的超前性所导致的中国宪政制度，实为一早产儿，在其初生阶段的混乱到了令人泣笑不得的地步。正如时人所道：“政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积弊甚于晚清。”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第四节 谁是总统

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很多地区宣布独立成立自治军政府。清朝政府一片恐慌，它赶紧派官员领军队进攻武昌，可所依靠的新军却不肯听从指挥，调度不灵，军事上长时间没有进展。谁来出面支撑这一盘散沙呢？西方国家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为代表，建议清朝政府任用袁世凯出头收拾局面。

在大清帝国袁世凯应该算是个颇为能干的人物。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小时候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荒于科业。不过，袁世凯的家族在清代倒是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袁保中在地方上列钜绅，剿办捻军期间，筹办团防，平捻有力，受到朝廷嘉奖。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是淮军中剿平捻军最有功勋的名将，最后官拜总督。袁的叔父袁保庆一向追随袁甲三，在袁甲三手下颇著功绩。袁世凯在家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因为自己弟弟袁保庆征战在外，年过40还没有儿子，而自己子女却很多，就把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袁世凯过继后，颇受袁保庆一家人宠爱。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世凯时年8岁，也随养父一起到了山东。两年后，袁保庆调到江苏，袁亦随同前往。1874年，袁保庆死于江南盐巡道任内，袁回到河南项城。1875年，他的堂叔袁保恒回家，见袁游手好闲，就将他带到了北京，受业于堂叔袁保龄。1876年，袁返回项城参加了乡试，落第。同年，时年18岁的袁世凯与一位姓于的小姐结婚。婚后，袁重回北京，并随袁保恒到河南赈灾。袁保恒死于河南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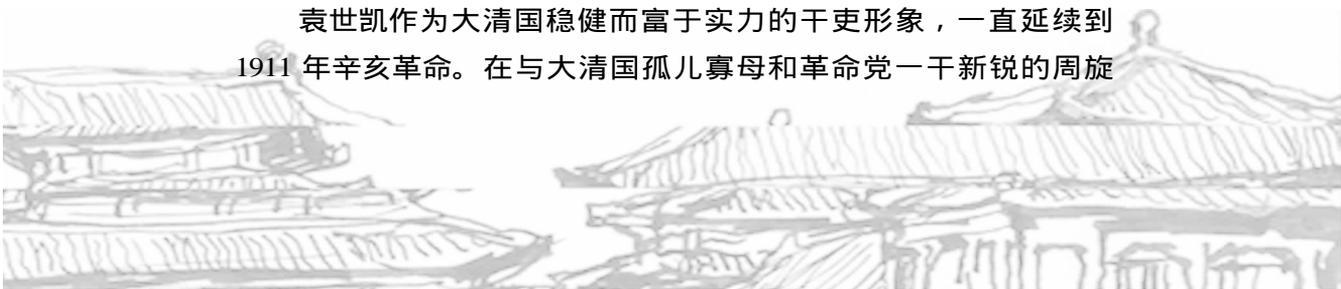
封，第二年朝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袁世凯得到了堂叔父的余荫，朝廷捐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但袁并没有将这个捐官看在眼里，他将自己所读的诗文和书籍用一把火给烧了，并对自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娱岁月？1880年，他的“志在四方”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了，他被推荐到养父昔日友人庆军统领吴长庆那里，成了山东军营中的一名将士。就是从那时起，袁世凯开始步步高升，直到权力的顶峰。

不久，袁世凯就带领清军去攻打朝鲜的农民起义军，开始受到提升重用。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他曾经受清政府委派在天津训练新式陆军，新军的很多将领都和他关系密切，外人根本指挥不动；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显著。袁世凯，这位河南籍汉人，历史的嬗变和时代的际遇使他走到了权力的中心位置。

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有意除掉身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袁得密报，惊恐万状，遂以“足疾”为由，辞官归隐，躲进河南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别墅。为掩人耳目，袁世凯让人拍了几幅题为《烟蓑雨笠——渔舟图》的照片，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袁世凯垂钓的模样使人觉得这位不到50岁的枭雄，真的要归隐了。然而，袁世凯在一系列归隐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雄心。比如“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实际上，袁世凯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可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作为大清国稳健而富于实力的干吏形象，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与大清国孤儿寡母和革命党一干新锐的周旋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面——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中，袁世凯真正成为中国政坛第一角色。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迫使清政府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国璋南下途中，先到河南彰德密会主子袁世凯，请示主意。袁世凯授之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言。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辛亥革命后第四天重新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其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得到任命后，心满意足的袁世凯亲自南下，装模作样指挥军队攻占了汉口，为了进一步捞取政治资本，他并不想彻底打跨革命党人，随后就返回了北京。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此时，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他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不让清廷立刻垮台，另一方面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廷：如果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廷来恐吓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那时在中国的外国势力是很强大的，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革命势力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们希望狭隘的袁世凯取代清朝统治中国，镇压革命的力量。西方列强大都支持北方的袁世凯而不支持南方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



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惟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惟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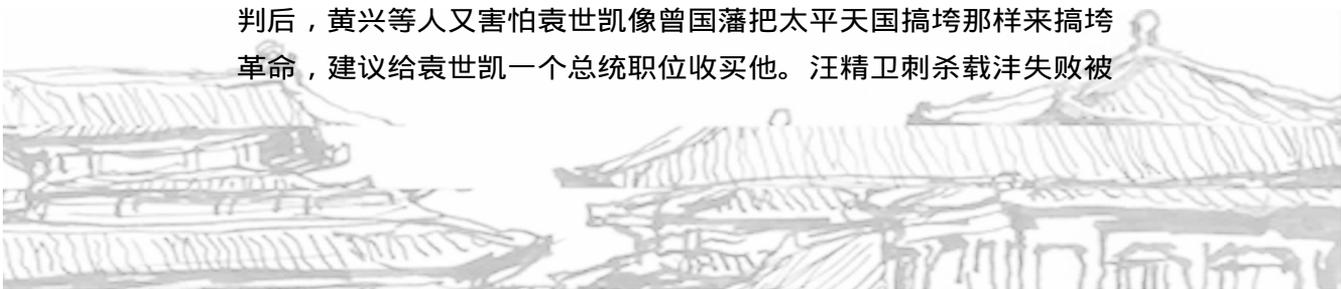
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快就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勾结在一起，在英国人的调解下召开南北和谈。当时南京政府的军队资金、武器和训练都很低劣，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实际上很难战胜袁世凯的军队，便接受了和谈。

袁世凯就派自己的亲信唐绍仪和的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

和谈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纷纷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很多外国军舰聚集在长江水面上，西方势力还阻止了革命军在大连的登陆。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分别增加在东北和内蒙的兵力。

南京政府自己意见也不统一，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压迫南京政府，要求尽快结束谈判，接受北方也就是袁世凯开出的条件。他们针对西方报纸鼓吹武装干涉的宣传，宣扬帝国主义一旦干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好像塌天大祸就在眼前。

在同盟会内部，妥协思想也占上风。黄兴曾给袁世凯写信说，希望他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南北开始谈判后，黄兴等人又害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建议给袁世凯一个总统职位收买他。汪精卫刺杀载沣失败被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面——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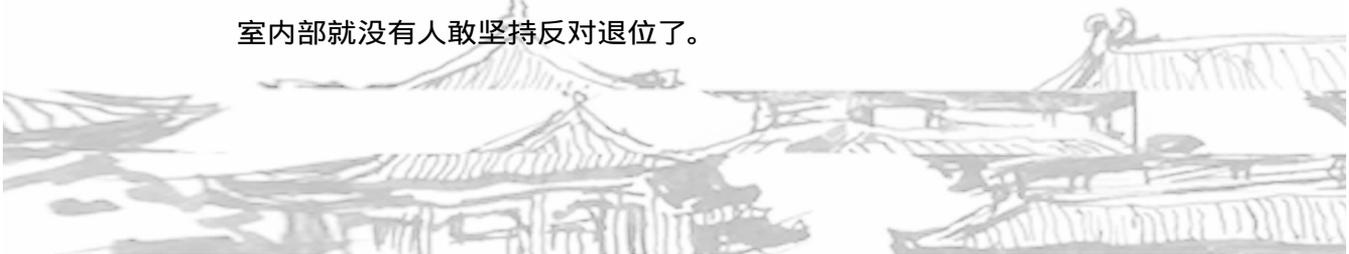
抓，出狱后也投靠了袁世凯，他一面向袁世凯告密，出卖北方革命组织，一面跑到上海，劝说革命党人接受袁世凯，还恶意攻击孙中山有为个人谋权利思想。

袁世凯的军队也时不时地找机会吓唬革命派。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担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指使他的手下冯国璋、段祺瑞等做出强硬的反应，撤消唐绍仪议和代表资格，段祺瑞在汉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并声称如采用共和政体，当战斗到底。冯国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决政体问题。他们还叫嚣要与民军开战。武昌、汉阳的北洋军违背停战协定，炮轰武昌。这些都是袁世凯故意做出不惜谈判破裂的架势，逼革命派跟他妥协。

最后南京政府只好妥协，接受袁世凯开出的条件，革命党人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无钱无兵的孙文随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代临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反正，随时让位。半个月后，孙文再次致电袁世凯，重申承诺。

袁世凯在压服了南方革命党人以后，立刻开始拿出两面派的手段，吓唬清朝皇室。那时的清朝皇室，只有一个没什么主见的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主持大局。

袁世凯一面指使手下将领给清朝政府上书要求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不时在各地制造骚乱，一面让俄国公使联合各国公使给清室发电报，也是要求清帝退位。他自己则哭哭咧咧地进皇宫，隐瞒自己按兵不动的事实，尽量夸大革命党人的威胁，还用法国大革命时法国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的例子吓唬隆裕太后。他的亲信大臣也不时入朝恐吓隆裕太后。当革命党人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接着又发表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话，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这样，清皇室内部就没有人敢坚持反对退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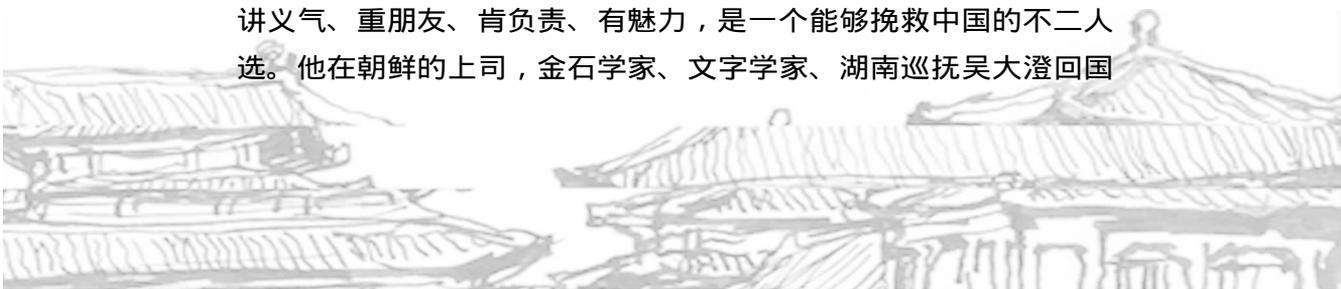


当时有个满族贵族组织的“宗社会”强烈反对清帝退位，袁世凯就故意放风说“宗社会”的领袖良弼是实行共和的主要障碍，结果良弼很快就被革命党人炸伤，本来伤能治好的，可给袁世凯派去的人医了一回，反而很快就死了。

隆裕太后给吓得魂不附体，最后只好答应退位，实行共和。但是，袁世凯表示革命的行动，却是在一番激烈的交易中逐渐明确的。他要等到有了十分的把握，才采取了最终的行动。剪掉辫子是当时表示革命的标志性行为。而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是一拖再拖。一说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的当天晚上。此说不符合袁世凯当时的心迹。如果没有得到当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和法律上的地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剪掉辫子的。于是，另一说可能成立：有学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致《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确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幹为袁剪掉辫子。另据莫里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还不肯剪辫子。尽管当天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任总统，但是直到次日，南京参议院才选举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袁世凯，说“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袁世凯又观察了一日，终于下决心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这确实符合袁世凯老奸巨猾的性格。

“袁世凯剪辫子”还成为当时北京城上层的轰动新闻。袁世凯为什么选在2月16日剪辫子呢？原来，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代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17票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这样，在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这位袁世凯才剪掉了辫子。

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除了有西方力量的支持，自身也有很重要的条件。清末民初，袁世凯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肯负责、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澂回国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印象不错。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其时，无论是各派革命党，还是国际社会，甚至中国普通民



众，无不对袁世凯寄予厚望。中国在那一时刻，似乎真是到了非袁不可的境地。

袁世凯果然也干了一些顺应革命形势的事情。

1912年1月26日，末代皇帝溥仪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起这一天：

“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毯上跪着一个粗壮的老头，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3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

6岁的小皇帝哪里知道，袁世凯的几滴眼泪，顷刻间革了中国几千年帝制的命。兵不血刃，国体巨变，袁世凯奸雄韬略，一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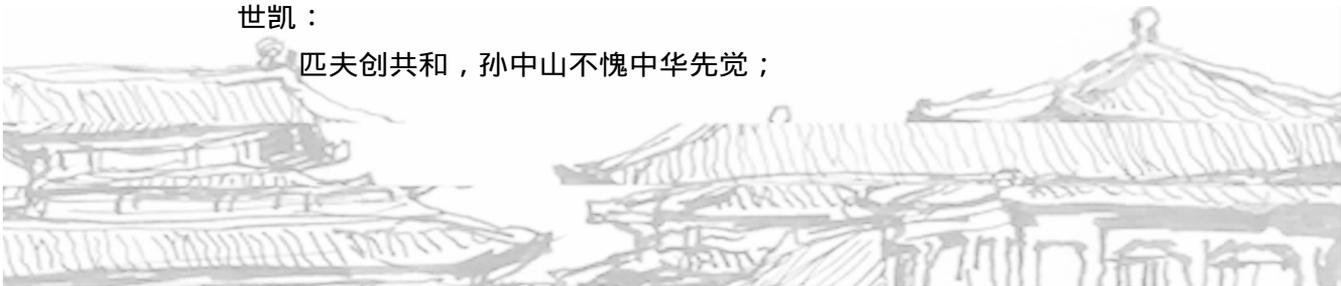
2月12日，溥仪下诏退位。退位诏书末尾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授意添上去的。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袁世凯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

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孙中山被迫再次退让，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革命党一诺千金，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许就是那个时候，袁世凯忽然发现，皇帝的龙椅，竟然离他如此之近。

后来在袁世凯复辟时，京城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袁世凯：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天朝末白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虽然崔启勋被袁世凯处决了，但这副对联却真实地勾画了袁世凯这位“共和英雄”的本来面目。

20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之后，形成了南孙北袁的权力较量，从1911年双十起义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到清廷颁布《逊位诏》，从8月孙赴北京与袁世凯多次商谈并最终让总统之位给袁，到1913年11月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政局大起大落，成败转瞬交替。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把大总统的头衔让给袁世凯，绝非仅仅因为顾全大局和不贪恋权力，更是因为实力对比和国内外局势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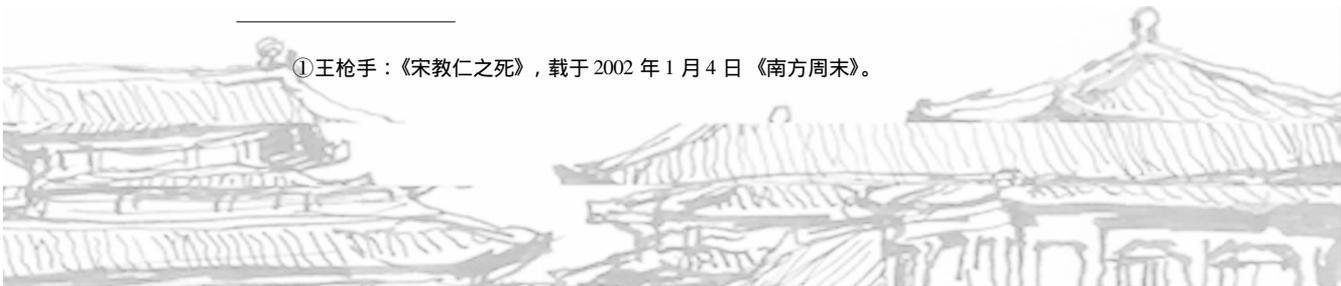
第五节 宋教仁之死

在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可以算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政治谋杀案，受害人就是革命元老宋教仁，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已经不是个人事件。

宋教仁，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却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民主政治的旋风。他心怀民主的梦想，要耗尽自己的良知和才智，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宪政理想。只可惜，他错生在一个没有规则也没有人想认真遵守规则的国度里，只能在 32 岁的时候就攀上了人生的最高峰，之后戛然而止，惨然而逝。^①

宋教仁，字遁初。1882 年 4 月 5 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上坊乡香冲村。年轻的时候留学日本，1904 年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举行了反清起义。1905 年在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与改良派进行大论战的同时，还多次举行了反清武装起义，但均遭失败。特别是 1911 年 4 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大会员丧失了革命的信念和斗志。宋教仁、谭人凤等鉴于同盟会军事战略重心局限于广东、广西、云南一隅，屡战屡败，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1911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闸北区北浙江路 821 号（今浙江北路 61 号福建北路小学）设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秘密接洽机关。中部总会奉

^①王枪手：《宋教仁之死》，载于 2002 年 1 月 4 日《南方周末》。



天朝末日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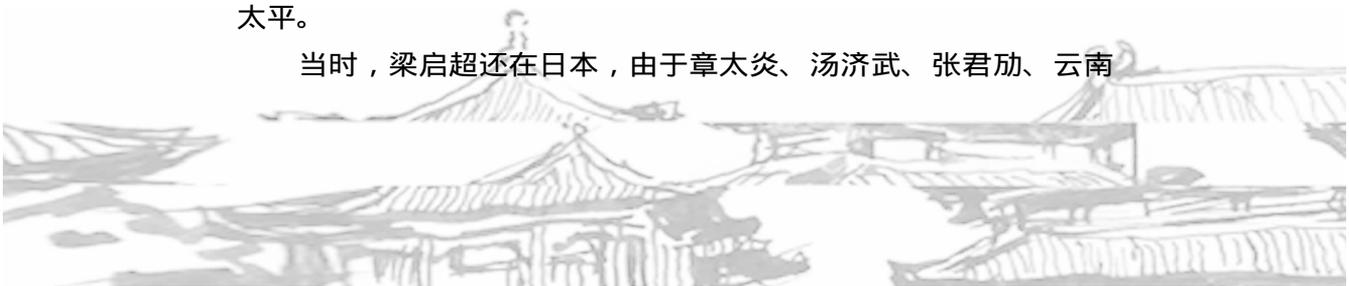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同盟会总部为主体，以筹划长江流域江、浙、皖、赣、鄂、湘、川、陕8省武装起义为己任，并确立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到各地运动新军，策划起义。从此革命的火种由上海撒向内地，革命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起来，同盟会是通过中部总会实现对武昌起义的领导的。上海光复后，同盟会总部自日本东京迁回上海，中部总会遂告结束。可以说同盟会中部总会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舞台上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12年1月18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宋教仁担任新政府法制局总裁。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法律、政治方面的特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不起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3个月就夭折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到3个月，在袁世凯的威逼和伪称拥护共和及革命党人的退让下，1912年2月中旬，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当时，袁世凯一再虚伪地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遵守《临时约法》、拥护民主制度。并按照《临时约法》组成第一届内阁，还让同盟会员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宋教仁担任农林总长。但实权却由袁的亲信掌握，如陆军部长便是由段祺瑞担任。由于袁世凯独裁专制，目空一切，宋教仁愤然谢绝了袁的一再挽留，于当年7月宣布辞职。不久，袁世凯就把唐绍仪赶走，让他的心腹赵秉钧担任总理，并开始做起他那称孤道寡的皇帝梦来。

袁世凯的虚伪表演，曾经迷惑了包括梁启超、宋教仁在内的许多人，他们以为袁世凯真的拥护共和制度，赞成议会民主、政党政治。从而对袁氏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看不透袁的本质。甚至有人寄望袁世凯做中国的华盛顿，为民主政治奠基，为万世开太平。

当时，梁启超还在日本，由于章太炎、汤济武、张君勱、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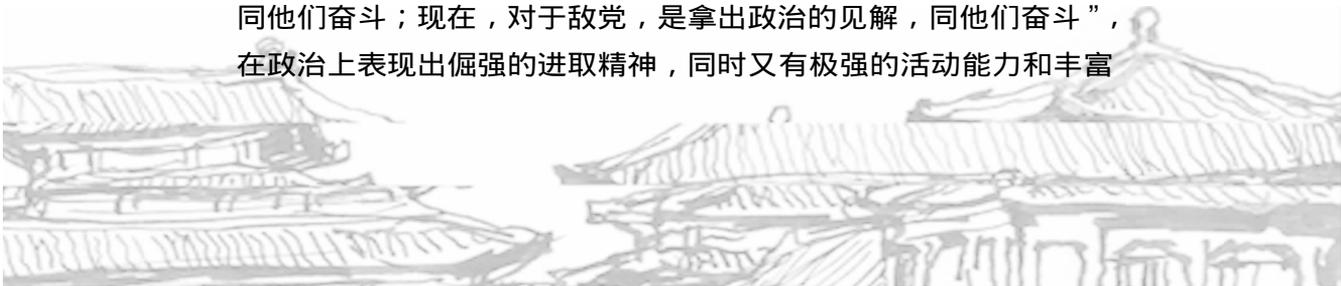


都督蔡锷、甚至副总统黎元洪等人先后来信和通电对梁启超表示欢迎，梁氏便于1912年10月回国，并决定了拥袁的方针。所以回国后，便向袁世凯就立国和财政等方面著文献计献策。梁氏在1913年2月24日正式加入袁世凯支持的共和党。但在3月初写信给女儿思顺时，已谈到对国事的失望。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便致力于实业方面，对同盟会的活动已很少过问，宋教仁则成了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为了革新政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宋教仁辞职后积极主张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以此来限制袁的权力。而要组织政党内阁，就必须有一个大的政党。这年5月间，民社与统一党、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几个小党派联合成立了共和党，拥护袁世凯，反对同盟会。为了与之相抗衡，宋教仁征得孙中山等人同意，以放弃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为代价，于当年8月在同盟会的原有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国民公党等几个中间党派，组成了国民党。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派人，幻想利用约法和议会来限制袁世凯，甚至想依靠议会的多数，由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与袁世凯分享权力。

由于宋教仁不断扩充国民党的力量，而使国民党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1912年底，国会大选开始，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取得了多数席位，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自然成了政党内阁的组阁人。为了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尖锐地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听者人人振奋，所到之处，掌声雷动。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①

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统治地位。袁世凯对待政敌有两个法宝：一是收买，或给予金钱，或授与高官厚爵；二是暗杀，如果政敌不被收买，则暗杀之以除后患。当宋教仁漫游全国，四处讲演抨击时政，袁欲以金钱贿赂之，乃令人付给宋一本支票，可以自由签发支票，绝不退票。但宋是条硬汉，又是一代伟大政治家，当然不为所动，严正地予以拒绝。这使袁对宋更加顾忌，袁透过第三者向宋表示，只要宋不坚持责任内阁制，袁便提名他为内阁总理，袁对“责任内阁”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性。原来他在宣统年间养痾涸上时，武昌爆发了革命，清廷被迫起用他为湖广总督，他乃提出组织责任内阁作为出山的主要条件，这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他就是借责任内阁迫使清廷让国的。现在他做了总统，遂把责任内阁制度当作了洪水猛兽，宋口口声声不离责任内阁，劝诱、收买、威胁都没有用，这怎不让老袁对这位湖南硬汉下毒手呢！早在国会选举前，袁世凯就试图拉拢宋教仁，曾赠他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要他放弃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宋教仁不为所动，以“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为由退回支票。袁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当他得知宋教仁拥黎逐袁计划后终于收买流氓，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但是对袁来说，杀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下决心的，何况要杀的又是人人皆知的精英人物宋教仁。

一直到了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从老家长沙沿江东下，途经武汉、安徽、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的内心深处已经认定，自己的宪政理想就要迈开第一步了，他在杭州写下了这样的诗：“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语气中已明显流露出政府总理舍我其谁的气魄。

^①傅国涌：《主角与配角》，长江文艺出版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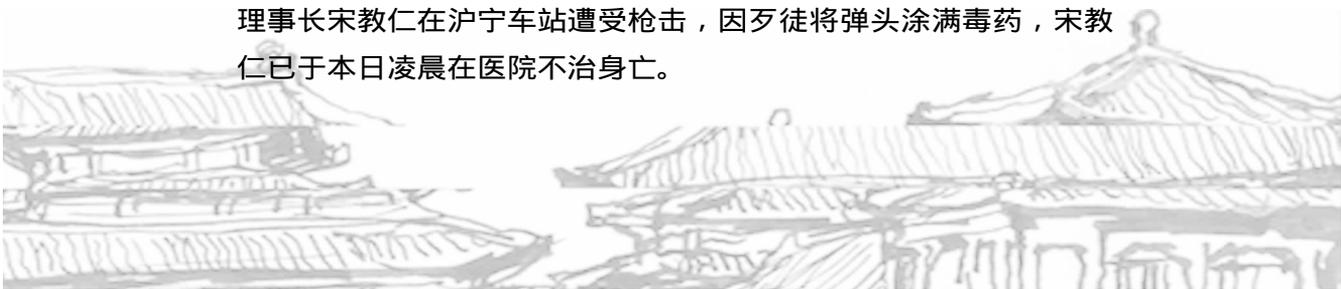


袁世凯认识到了，再不杀宋，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就保不住了，更别想做什么皇帝梦了。袁世凯终于下手了。时间：1913年3月20日。地点：上海火车站。凶手：武士英，山西小贩；联系人：应桂馨，上海无赖；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历史那一幕是刻骨铭心的。1913年3月20日夜，上海沪宁车站，战乱初平的上海滩又开始人流如织。“呜——”沿着破蔽的铁轨，即将开往北平的蒸汽火车拖着长长的汽笛，缓缓地驶进站台。骚动的人群中，一位身着西装的神秘人物在随从的簇拥下向头等舱门口走去。突然，一个流氓打扮的青年快步上前，从怀中掏出手枪，朝着“西装”的背影射击，两声清脆的枪声击碎了人们的思维，宋教仁痛苦地倾倒在挤车的人群中，站台上的秩序顿时大乱。

为他送行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宋教仁对于右任说：“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诸及公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他在痛苦中仍念念不忘国事，要求他的同志在他死后“总要往前做”，并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真诚地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宋教仁被暗杀的电报到京，章士钊正和袁世凯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的叹息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天早晨，上海各大报馆纷纷爆出头条消息：昨晚，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遭受枪击，因歹徒将弹头涂满毒药，宋教仁已于本日凌晨在医院不治身亡。



天朝末

清朝最后五十年

The Sunset of Qing Dynasty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3月22日，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成立仅仅一年就黯然离世，年仅32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的朋友，无不失声痛哭。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当天就给国内发电报：“闻遁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袁世凯在得知宋教仁的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在假惺惺表示哀悼、愤怒的同时，抑制不住的是内心的喜悦。黎元洪、赵秉钧、章太炎，共和党、民主党等政见不同的个人、政党、团体都纷纷发出唁电，黄兴、国民党的通电则充满了悲愤之情。在近代史上政治人物被暗杀几乎是常见的，但各界反应之强烈以宋教仁之死为最。

宋教仁对自己的结局是没有预料到的，他在此前只有着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满腔抱负。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自我牺牲，急流勇退转身去经营“路政大计”去了，金迷纸醉的上海滩又继续着昔日的繁华，身为袁世凯北京政府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却心怀忧郁。本来，宋教仁所希望的是，自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按照他的设计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况且，宋教仁的构想还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予以确定。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但是，形势发生恶劣逆转，袁世凯根本就没有实践《临时约法》的打算，而是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夺取革命派去的权力和地盘，一场新的内战一触即发。

宋教仁不希望流血，宋教仁希望通过政治的手腕解决权力问题。这个时候，他有自信，因为他已经有10余年的革命经历了，积累了大量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深厚的西方政治理论修养让他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在他看来，他所面对的，不过是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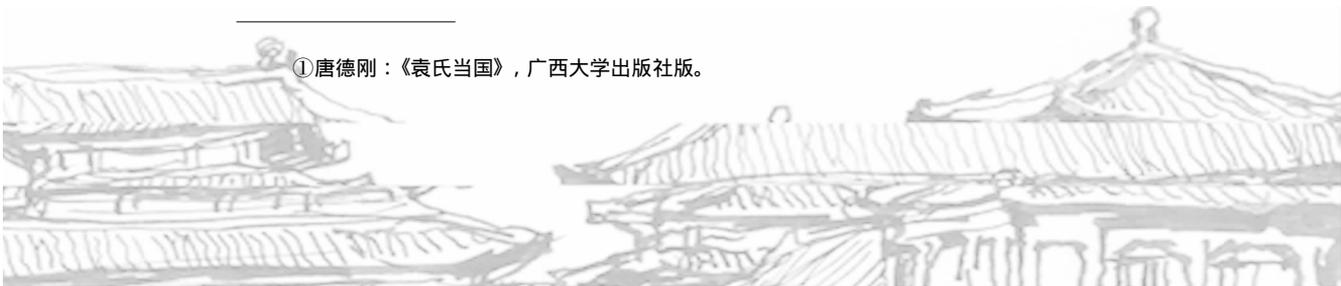


政治的袁世凯，一介武夫罢了。于是，他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模式，联络合并了一批小党派，在全国大造舆论拉取选票，在依法设置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非常高兴，以为中国的前途通过选举就光明灿烂了。

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在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①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防”。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地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道要变了，天也要变了，袁世凯假惺惺的面孔当然也要变化了，而心地坦荡的宋教仁还在“春闺梦里”。在他最后一行之前，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意外，但宋教仁坦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于是，1913年3月20日的上海，就在宋教仁预备赴北平就任内阁总理的火车站站台上，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伟人的胸膛，罪恶的毒液浸染了他充满幻想的血液，巨星的陨落，民族的悲哀，民主的葬礼，随着宋教仁身躯的倒下，都幻为了一个永恒的悲情。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大学出版社。



宋教仁被杀了，孙中山开始觉醒了，也就揭开了所谓的“二次革命”的序幕。“三尺剑，五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侯，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滴苍虹血泪，向屈子招魂！”这幅孙中山留下的挽联，何其伤感啊！

宋教仁被刺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倒可以折射出当时的许多人和事，也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宋教仁的被刺，无论当时的政坛还是今天的许多所谓主流历史学家，均普遍把这件事情无限升级，认为这意味着宪政民主在中国就像宋的个人命运一样死路一条。独裁专制集权的思潮重新占有市场，袁世凯甚至最终想回到帝制的老路上。

第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点法治观念在处置这件事情时被断然抛弃。所谓“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想当然地认为法院会被政府影响，便要求改变国家的司法体系，这种对法治的公然践踏的行径，与宋的法治思想真是南辕北辙。

1913年，那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尽管这次选举还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了限制。毕竟开始了，就是好事情。

“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是宋教仁宪政思想最大的一个实践，尽管离他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却让国民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还可以这样。

如果没有在第一线，宋教仁也许会成为宪政教父式的精神领袖。作为“议会迷”，可以说，早期的辛亥革命党人中，对现代宪政、法治、政党等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的，他是第一人。早年东渡日本的求学生涯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了，对日后的《临时约法》影响深远。此外，翻译的《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等著作，亦让革命党内许多人对宪政这个新生事物有个感性的认识。

宋教仁身上还有一样好东西，那就是中国政治上少有的“当仁不让”的观念。用傅国涌先生的话说，宋有一种“健全的角色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总是对“第一”的态度比较暧昧，退隐成为被推崇的美德，皇帝即位还要假惺惺推辞几番。“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这种责任感今天也是我们所缺乏的。

宋教仁另一个应该被载入史册的宪政实践就是改组国民党，他才是国民党的缔造者。

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都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政党，或者只能算一个带有旧社会性质的革命政治组织。1912年宋先生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在同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多党竞选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可惜宋先生倒下了，还未能等到把国民党彻底改造。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而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起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开了先例，是一罪。

傅国涌先生认为，“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宋教仁死，中国的一次民主萌芽被掐死了。连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也拉开大清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

后记

感谢读者购买、阅读本书。

本书是全景式描写清末民初人物、事件的作品。我们之所以选择上起辛酉政变，下至宋教仁遇刺这段时间，是因为其中包含的人事难读、耐读、让人手不释卷，对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中的人和事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希望本书能够进一步勾起读者对这一段历史的兴趣。

本书的第一章、第三章由张程写作，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由陈娇娇写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广泛吸引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参阅了大量论著。除在书中标注外，我们要对所有的前辈和老师表示感谢。全书由张程通读统稿。

最后要感谢中图恒业的杨文编辑，他对本书的三易其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要感谢北京牧工作室的所有同人；更要感谢为本书的编辑、印刷出版付出心血与汗水的所有人。

谢谢大家。

张程

二〇〇七年三月一日

